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沈志华 李丹慧 著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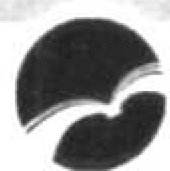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沈志华 李丹慧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沈志华　李丹慧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01-005426-6

Ⅰ．战…　Ⅱ．①沈…②李…　Ⅲ．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Ⅳ．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3035 号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ZHANHOU ZHONGSU GUANXI RUOGAN WENTI YANJIU
——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沈志华　李丹慧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5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426-6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出　版　说　明







一、研究中苏关系史已近十年，期间收集了不少资料，也写了几篇论文。有同行和学生希望我们把相关的题目集中起来，出个论文集，以便于别人参阅，还可以作为讲课的辅助教材。恰在此时，我们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通过，题目就是“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也需要清理一下自己过去掌握的资料和形成的看法。于是，就选编了这个论文集。

二、这几年我们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做了一些历史研究者最基本、最普通的工作，即一点一滴地收集和整理史料，然后精心地进行筛选和疏理，再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把一些历史事件或过程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细细想来，做好史学研究的这些基础工作也并非易事，这里需要的基本功就是耐心和甘于寂寞——宁静致远嘛。

三、这里选编的论文，从题目到内容，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来发表时的状况，所作的编辑工作主要有：1. 少量文字和措辞的技术性改动；2. 按照《历史研究》杂志的规范标准对注释进行统一和调整；3. 个别论文在发表时编辑部考虑版面做了一些删节，现恢复定稿时的原样；4. 有些史料和研究的状况在论文发表后已经有所改变，其中需要加以说明的，在注释中用楷体标明。

四、为了行文方便和节省篇幅，注释中的俄国档案馆名称一律使用了缩写字母，其全称如下：

АПРФ（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АВПРФ（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ЦХСД（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当代文

献保管中心，现改名为 РГАНИ（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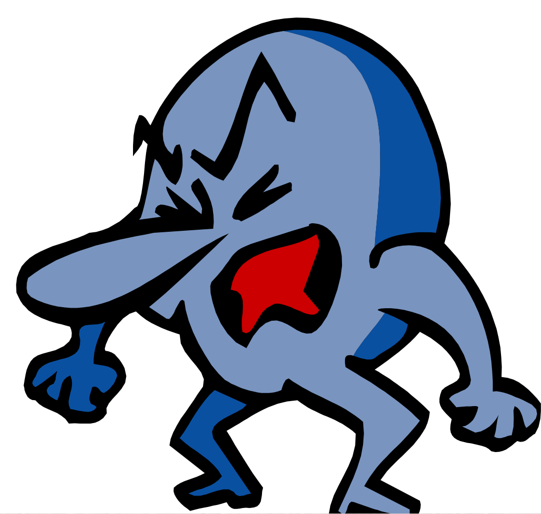
РЦХИДНИ（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现改名为 РГАСПИ（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ГАРФ（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РГАЭ（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Экономики），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

ЦАМОРФ（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

沈志华 李丹慧
2005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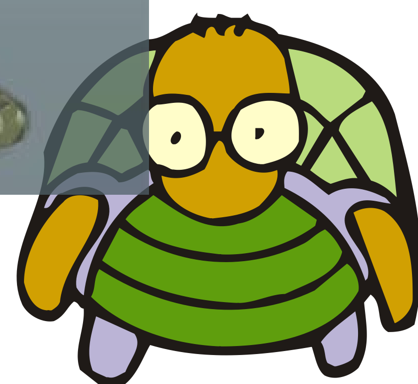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同盟条约

二、苏联专家

三、对华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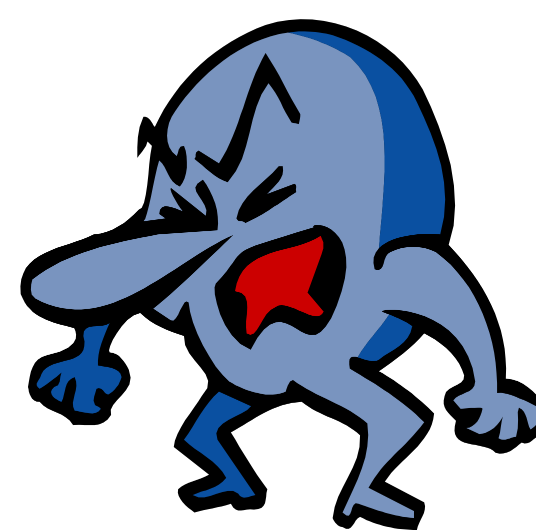
四、友好合作

五、矛盾分歧

六、冲突敌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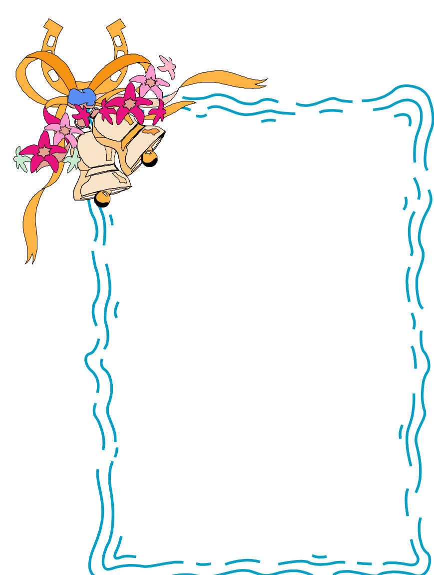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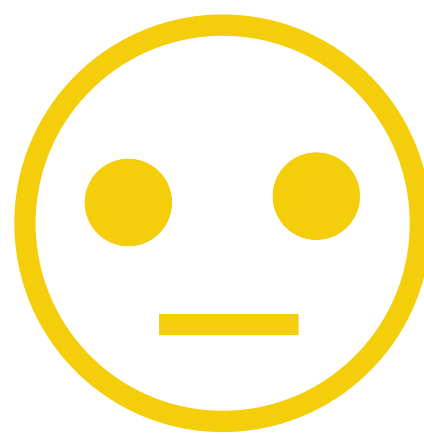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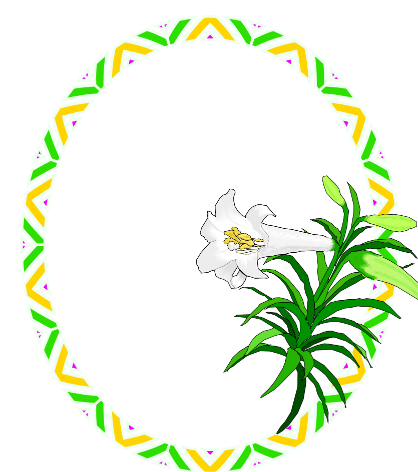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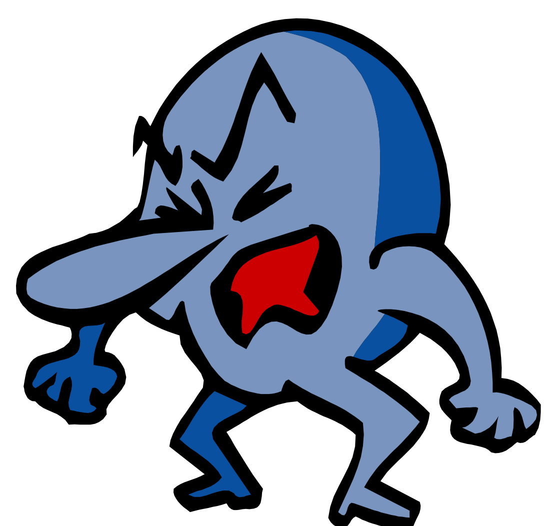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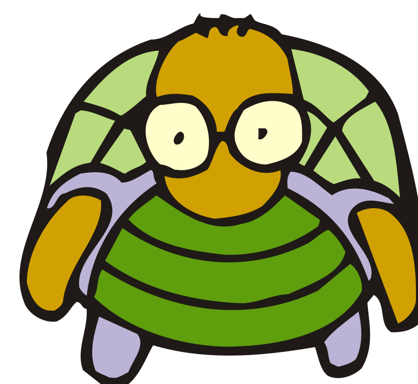








一、同盟条约



1.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和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 1945 年中苏条约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也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然而，由于相关档案文献的缺乏，以往研究者依据现有的材料，无法肯定和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是谁作出了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化解利益冲突的结果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甚至因当事人记忆上的模糊或错误，导致人们得出了一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1997 年，笔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七十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订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本及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

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①] 尽管这还不是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的全部档案文献，但对这些文件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作出比较清楚的描述，从而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上正确地判断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并回答上述几个问题。[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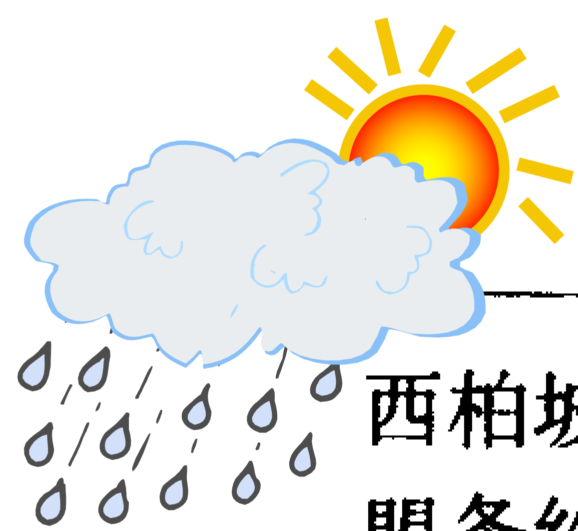
(一)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不同设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苏条约中保证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 1949 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

① 其中大部分文献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1998 年总 67 辑和《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4 期。

② 在这方面首先作出贡献的是联邦德国苏联东欧研究所迪特·海因茨希(Dieter Heinzig)教授，虽然笔者还无法阅读他的德文新著《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 年～1950 年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但通过一起开会讨论，并看过陈之宏、陈兼为该书所写的书评(载《历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后，相信他的研究是相当成功的，尽管笔者有些观点与其不尽相同。(海因茨希著作的中译本已经出版：《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笔者曾与俄国学者冈察洛夫合作《1950 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一文，讲述了谈判的基本过程，本文将作进一步分析，并增加了新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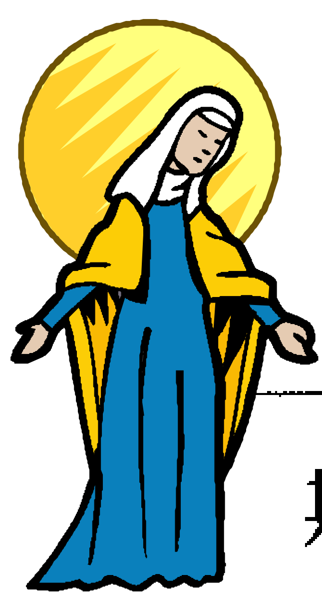

西柏坡期间。尽管这次会谈没有直接提出是否废除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但恰恰是这些问题涉及到中苏之间的主权和利益分歧。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在西柏坡会谈中,苏联采取了当年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同样的策略,即以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保证苏联的利益。① 当毛泽东暗示苏联插手新疆问题时,米高扬立即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任何要求和企图。而在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统一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理由是如果蒙古实现统一,那将是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随后,斯大林又来电,表明了同样强硬的立场。毛泽东只得表示不再提出蒙古问题。关于东北问题,中苏双方都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谈到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毛泽东一方面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在革命政府掌握中国政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又表示,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委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很清楚,新中国没有海军,因此目前尚无力收回旅顺港,于是,在得到米高扬的报告后致电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所以,米高扬当时的感觉是正确的: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②。

---

① 参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 106～107; №3, с. 101。





斯大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如果确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那么中长铁路则是这一战略的生命线，他十分担心毛泽东会提出 1945 年中长铁路协定的有效性问题。据随同米高扬来华的科瓦廖夫回忆，斯大林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铁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铁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①。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个直接涉及中苏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像前两个问题那样表示明确的态度。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铁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摩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但他接着又暗示将一些东北企业归属中长铁路是违背有关协定的：国民党军队掠夺了中长铁路及部分企业，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又归还给了中长铁路。不过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把企业交给中长铁路，似乎是破坏了条约。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② 然而，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铁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③。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

但是对于即将成立新政府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等待的。至迟 1949 年 4 月，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

---

①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с. 86。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 ～ 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3, с. 101。

③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с. 86;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1994, p. 63。

题已经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对民主人士谈道: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①] 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 1945 年的中苏条约。对于新中国来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以新约代替旧约,不过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揣摩到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刘少奇访苏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讲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②]。

1949 年 6 月至 8 月,刘少奇在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按照事先的准备,向苏联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举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新条约。此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急于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他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③]显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想摸到对方在即将开始的外交谈判中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同盟条约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寄希望于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

---

①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 年 4 月 17 日,《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21 页。

② 采访邓力群记录,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第 456 页。

③ 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4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8,л. 11~50。

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①]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②] 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③] 看来，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④] 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表明访苏的目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所以他仍然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只身前往莫斯科了。



(二)毛泽东坚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于 1949 年 12 月 16 日到达莫斯科，6 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就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

---

①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2а, п. 288, д. 19, л. 81～85，转引自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 75。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31 页。

③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с. 88～89。

④ 在此之前，研究者大多根据师哲的回忆录认为，中苏莫斯科会谈初期出现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或双方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有俄国学者称毛泽东访苏主要是为了养病的说法，更是大谬不然了。

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他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会谈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很不高兴，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恩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①]

在第一次对话中，斯大林先声夺人，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原则，而毛泽东却未能明确表达出中方的立场。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仍然强调，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并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②]

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③] 显然，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此时意识到，通过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已经不大可能按照中方的意图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了。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现出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待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希望下一次会见安排在12月

---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23 日或 24 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①] 毛泽东对第二次会谈仍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道："已与斯大林约好 23 日或 24 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②]

然而，在 12 月 24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③] 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待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④]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2 月 25 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 日和 27 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 1950 年 1 月 1 日前的几天，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⑤] 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

---

①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с. 89。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97 页。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8 页。可惜的是，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

④ *Юдин П.*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ена и Сталин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05～106。

⑤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65～170 页。

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作出让步。

1950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①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中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② 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了签订新条约、捍卫新中国利益的决心。斯大林必须考虑到毛泽东的处境和可能做出的反应。③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

---

①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1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1～4。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06页。

③ 有学者根据对苏联当事人的采访指出,米高扬当时就是如此劝说斯大林接受中共要求的。参见Odd Westa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rs,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1950～1961,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1996.1。

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①]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②] 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斯大林无疑是一个震动，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③] 显然，考虑到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中美缓和对苏联在亚洲利益形成的威胁，斯大林也不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回。[④]

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便开始缓解，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 月 2 日晚 8 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 1 月 3 日到北京，恩来准备 5 天，1 月 9 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 11 天，1 月 19 日到莫斯科，1 月 20 日至月底约 10 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 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⑤]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 月 3 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⑥]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

①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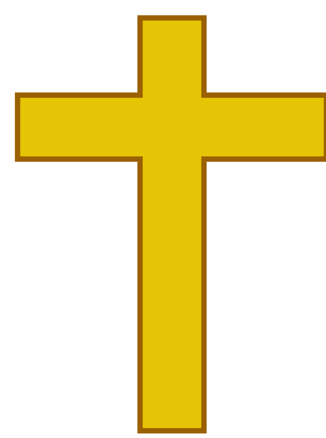
② 当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后，毛泽东即指示中国外交部，对于英国建交要求的答复“应当拖一下”。这说明他当时提出这一问题确是别有用意的。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249 页。

③ 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11。

④ 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参见 *Юдин П.*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ена и Сталин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06。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212 页。

⑥ 《汪东兴日记》，第 173 页。



(三)苏联对同盟条约的精心设计

中苏第一回合谈判确定签订一个新条约以代替1945年的条约,问题在原则上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斯大林此时的让步不过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关键的问题在于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在这个实质问题上,莫斯科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条约草案,其目的是全面维护苏联在1945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1945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的各种草案却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由此看来,斯大林所谓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将引起破坏雅尔塔体系的连锁反应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借口,至多也只是表面层次的理由,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毛泽东此时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他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和1月9日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中,只是强调"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议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①] 而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则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的行装。然而,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协定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草案第一稿,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②]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

---

①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年1月6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3.,п. 8,д. 302,л. 1~5;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1950年1月9日。参见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p. 247~248。

②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12~15。

1月9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改成比较具体的内容：“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1月10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增加了以前斯大林提出过的说法，即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年至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②]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二十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③]

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年至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一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

①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18～19。

②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20～25。

③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26～29、30～34。

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①] 鉴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在 12 月 16 日和 1 月 6 日的会谈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条约"的说法，显然，维辛斯基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注意到了中方的这一说法。[②]

为了在新条约中保留旧条约的部分内容，苏联需要从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理论中找到法律根据。苏联外交部条约法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 1 月 13 日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关于 1928 年 2 月 20 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理论中，都没有谈到在旧条约失效的情况下，其内容被新条约所吸收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不乏在旧条约没有被明确废除和取消的情况下其内容与新条约并行有效的例子。杜尔金涅夫斯基列举了道威斯和杨格计划，关于同贩卖妇女、儿童作斗争的公约，1890 年和 1906 年中英西藏协定，以及苏联先后与法国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实例，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以前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③]外交部此举的意图主要是针对中长铁路和大连问题的。鉴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已经表示不会在近期收回旅顺港军事基地，因而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就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的控制权上。所以，莫斯科极为重视有关中长铁路及大连港的协定，其方针就是将这一问题与条约本身（含旅顺问题）区别开而单独提出。

苏联外交部首先确定了处理中长铁路协定的原则。根据法律专

---

①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1～4。

② 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莫斯科，更没有提交中方的条约草案。所以，师哲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即是周恩来提出在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二字的（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48 页），是值得怀疑的。

③ 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1950 年 1 月 13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117～121。

家的建议，维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草案，其中专门提出"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建议，在中苏条约签字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①

接着，苏联交通部便提出了关于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协定的具体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交通部长贝舍夫在1月19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明了他们如下的修改建议：

关于中长铁路协定：

一、重新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1945年的协定没有把位于南线(哈尔滨一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而新修订的条款应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需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拥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二、规定由中苏双方人员轮流担任铁路局的理事长、监事长、局长和总稽核等职务及其副职，每三年轮换一次。而以前这些职务是固定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的。

三、新增加的条款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四、将旧协定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一句改为"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关于大连港协定：

一、尽管大连港未被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原协定的第三条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二、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

① АВПРФ, ф. 07, оп. 23а, п. 18, д. 235, л. 5～7。

贝舍夫在报告的结尾还特别说明，把 1945 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的资产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因为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 年其利润是 1.63 亿卢布”，“从 1946 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数额的利润”。而目前“满洲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① 这就是说，保证对中长铁路的控制，对于苏联不仅有战略利益，而且还有直接的经济利益。

1 月 21 日，葛罗米柯、贝舍夫、科瓦廖夫、罗申等六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

一、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 1945 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

二、关于从 1950 年 2 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四、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

五、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和交通部贝舍夫就上述两个议定书草案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②

1 月 22 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 12 个草案呈报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

①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1950 年 1 月 19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20，д. 248，л. 4～13。

②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20，д. 248，л. 20～28。

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①

苏方最后确定的中苏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的草案没有原则上的变化,只是将条约第七条的内容单独列出,形成了《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上述提交斯大林的 12 个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惟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原因何在? 显然,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况且,莫斯科也不愿为中方代表提供讨论这三个协定具体内容的机会。

至此,苏联方面已经为中苏第二回合谈判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 1945 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 30 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 1950 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 2 年至 3 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这是中苏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期望,接下来就要看刚刚到达莫斯科的

① АВПРФ, ф. 07, оп. 23а, п. 18, д. 235, л. 41~50。

周恩来拿出的是什么方案了。

(四)斯大林被迫作出的重大让步

中苏关于签订新条约谈判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在于,同苏联改变其谈判方针一样,中国提出的条约方案也完全背离了谈判开始时本身提出的方针。中方原先提出在形式上必须以新条约取代1945年的条约,而在实际上可以保留旧条约的具体内容。但在确定了要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原则以后,中方最初提出的协定文本却与旧条约的内容大相径庭。正是在涉及双方实际经济利益的谈判中,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便暴露出来了。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对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①]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定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②] 1月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

② 《汪东兴日记》,第194页。

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①] 这一点与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中的说法完全不同，按照以前中国方面的说法，1950 年中苏条约的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②]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③]

无论如何，就条约本身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④] 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

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上述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于 1 月 26 日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1)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2)凡经大连港的苏联的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3)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4)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5)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⑤] 看来，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的确是有周密考虑的，他们在中方尚未提出对应方案之前就提出超出原协定内容的要求，不外是为下一步谈判留出让步的余地。然而，莫斯科万万没有想到，中方却提出了与苏方设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 月 26 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

---

①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38～40。

②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8 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3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2 页。

③ 笔者后来了解到，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周恩来当时曾有一封电报称条约是我方起草的。但笔者估计周这样说很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不足为凭，而且目前也没有看到任何中方最初起草的文本。需要指出的是，中苏谈判的直接参加者、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的回忆与俄国档案材料是吻合的，他承认"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没有原则变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37 页)。

④ АПРФ，ф. 3，оп. 65，д. 369，л. 7～10；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8～15。

⑤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20，д. 248，л. 35～37。

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①]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致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作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①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26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38~55。

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①]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作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②] 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争论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作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

① АВПРФ, ф. 07, оп. 23а, п. 20, д. 248, л. 74～79。

② АВПРФ, ф. 07, оп. 23а, п. 18, д. 234, л. 17～22。

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作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①

周恩来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因为作出重大让步的的确是苏联方面。2 月 5 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 1945 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② 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有时间和闲心在莫斯科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了。

根据俄国档案材料，2 月 11 日至 13 日，双方代表进入了新一轮谈判，又举行了三次会谈。2 月 10 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③ 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

---

①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1 日、2 日、3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8～13、29～34、50～55。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3～24 页。

③ 《补充协定》原件及中方的修改意见参见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64～69。在这一问题上，俄国档案记录与以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些说法又有所不同。中国有材料说，毛泽东开始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5 页；《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 页。

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2月14日18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这显然是针对《补充协定》而给苏方出的一个难题。维辛斯基表示这样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并答应向苏联政府汇报。[①]

2月14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②] 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③]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双方都没有公布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议定书和那个《补充协定》。

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作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方面。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涉及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五）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其结果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尽管个别条款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大部分东西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

---

①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2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2月13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64～69、70～74、75～76。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43页。

③ 正式发表的中文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8～523页。

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难道斯大林真的愿意牺牲苏联多年来梦寐以求且来之不易的战略利益吗?[①] 苏联坚持要在军事方面使用中长铁路和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当然是要以此为补救措施来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仅仅如此,焉能弥补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损失?那么,斯大林能够在中长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上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或深层的考虑?

第一,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两大要素之一,蒙古问题在中苏谈判中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块心病,但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中长铁路等问题的交换条件的。

尽管如前所述,毛泽东已经许诺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但是在正式谈判中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国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因此苏联在这方面也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根据外交部的要求,1月16日杜尔金涅夫斯基向维辛斯基报告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1945年11月关于蒙古独立的全民投票议定书的文本,还在档案管理局和第一远东司找到了批准承认独立和准备互换外交代表的公报和1946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与蒙古代表苏伦扎布互换的照会书。[②] 然而,苏方准备的这些材料都没有用上。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③] 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动提出新政权承认蒙古于1945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周恩来随后便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文本。

---

① 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38~439页)。

② 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1950年1月16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д.235,л.123。

③ 当周恩来突然提到蒙古问题时,斯大林不明所以,生怕在外蒙独立问题上再出枝节,神态十分紧张(《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0页)。

照会全文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仅以此声明，缔约的双方在如下事项中应达成理解：

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的双方同意宣布：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

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 1945 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①]

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 1945 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联就必须在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

第二，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耿耿于怀。[②] 而苏联掌握的情报充分表明，美国在千方百计离间中苏关系，并策动新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

---

①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16。

② 据齐赫文斯基后来说，斯大林一直怀疑，内战时期美国没有发动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是因为中共和美国政府之间有某种默契。参见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载《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 年第 2 期，第 59 页。

的联络人，李克农于 1949 年 11 月 17 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其宣传重点是"挑衅性地把中苏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自然资源"，攻击 1945 年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①] 1950 年 1 月 17 日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报告了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报告说，根据可靠情报，"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美国将通过英国承认中国的机会，试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并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作为将来同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桥梁"。[②] 几天后，苏联使馆又传来了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秘密情报。[③] 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特别是当艾奇逊 1 月 12 日关于中苏之间相互关系的公开讲演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去见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以相应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④] 至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⑤] 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当然是得不偿失的。无论如何，

---

① 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1949 年 11 月 17 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2，п. 288，д. 19，л. 99～102。

② АВПРФ，ф. 0100，оп. 43，п. 315，д. 142，л. 53～54。

③ АВПРФ，ф. 0100，оп. 43，п. 315，д. 142，л. 59。

④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 年 1 月 17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9，л. 1～7。

⑤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54～456 页。1 月 17 日谈话记录表明，师哲所说毛泽东没有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是出于"误会"，显然又是记忆的错误，因为谈话记录表明毛泽东特意问明"以政府名义"就是指外交部。

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阴谋得逞。[①]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精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可以在同意中国的主张、放弃苏联在东北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苏联一直坚持的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

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缔结同盟条约的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事实是,就在周恩来提出《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1 月 12 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了南朝鲜;1 月 19 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②] 对此,斯大林迟迟没有作出反应。因为苏联不愿看到在远东出现一场可能引发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1949 年 9 月苏联领导人还专门为此作出决议。[③] 然而,就在 1 月 30 日,即接受中方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表示愿意同金日成直接进行商谈。[④]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及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

---

①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谈话中无形的第三者"(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 104)。

②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 233 页;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1 月 19 日,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3, д. 11, л. 87~91。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49 年 9 月 24 日,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776, л. 33~38。

④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 年 1 月 30 日,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5а, п. 3, д. 11, л. 92。关于苏联转变对朝政策的详细过程,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载《二十一世纪》2000 年 2 月号。

的作用，[①]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这样，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的上述设想和动机，[②]但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 1945 年 6 月 29 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③] 甚至在是年 9 月美苏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以后，苏联外交部仍然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八十二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④] 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

① 南朝鲜港口的惟一缺陷就是没有与苏联的铁路直接连线，而为了把苏朝之间的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 1949 年 3 月已经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仅 58 公里的铁路线。参见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49 年 3 月 5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6，л. 13～23。

② 顺便说一句，就斯大林的处事惯例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决策程序而言，很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即使苏联有文件公开说明其改变对朝政策的动机，也无法确定那白纸黑字就是斯大林的真实想法。

③ 茹可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报告，1945 年 6 月 29 日，АВПРФ，ф. 0430，оп. 2，п. 18，д. 5，л. 1～7。

④ АВПРФ，ф. 0431I，оп. 1，п. 52，д. 8，л. 40～43、44～45，转引自 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8，1993，pp. 9～11。

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①

对此还可以指出的间接证据是，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② 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不仅战时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交易是众所周知的一例，而且就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当美苏之间讨论三八线的划分问题时，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③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是有缜密的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通过对中苏外交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形式上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但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反而加强了。苏联被迫作出的让步和牺牲固然使斯大林心中充满怨气，而毛泽东尽管对《补充协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他常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

---

①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估计美国对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反应问题。笔者对这方面的论述，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四章。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5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7页。

③ 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二章第一节：“三八线的划定及其作用”。

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说法，也表明他接受这个协定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决定出兵帮助朝鲜，才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原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日译文发表在《思想》2001 年 8 月号，英译文发表在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 16，№3，2002，俄译文发表在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2004。

2.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俄国及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公布，利用多国文献资料及口述史料对冷战时期一些人物或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注重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史，特别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才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如此，对一些重要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在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一般说来，在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总体评价和做出全面结论时出现异议，意识形态往往起了主导作用。而对具体史实的不同认知，虽然也有文化差异的背景，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可资利用的史料不够充分，以及对已有史料的片面理解或轻易采信。例如，对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苏，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对于冷战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这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而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① 近十年来，随着新史料的

---

① 相关的论著可以参见：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 феврале 1950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1；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不断涌现，人们对中苏条约谈判的基本过程已经有了大体一致的了解和认识，如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了解到其访苏的主要目的；斯大林起初想维持 1945 年的旧条约，而毛泽东却坚持要签订一个新条约；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曾发生激烈争执，后来是苏方作出了重大让步等等。但是，在以往的研究论著中，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描述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笔者拟根据目前中俄双方披露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分析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以期推动有关课题研究的继续深入和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

（一）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笼的？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对于如何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持有不同的立场。此后一段时间，特别是 24 日至 30 日之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期待对方作出让步。1950 年 1 月 2 日，《真理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①] 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标志着斯大林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中苏将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然而，这个“答记者问”的办法究竟是谁提出的，其文本又是谁起草的？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作为翻译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师哲回忆说：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 年 1 月 1 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 月 2 日见报。[②]

① 几乎所有谈到这一点的中文著作都说《答记者问》发表在头版头条，看来很少有人真正查阅《真理报》，别人这样说，也就跟着说。实际上打开《真理报》一看就知道，该消息发表在头版第二条。

②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38～439 页。

作为保卫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汪东兴在日记中记载：

(1949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许，王稼祥到毛主席处说："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毛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说："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王稼祥大使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毛主席说："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1950年1月1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毛主席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这时，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对此，苏方有些着慌……大家为此都很着急。王稼祥大使提出让主席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①

有人为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写了年谱，其中记载：

(1月1日)鉴于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进行辟谣。②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在其专著中转引了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未公开的手稿《毛泽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中提供的一份俄国档案文件，即1950年1月2日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关于1月1日与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书中说：

《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文本是科瓦廖夫1月1日受斯大林委托交给毛泽东的，虽然是草稿的形式，但斯大林已在上面签了字。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他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

①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9、171～172页。
②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89页。

充。关于《答塔斯社记者问》中提及的旅行计划，如过去已表示过的那样，他希望访问列宁格勒，并提出在 1 月 22 日或 25 日以前留在莫斯科。在此期间，他愿与斯大林会晤几次，以便商谈答记者问中提到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

最新的一个材料是《毛泽东传》引用的 1963 年 2 月 23 日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待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2]

笔者还可以补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另一个毛泽东本人的类似说法——苏联大使尤金记录了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对他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交给我一份将要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稿，斯大林已经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报道说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 1950 年 1 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3]

---

① 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504 页。

② 《毛泽东传》，第 41 页。

③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1956 年 3 月 31 日。ЦХСД，ф. 5，оп. 30，д. 163，л. 88～89，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 106。马斯特尼在研究中曾提到这次谈话，但他认为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电报中的说法不同，当时毛说举行答记者问是他自己的主意。见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9。

或许是此前看到过这些材料，中国学者杨奎松在其论文中断定："在进一步得悉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对苏联来说，争取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更为实际。于是，他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当毛泽东看到这一文字稿时又惊又喜，毫无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①

其实，这个引起争议的《答记者问》很简单，只有三个问题，其中涉及毛泽东访苏的内容如下：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问：您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②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材料和判断。

首先是答记者问这个方式的提出。根据中方诸多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可以断定，答塔斯社记者问的这个主意是王稼祥建议的，而不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科瓦廖夫的报告以及毛泽东本人后来的说法，从字面上看都无法否定这个结论，充其量只能证明答记者问的文本是斯大林起草的或经斯大林签字后送给毛泽东的。至于师哲所说在报纸上发表这一消息的决定是由毛泽东作出的，这在逻辑上讲不

① 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9～110页。杨文中没有提供其史料根据。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通。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的决定权当然属于苏联人。所以,上述材料提到,答记者问的文本是经斯大林签字后交给毛泽东的,大抵还是合乎情理的。这就是说,建议是中方提出的,而最后决定是苏方作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此外还可以断定,就中方提出这种方式本身而言,其目的最初仅仅是为了"辟谣",并非是针对中苏条约的形式和内容的。后来,这种方式推动了中苏谈判的进展,是因为答记者问的内容。

那么,答记者问的文本是谁起草的?提出中苏条约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想施加压力的手段,还是斯大林主动作出的让步?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中方提出建议的同时起草了文本,交苏方认可(斯大林签字)后发表的;二是中方提出建议后,苏方提出问题而由中方作答,再经斯大林批准发表的;三是接到中方建议后,苏方(斯大林)起草了全部问答(草稿)并送中方认可后发表的。按照科瓦廖夫和毛泽东的说法是第三种情况,即答记者问的最初文本是斯大林起草的,研究者似乎也都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笔者看来,这里还是存在几处疑点。

第一,仅从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谈话看,还没有充分根据断定文本就是斯大林起草的,因为看毛泽东谈话的字面意思,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是在中方送去的草稿上签的字。

第二,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谈话说的很明确:是斯大林"起草了一个谈话稿"。不过,此时中苏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讲话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苏联使馆认为毛泽东是有意显示中共对苏联一贯的友好态度,从而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推给苏联。就在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不久,契尔沃年科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报告,其中讲到:"中共领导人的策略之一,就是在自己的党和人民面前以及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有主动精神。中国宣传中的以下说法就是为这一策略服务的:似乎是中共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也许,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对这次谈话的报道以及发表苏共中央2月21日信和中共中央3月9日信,也主要是为这一策略服务的。中共领导人想以此表明,他们不仅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有原则的'批评,而且也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以

'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①]的确,毛泽东有时讲话言不由衷,这种情况下面还会提到。所以,仅凭他的一句话,还难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第三,关于科瓦廖夫的报告,引用者没有提供原始档案的文本,因此科瓦廖夫报告全部的和具体的内容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况且,这里还有一个辗转翻译(由俄文到德文再到中文)后译文是否准确的问题。此外,首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是上午拜会毛泽东且在那里吃过午饭后离开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声称,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会谈中,毛泽东还提出要"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关于缅甸、印度以及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毛泽东也是这时有意透露给苏联人的。[②] 显然,毛泽东这是在向斯大林表露他的不满,并施加压力迫其让步。而照汪东兴日记记载,当天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就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此时双方已经就发表答记者问事达成一致意见。最迟到1月2日凌晨3时,毛泽东已经发电给刘少奇说:"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③]看来,如果确有1月1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那么一定是发生在罗申走后和莫洛托夫到来之前,而就目前披露的史料来看,1月1日下午到晚上在毛泽东住所和克里姆林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很难说清,其中变数甚多。

第四,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他是否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斯大林起草的文本发表讲话,很值得怀疑。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佐证:本来中苏双方商量好,同时以外交部的名义在各自报纸上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挑拨中苏关系的讲话。结果毛泽东却偏偏自作

---

① 契尔沃年科给苏斯洛夫的报告,1963年5月17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原印件汇编》第15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3770～3820页。

② 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纪要,1950年1月1日。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3, п. 302, д. 10, л. 1～4。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07页。

主张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从而引起斯大林的极大不满。①

结论只能是:如果要确定答记者问的作者及起草过程,还需要发掘更多的文献证据。首先是把科瓦廖夫与毛泽东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全部内容搞清楚,而最关键的是要在档案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找到《答记者问》草稿的文本。如此,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与此不同的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过程,由于俄国档案中的各种文本已经问世,就比较能够说清楚了。

(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

到目前为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的最初文本究竟是中方起草的还是苏方起草的,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

首先按中方相关史料出版的时间顺序,将各种说法陈列如下,以便对比。

中国最早披露有关档案文献的是 1987 年 11 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其中发表了 1950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

(一)周、李等一行廿日到此。廿一日,我们十二人参加列宁纪念会。廿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廿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廿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在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二)兹将中

①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有意忽视 1 月 17 日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海因茨希断定不是因为毛泽东要贬低此事的意义,理由是中国的声明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而苏联的声明是登在《真理报》的第二版。此外,《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维辛斯基的声明,而《真理报》只是把胡乔木对记者谈话摘要刊登在第四版。他认为,毛泽东这样做"也许是对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那种好人师的态度表示反感"。参见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527 页。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请勿外传。[①]

1991年5月出版了伍修权的回忆录，作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是随同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并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他回忆说：

条约最初的文本是由苏联草拟并提出的，同后来通过并公布的条约虽无原则上的变动，但是在文字上却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一工作是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自动手进行的。他将条约的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地研究斟酌和修改……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明确了。[②]

1991年12月师哲的回忆录出版，其中谈到：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51～252页。编者在文中加了一条注释说：这个条约草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周恩来起草的。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7～238页。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①

据1993年出版的《汪东兴日记》记载：

(1月23日)双方小班子开始会谈。

苏方首先拿出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条约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

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此情况，毛主席说：“把我们起草的条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月24日)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同志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充实条约内容。毛主席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在毛主席住所的一层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

当天，我们把起草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方维辛斯基。

(1月27日)中苏代表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由于中方准备的草案文稿内容充实，使苏方代表感到意外，会谈以此为基点进行讨论。②

中国官方研究著作最先谈到这个问题的是由外交部编写并于199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书中称：“根据斯大林与毛泽东商定的关于新条约的基本精神，在苏方的提议下，由中方周恩来主持起草新条约的文本。为了区别于旧约，新约以旧约的名称为基础，加上‘互助’两字，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约的宗旨和条

①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8页。

② 《汪东兴日记》，第194～196页。

文比之旧约作了重大的修改与补充……苏方同意中方的草案本。”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并于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写道：1月24日周恩来“拟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并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所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②

一年后出版了还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其中引用了1950年2月8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央政治局电：“从23日起，在毛主席指导下，便先谈条约及各项具体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第一次电告即为该草案。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除文字修改外，较重要的是第二条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和约，第三条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原第五、六两条合为一条。故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成定案，已见第二次电告。”该书还写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都由周恩来经过仔细研究后执笔，经济贷款协定是苏方起草的。在具体商谈过程中，对这三个文件草案都没有作原则性的修改，文字上的更动也不多。③

最近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和出版的《毛泽东传》再次断定：“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④

综上所述，除伍修权回忆说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中方没有做原则性修改外，目前中国的回忆材料和官方研究论著一致认为条约草案是中方提供的（或按苏方提议或否定苏方草案后），条约名称也是中方提议的，而苏方大体接受了中方意见，其基本文献依据就

---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2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③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94、997页。

④ 《毛泽东传》，第47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是 1950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的电报和 2 月 8 日周恩来的电报。

完全相反的结论是一些研究者依据最新发现的俄国档案文献做出的。[①] 1997 年前后，笔者陆续收集到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解密档案文献，共有八十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本及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笔者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将原件扫描后保存在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同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部分中译文。[②] 遗憾的是，这批重要的史料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和利用，[③]这就难怪此后发表的研究论著依然因循旧说，甚至根本没有理会已经出现的最新史料。

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开始布置周恩来访苏及其他准备工作。此时，根据俄国档案文献，斯大林则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了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在提交中国代表团之前，苏方共修改了七稿，1 月 22 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 1 月 23 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 24 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三个：1. 新条约的名称是由何方在何时提出的；2. 苏方提交给中方的文本是否保留了旧约的基本内容，以至中方必须重搞一个；3. 中方修改后退回的条约草案与苏方提供的文本究竟有没有"原则性"区别。

第一个问题。1950 年 1 月 5 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条约第一稿草案，取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④]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签订

---

① 参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3 期；《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591～598 页。

② 参见《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4 期，《中共党史资料》总 67 辑。

③ 笔者所见，只有杨奎松在其前引论文中使用了这些材料。

④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13～14。

的双边条约大都是以此命名的，如苏蒙、苏罗、苏匈、苏保等条约。[1]此外，笔者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还看到了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名称也完全相同。[2] 看来，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通行的做法。苏方以后的各修改稿均延续使用了这一名称。但是，到1月16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将条约文本（第六稿）呈报给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时，条约名称已经改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了，[3]而这时周恩来还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1月22日向斯大林报送并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后交给中方的文本（第七稿）使用的也是这个名称。[4] 显然，条约名称不可能是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修改的。应该注意的倒是，苏方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提法。据俄国档案记载，提到中苏将要签订的条约时，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在1950年1月6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则提到"中苏之间缔结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是符合双方利益的"（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5] 引起苏方注意的应该是毛泽东两次都提到了"同盟"的概念，而苏联外交部前几个文本所取的名称中没有"同盟"一词，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因为这比1945年的条约退了一步。但无论如何，条约名称中"互助"一词不是周恩来后来加进去的。

第二个问题。苏方最初的设想是签订一个新条约而同时保留1945年条约中的三个协定，因此外交部起草的第一个草案在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

① 安·葛罗米柯、鲍·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10～711页。

② 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47年11月2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063～02。

③ АВПРФ, ф. 07, оп. 23а, п. 18, д. 235, л. 3～6。

④ АВПРФ, ф. 07, оп. 23а, п. 18, д. 235, л. 42～50。

⑤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9, л. 9～17;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3, п. 302, д. 8, л. 1～5。

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①]不过，经过几次修改，到1月16日的第六稿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已经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年至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②]而在最后提交给中方的第七稿中，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再提到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了——所有协定和议定书将单独成文。[③] 显然，就新条约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纯政治性宣言，而与1945年那个包括具体协定在内的条约已经完全不同了。根据俄国档案文献，在中苏谈判期间引起激烈争论的主要是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苏联要求无偿使用中长铁路、确定卢布与人民币之间汇率和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待遇的问题。[④] 从苏联收集的中国社会对中苏条约结果的反映看，人们的不满主要也是集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而对条约本身没有提出疑义。例如，有些人认为，"延期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同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是相矛盾的"，"有关1952年年底归还旅顺和中长铁路的条款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种宣传，因为过2年至3年之后还不知道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关于蒙古独立的问题，部分民主人士说，"这是涉及民族感情的问题，会给人留下不悦的感觉。部分归国华侨甚至怀疑西藏和新疆会不会以蒙古方式宣布独立。"还有人认为，贷款3亿美元的数额太少，利息太高(许多人错把1%当成了10%)，等等。[⑤] 从以上材料来看，说中方对这个条约草案十分不满而又重新起草了一个草案，恐怕是搞错了。

---

①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13～14。

②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3～6。

③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42～50。

④ 笔者有关论述详见《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出版，200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第二章第一节。

⑤ 苏共中央情报部关于中国对中苏条约反映的报告，1950年3月20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9卷，第130～135页。

第三个问题。中方的确对苏联草案进行了修改，并于1月24日23时由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修改后的草案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笔者看到的中方草案是经克鲁季科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翻译的俄文文本，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虽然有多处改动，但除调整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①] 顺便说一句，关于缔约国一方受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给予援助的问题，在苏方第一稿(1月5日)中的提法是"相互给予一切可能的，其中包括军事的援助"(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всяческу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第二稿(1月9日)已经改为"尽其所能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немедленно окажет вовлеченной в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договаривающейся стороне военную и другую помощь 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в её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редствами)，以后各稿，包括中方的修改稿(只是把原来在第二条的这个内容合并到第一条去了)，都延续了这一提法。因此，"尽其所能"一词为中方修改时所加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②]

还有一个情况可以推断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2月14日中苏条约公布后，英国外交部政策司立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条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第一款写上了旨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发动进攻的内容，如果把日本换成德国，则与苏罗条约一模一样。条约第三款申明，任何一方不得与他国结盟反对另一国，这与苏捷条约的第五款很相似。条约第五款的内容是关于经济和文化的，这几乎与苏捷条约的第四款完全一样。2月16日美国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除了第二款外，中苏条约与1948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友好条约十分相似。[③] 显然，匆匆赶到

① АВПРФ, ф. 07, оп. 23а, п. 18, д. 235, л. 42~50; л. 38~40。

② 有些西方学者也接受了周恩来在条约中增加了"尽其所能"一词的说法，甚至对此作出了他们想象中的理由(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 118)，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那时有关条约草案的俄国档案文献尚未披露。

③ 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128~129页。

莫斯科的周恩来是起草不出这样的文本的。[①]

那么，中国当事人的回忆或说法为什么会与俄国档案反映的情况完全相反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从师哲和汪东兴的回忆看，他们显然是把条约与协定混淆在一起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包含了有关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三个协定，[②]而1950年苏联起草的条约，如前所说，在提交中方时已经删除了有关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所有内容，另外分别搞了三个协定。中方代表团对这些协定很有意见，因而重新起草了一个协定(把有关这三项内容融为一体)。实际上，引起双方争议的是这个协定，而非条约本身。[③] 当时在中方代表团里，师哲担任翻译，汪东兴担任警卫，都没有直接参与条约和协定的起草，出现记忆混乱情有可原。而伍修权直接参与了谈判和起草文件，所以，他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苏方提供了最初的条约文本，中方做了多处改动，但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意见。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看，说中方提供条约草案后，苏方基本没有改动，这也是实情，因为后来公布的条约就是这个文本。[④] 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报中只谈了事情的后半部分，而隐瞒了前半部分，即中方提供的草案实际上是以苏方的文本为基础的，并且没有做原则性修改。毛泽东和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是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势。中共1949年6月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后，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引起不少非议。[⑤] 在毛泽东访苏前的一次会议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坚决反对这次出访，他们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一向是外夷前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还有人担心此行会使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复杂化，从而失去这些国家可能

---

① 周恩来1月10日离开北京，1月20日到达莫斯科。期间，1月18日与毛泽东通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参见《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1、22页；《毛泽东传》，第44～45页。

②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27～1338页。

③ 详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④ 正式发表的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8～523页。

⑤ 详见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5～186页。

提供的经济援助。[①] 这无疑是一种压力，迫使毛泽东要认真考虑这次访问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结果。[②]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这种压力仍在继续增加。据中共中央调查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国内很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和不满，因为在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曾到火车站迎接日本外相。还有人认为，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有损于国家威信"，中国好像是苏联的一个"仆从国"。[③] 在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公布以后，正如 1950 年 1 月 25 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马康卫（McConaughy）给国务院发出的电报所说，社会上仍然到处流传着"夸大莫斯科要求毛泽东作出让步的谣言"。[④] 甚至苏联方面也收集到许多类似的情报，1950 年 3 月 20 日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言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广泛展开活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中苏条约公布后，敌对势力"又开始进行挑拨性的宣传，制造所谓的条约的'秘密条文'、'苏联吞并新疆和满洲'、'中国向苏联输送士兵和粮食'、'中国向苏联派遣 20 万名士兵和几百名飞行员去受训，以便在世界大战时使用'等等。""类似的谣言在那些落后的居民中间广泛流传着。"[⑤]试想，在如此背景下，一旦外界知道中苏新约是苏联事先起草好的而中方并没有做任何重要修改，将会给毛泽东和中共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或许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才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意强调：对中苏条约的问题要"保守机密"，"不许乱说乱动"。[⑥]

---

①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с. 88。

② 不少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访苏的结果不抱什么希望。在中国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斯巴诺·维利尤曾向苏联使馆报告说，他在一次与薄一波的谈话中对毛泽东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表示高兴，而薄一波却"严肃地指出，关于这次出行，他没看到有特别值得高兴的地方"。谢巴耶夫与斯巴诺谈话备忘录，1949 年 12 月 13 日，АВПРФ, ф. 100, оп. 43, п. 312, д. 126, л. 5～17。

③ 中共中央调查部第 50 号通报，1950 年 1 月 1 日。АВПРФ, ф. 100, оп. 43, п. 305, д. 32, л. 1～6。

④ GR59, Decimal File1950～1954, Folder661. 93/1～2550, Box2949,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SA。

⑤ 苏共中央情报部关于中国对中苏条约反映的报告，1950 年 3 月 20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9 卷，第 130～135 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217 页。

(三)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及合股公司持何种态度?

在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另一个争议问题涉及到《补充协定》及四个中苏合股公司。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表现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以及对中国主权的干涉。

首先,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师哲回忆说,在 1 月 22 日中苏领导人会谈时,“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几个股份公司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这“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① 汪东兴回忆说,2 月 8 日毛泽东曾对他说过:“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 20 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②作为当事人,苏联外交部官员卡皮察在 1992 年接受采访时说:斯大林想在满洲和新疆完全排除美国人的存在。补充协定的问题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开始,斯大林希望协定有个更大的范围,但是最后范围被缩小,并且他允许条件是互相的。毛泽东对这个文

---

①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447 页。师哲的记忆至少在日期上有误,因为 1 月 22 日的谈话记录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 29~38)。有人考证说这次谈话是在 2 月 10 日前进行的(参见《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600 页),但这个说法也令人怀疑,因为如下文所述,苏方是在 2 月 10 日才向中方送交这个新协定草案的。

② 《汪东兴日记》,第 202 页。

件极其不满意。[1]

其次，对这个问题谈得更多，影响也更大的是毛泽东本人。尤金曾向莫斯科报告了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毛泽东告诉他，"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但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四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满洲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国家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惟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种贪婪令我们不能理解。""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2]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对哥穆尔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苏条约谈判期间，"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铁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3]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尤金谈话时又提到：中苏条约谈判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以后，毛泽东的类似说法还有很多。[5]

最后，许多研究著作也都采用了大致相同的说法。由中国外交部人员编写并于198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提到，苏方企图把四个合营公司变成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6] 1994年外交部编写的另一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说法是：在谈判期间，2

---

①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 123。

②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163, л. 88～89,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05～106。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⑤ 参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 122。

⑥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月6日发生了国民党集团的飞机袭击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斯大林的目的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等国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至此，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这就是周恩来后来所说的，两个势力范围交换两个东西。[①] 甚至很多西方学者也同意这种看法，如海因茨希在其专门讨论中苏条约谈判的著作中就认为，“这一协定是强加于中方的，它很可能导致中共领导人最为沉重和最不能忘怀的恼怒”，因为它“使人看到殖民思想的回潮，使人感到羞辱”。[②] 尽管也有学者根据新材料提出了不同看法，[③]但直到最近出版的中国官方著作中，仍然坚持同样的说法。[④]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根据都是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实际上也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感受。很多研究者的判断都是受此影响的。那么，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对于中苏双方协商并签署这个《补充协定》的过程，档案文献中是有详细记载的。

维辛斯基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2月11日米高扬同志和我会见了周恩来。

周恩来告之，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5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② 《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99页。

③ 参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④ 《毛泽东传》，第49页。

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我们回答,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大概不会遭到反对。①

作为附件,维辛斯基提交了中方的修改稿,并注明“画着重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即“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和“租让权”(права на концессии)这两句。②

2月12日晨4时,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关于这次会晤的备忘录记载:

周恩来请我向苏联外交部长报告下列事情:

在关于不允许各外国公司和团体在满洲和新疆境内从事活动的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③

---

①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2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64～69。

②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135。

③ 罗申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2月12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70～74。

上述文件表明，毛泽东在看到这个新协定后，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将名称确定为“补充协定”，周恩来所做的两处修改也仅仅是文字性的。不仅如此，中方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执行这个协定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显然，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利于中共新政权对新疆这样边远地区的控制的。[①]

为了证明毛泽东当时对《补充协定》的不满，海因茨希还提出一条论据：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意识到这个协定“实际上具有不光彩传统的‘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所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保守协定的秘密”。[②] 但笔者看到的档案文献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证据。

在 2 月 12 日凌晨 4 时与罗申会晤时，周恩来提出，2 月 14 日 18 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经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 14 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 月 15 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③]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应该是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

2 月 13 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周恩来更明确地表达了中方的这个意见。据俄国档案记载：

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同时，周恩来补充说，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有些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

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

① 1998 年 10 月笔者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当时在新疆工作的邓力群，据他讲，那时新疆刚刚解放，由于有很多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英美残余势力活动，麻烦不少。《补充协定》签字后，当局借此清理了大批外籍人员。

② 《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602 页。作者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③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0 年 2 月 12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70～74。

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

我(指维辛斯基——引者)对周恩来说,尽管他表述的意见相当明确,然而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公布这些文件或其他一些文件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向苏联政府汇报。我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周恩来。①

这个情况进一步表明,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签署和公布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这些文件,根本谈不上是“屈辱”,是给苏联提供了“殖民地”,反而是中国求之不得的事情。但考虑到苏方对公布文件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在当晚给北京的电报中称:“苏方提议若干文件签字而不公布,我们则主张全部公布,究如何,待今晚决定电告。因此,今晚如已开过政府政协座谈会,则须补行声明,公布日期未定,暂勿外泄。如尚未开,最好改在明(14 日)晚开,以便确定是否全部公布后再做处理。”②就在周恩来发出这封电报后不久,苏联方面送来了最后答复——《补充协定》不能公布。鉴于 2 月 14 日是条约签字的日期,且中方已经准备好了庆祝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毛泽东于 14 日凌晨 5 时向北京发出了“限即刻到”的紧急电报。电报要求删除社论中一切涉及《补充协定》以及其他尚无法签字的协定的内容和文字,其中也包括对《补充协定》进行解释的一句话:“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切必要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说来都是有利的”。毛泽东还说明,进行这些删除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③

斯大林提出第三国势力不得进入东北和新疆的问题,确实有为苏联安全利益考虑的自私目的,加上苏联的远东和中亚两个地区作为陪衬,也只是为了使协定在形式上看来平等一些,因为早在战前苏

---

①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0 年 2 月 13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75~76。

② 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杨、李、乔木,1950 年 2 月 13 日。转引自《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第 115 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 262~263 页。

联就已经在这两个地区清除异己势力了。[①] 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当时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至于股份公司的问题,更不能说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的确很有兴趣,早在 1939 年 9 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 10 年),1949 年又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②] 到 1950 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③] 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早在 1949 年 2 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④] 1950 年 1 月 2 日,刘少奇又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主政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 45 年缩短为 20 年或 25 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⑤] 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

---

① 有关当时苏联移民的材料在俄国档案中已有详细披露,部分文件可参见沈志华、徐天新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② 详见翟韶华主编:《航空史料——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三)》,台北:国史馆 1991 年,第 358～363、377～384页;Donald Gillin and Ramon Myers ed.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6,с. 112。

③ 1950 年 1 月 22 日联共(布)中央关于中苏谈判的决议及附件,АВПРФ,ф. 07, оп. 23а,п. 18,д. 235,л. 41～45;《周恩来传》下卷,第 997 页。

④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и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3,с. 99～101。

⑤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219～220 页。

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关于新疆两个合股公司的协定草案，3月8日中共中央很顺利地就批准了，按毛泽东的话说，“只作了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①]

显然，关于股份公司问题，中共领导人当时的着眼点仅在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没有估计到这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不过，毛泽东事后对这个问题改变了态度则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民众的情绪。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②]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③] 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现在看来，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④] 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缴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长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

---

① 谢巴耶夫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50年3月9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10，л.84～85。

②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存《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参考资料》)，1950年4月1日第122号，第1～5页。

③ 中央关于中苏签订两合股公司协定后应注意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5，卷宗5，第5～6页。正是了解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赫鲁晓夫在1954年10月访华前决定苏联退出四个合股公司。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83，д.40，л.4～5、10～19。

④ 上述协定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88～9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90～794页。

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缴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①] 尽管从现在的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②]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以及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③] 正因为如此，中苏双方当时才会一致决定公布有关股份公司的协定。

总之，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和股份公司表示强烈不满，并反复向苏联人重提旧事，都是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以后的事情。[④] 毛泽东的情绪的确能影响很多人，就连苏联外交部在 1959 年 9 月的一个报告中都承认，《补充协定》和建立苏中联合股份公司是"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利和最高利益"的"消极因素"。[⑤] 所以，当事人的回忆和学者的判断受到毛泽东后来这些说法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谈到冷战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笔者想要强调的是：第一，对口述史料（包括回忆录、采访录）的利用必须慎重，由于敌对双方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一点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尤其显得重要。而欲弥补口述史料的舛误，最好的办法是找到相应的档案文献，以便鉴别和相互印证；第二，鉴于上述同样的原因，在冷战史研究中，目前国际学界强调的是利用双边或多边档案，如此才有比较，才易于

---

①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第 1331～1333 页；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90～394、404～405、412～427 页。

② 石油、金属公司 30 年，造船公司 25 年，民航公司 10 年，均超过中方最初设想的合作年限。

③ 《回忆与怀念》，第 247～248 页。

④ 由于毛泽东多次向苏联表示不满，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提出了将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转让给中国的建议，并向中国领导人流露了苏方可以考虑放弃《补充协定》的想法。1956 年 5 月 10 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认为该《补充协定》已不符合苏中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精神，建议加以废除。5 月 29 日，中国复照表示同意。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9 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39 页。

⑤ 齐姆亚宁关于中国状况和苏中关系给外交部的报告，1959 年 9 月 15 日。转引自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 178。

辨别;第三,历史研究既不能离开档案,也不能迷信档案,因为研究者看到的档案文献的内容,都是文献的作者希望人们接受的其本人当时的看法,而这未必就是事实。所以,积极寻找档案文献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和解读已经获得的档案文献;第四,由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人们对于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研究者的描述也是逐步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研究)没有终点。

原载《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

二、苏联专家

3.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 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 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 1960 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 1949 年至 1960 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

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①],时间最长[②],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要谈到苏联专家问题,但专门的论著却极为少见。[③] 笔者在考察中体会到,其原因主要是有关史料在以往研究著作中少而凌乱,原始材料又分散在各地,特别是要了解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和实际的状况,则必须深入到社会基层。所以,为了收集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著外,还到北京、内蒙、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

作为对这一课题的初步探讨,本文主要目的是对所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及中苏双方政策的变化,以为进一步研究作准备。

---

① 1947年至1956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派出的专家总计一万四千多人(《人民日报》1957年2月23日),而据俄国档案记载,1950年至1956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有5092名。参见 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5。1957年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华专家则保留了几年而且还有新增者。

② 尽管1960年7月赫鲁晓夫撤走了在华专家,但1961年又向中国派出9名苏联专家,1962年派遣了10名。*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65, с. 49。

③ 笔者只见到一篇专门讨论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论文(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作者是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曾出版过一部有关中国如何学习苏联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专著(*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国解密档案和对专家本人的采访,而缺憾是没有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一)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①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六百余人。② 至于到1960年7月撤退专家前,究竟有多少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学术界没有考证。一般的说法是专家总数在万余人,但有学者指出这一估计没有根据。③ 笔者以为,由于当时对专家这一概念没有确定的范围④,以及在华专家往来期限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延聘、新聘者之交叉),加之统计材料不全面,的确难以把握精确的数字。不过,大体情况还是可以了解的。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占89%,⑤即约10260人。而1958年至

① 详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1948～1949)》,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②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с. 84。

③ *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 (1949～1960)//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5, с. 342。

④ 这里需要对专家的称谓做一说明。波匈事件以前,中国对请来的苏联援助人员有各种称呼,一般来讲,在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及军事机构的称为顾问(总顾问),在工矿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称为专家,在学校和教学单位的称为教授或教师,此外还有一些辅助工作人员,如技工和军士。1957年12月5日国务院通知,鉴于苏共中央提出"取消向我国派遣顾问的建议",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的苏联专家仍称顾问外,其余统称为苏联专家(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239,页码45)。195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通知:"今后凡在我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律取消顾问名称,统称专家",总顾问改称专家负责人(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第94卷,页码46～47)。本文所说专家,除特别说明外,是对来华援助人员的统称,但所引史料中使用的称谓各异,需要仔细判别。

⑤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4月11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页码96～106。

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915名、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1] 相对来说，苏联教师来华人数有限，1948年至1960年总计615名。[2] 故1958年以后来华教师数字可以略去不计。这样，来华工作的非军事专家（除临时开会和访问的学者、专家）应在12284人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军事顾问（1957年后也称专家）。据目前看到的中国书面材料，海军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3390余人，[3]再加上空军、炮兵、通讯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有人估计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总数肯定在万人以上。[4] 如此计算，1949年至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5]

这么多的专家是如何到中国来的？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国家派遣专家（主要是军事、安全顾问）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6]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完全是中国政府请来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而管理城市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人才则严重缺乏，因此，掌握政权以后就特别需要学习，尤其是向苏联学习。在这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无疑是一条重要而快捷的途径。正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莫斯科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

缺乏可靠的科学技术人才是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所面临

---

①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39。

②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56。

③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4～4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④ 2001年6月至10月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⑤ 笔者后来撰写《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一书时，又核对各方材料计算，估计总人数在18000人以上。

⑥ *Носкова А. 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1945～1953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с. 105；Zoltan Barany，Soviet Takeovers：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East European Quarterly*，Vol. 28，№4，January 1995，pp. 411～413。

的一个严重问题。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告诉苏联大使罗申,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①] 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②] 到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③] 由于缺乏专家,中方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以至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④] 显然,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⑤] 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至1953年已有1210人。[⑥] 这些数字大概都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⑦]

---

① 罗申与陈云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28日。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58~62。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③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51年7月24日。АВПРФ,ф.100,оп.44,п.322,д.13,л.44~51。

④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电,1949年7月4日。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47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第386~388页。

⑥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11。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首先需要技术支持的就是基建工程的设计力量，而在这方面中国确实无能为力。到 1953 年，全国总共只有 78 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不足 500 人。[①] 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 年 2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 16 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 3 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 23 个苏联设计组是 1951 年聘请的。这样，到 1951 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 42 个小组，其中 30 个安排在东北地区。[②] 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 5 个综合专家组于 1952 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 6 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③]

建国初期中共对苏联还有一个急切需求，就是派遣军事技术和训练专家。中共军队虽英勇善战，但武器装备实在太落后，炮兵数量有限，空军根本不存在，仅有的一些海军舰只破旧不堪，甚至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战船。[④] 这样的装备，既要保证国家的空防和海防，又要渡海解放中国台湾，还要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显然力不从心。而从苏联大量购进飞机、军舰及其他现代化武器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部队文化素质太低，自己无法立即掌握和使用新式武器。据统计，1952 年中国军队 128 万排长以上的军官，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 2.14%，具有高中水平的占 12%，还有 27.21%的人是文盲。[⑤] 刘少奇后来向苏联大使尤金承认，那时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员不是其所

---

①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c. 7～8。

②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4～15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369、374 页。

④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⑤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辖兵种的内行，有些空军团长没当过飞行员，炮兵军官没当过炮兵，他们“应该接受培训，以便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①] 于是，苏联不仅需要提供武器，还必须派遣教官和军士来帮助中国军队掌握新式武器。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6所空军学校，1949年底根据双方协定，苏联派出了从校长到地勤人员的全套人马，总计878名专家。[②] 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顾问711人也分三批先后来华。[③]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以致苏联有时甚至不能完全满足中方的请求。如1950年8月苏联应邀增派了38名空军顾问，[④]1951年2月又派出15名军事顾问。[⑤] 同年9月毛泽东要求苏联派83名顾问到志愿军部队工作。[⑥] 尽管中方一再坚持，苏联只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的5人专家小组驻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⑦] 1951年11月苏联再次应中方要求派出19名空军顾问。[⑧] 对于1953年1月中国请求派12名海军航空兵顾问的电报，斯大林答复只能补派3人，其余从已在华的顾问中派出。[⑨]

中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主要难题也是干部文化水平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名党员，其中130万名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中共准备用2年至3年时间在党的基层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

---

① AVPRF, f. 0100, op. 48, pap. 410, d. 9, p. 9, Sergei Goncharenko,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1996. 1, p. 7。

② 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的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

③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8～49页。

④ 斯大林致科托夫电，1950年8月27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4, л. 94。

⑤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1951年2月13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п. 337, л. 58～59；斯大林致周恩来电，1951年2月16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п. 337, л. 60。

⑥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9月8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п. 341, л. 98～99。

⑦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9月10日、12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п. 341, л. 109、120。

⑧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11月13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п. 342, л. 8～9。

⑨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3年1月7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月27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п. 343, л. 128、139。

般党员中扫除文盲。[①] 依靠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当然是无法对偌大中国进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动员各部门干部到苏联学习、参观,[②]一方面聘请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共中央的档案提供了 1954 年第一季度苏联顾问在华工作范围和地区的证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达 403 人,这个数字大约占当时在华经济专家人数的 1/3,而且其中 318 人,即 3/4 以上的顾问集中在北京。[③] 这些顾问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安全、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由此可以想见,中共对国家尤其是城市的管理,最初是何等地需要和依赖于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

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不仅是中国要求的,而且往往是应中国临时和紧急之需。建国之初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鼠疫,威胁平津,毛泽东请求苏联空运疫苗和血清,并派遣防疫专家来北京。第二天斯大林便回电答应了这一要求。[④] 1949 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开学时确定使用 50 名苏联教师讲课,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便答复立即先行派遣 9 名教员到人大任教。同时,苏联还满足了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临时请求:向中国派遣一组海军专家,携带必要的器材,帮助打捞沉没于长江的“重庆号”战舰。[⑤] 1950 年 1 月 6 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通知毛泽东,为排除吉林水电站的故障,苏联政府已决定按中方要求在 5 天内派出 4 名苏联专家到中国。[⑥] 1953 年 7 月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聘 4 位苏联教授来校讲课,苏联方面立即满足了这

---

① АВПРФ, ф. 0100, оп43, д. 10, п. 302, л. 100;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17(库利克错把陆定一当作组织部长,笔者在这里已做更正)。

② 在俄国解密档案中有许多关于中国代表团请求到苏联对口部门或单位参观、学习的报告和批示。

③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187, с. 15～19, *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1949～1960), с. 342。

④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49 年 10 月 28 日、30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98、99 页。

⑤ 齐赫文斯基与张西畴谈话的报告,1949 年 12 月 29 日。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3, п. 302, д. 10, л. 50～52,谢巴耶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9 年 12 月 31 日。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3, п. 302, д. 10, л. 47～49。

⑥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0 年 1 月 6 日。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3, п. 8, д. 302, л. 1～5。

一要求。[1] 如此等等。

(二)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多专家来华是为了解决中国之亟须,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所以,尽管高层对此十分重视,但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工作是相当混乱的。

最初在华苏联专家负责人是莫斯科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认为此人不懂政治,作为铁路专家,其技术也不全面,所以推荐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担任总顾问。[2] 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决议,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阿尔希波夫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这一职务。[3] 斯大林曾指示,苏联专家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苏联专家到中国后由中方分配工作,受中方各级负责人的领导。[4] 在苏共十九大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还向刘少奇和李富春建议:"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专家包办","不一定事事派苏联专家去。派专家一定要专业对口才行。"[5]

不过,苏联多年形成的官僚体制使得领导人的良好愿望无法贯

---

①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3年7月27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38,р. 5082,л. 34~35;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68、204页。

②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7~488页。笔者2000年10月29日采访李越然记录。李越然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俄文翻译。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74号记录摘录,1950年4月24日。РЦХИДНИ,ф. 17,оп. 3,д. 1081,л. 1。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9~74页。另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7日。

⑤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39~40页。

彻下去。通过凯佩尔教授对大量苏联专家的采访可以得知，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的，但具体负责人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据说，每一位被挑选准备出国的人都要填写一些表格，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确认其本人和家庭、亲属没有政治问题后，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参加会议，进行谈话，并分配任务。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认为，挑选专家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你有没有党证”，而且一旦被选中是不能拒绝的。而对于专家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准备，既没有发给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材料，也不要求他们到中国后学习最基本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多数受聘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当前形势竟然一无所知，有报告说，马上要出发到中国去的教师甚至都没有看过刚从那里返回的苏联专家写的在华工作总结。①

实际上，尽管中国迫切需要苏联专家，但并没有及时做好接受专家的各项准备工作。例如，1949 年底大量专家来华，一时间住满了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接待单位只能在北京以外设法为他们安排住宿；有时由于缺少足够的翻译人员而不得不减少聘请的专家人数。②鉴于这种情况，1950 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中方最先成立苏联专家事务管理部门是“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专门负责接待、住宿等生活问题。③

安排专家工作方面的准备同样非常仓促。如中央各部和东北等地区的主管部门纷纷提出聘请专家的要求，却没有事先为苏联专家设计组准备好必要的资料，多数设计组来到中国后还要搜集设计资料，以致不能依照合同如期完成工作，必须延长留在中国的时间。1951 年鞍山钢铁厂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零星分散，没有专责，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方面的设计工作缺乏相互配合，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 年以前，除由苏联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资料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文

---

①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pp. 125～127。

②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的报告，1949 年 12 月 29 日。АВПРФ, ф. 100, оп. 43, п. 302, д. 10, л. 50～52。

③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89 页。

献和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其结果,不但增加了设计费用,推迟了建设工期,也因苏方专家延期返国,耽误了他们在国内的原有工作。[①]

为了克服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中央财经委在1951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有关聘请设计专家事项,应由中央主管部核转中财委呈请政务院批准。政务院核准后,经中财委通知主管部及贸易部,由贸易部会同主管部与外国驻华商务代表接洽办理。必要时由贸易部授权驻外商务参赞处在国外洽商办理。[②] 4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再次强调,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专家到职后的薪金、待遇等事项亦由政务院通知有关部门统一办理。[③]

中苏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欠缺。如1949年12月9名苏联女教师来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未得到通知;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④] 还有,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不足一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不征求计划局的意见。[⑤] 此外,由于中方有些部门在聘请专家方面缺乏计划,考虑不周,往往在报请中央批准后又要求改变专家种类或名额。[⑥] 这些都是造成双方交涉困难、出现麻烦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苏双方加强了高层接触。1953年6月8日,

① 中央财经委关于聘请苏联设计专家的补充通知,1951年7月20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361,页码17~21。《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第410~418页。

② 中央财经委关于"聘请国外设计组、设计专家及设计顾问暂行办法"的通知,1951年4月30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361,页码1~6。

③ 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聘请外国顾问及专家暂行办法,1951年8月18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361,页码29~31。

④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的报告,1949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 100,оп. 43,п. 302,д. 10,л. 50~52。

⑤ 陈云给周恩来的报告,1952年4月8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406,页码67~68。

⑥ 中央财经委关于下年度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的通知,1952年4月28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406,页码4~6。

周恩来接见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部门代总顾问布拉金(阿尔希波夫为洽谈一五计划援华问题回国),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①] 此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②] 从1954年起,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专家工作计划的记载。[③]

(三)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以一五计划为核心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苏联专家的需求猛然增加。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也注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由此出现了高潮。

1953年9月3日李富春自莫斯科报告,历时8个月的关于苏联援华问题讨论终于有了结果。苏联将派遣200名设计专家,帮助中国建立工业企业设计单位,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人员,并为中国进行工业企业的设计。此外,还决定增派50名地质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组织地质勘探工作,同时培训中国地质人员。[④]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6、308页。

②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③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pp.119。

④ 《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第359～364页。

按照计划，仅 1954 年 1 月份，苏联即向中国派去 343 名专家。[1] 根据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统计，是年一至三季度工矿企业新到苏联专家 467 人。到年底，除期满回国者，在工业部门的苏联技术专家已达 820 人。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估计，中国聘请的技术专家，“1954 年比 1953 年增加两倍多，1955 年比 1954 年可能还要多些”。[2] 鉴于一五计划主要是为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所以，从此期来华专家的比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工业部门。到 1954 年底，在中国各厂矿企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专家，82.4%集中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和燃料工业部系统。[3] 可见，1954 年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仍然是根据中国的需要。

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方提出了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进一步要求：一、派遣解决总体利用扬子江和水利资源问题的专家组到中国来帮助进行勘察工作。二、派遣建筑施工专家 40 名到 50 名帮助中国在新工业城市建立的 11 个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作。三、派遣 8 名城市规划方面的顾问，指导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四、在 1955 年派遣 57 名铁路设计专家，6 名铁路施工专家帮助中国进行铁路建设。[4] 苏联部长会议于 11 月 25 日通过决议：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额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工厂生产实习的请求；责成苏联一批工业部为总供货人，必须按期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厂矿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交通建设部和交通部必须于 1955 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设计师和建设者；电站部必须在 1955 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 13 人的专家小组，期限为 1 年，帮助中国进行长江水利资源勘察和测算，包括农业部专家和技工，河运部专家和技工，地质部、科学院、测绘总局各 1 名专家；建设部、冶金和化学企业建设部必须在 1955 年上半年向中国各派出 11 名专家，期

---

① *Кейл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1949～1960)，c. 341。

② 《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 年，第 390、396、437 页。

③ 《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 年，第 396 页。

④ 中国政府备忘录，1954 年 10 月 12 日。载《党的文献》1999 年第 5 期，第 25～27 页。

限为2年，根据双方达成的专业范围，为中国11个联合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莫斯科市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为中国派去顾问，帮助制定北京市的总计划；石油工业部必须在1955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派出专家，就地了解现行炼油厂的状况，并同中国方面一起弄清同炼油厂改造有关的问题。①

此期，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持续增长。据苏方的统计，在1954年至1957年工业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苏联除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外，还派遣了近5000名专家，其中1954年983名，1955年963名；1956年1936名，1957年952名。到1956年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达到最高峰，为3113人，其中技术专家2213人，经济顾问123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人，军事顾问和专家374人。② 如果按照中方的估计，此期苏联专家人数还要多。③

在短时间内派遣大量专家来华，苏联的管理工作难免出现差错。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1954年1月向苏共中央报告说，答应往中国派遣的50名地质专家，结果只来了21名，而卫生保健专家根本就没有来。更为糟糕的是，某些部派来的专家明显没有能力或身体欠佳。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也报告说，到中国考察的结果表明，由于选人不当，把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的顾问派到了中国。一位在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不仅对中国的冶金状况缺乏了解，甚至对苏联先进的炼钢工艺也不熟悉。谢列平认为这简直是耻辱。④ 1957年外交部的几份报告反映，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

---

① 费德林致尤金的信，1954年12月27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4，д. 52，л. 52～56。

②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24；谢皮洛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1月4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1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2810～2813页。

③ 1956年6月28日结束的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报告说，预计在年底全国将有苏联专家3500人，其他国家专家200余人，如加上家属即有6000人至7000人。（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38，页码7～14。）同期在华军事专家和顾问有592人。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3页。

④ ЦХСД，ф. 5，оп. 28，д. 187，л. 15～19；д. 308，л. 116～126，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ом，с. 342。

机关对派遣专家问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把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很多专家事前毫无准备,一些人工作状况很糟糕,甚至有人还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由于对派遣条件控制不严,有的部门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中国,以致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只是养病,直到身体康复又被送回国。教育部门派遣专家在时间安排上有很大漏洞,有些教师到中国后,学校正在放假,根本无事可做,而几个月后又该回国了。外交部还向苏共中央抱怨说,已决定派往中国的39名专家中,至今有31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①]

其实责任并不完全在苏方,中方聘请不当,准备不足,也是造成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工作量不足,到期又不能返回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没有根据工作进度安排聘请计划,便贸然请来大批专家。如陕西兴平中速柴油机厂急急忙忙发出聘用专家的申请,但8位苏联专家到厂后,发现建厂计划推迟,甚至主厂房还未建起,结果无所事事。还有兰州化工厂、洛阳铜加工厂、洛阳高速柴油机厂及中山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都因原材料或仪器供应不上而造成专家工作延期。[②] 长春汽车制造厂则有16位专家因聘期不当,不能发挥作用而提前回国。还有3位负责职工技术培训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厂,而该厂的招工工作尚未开始,只得由苏联调回。[③]

这些情况的发生,自然会引起双方的矛盾,特别是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专家工作中的问题便成为双方相互指责的借口。

(四)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1956年10月波苏冲突时,苏联被迫答应撤走在波兰的军事专

---

① TsKhSD, f. 5, op. 49, roll. 8862, no. 41(April~December 1957), pp. 120~152,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pp. 131~132。

②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报告,1959年8月1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1,卷宗88,页码81~82。

③ 中共第一汽车制造厂委员会关于建厂以来苏联专家工作总结,1960年9月1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页码45~49。

家,①并在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考虑撤回在其他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② 此事对在华苏联专家也产生了影响。在10月30日与尤金大使讨论宣言时,刘少奇指出,由于对所在国的特点缺乏了解,"某些顾问提出的政治建议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而某些地方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通常都归罪于顾问,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国从越南召回了除技术专家之外的全部顾问。说到苏联顾问,刘少奇强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当地国家的干部,"目前已经是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了"。考虑到某些国家已经习惯于依赖苏联顾问的情况,刘少奇甚至建议莫斯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要表现得坚定果断一些。③ 尽管谈的不是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但莫斯科了解到中国这一立场后的感觉是可以想见的。

实际上,中国聘请苏联专家的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改变。1957年2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我们需要苏联专家,但有些部门过去请得多了些,以后要严格控制。④ 随后国务院发出通知,批评某些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并非必需,聘期也过长,规定"今后在聘请专家方面必须严格掌握精简的原则,凡可聘可不聘的坚决不聘,凡能缓聘的坚决缓聘"。⑤ 中国改变聘请专家政策的考虑,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目的是缩减聘请专家的庞大开支。⑥ 另一方面,是对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某些苏联顾问有意见。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

---

① 详见 Kramer, Mark, Hungary and Poland, 1956: 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 24 October 195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 №5, p. 50;关于苏共中央讨论在波兰苏联专家问题的俄国档案中译文,刊登在《苏联历史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②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日发表了宣言全文。

③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9, д. 9, п. 410, л. 202 ~ 203; *Кулик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 2000, с. 44。实际上,早在1955年8月中国就提出撤走在越南的全部顾问,尽管胡志明有意挽留。佐林致苏共中央的信,1955年8月23日。АВПРФ, ф. 079, оп. 10, п. 9, д. 8, л. 57。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7页。

⑤ 国务院批转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报告的通知,1957年2月25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4~5。

⑥ 关于专家开支的情况笔者将另文论述。

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以苏为鉴”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响中国政策方针或体制建设的顾问显然是没有必要了。① 这一点在1958年7月毛泽东分别与尤金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充分表现出来。毛泽东指责在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讲战例时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公安部的首席顾问工作调动不同中方商议等。但毛泽东又明确讲,这些批评仅仅是针对军事和公安两个部门的苏联顾问,并不是针对经济领域的专家。当赫鲁晓夫提出撤走所有顾问的建议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主张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② 随后,中国政府逐渐确定了聘请苏联专家的新方针。

赫鲁晓夫尚未离开北京,周恩来即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中国工作问题的议定书草案送毛泽东审阅。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继续工作。③ 8月23日国务院通知:“各部门聘请苏联专家必须严格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只有工作上确属需要的新技术、新专业和薄弱环节才可聘请专家,同时,要注意凡能聘请短期专家解决的,就不要聘请长期的专家,凡能够几个单位合聘的就要合聘。”④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通知,一方面强调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是优秀的技术人才,对他们应热情相待,并虚心向他们学习;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请专家不可的部门和技术环节才能聘请专家,聘期以短期为主,一般不要延聘。⑤

苏联方面也加强了对聘请专家手续的管理。1958年12月苏联

① 1956年5月彭德怀就主张将军队系统的专家、顾问减少170人。《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3页。

②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主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2~333页;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7月31日。АПРФ,ф.52,оп.1,п.498,л.44~47。

③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6页。

④ 国务院关于1959年度聘请苏联专家注意事项的通知,1958年8月23日。吉林市档案馆,全宗77,目录4,卷宗20,页码61~62。

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对苏联专家工作的通知,1958年10月20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94,页码46~47。

经济专家负责人符明转告中方，今后将严格按照派遣专家的新协定办事。过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届满时才提出延期问题，苏方为了满足聘请部门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专家留下来，以后再补办手续，今后使馆就没有权力这样做了。中方要求延聘专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专家。确属非延聘不可的专家，希望在专家满期前两三个月提出请求，以便在专家满期以前办好延聘手续。[①] 此后，中方进一步对聘请专家的专业、聘期、来华日期和聘请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并规定了审查制度和相应程序。[②]

由于执行新政策，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的数量逐年减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③] 再加上不断有专家到期回国，从1957年开始，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更呈现下降趋势。有材料说，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共2419人，1958年为1285人。[④] 如果与前引苏方统计数字相比，则在华苏联专家1957年减少了694人，1958年减少了1134人。[⑤] 至于1960年4月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数（约1500人[⑥]）还多于1958年，其原因在于中国许多单位要求延长在华专家的聘用期。[⑦]

---

①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报告，1958年1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全宗252，目录1，卷宗5，页码65～67。

② 国务院关于1960年度聘请苏联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1959年6月16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页码141～142；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编写聘请苏联专家说明书的内容和注意事项的通知，1959年6月16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363，页码76～82。

③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24、39。

④ ЦХСД，ф. 5，оп. 49，д. 131；*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1949～1960），с. 341。

⑤ 另有材料说，到1957年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已减少了1/3，即947人。AVPRF，f. 0100，op. 50，pap. 426，d. 29，p. 69，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p. 155。按中方的统计，到1958年底，在经济、文教各部门的苏联专家共有1177人。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报告，1959年4月11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5，卷宗21，页码96～106。

⑥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的报告，1960年4月2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3，卷宗51卷，页码6～11；АВПРФ，Ф. 0100，оп. 53，д. 8，п. 454，л. 205；*Кулик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295。

⑦ 1959年各部门提出延聘的苏联专家相当多，将近工作期满专家人数的1/3。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党组的报告，1960年4月2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3，卷宗51，页码6～11。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后聘请专家的低潮中,并非所有部门都减少了对苏联的要求,有些单位甚至还增加或新聘了苏联专家,这主要表现在国防新技术领域。1957年3月底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组织有关专业的教学和讲授喷气技术课程。几个月后又决定增设固体火箭、远程控制(陀螺仪)、远程控制(无线电)等三个专业,增聘控制专业2名至3名专家。[①] 为了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根据10月15日双方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派遣了3名专家来到内蒙,进行核部件设计和生产厂的选址工作。[②] 苏联国防部还决定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国官兵使用和维护这些设备,苏方拟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③] 1958年5月27日,周恩来致电赫鲁晓夫:鉴于在研究试制和生产火箭武器过程中,保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决定请求苏联政府派一个保密专家组来华协助工作,为期两年。[④] 中国政府还要求苏联派遣一个由31名导弹专家组成的技术小组于10月内抵达中国,同样工作两年。[⑤] 为了帮助中国建立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6月底和7月初,由苏联海军通信部副部长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6人,分两批到达北京,协商勘察建台选址事宜。[⑥] 7月12日聂荣臻复电在莫斯科的李强:经中央批准,在榆林建立水声学研究站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中方支付,但"建站技术及研究工作请

①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5、624页。

② 2001年8月10日笔者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在20世纪50年代任核工业部202厂技术员,后任该厂总工程师。

③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7~628页。

④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⑤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备忘录,1958年6月6日;张闻天致苏联驻华大使备忘录,1958年8月16日。AVPRF,f. 0100,op. 51,pap. 431,d. 1,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 213。

⑥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01~202页。

苏派专家来我国具体指导,所获资料可互相交换。"[①]到1959年,中国对国防新技术专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1月27日要求聘请13名国防专家,6月24日要求聘请195名军事专家,9月22日要求聘请8名P—2导弹专家,11月23日要求聘请23名军事技术专家。是年6月,中国还希望已经在华工作的137名军事专家延期两年。[②]

不过,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1959年10月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后,聘请专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国务院再次强调,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则是继续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聘请专家只限于为保证苏联援建项目的需要和发展高、精、尖、新的现代技术以及培养高等学校开设新专业或新课程的师资;聘请专家必须严肃认真,全面规划,通盘考虑,严格审查。[③] 苏联方面对专家来华则更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急需的领域。7月3日聂荣臻报告:苏联的援助在国防科技领域已经封口,对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则尽量控制,对已经签订的协议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专家问题:一、满期的一般不留,热诚欢送;十分必要而专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满期的我们一律不退,帮助他们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应表示遗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④]至此,苏联全面撤走专家的迹象已经显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准备。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作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的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

① 《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6页。

② AVPRF, f. 0100, op. 52, pap. 442, d. 3,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pp. 213、339。

③ 国务院关于1961年聘请苏联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1960年5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12,卷宗21,页码16~17。

④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0~331页。

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时过于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为信仰相同，目标一致，便可以兄弟相称，不分你我，一句国际主义的口号就替代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一旦出现分歧或误解，主权问题、平等问题则立即被提到桌面上来，使得本来可以维持的正常关系也无法继续。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否构成了苏联全面撤走专家的真正原因，作为中苏关系的一个侧面，苏联专家在中国究竟有何作用和影响，笔者将另文加以论述。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3期摘要转载，英译文发表在 *Russian History*, Vol. 29, Nos. 2～4, 2002。

4.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

在中苏争吵的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问题是一个经常涉及的话题。苏联人抱怨其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仅在华苏联专家和总顾问多次反映，就连苏联政府也出面请求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破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绝不是地方行政部门的专横妄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意识贯彻实施的方针的结果，这一方针反映了中国的总的政治路线。[①] 中国人则认为苏联专家在工作中有大国主义表现，看不起中国，苏联专家工资过高，是中苏关系不平等的表现。[②]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中苏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是否平等，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是否缺少正常的条件，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是否构成破坏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是否因负担专家开支而感受到巨大的经济压力呢？笔者拟依据来自中俄双方大量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回答这些问题。

（一）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

1949 年夏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

---

①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1977, c. 269。

② 笔者 2000 年 10 月 29 日采访李越然记录及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46～447 页。

遇只需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1]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2] 刘少奇还在公众大会上特别提到，苏联专家只领取和中国同等工程师一样的薪资，而不是如英、美工程师一样，领取很高的薪资。这是苏联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3]

但在1950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等新协定后，情况有了变化。[4] 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专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为此，中国政府应按每人每月2000卢布到4000卢布交付给苏联政府。中方对此感到难以接受。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1万斤至1.8万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此外，中国希望以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而不要支付美元。[5] 然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谈判中，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到1500卢布到3000卢布，但坚持应以外汇(卢布)结算。在3月8日双方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协定的会谈中，为了减少外汇的支出，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又提出，根据一些在华专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将补偿金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苏联外贸部长葛罗米柯对此予以否定，同时，苏方还要求把在华苏联军士的报酬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

---

①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 1～7。(2004年2月笔者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馆发现了中苏双方于1949年8月签订的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最初协定文本(109－00192－01/9－10)，详见：《寻找档案文献，探索历史真相——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的点滴收获》，载《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4、5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③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9～74页。

④ 关于中苏谈判的情况可参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⑤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2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2月12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64～69、70～74。

对普通士兵也要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卢布至600卢布，因此不应该把对专家的条件扩展到军士身上。况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样的标准也太高了。葛罗米柯则认为，苏方的立场“是以许多恰当理由为基础提出的”。尽管王稼祥后来暗示在协定中暂时不要提出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但苏方坚持己见。[①]

实际上，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经决定基本接受苏方的协定草案。3月6日周恩来通知，关于中苏专家协定草案，除少数属文字的修改意见外，全部同意。3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关于专家协定的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简专家”。[②] 此后，苏联领导人对中方提出的要求也有所考虑。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修改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有关决议，除了增加该协定“应适用于以前到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的条款外，将给苏联政府的军士补偿金降为每人每月1000卢布，并接受中方对协定第三款的修改意见，即中国政府“将以中国货币支付苏联专家固定工资，其数额与中国同等级别和专业的专家现行工资及以后相应的变动保持一致。在其他方面，保证苏联专家享有与中国专家同样的待遇，包括对专家食品和日用品的补贴”[③]。

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签字，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根据这两个协定，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出差补偿费用，按每人每月1500卢布至3000卢布计。[④] 1950年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批准将1950年有关专家薪金的决议延长

---

①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1950年3月8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3，д. 8，л. 36～40。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7、29页。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73号记录摘录，1950年3月22日。РЦХИДНИ，ф. 17，оп. 3，д. 1080，л. 6。

④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65，с. 8～9。

一年。[①] 1957 年 12 月 28 日双方政府又签订关于互派专家的新协定，其中对双方派遣专家规定了对等的条件。[②] 考虑到中国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的人员大大少于苏联来华的专家，[③]可以说这一协定主要还是为苏联专家制定的。不过，这至少在形式上反映了双方平等的原则。

在原则上确定苏联专家领取与中国专家同等的工资，这当然是合理的，也是中方乐于接受的。至于补偿金，首先，出国工作人员领取双份工资恐怕是通行的惯例；其次，本单位人员出国为他国工作，自然也需要得到经济补偿；最后的问题主要在于苏联的工资水平高于中国，再加上对派遣专家单位的经济补偿，使得中方对付出高额外汇补偿金感到为难，但从道理上讲，这种代价的付出并无不合理之处。引起中方不快的原因，关键在于中苏双方观念上的差异。在斯大林看来，中国是苏联的一位盟友，但毕竟是另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他并不了解的民族。而中国领导人则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标准看待苏联老大哥，认为革命先成功的国家帮助后来者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想到苏联领导人会在具体谈判中斤斤计较。

（二）苏联专家的待遇和中国的实际支出

中国为聘请苏联专家所需支出分为三部分：专家本人在华工资，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补贴费用，以及为弥补专家原单位损失而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规定的苏联专家在华工资在一开始就普遍高于中方同等人员的工资。据 1952 年 2 月 18 日陈云等关于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 79 号记录摘录，1950 年 12 月 13 日。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86, л. 176、208。

②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中苏政府签订的互派专家条件协定的通知，1958 年 1 月 22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10，卷宗 275，页码 108～112。

③ 据苏联的统计资料，根据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决议，1958 年至 1960 年到苏联参与共同研究和提供援助的中国专家只有 3 人。*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94、107。

苏联专家工薪标准问题给周恩来的报告所说，虽然合同规定苏联专家的工薪待遇比照中国同等职务和能力的专家现行标准执行，但实际上支付的工薪是高于国内标准的。该报告完全参照现有苏联专家工资标准制定了即将来华进行设计工作的专家的工资标准，按照当时计算工资的工作分值，来华专家工资分为七级：一级设计总工程师2900分，二级设计组负责人2800分，三级设计组工程师2600分，四级主任工程师2300分，五级工程师2000分，六级主任工程师1600分，七级技术员1500分。[①] 作为对比，这里举出1954年6月25日政务院颁发的中国各级行政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标准（包括补贴在内）：国家主席、副主席4280分，政务院总理、副总理3580分，部长最高2260分，司局长最高1470分；一级工程师最高136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560分。[②] 从分值看，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抵与中国的部长相同，而远远高于一级工程师。如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就比罗瑞卿部长的工资高。[③]

此外，笔者还在大连市档案馆发现一份1951年7月26日大连市苏联专家服务局副局长林志新和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乌宪科商定的当地苏联专家的工资表，大体情况是主任医师160万元（旧币，下同），医师140万元至150万元；高级教师150万元至160万元，教师100万元至140万元；工程师150万元，会计、技术员和实验员110万元至120万元，还有少数专家的工资定为200万元至230万元。[④] 没有找到同期中国相应人员的工资数据，但1956年全国实行工资制改革后确定的标准（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1元）：卫生部门分11类21级，最高类别最高级377元，最高类别最低级32.5元，最高类别平均约139.2元；高等院校教师分11类12级，最高类别最高级390元，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778～78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382～384页。

③ 笔者2001年12月23日采访赵明记录。赵明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编译处副处长，负责管理专家工作。

④ 关于大连市苏联专家工资标准的协定，1951年5月20日。大连市档案馆，全宗2，目录2，卷宗309，页码43～46、53、58。

最高类别最低级70元，最高类别平均约182.6元。如果考虑到工资改革后全国工资水平平均增长了39%，而苏联专家的工资分值1954年1月从原来的每分人民币1200元（旧币）提高到1400元，那么以上两项数据相比，当时中国同等人员的工资显然大大低于苏联专家的工资水平。[①] 另一个可以作为参考数据的材料是，1955年底国务院规定，编制在华苏联专家工资预算的标准按每位专家（限顾问和教师）每月平均350元计算，[②]可以看出，苏联专家的平均工资与中国同类人员最高工资相差无几。至于军队系统聘请的苏联顾问，其工资待遇大约要比非军事专家高15%。[③]

其实上述比较还省却了一个因素，即中国人员（高级干部除外）的工资一般包含了个人的所有开销，而苏联专家的工资中尚未包括其日常生活费用——这些开支都是由中方另行负担的。1955年12月国务院通知，因过去苏联专家经费预算标准偏高，故需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日常费用标准平均每位专家每天规定为：招待费（节日宴会费、礼品和纪念品费等）0.5元，文娱费（书报购置和文娱、体育所需费用）0.25元，住宿费（租金、家具、房屋修缮、煤火费、水电费、卫生杂品费和服务人员工资）13.5元，交通费（油料消耗、汽车维修、司机工资及管理费用）7.5元。此外还有由财政部统一支付的专家医疗费和警卫费用等等。[④] 如此算下来，这笔费用（超过652.5元）要大大高于工资本身，而且实际开销往往是难以计算的。仍以公安部为例，那里共有苏联专家三十多人，每人配备一部专车，一个翻译。所有专家都住在原恭王府（公安部宿舍）院内，每人一栋单独住宅，有4个至5个警卫日夜看守。据说，那时为专家服务的编译处用钱非常方便，

---

① 《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526、515、568页；政务院关于调整苏联专家工资分值的通知，1953年11月5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429，页码22～23。平均值为笔者计算所得。

② 国务院关于修订苏联专家所需经费的预算标准及开支掌管办法的通知，1955年12月15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83，页码12～15。

③ 2001年6～9月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④ 国务院关于修订苏联专家所需经费的预算标准及开支掌管办法的通知，1955年12月15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83，页码12～15。

只要说明是为专家开销的，从来都畅通无阻。[①]

中方为专家支出的第三笔费用是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1950年协定规定补偿金为每人每月1500卢布至3000卢布，1957年的新协定拉开了支付标准的档次，即咨询专家2400卢布，总工程师2200卢布，主任工程师2000卢布，工程师1700卢布，技师和工长1300卢布，熟练工人900卢布。[②] 笔者没有找到此后苏联援华人员结构的统计资料，但仅从1958年1月18日中苏科技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看，1958年至1959年苏联到中国讲学和提供咨询的学者、专家375人，而进行技术援助的学者、专家只有111人。[③] 由此可以判断，新协定很可能进一步增加了中国政府在补偿金方面的负担。

上述情况表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收入是丰厚的。据接受采访的专家本人反映，尽管很多人最初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时有些不情愿，甚至是迫于政治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后悔。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对他们在华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补偿，有些人得到的报酬至少是其平常在苏联工资的5倍。[④]

当然，如果说苏联专家的工资偏高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就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也不尽合理。首先，从客观上讲，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大批专家来华最终受益的是中国。毛泽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1958年曾经对下面的干部说过："你们不愿意请顾问，我反正是要请的。"[⑤]其次，对于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中方人员，苏联实行的是优惠政策。根据1951年12月6日关于中国公

---

① 笔者采访赵明记录。

②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中苏政府签订的互派专家条件协定的通知，1958年1月22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0，卷宗275，页码108～112；*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31。

③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93～94。

④ 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6。显然，赫鲁晓夫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受折磨"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参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07页。

⑤ 1958年6月1日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毛泽东的看法还可参见他1958年7月22日与尤金的谈话，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中方只需向苏联支付讲课费和指导者工资的10%~20%。根据1952年9月1日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中方仅向苏联政府支付书本费、公用事业费和助学金的50%。[①] 这无疑将抵消一部分中方的开支。最后,按苏方的计算,苏联收取的费用大大低于各种科学技术援助的国际价格水平,中国支付援华苏联专家的补偿金只是国际标准的1/3~1/4,而支付培训中方人员的费用则只是国际标准的1/6,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了大量科技文件和图纸。[②] 当然,作为个人行为,苏联专家也有超出协定范围滥用由中方支付费用的公共服务设施的现象。为此,联共(布)中央曾责令外交部授权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就地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一现象。[③]

不过,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这项开支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据1951年至1955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行政顾问和专家费一项开支:1951年5604万卢布,1952年4069万卢布,1953年3260万卢布,1954年3295万卢布,1955年4912万卢布,合计21140万卢布。[④] 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才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因此,作为全国的大管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强调尽量少聘请苏联专家。1951年1月7日周恩来致电王震和赛福鼎并告各大行政区和中央财经委:"凡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专门技术人员就不要再从苏联请人来"。1月18日就苏联在大连的企业移交中国后苏方人员的留用和薪俸等问题,周恩来又致电高岗转欧阳钦、韩光:"你们应将必须聘请的人数减至最低限度"。[⑤] 1957年以后中国在聘请专家方面实行"少而精"

---

①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9。

②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73。关于苏联提供技术资料的费用问题,详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第3章,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0年。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83号记录,1951年9月1日。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3, д. 1090, л. 6。*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8~9。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917页。

⑤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3~114、119~120页。

的原则,[1]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以外,与减轻巨大的经济负担也不无关系。

有一点需要指出,造成在聘请专家问题上经济负担过重,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因为对苏联专家的高待遇,中国人本身在一些问题上也是有责任的。支付给苏联专家的工资超过了协定标准,是中国政府主动为之,表明了中国人的诚意和待客之道,但不可取的是一些中国地方官员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如招待服务人员过多,随便为专家举行宴会和给专家送礼,宴会时陪客人员过多,给予专家各种不必要的额外补贴,经常在专家住室内摆放纸烟、糖果等等。如有的企业将专家的房间布置得花花绿绿,用最好的床单做桌布,在屋内喷香水。以宴请专家为名大吃大喝是经常的事情,个别单位甚至每日必宴,有时宴请一位专家,中方的陪客竟有二三十人。专家出差时中方随员过多也是个问题,被专家戏称为游行队伍。[2] 有些做法连苏联人自己都看不过去。如天津音乐学院和南开大学邀请苏联专家游览泰山,途中遇雨,陪同游览的负责人劝告专家家属及孩子乘坐山轿,而且自己也坐轿陪同。事后,苏联使馆认为影响极坏,提出将有关专家调回国内进行严肃处理。[3]

(三)对苏联专家日常生活的关心和照顾

苏联专家在中国享受的待遇有些是不能以金钱来计算的。笔者查阅的大量中国文献表明,从政策的角度看,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在日常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宾至如归”这些

---

[1] 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 国务院秘书厅关于检查1956年接待外国专家工作的通知,1956年12月8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35~37;关于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1956年7月1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38,页码7~14。

[3] 国务院关于在泰山组织苏联专家家属乘坐山轿错误的通报,1957年10月12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45~46。

中国待客的传统词汇来形容。

来者欢迎。首批到北京的苏联专家尚未启程，刘少奇就专门致电周恩来，对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做了认真交代。① 专家到京后，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接见，周恩来则邀请他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还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前往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看望他们。② 1956 年 6 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通知：凡新聘请的专家应由聘请部门负责人陪同游览一次本地的名胜古迹；定期统一组织所属范围的专家参观本地名胜古迹和工厂、农庄以及各种经济、文化展览会；专家要求在假期到外地游览参观可予同意；专家出差到外地时可顺便游览途中或附近地区的名胜古迹。③

走者欢送。第一批专家期满回国前，政务院专门通知：各部门可以首长名义赠送总值不超过 20 万人民币的有政治意义的纪念品一份，部门首长可举行小型宴会饯行，并亲自到车站欢送。④ 1955 年 9 月中国政府又规定：专家工作期满回国时，除以国务院名义发给中苏友谊纪念章外，所在工作单位负责人应给专家写感谢信，写明专家的主要工作和成绩，并附俄文译本。对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应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发给感谢状。对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则应报请国务院以总理名义颁发感谢状。⑤

苏联专家的节日和休假问题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1953 年 2 月规定，在华苏联专家除享受中国统一的节假日外，十月革命节放假 2 天，12 月 5 日斯大林宪法日放假 1 天，2 月 23 日苏联红军节放假 1 天；各地负责人每年国庆节统一宴请一次当地的苏联专家，每年春节则由聘有专家的各单位负责人分别宴请本部门的苏联专家；国庆节

---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6～47 页。

② 李越然：《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片段回忆》，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87～89 页。

③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组织专家游览参观的通知，1956 年 6 月 28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10，卷宗 275，页码 41～42。

④ 政务院关于欢送苏联专家回国的办法的通知，1952 年 1 月 6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A31，目录 2，卷宗 429，页码 10～11。

⑤ 国务院关于发给苏联专家感谢状和纪念章的办法的通知，1955 年 9 月 15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67，页码 11～12。

和春节时向苏联专家子女每人赠送一份礼物；元旦、五一劳动节及苏联红军节各单位应为专家举办纪念会和各种晚会；国庆节的天安门和各地观礼及其他庆祝大典，应酌情邀请专家或其代表出席。[①] 关于专家按协定享受的休假，1955 年 10 月规定，休假的时间和地点应尊重专家本人的意见，如回国休假，其往返旅途时间不计算在休假期内。[②] 为了满足苏联专家到海滨度假的愿望，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同意了苏方建议，特将 1957 年暑期在中国境内各地休假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原则上集中在北戴河及青岛两地休假，往返费用由聘请单位负担。北戴河及青岛的专家休养所由外专局和当地人民委员会筹办并管理。[③] 为了减少休假专家长途跋涉，1958 年夏天又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境内休假采取了分区集中的办法，开设了北戴河海滨专家休养所、庐山交际处招待所和青岛疗养院三处休假场所，并划分了休假区域和分期时间。[④]

在医疗方面，不仅专家本人，而且其家属的医疗医药费用一般都是由中国政府统一负担的，还特别规定，专家或专家眷属镶牙的医药费和手术费也由中方支付。[⑤] 1954 年 12 月国务院还通知，各单位负责人须探望本单位患病住院的专家并派翻译人员前往照料。[⑥] 后来又因苏联专家对看病时没有固定医生的状况有意见，要求各医疗单位给专家及其家属治病时，“尽可能固定大夫，负责治疗到底”[⑦]。

对于在野外工作的专家，中国政府也给予特别关照。1957 年 2

---

① 政务院关于苏联专家放假办法和放假日招待办法的通知，1953 年 2 月 7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A31，目录 2，卷宗 429，页码 4～5。

② 国务院关于苏联专家休假办法的规定，1955 年 10 月 22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67，页码 18。

③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 1957 年暑期苏联专家在我国境内休假办法的通知，1957 年 6 月 4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9，卷宗 294，页码 14～16。

④ 外国专家局关于 1958 年暑期苏联专家在中国境内休假办法的通知，1958 年 5 月 24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312，页码 108～111。

⑤ 国务院秘书厅关于苏联专家医疗费和镶牙费的补充通知，1955 年 9 月 12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67，页码 45。

⑥ 国务院关于探望患病住院专家的通知，1954 年 12 月 28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67，页码 4～5。

⑦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在专家医疗和饮食卫生方面应注意的几件事项的通知，1959 年 8 月 12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11，卷宗 88，页码 99。

月外国专家局专门就伙食补贴问题发出通知,强调外国专家在野外工作期间,各聘请部门应当供应大体上相当于北京国际饭店标准的西餐伙食,并保证对专家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如纸、烟、毛巾、肥皂等)的供应,并按照附近大、中城市通行市价予以出售,其差价由聘请部门予以补贴。①

为了保证对来华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专门开设了使用票卷购物的商店,对外国专家开放。② 1958 年提出了如下要求:各地专家招待部门应根据专家实际所需肉制品、糖果及必需的水果的品种和数量,提出年度和分月要货计划,由当地供应;当地不能解决的部分,可报请省第二商业厅、局进行计划安排,确定专点加工复制;本省市内不能解决的部分,由省市第二商业厅、局分地区、品种、数量汇总,报第二商业部安排解决。③ 考虑到专家的生活习惯不同,还对一些特殊粮食成品——黑面粉、三角米(荞麦制成)、麦精(小麦或大米制成)、巴力米(芒麦制成)、豌豆瓣、通心粉等——的供应专门提出要求:各地专家接待单位,应事先认真制定要货计划交当地粮食部门;各地粮食部门应尽可能在当地加工解决;如因当地缺乏加工设备或限于技术条件不能加工而必须由外地供应者,则统由北京市粮食局负责协助解决。④

有意思的是,对于苏联专家饮酒这样的细节,中国政府也作出了特别规定。鉴于苏共二十一大提出关于禁止酗酒的问题,苏方专家组织也要求平时不要向专家供应烈性酒,1959 年外专局专门规定:平时组织专家舞会和野游时,一般不必供应酒类。如专家坚持要求,则可供应一些啤酒和葡萄酒;餐厅小卖部平时可供应啤酒和葡萄酒,不应卖烈性酒,只在重大节日,可采取少量定量供应的办法;举行宴会时可少量供给一部分烈性酒。并要求各地招待单位就此问题与当

①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对在野外工作的外国专家实行伙食补贴等问题的通知,1957 年 2 月 27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9,卷宗 294,页码 25~26。

②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p. 126。

③ 外专局关于解决外国专家所需肉制品水果及高级糖果问题的通知,1958 年 4 月 3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312,页码 22~24。

④ 外专局、粮食部关于解决外国专家需要某些特种粮食制成品供应问题的联合通知,1958 年 5 月 3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312,页码 17~18。

地外国专家负责人妥善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协助和支持。[①]

甚至对专家的丧事也有明确规定：各省、市专家招待委员会和专家所在工作单位会同其他有关单位组织治丧委员会，并指派负责干部前往专家逝世地点，协助料理善后事宜；聘请部门应派负责同志至大使馆或领事馆吊唁；举行适当仪式的追悼会；慰问已故专家亲属或商请外交部发唁电；对已故专家尸体的处理（火葬、土葬或运回本国），依其家属或驻华使馆意见办理；对已故专家亲属给予抚恤金。[②]

总之，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招待来华专家的制度，要求各地对招待外国专家的工作每半年检查总结一次。检查总结中所包括的事项有"对专家迎送、住房分配、伙食调济、交通供应、疾病医疗、文化娱乐、参观游览、安全保卫"等各个方面，目的是克服"对专家不热情、不礼貌和不照顾专家本国生活习惯的缺点"[③]。

（四）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及其变化

如果说对苏联专家在华生活的关心和照顾是始终如一的，那么为苏联专家创造的工作环境则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造成这种环境改变的原因是复杂的。从中国政府的初衷看，既然付出高昂代价把专家请来，自然是希望他们能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发挥最大的作用，而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则是首要的、必需的条件。这一点，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始终注意的，从逻辑的角度看也是容易理解的。但事实上，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环境确有不尽人意之处。从中国各级政府到具体聘请专家的单位都缺乏工作经验，以致聘请专家的计划经常变动，专家开展工作所需的基本材料和文献准备不全，与苏联有关方面缺乏必需的沟通和联系等等，其结果往往造成苏

①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供应外国专家酒类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1959 年 7 月 27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11，卷宗 88，页码 103。

② 国务院关于苏联专家善后事宜的通知，1955 年 10 月 25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67，页码 27～28。

③ 国务院秘书厅关于检查 1956 年接待外国专家工作的通知，1957 年 1 月 12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9，卷宗 294，页码 35～37。

联专家来华以后无法顺利工作。[①] 不过,这方面的状况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地得到改善,问题在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两种情况使得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确有向不利方向转变的趋势:其一,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以及广大基层工作人员政治情绪的波动,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二,中苏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消息渐渐在基层和群众当中传播,无形中影响了对苏联专家的态度。

苏联专家来华之初,中国政府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熟悉中国的环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三令五申,要求聘请专家的各部门和各单位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有关情况。早在1950年6月,周恩来就致函陈云:今后凡有苏联专家工作的机关、企业的负责人,务必将本机关、企业的生产业务计划扼要地告诉苏联专家,各地工业生产的情况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工业生产方针、计划的指示,不论是报纸上登载的或单位发布的,均应尽一切可能有计划地指定专人经常找苏联专家面谈,并与他们密切联系,借以更好地发挥专家们的作用。[②] 12月9日,周恩来批准了《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其中规定:(一)每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分别向专家作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情况和各种政策问题的报告;(二)将政府的各种政策性文件,编译成俄文供专家参考;(三)第三个月召开一次专家工作汇报会议。[③] 为此,周恩来还提出要外国专家局编印《专家工作通讯》,并亲自题写刊名。除了交流专家工作的经验,这本内部资料主要内容就是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政策或其基本精神翻译成俄文,提供给苏联专家。[④] 1958年又扩大了发送范围,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都可以阅读。[⑤] 中共中央党校则把每期的俄文版《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发给专家阅读,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⑥]

---

① 详见本书《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一文。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③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④ 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⑤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扩大俄文内部参考资料阅读范围的通知,1958年7月12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0,卷宗275,第122~123页。

⑥ 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4~205页。

不仅如此，苏联专家还可以参加所在部门或单位的所有重要会议，以便及时了解政策和方针的制定情况。1952年11月4日华北军区副司令杨成武请示，苏联顾问可否参加部队党委会议，毛泽东答复允许，并批转各处参考。[①] 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专家总负责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政府系统和军事系统各部门的最重要的、带方针政策性的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是在党委会议上讨论的，因此，虽然有了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见专家组长的规定，但在讨论上述问题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或党委会议仍然是必要的。[②]

据公安部专家工作负责人介绍，苏联专家可以参加公安部所有的工作会议，包括部领导的内部会议。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办公室就设在罗瑞卿部长的外屋，有事可以随时找部长商议。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所有文件都必须给专家看，所以无论是中央下达的文件，还是部里的文件，都一字不落地翻译给他们听，由他们做记录。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60年专家撤走前。当笔者问到这样做有无顾虑时，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们对苏联专家非常信任，都是共产党嘛"[③]。

在军队系统也是如此。1952年12月31日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毛泽东报告改进专家工作的措施时提到：今后各部门、各兵种的党委会议，以及有关布置工作、检查工作较为重要的会议，都吸收顾问或首席顾问参加；各部门、各兵种负责人，定期向顾问介绍我军情况及本身工作情况，并征求顾问意见等，得到毛泽东赞同。[④] 后来，不仅各部队照此办法执行，甚至每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报告和文件，也均送给苏联顾问团一份，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58年。[⑤]

苏联专家工作很认真，但由于缺乏有关中共历史的基本知识，常常闹笑话。比如，1955年一位在公安部工作的顾问回国前，坚决要求面见周总理，说有重要情况反映。有关方面未敢怠慢，随即安排周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07～608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

③ 笔者采访赵明记录。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⑤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2001年10月18日采访纪亭榭记录。纪亭榭时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兼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

恩来和公安部、军委几位领导人接见了他。这位顾问郑重报告说,公安部队中有的干部是国民党特务,因为他看了档案材料,这些人曾参加过国民党。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说,邓颖超也曾加入过国民党。[①]这件事一方面表明苏联专家可以查阅中共干部的人事档案,足见对其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联专家确实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和中共的历史。

1956 年 4 月国务院明确发出通知,为使苏联专家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各聘有苏联专家部门的负责同志必须定期向专家介绍本单位的工作情况、业务计划以及执行专家建议的情况和问题,并且供给专家必要的业务资料";"凡在中央各部门司、局长和省、市厅、局长一级干部中传达的有关党和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方面的重要政策的内部报告,中央各部门和地区应当指定适当的同志向本部门的专家组长和各地区的专家组织负责人进行传达";"在苏联专家人数较多的地区,主管专家工作(或主管专家招待工作)的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定期地为专家组织有关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方面情况的报告会"[②]。是年 12 月,国务院又规定,为苏联专家组织报告会已列为今后检查专家工作的内容之一。[③]

此外,一些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对于苏联专家也是开放的。例如,1956 年 6 月国务院通知,旅顺军港为非参观游览区,过去原则上一律不准外宾进入。现在考虑到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都是我们国家机关内部的人员,不同于一般外宾",特规定允许他们去旅顺作一般性参观。[④]

在此对比一下 1948 年苏南冲突时的同类问题,对于评判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有参考意义。苏联把南斯拉夫政府拒绝向苏联专家提供有关材料作为撤走专家的理由,而铁托则因政治局委员赫

---

① 笔者采访赵明记录。

② 国务院关于向苏联专家介绍情况、供给资料的通知,1956 年 4 月 5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143,页码 121。

③ 国务院秘书厅关于为外国专家组织报告会的通知,1956 年 12 月 8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138,页码 55~61。

④ 国务院关于苏联专家去旅顺参观问题的通知,1956 年 6 月 19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143,页码 122。

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苏联使馆提供了党内情况而对他们进行审判。[①]如此看来,苏联专家在中国享受的政治待遇应该是无从挑剔的。

不过,1958年中苏领导人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产生分歧时,中国领导人也顺带提出了专家问题。[②] 此后,向苏联专家介绍情况的要求也有一些微妙变化。9月15日外专局向国务院报告,今年以来为北京地区苏联专家组织的15次报告会,效果良好。如国务院副秘书长龚子荣关于中央国家机关的双反运动的报告,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关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计委重工业局长余建亭关于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问题的报告等等。苏联方面的专家组织希望各地都加强这项工作,并强调,如果专家对于本地区以至于全国情况知道太少,不仅影响在华工作的开展,回国后无法介绍中国的情况,也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外专局为此提出的改进意见在报告内容方面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强调在介绍情况时应当根据总路线对专家进行"务虚",即重点报告大跃进、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况;二是降低了报告本身的等级,过去可以向专家传达厅局级甚至部级的文件,现在限制为"向我们自己一般干部传达的报告内容",但不能涉及对苏联的批评;三是降低了报告人的级别,过去要求部门负责人亲自作报告,现在允许指定代理人,但对报告稿事先需加以审查。[③] 当然,这些微小的变化尚不致影响专家的工作环境。

赫鲁晓夫全面撤走在华专家时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监视和跟踪,认为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④] 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许多专家也有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苏联专家都不许单独行动,跟踪他们是强制性的,即使上厕所也有卫

---

① 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7月31日。АПРФ,ф.52,оп.1,п.498,л.44～47。

③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加强为苏联专家组织报告会问题的报告,1958年9月15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4,第21卷,页码5～7。

④ 苏联驻华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1960年7月18日。АВПРФ,ф.0100,оп.53,д.11,п.454,л.243～246。

兵跟在旁边,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搜查他们的住所。有的专家感觉到,“我们在中国就像关进了一所被高墙环绕的监狱”。[①] 无论苏联政府或专家本人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样说的,以及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在采访中方负责接待苏联专家或与专家共同工作的人员时,几乎都问了这个同样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复,安全部门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名苏联专家使用过“手段”,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政策。[②] 对苏联人采取反间谍手段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而那时苏联专家离开中国已经很久了。即使某些专家的感受是真实的,也是由于误会造成的。据了解,对于苏联专家的外出行动,中国方面的确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这些人只是警卫、向导和翻译。由于在专家住所发生过偷盗现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想要杀害苏联专家,所以中方对专家的警卫是很严格的。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国专家的会议上才决定,对专家的警卫工作应主要放在驻地的安全保卫方面,一般专家外出可不随身警卫,但对于专家负责人或特殊专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凉地区出差的专家,还是要求随身警卫。[③] 至于中方派遣向导和翻译跟随,则完全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苏联专家也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不懂汉语”[④]。

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对苏联专家的工作确实是有影响的,尽管这并非是官方有意造成的。1957年6月苏联大使馆在一份关于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提到,虽然中共在同“右派分子”作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运动组织得不好,大量有损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情报落入了这些“右派分子”手中,致使反苏言论和关于

---

①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p. 129;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75。

② 中苏关系恶化时,赫鲁晓夫曾找人写反华文章,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拒绝这样做,并坚决否认中国人对苏联专家进行“盯梢”的说法。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③ 习仲勋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的指示,1956年12月28日。关于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1956年7月10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38,页码2~5、7~14。《参考资料》,1954年8月23日,第189号,第314~316页。

④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p. 130。

匈牙利事件的敌对性宣传不胫而走。大使馆忧心忡忡：其结果很可能在某些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产生不利于苏联人的影响。① 苏联使馆的担心不无道理，根据新华社的消息，确有不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一般市民，对苏联在波匈事件中的做法表示不满或不理解，认为匈牙利出现暴乱是苏联的责任，苏联出兵是干涉别国内政等等。②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讲，已经考虑到开展政治运动时应内外有别。如在1958年开展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有些部门提出是否可以组织外国专家写大字报和参加群众性辩论，为此国务院规定：应当及时向外国专家介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以及本部门的运动进展情况。群众在运动中所提出的有关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国外设计、专家建议等问题，应当根据需要，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虚心地征求外国专家的意见并向他们求教。这种谈话和座谈会应当和群众性的鸣放、辩论严格分开；应当允许外国专家看大字报和参观展览会。他们如要求将大字报摄影，也不要加以禁止。但必须注意凡大字报和展览会有批评专家内容的，一律不许张贴和展出；不要组织外国专家参加群众的座谈会和辩论会，也不要提倡和引导外国专家采取大字报的形式向我们提意见。但如果外国专家主动要写大字报，不要加以阻止。③

不过，群众的热情一旦在运动中迸发出来，是很难靠几项规定制约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很多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认为苏联专家思想保守，跟不上跃进的步伐，有事不愿找专家，甚至减少专家工作，的确出现了有些专家无事可做的现象。④ 核工业部202厂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该厂正处于设计阶段，苏联专家按照常规提出，设计工作应分为三步，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

① TsKhSD, f. 5, op. 49, roll. 8862, no. 41 (April～December 1957), pp. 105～113,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pp. 132～133。

② 《参考资料》，1956年11月5日，第2043号，第127～128、134～136、145页。

③ 国务院关于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是否组织外国专家写大字报等问题的通知，1958年3月18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10，卷宗275，页码108～112。

④ 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48，页码8～15。

设计。但中方负责人认为，在目前大跃进和任务紧急的形势下，应打破常规，采取两步设计，取消技术设计的中间环节。为了说服苏联专家，中方便组织他们参观在“大跃进”中名声显赫的徐水地区，试图以亩产万斤的惊人记录说服苏联专家。但苏方人员对徐水的粮食产量持保留态度，仍不同意改变设计方案。由于中方人员一再坚持，苏方被迫同意取消技术设计环节，并三步为两步，提前完成了设计。结果在施工中出现了问题，不断遇到麻烦，大大小小的修改有几百次。①

1958 年夏季及 1959 年 10 月中苏领导人发生争吵以后，大多数干部都已经知道中苏关系出现了麻烦，苏联在搞修正主义。② 特别是听说毛泽东讲了“我们上山打游击”的话，不少基层工作人员以为问题严重，思想和情绪受到很大影响。过去对苏联专家的建议有不同意见，都是协商解决，现在则有人认定是专家有意捣乱，是赫鲁晓夫让专家们在中国做自己的试验。海军航空兵一位搞机场建筑的苏联专家在修建机场时，提出跑道坡度超出了常规标准，中方认为这样可能造成事故，双方发生争执。一位中方干部在情急时竟说：“我们请专家来不是搞破坏的，中国不是你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于相互之间的信任不存在了，有的部门甚至在电话总机处安装了监听设备，监听苏联专家与国内的长途电话。③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可以相信有的苏联专家所说其信件被拆阅的事情。④ 尽管这些情况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政府行为，但毕竟会伤害苏联专家的感情，使他们感到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已经恶化。

如果对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环境进行整体评价，那么接受凯佩尔教授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两国关系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的工作感到满意”，也欣赏中华民族的质朴风格，只是对中国人与专家私下接触受到严格限制的现象感到不解。⑤ 而

---

① 笔者 2001 年 8 月 10 日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任核工业部 202 厂技术员，后任该厂总工程师。

② 笔者当时在上小学，因生活在机关大院，对此也有所耳闻。

③ 笔者采访纪亭榭记录。

④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p. 133；*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c. 75。

⑤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pp. 129～130。

笔者采访的所有中方人员也都认为，与苏联专家的工作关系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列举苏联专家撤离时的情形对此加以说明。大连造船厂的专家撤走前，没有按照苏联政府要求的将全部图纸和资料带走，而是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的所有图纸和资料都交给中国技术人员，让他们尽量抄写和记录，说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记多少就记多少，他们不想就这样把图纸、资料带走。在包头 202 厂负责培训核材料生产人员的有三十多位苏联专家，他们听到撤离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国技术人员表示，中国需要了解的东西，他们知道什么就告诉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绝不保留，他们把这种做法叫“挤牛奶”。在海军工作的许多专家临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别之情，一位曾得过列宁奖章的苏联战斗英雄还流下了眼泪，甚至有人到了火车站还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中国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资料。① 这种情况之普遍，以致国务院专门为此发出通知，对于主动提供技术资料，甚至亲自动手帮助抄录资料的苏联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通知》要求：一、各单位不要向专家索取原来属于专家所有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除非专家主动借给或送给。二、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应严格保密，注意务使资料保持原状，必须选择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员去做，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三、所借资料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可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四、切忌对个别专家表示出过分的热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强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②

上述如此动人的情节，不仅表明苏联专家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是满意的，而且从一个角度说明，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对中苏人民之间的感情造成严重影响。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总 82 辑，2002 年 5 月

---

① 笔者 2001 年 9 月 21 日采访徐金成记录。徐金成现任大连造船厂厂史编撰办公室主任。笔者采访安纯祥记录，采访纪亭榭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404 页。

② 国务院有关保护苏联专家的指示电，1960 年 8 月 5 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 1960 年，卷号 479，页码 6～7。

5.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

中苏同盟的存在仅仅十几年,而真正的蜜月时期不过数年而已,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深远的。直到今天,从党和政府的机构建制及名称,到经济体制的设立和运转,乃至大都市的建筑物和厂矿企业的机器设备,都还可以看到苏联的痕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国家的时尚或习俗传播到其他国度和地区,大体说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国民自我意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然而,一种思想、制度甚至国家体制的移植,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完成,则必然依赖于政府行为,所以它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学习苏联的途径大体上有三种,第一是大量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通过书本学习。[①] 第二是大量派遣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学生到苏联实习、考察,通过实践学习。[②] 第三就是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将苏联

---

①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完全的统计,自 1949 年 2 月到 1952 年 9 月止,中国出版的苏联书籍中译本共约 3131 种,仅人民出版社就出版 1216.61 万册,其中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占 1/6。参见《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9 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中国台湾学者余敏玲有专文论述《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台湾)《新史学》第 12 卷第 4 期(2001 年 12 月)。

② 1950 年至 1960 年,苏联共接受 3.8 万名中国公民前去学习或实习,1949 年至 1966 年,苏联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 1.1 万人。*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 — 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65, с. 53。

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传授给中国人。[①] 应该说，与阅读书本和实地考察相比，通过面对面、手把手和朝夕相处的方式向苏联专家学习，影响更大，成绩更佳，见效更快。可以这样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一度在中国的出现，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专家这一渠道发生作用的结果。

鉴于有关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研究目前在国际学界，尤其是在中俄学者当中尚未展开，因此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收集和梳理史料。为此，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著外，还到北京、内蒙、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在此基础上，本文拟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这一过程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一）倡导“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当第一批苏联专家于 1949 年 8 月来到中国时，刘少奇就在欢迎会上表示：这些专家“千里迢迢到中国来，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说到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刘少奇提出了“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的著名口号。[②] 这个说法在以后若干年几乎成为中国各级干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的一条戒律，也是在那个时期无条件学习苏联的保障。[③] 几天以后，刘少奇

---

① 关于苏联专家来华的过程和规模，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一文。

②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年，第 7 页。

③ 笔者 2001 年 6 月至 9 月采访王亚志、2000 年 10 月 29 日采访李越然、2001 年 10 月 18 日采访纪亭榭等人时都留下了这种印象。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李越然在 50 年代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俄文翻译。纪亭榭时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兼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直到 1956 年下半年，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是坚持这种说法。参见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第 20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626 页。

又分别对东北局干部和在北平的中共高级干部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①

在工业系统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针。1951 年 4 月，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代表中央政府要求在中长铁路工作的中国干部，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从各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一件一件地学透彻，学会成套的经验"。② 1952 年 12 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③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苏联专家并非没有阻力。如鞍山钢铁厂聘请苏联专家两年来，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进，但仍有 144 项合理建议未被采纳，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领导上未加重视，长期搁置；二是操作人员思想保守，习惯于旧方法，无法贯彻。④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工程人员最初抵触苏联专家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种情绪在有一些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干部、老工程师和老工人中间尤为明显。⑤ 针对这种状况，1953 年 9 月 9 日中共中央专门下发文件，其中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巩固地确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思想，克服保守观念和骄傲自满情绪；各部门必须在专家参加之下制定工作计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22 页。

② 《人民日报》1951 年 4 月 25 日。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374～375 页。

④ 鞍山钢铁公司关于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指示，1951 年 2 月。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 500，目录 2.1，案卷 3。

⑤ 《参考资料》，1954 年 12 月 9 日第 281 号，第 130 页。

划，并邀请他们参加各级领导会议、专业会议和技术会议；对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加以采用；必须在苏联专家帮助之下有计划地加强在职干部的业务教育，请专家有系统地讲解各专业和各方面苏联的先进经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把使用专家作为自己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各部门的专家工作应有负责人专管，并根据专家人数建立适当的专家工作机构；各部门每半年（每年 3 月和 9 月）应对苏联专家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及时上报中央。[①] 笔者的确在地方档案中看到许多关于检查专家工作的报告或总结，包括国家计委和财政部都有详细的报告，[②]有的地区还以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这一工作。[③]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甚至针对个别企业的具体问题向全党和全国发出指示，强调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 1953 年 5 月和 7 月，新华社两次报道了黄石市大冶钢厂因不尊重苏联专家意见而出现大量废品，以及苏联专家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的情况。[④] 中共中南局了解情况后，很快派出了工作组，帮助大冶钢厂在领导上、管理上、技术上坚决转变忽视专家意见的状况，指令该厂把实现苏联专家的建议作为今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中心工作，并提议把苏联专家的建议编成本厂的技术措施计划，动员全厂，保证实施。8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专门转发了中南局的指示。[⑤] 同年 8 月 7 日新华社又刊登了天津钢厂不认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消息。[⑥] 不久，天津市委也向华北局和中央报告，该厂在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专家工作无人负责，专家的建议也不记录，特别是一些技术干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1953 年 9 月 9 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9，卷宗 52，页码 5～6。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档案馆编：《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年，第 880～881、882～885 页。

③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报告，1953 年 7 月 15 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9～1，卷宗 20，页码 9～11。

④ 《参考资料》，1953 年 5 月 23 日第 116 号，第 343～344 页；1953 年 7 月 8 日第 155 号，第 119～120 号。

⑤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南局（加强与苏专家合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53 年 8 月 22 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9～1，卷宗 1，页码 109～111。

⑥ 《参考资料》，1953 年 8 月 7 日第 183 号，第 76～77 页。

部一贯轻视、怀疑甚至抗拒苏联专家的建议,并以敷衍、欺骗的恶劣做法对付苏联专家,以致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也使生产遭到严重损失。天津市委为此召开全市工程技术人员大会展开批评讨论,以示教育。中共中央当天便批转了这一报告。①

20世纪50年代初军队系统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在海军就有不少技术人员认为,英美的海军比苏联强,科技比苏联发达,应该在政治上学苏联,在技术上学英美。② 针对这种抵触情绪,1952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③彭德怀12月24日的讲话虽然粗糙一些,但意思完全相同。他严厉指责那些故步自封、知识浅薄而不愿向苏联专家学习的人说:"应当大喝一声,告诉他们,革命的历史总是向前的;是任何人拖不住,挡不了的。或者很快赶上来跟大家一起前进,或者就请滚开!"④

在这样一种由上层推动的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聘请苏联专家的意义才充分体现出来。

(二)苏联专家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苏联专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国家管理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建立方面。建国之初的几年,大量专家和顾问云集北京,⑤就足以说明其对中国党政机关工作的影响。

解放初期,各地厂矿企业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健全,劳动力管

---

① 中共中央批转天津市委关于天津钢厂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存在问题的报告,1953年10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9～1,卷宗68卷,页码105～108。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64～165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07～608页。

④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⑤ 详见本书《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一文。

理混乱。[1] 针对这种状况,苏联专家小组认为需要立即进行制度上的整顿和改进,并于 1954 年 1 月建议中共中央责成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及其他部门合作解决这一问题。[2] 半年后,政务院颁布了根据全国总工会建议制定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并责成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纲要》制定本部门的劳动规则。[3]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聘请的苏联专家契普洛夫不仅深入各省市解决实际问题,帮助沈阳、旅大、吉林等地编制预算,加强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而且对于领导机关的财政管理制度也提出很好建议,以致财政部请求政务院务必让他继续留在东北工作一年,并保证在这一年中组织干部加紧学习,力求提高,以达能胜任工作。[4]

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苏联专家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和巨大的帮助。中国在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既无人才,又无经验,也不能完全依靠苏联的计划部门,因为他们远离中国,不了解实际情况。于是,在华苏联专家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苏联方面关于修改"一五计划"草案的 59 条意见当中,有 52 条就是在华顾问提出的。[5] 再有,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半年,协助中国专家完成了《1956 年～195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为奠定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6]

即使在中共建立多年的军队组织,为了加强现代化和正规化建

---

① 天津、武汉、郑州等地对有关情况的报告详见《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第 321～332 页。

② TsKhSD, f. 5, op. 28, roll. 5104, no. 138(January—October 1954), Deborah Kaple, 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2～123。

③ 《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第 316～321 页。

④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关于请求让苏联专家继续留住一年的报告,1953 年 1 月 7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A31,目录 2,卷宗 429,页码 1。

⑤ 《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年,第 411～412 页。

⑥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93 页。

设,也需要通过苏联专家从建制上加以改造。海军、空军是这样,[①]干部管理也是如此。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 1952 年 12 月 27 日报告,“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②]。

特别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苏联专家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旧中国的工业管理大体上还处于手工业水平,如在电力系统,设备的检修和运行主要是靠老师傅的经验和言传身教,没有一套统一的、科学的操作方法。1949 年 9 月,石景山发电厂 6 号机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全北平大面积停电,于是聘请苏联专家到厂帮助处理。在修复设备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不仅在计划检修、改革管理体制、改进设备和恢复铭牌出力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更重要的是为电厂编制了一套运行规程,要求工人按规程操作。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为此,中央燃料工业部将此规程作为典型规程印发到全国各电厂。[③] 1950 年,苏联专家又帮助东北电力企业建立起经济核算制及各种安全发供电规程和机构。[④] 应该说,是苏联专家为中国电力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大连造船厂是苏联 1945 年接管的老厂,较早地实行了一套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1947 年陈云主管东北经济工作时,就对那里实行苏联的八级工资制拍手叫好。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合营后,大连造船厂便成为全国企业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一面旗帜。当时在专家的主持下按照苏联模式搞了一套规章制度,号称“企业管理天书”,1954 年在全国推行,带动了全国造船业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⑤] 冶金工业的管理工作也是苏联专家推动的。早在 1951 年 1 月,苏联专家就

---

① 详见本书《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一文。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673~674 页。

③ 薛启宇主编:《中共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历史大事(1948~1995)》,中共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党史征编办公室 1999 年印制(未刊),第 202 页。

④ 《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15 日。

⑤ 笔者 2001 年 9 月 21 日采访徐金成记录。徐金成现任大连造船厂厂史编辑委员会主任。

对鞍山钢铁公司的管理机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整编意见。[①] 同时,苏联专家还帮助东北的许多企业建立了各级计划机构,推行使用计划表格,确定生产责任制,实施"流水作业法",大大加强了生产的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②]

中国很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都倾注了苏联专家的心血和汗水。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是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该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帮助筹建。在 1953 年 7 月 15 日破土动工前,苏联就派出了总顾问希格乔夫和第一批技术培训和土建专家进行现场指导,以后又陆续派来近 200 名各种专家,从产品工艺、技术检查到设备安装、生产调度,都有苏联专家把关,还配备了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直到各车间高级调整技工的全班人马。他们手把手地教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 1956 年 7 月 13 日从总装线开出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③] 对于中国航空工业如何从修理飞机过渡到制造飞机,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提出了根本性的建议,并设想了非常具体的途径和方法。40 余年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之一段子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由衷地说:"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④]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舰艇制造业。在新中国海军初创阶段,只能依靠修复旧船和改装商船建造一些巡逻艇,朝鲜战争期间则完全是依赖购买苏联的舰船。1950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转让技术和提供设备,帮助中国建造驱逐舰、扫雷艇、鱼雷快艇等。经过长期的谈判,中苏于 1953 年 6 月 4 日签署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1954 年 11 月,随着技术组织措施逐步落实和图纸资料及器材设备陆续到位,苏联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来华。该委员会在

---

① 鞍山钢铁公司关于苏联专家对鞍钢管理机构整编意见给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报告,1951 年 1 月 13 日。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 500,目录 2.1,案卷 9。

② 《人民日报》1951 年 2 月 15 日。

③ 《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一汽车制造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汽车制造厂企业研究中心编,1983 年印制(未刊),第 38 页。

④ 王凡:《周恩来、李富春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原航空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段子俊访谈》,载《党史博览》2001 年第 4 期,第 14~15 页。

华期间先后共有 288 位专家(协定规定不超过 150 人)，委员会及其下属各专家组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与相应的中方机构对口配合，从船舶工业管理局直到各厂科室。在编制造船工业长远规划、选购配套机电设备、解答工艺技术难题、翻译校对图纸资料、选择各型舰艇试航基地，以及培训中方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苏联专家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这一协定的执行，奠定了中国舰艇制造工业的基础。[1]

苏联专家在生产技术领域为中国各行各业改进工艺、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产量所作出的贡献更是举不胜举。如石景山发电厂的重大事故从 1949 年的 113 次减少到 1951 年的 2 次；本溪煤铁公司炼铁厂低磷铁的合格率在 3 个月内从 16%提高到 88.5%，抚顺矿务局炼钢分厂钢锭合格率也提高到 95.3%，超过以往标准 15 个百分点；1952 年除新疆外全国原油产量即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的 19.66%，以及玉门优质油田和乌苏油田旺井的发现，老君庙旧油井的复活；阜新发电厂安装一部锅炉节省人工 2.5 万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 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 60 亿元(旧币)；1952 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 60%，大部分矿井使用期延长了 20 年至 40 年，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 20%～30%；石景山钢铁厂 250 吨炼铁炉可炼铁 376 吨，太原钢铁厂 50 吨炼铁炉创造了 106 吨的纪录；山西浑河水库工程设计蓄水量增加 2.25 倍，投资节约 2000 亿元(旧币)，如此等等。[2]

以长远的眼光看，苏联专家的作用还在于培养出大批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通过讲授技术课、现场指导工作、翻译讲解文献资料等各种方式，耐心而无私地向中国干部、工人传授知识和经验。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在 1953 年至 1956 年的三年建厂期间，186 名苏联专家为 2 万名职工讲授技术课 1500 余次，直接传教和培养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 470 名，其中处长 56 人，工程师 139 人，科长、车

---

① 余伯良主编：《〈六四协定〉史料集(1953～1963)》，中国舰艇工业历史资料丛书，1991 年(未刊)，第 4～8 页。

② 《人民日报》1951 年 11 月 4 日、1950 年 10 月 6 日、1953 年 4 月 10 日、1952 年 12 月 15 日、1951 年 2 月 15 日，《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年，第 753～776 页。

间主任 60 人，技术员 173 人，技工 90 人。[①] 大连造船厂自 1952 年移交中方以后，苏联专家更加毫无保留地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向中国职工传授知识和经验。苏方总经理和总工程师亲自审查各科室专家的教学计划和材料，技术专家则是亲自示范，边做边教，耐心讲解。到 1954 年底已经培养出工段以上技术和管理干部近千人，其中 65% 的科长和车间主任是从普通工人中提拔起来的。[②]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大量向内地输送人才，被称为全国的干部基地，这与苏联专家的帮助也不无关系。1952 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达 3 万多人，其中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③] 正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直接帮助，中国的设计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的设计单位从 78 个增加到 198 个，每个单位有设计人员 200 名至 1000 名，设计和勘查的工作量分别增长了 4.1% 和 5.1%，通过中国自行设计或部分自行设计的大中型工业项目已达 413 个。[④]

教育也是苏联专家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北京大学 13 个系 35 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大多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苏联相同专业的教学计划为蓝本，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教师、学生的水平，经过反复修订而制成的。[⑤]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两年中建立的 40 多个现代化实验室，都是苏联专家从设计到安装一手帮助搞起来的。[⑥] 吉林大学聘请的 5 位苏联专家，培养了 9 名研究生和 18 名进修教师，帮助建立了 6 个新的实验室，还提出 112 条改进教学工作的建议，校方感到受益匪浅。[⑦] 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早在 1949 年 12 月就聘请了 4 位苏联专家来讲授苏联党史，以后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新闻等课程，全都有苏联顾问任教，他们除了授课、编写讲义，还辅导中国年轻教

① 第一汽车制造厂关于建厂以来专家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1960 年 9 月 3 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6，卷宗 23，页码 40～43。

② 《人民日报》1955 年 1 月 2 日。

③ 《人民日报》1952 年 1 月 20 日。

④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28。

⑤ 《苏联专家谈话报告集》，北京大学编印，1955 年(未刊)，第 1～3 页。

⑥ 《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5 日。

⑦ 吉林大学关于苏联专家建议执行情况的汇报，1960 年 8 月 22 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6，卷宗 122，页码 37～41。

师从事教学和研究,并在党校刊物《向专家学习》上发表文章,介绍自己的教学经验。①

(三)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

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苏联专家提倡的某些在苏联一贯采用的制度和方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应该说,从苏联的主导思想来说,并非要中国照搬苏联的一切。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在 1952 年 10 月与刘少奇、李富春谈话时就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能包办一切。② 作为前后在华工作 8 年的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反复向专家强调,你们最熟悉的事情在中国未必适用,最了解中国情况的是他们自己,必须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离开他们,苏联专家是无法开展工作的。阿尔希波夫本人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③

然而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指手画脚和生搬硬套的情况却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军队系统。如苏联专家在军事院校讲课时,历史课不讲中共党史,只讲苏共历史,讲战例时只准讲苏联的十大打击,不准讲朝鲜战争,引起中方干部的不满。苏联专家在军队指挥管理上推广的"一长制"也因与中国传统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矛盾,未能全面实行。④

在公安系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位曾在公安部负责专家工作

---

① 《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第 204～205 页。

②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年,第 39～40 页。

③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87～488 页;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④ 《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164～165 页;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26～327 页;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45 页。

的干部告诉笔者，苏联顾问在那里的作用不大。苏联专家在公安系统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技术设备方面，如电台测向和邮件检查系统，就是苏联专家帮助建立的。但在政策和方针上，我们有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传统，苏联专家则推行“一长制”，在实际破案和审案工作中，主张使用包括美人计在内的一切手段，引诱和调动敌人，这些我们都没有采纳。[①]

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军方干部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事例。1952年2月27日第十五次军委办公例会讨论海防第一线重点地域设防工程时，中南军区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提出，要把珠江口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军事总顾问柯托夫强调，苏联的经验是，为了保密和军事需要，在国防要地内的居民应全部搬迁，并举出苏联卫国战争中有些少数民族倾向德国，被全部远距离迁移的例子。由于受苏联专家的影响，中国在山东、广东沿海等地禁区划得过宽，禁止捕鱼区过大，引起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强烈反映，以后才逐渐得到纠正。关于军事训练场地，苏联地广人稀，中国人多地少，两方情况差距很大。但1951年9月军训部发下的参考材料，根据苏联顾问的经验介绍，要求每个师应有训练基地12万亩。有些部队参照执行，如贵州某部一个团竟占用了1.12万亩训练场地，附近农民怨声载道。再如山东海岸防务，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每个炮连火炮一字平列，置于最前沿，对空无遮蔽，炮位相距40米，弹药所设在4门炮位中央。这适用于苏联享有制空权的条件，而当时中国防空力量十分薄弱，一旦敌空军炸弹命中弹药所，全连火炮将被同时毁灭。这种状况直到1954年彭德怀视察后才得以纠正。[②]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倒不是苏联专家本身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在于全国上上下下出现的一种事事听从专家、全搬苏联一套的依赖思想。早在1952年11月聂荣臻就指出，300多位苏联专家对我军特种兵的建设帮助很大，但部队中也出现了完全依赖苏联顾问，不考虑我们具体条件的偏向。[③] 1956年1月2日刘少奇

---

① 笔者2001年12月23日采访赵明记录。赵明时任公安部编译处副处长，负责专家工作。

②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③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4～555页。

指示粮食部领导人，合作化以后的粮食征购制度如何改变，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1] 这种现象在工矿企业尤为严重。大连造船厂铸造分厂的职工在生产过程中自己不动脑筋，专家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出了问题就找专家，说是“孩子哭了抱给娘”。[2]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的工程人员盲目执行专家的建议，对建议不做具体分析，不领会其精神实质。[3] 类似的情况在鞍钢基建部门和黑色冶金设计公司，以及沈阳电线厂等企业都普遍存在。[4]

针对这种情况，在 1955 年底检查专家工作时，国务院已经开始提醒各部门，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要注意结合实际情况，对专家的建议应“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加以执行”。[5] 1956 年 2 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周恩来的讲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6] 不过，在学习苏联专家问题的指导方针上的变化，还是出现在苏共二十大，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和批判，虽然最初令人感到意外，但无论是东欧各党还是中共领导人，已经从中领悟到苏联承认其犯有错误的深远意义是各国可以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应该放弃了。苏共二十大结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开宗明义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苏联方面暴露的缺点、错误和走过的弯路，中国党现在“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所谈十个问题，无一不是针对苏联而言的，特别是在讲最后一个问题时，

---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52 页。

② 中苏造船公司向苏联学习的初步总结，1954 年 10 月。大连市档案馆，全宗 7，目录 2，卷宗 60，页码 2～16。

③ 《参考资料》，1954 年 12 月 9 日第 281 号，第 130～131 页。

④ 《参考资料》，1954 年 7 月 10 日第 153 号，第 164～165 页；1955 年 1 月 30 日第 21 号，第 387 页；1954 年 12 月 30 日第 299 号，第 487～488 页。

⑤ 国务院关于 1955 年年终专家工作检查的通知，1955 年 11 月 14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67，页码 31。

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484 页；《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548 页。

反复强调不能对苏联照抄照搬，不能盲目学习。[①] 这种说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在大张旗鼓学习苏联以及大量苏联专家在中国的1956年，[②]讲话的重点在于突出“以苏为鉴”，就自然带有指导方针的性质了。于是，中国领导人纷纷出来就此发表谈话。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在肯定“首先还是要向苏联学习”的前提下，也强调“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③]。6月28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又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批评“一切依赖专家的思想”，指出“专家的建议有70%是可行的，有的建议是不可行的”，“外国的专家只能帮助我们，靠外国专家的思想是危险的”。[④] 刘少奇则批评了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强调“学习苏联经验要有分析，必须独立思考”[⑤]。

这种精神贯彻到基层以后，引起广大干部对苏联理论和经验的质疑。一名在高教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总结与其中国同事们谈话的内容，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还能不能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马列主义的基础课本，通过议会斗争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与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有矛盾，斯大林提出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是否已经过时，苏联怎么评价《人民日报》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算不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南斯拉夫问题，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犯有哪些错误？如此等等。[⑥]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8页。

② 据笔者考察，在华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是1956年，详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情况及政策变化》一文。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④ 习仲勋在全国外国专家招待工作会议上的指示，1956年6月28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138，页码2～5。

⑤ 《杨献珍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77页。

⑥ ЦХСД，ф. 5，оп. 49，дело 408，с. 216～222，*Кейпл Д*. Развенчание мифа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монолите(1949～1960)//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5，с. 340。

在波匈事件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帮了赫鲁晓夫的忙，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明显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到学习苏联和苏联专家问题，口气自然又强硬了许多。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反复谈到这个话题。他批评"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已经深入人心"，"各部都有，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部长们都五十岁左右了，非三岁小孩要扶"。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情况变了，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自己制造了"，"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①。6月23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②

对此，苏联方面表示理解。1957年2月15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华代表处党委书记列瓦金与外专局副局长吴凡吾谈话时，坦率地承认有些专家在不熟悉情况的条件下硬搬苏联的经验，诚恳地希望对苏联专家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要求经常向专家介绍情况。③

在这样的气氛中，苏联专家在中国地位自然会受到影响。1957年2月外国专家局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苏联专家的报告，其中谈到苏联专家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改进，"他们更加谦虚了，处处表示十分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提建议也"比以前更加慎重了"，而且总要一再声明，"请按照中国具体情况研究采纳"。但同时在某些部门则出现了"一种对苏联专家冷淡、疏远，不虚心向专家学习，甚至傲慢无理的现象"。其表现是：不积极主动地安排专家的工作，致使专家感到无事可做；不及时向专家介绍业务情况，提供相关资料；对专家不尊重，自己不愿与专家合作进行工作，

---

①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66～167页。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摘要)，1958年3月10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页码11～16。

② 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各小组组长座谈会上的指示，1958年6月23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页码15～17。

③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给习仲勋的报告，1957年3月7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40～42。

也不让研究生接近专家。[1] 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并要求"勤勤恳恳地、老老实实地"向苏联专家学习，"以亲切、热情的态度去对待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

不过，总体来讲，直到1958年下半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之前，苏联专家在中国基层单位，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并未减退。为了证明这一点，笔者对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些具体材料做了下表，以备参考。

部分企业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

单位	时间	提出建议	执行建议	执行比例	未执行的主要原因
阜新矿务局	1949年～1954年3月	516	340	66.89%	条件不足和设备未到
石景山钢铁厂	1950年～1955年	561	442	78.78%	不详
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3年6月～9月	69	54	78.26%	条件不具备
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3年～1960年	20000	19950	99.75%	事关重大，以后再议
鞍山钢铁公司	1957年	176	158	89.77%	条件不宜或正在商议
鞍山钢铁公司	1958年	262	绝大部分		不详

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1704，页码2～13；《参考资料》，1955年2月24日第43号，第315页；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A31，目录2，卷宗1704，页码22～24；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6，卷宗23，页码40～43；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全宗500，目录2.1，案卷20、21。

当然，这些具体数字未必能反映全面情况，但从这些大企业的材料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基本是良好和正常的，这至少从一个角度说明苏联专家在工业企业中发挥的作用还

①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的报告，1957年2月10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6～10。

② 国务院批转外专局关于对苏联专家关系中一些问题报告的通知，1957年2月25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36，目录9，卷宗294，页码4～5。

是比较充分的。至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执行建议的情况要好于50年代初,恐怕主要在于上层领导开始提出“以苏为鉴”的方针时,社会基层的多数群众还停留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情中。当新的方针已经贯彻下来,广大群众也投入到“大跃进”浪潮中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四)“大跃进”和中苏分歧的影响

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再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整个1958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在筹备和动员“大跃进”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个方向上。如果说反保守主义的矛头是针对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领导人的,那么提出反教条主义则主要是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一套做法和经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专家学者自然列在其中)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朝鲜战争期间在国内开展的几次大规模运动及其结局使毛泽东领悟到,发动群众运动这种方式,不仅在夺取政权和战争时期是整合社会、积聚力量的有效手段,就是在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时期,也会成为实现各种宏伟理想的法宝。他在党内各种会议上大批苏联的教条和规章制度,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大跃进”这一群众运动扫清思想障碍。因此,当“大跃进”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行动,中苏之间的政治矛盾也日渐明朗的时候,大量在华苏联专家的地位自然显得十分尴尬。

笔者在地方档案发现了一系列的报告或材料,普遍反映了1958年至1959年在基层工作中不尊重专家、斥责专家思想保守以及忽视专家作用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专家在“大跃进”及反右倾运动中的处境。在吉林省,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认为专家思想保守、陈规旧律没有破除,对专家的建议或设计,不进行认真的研究,不征求专家意见,过分地强调中国条件与苏联不同,就任意否定或修改”。有的工厂把听取专家建议的工作制度也作为“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而废除了”,有的学校还任意削减苏联专家

所担任的课程，认为这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①] 苏联专家一致认为长春汽车制造厂正在试制的红旗轿车外型不好看，设计不合理，建议修改设计。但该厂为了实现国庆十周年出车的目标，拒绝考虑专家的建议。[②] 一机部第一设计院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现在不需要苏联专家帮助也能独立进行设计，向专家请教益处不大，反而招来许多麻烦，甚至会阻碍我们跃进。以致某些专家担心会出现在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情况，并表示"如不需要我们，可以回国"。武汉重型机械厂设计了新的大型简易车床，事先未与专家商量也没进行试验，就成批投入生产 50 台。苏联专家得知后再三建议发货前需检验，结果发现这批车床有严重问题。鞍山钢铁厂因忽视苏联专家一再提出的遵守工艺规程的主张，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 93%降低到 42%～50%。平炉顶的寿命也比过去大为缩短。[③] 哈尔滨电机厂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该厂当时正在设计的一种直流电机，使用的是苏联提供的达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整套图纸，按这种图纸生产的直流电机投入生产后，年产钢材可达 300 万吨至 400 万吨，相当于 1957 年中国钢材产量的 70%～80%。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大产品，工厂设计人员为了节省几吨制作钢材，未同苏联专家商量，就对原图纸的主要部件做了重大修改。苏联专家发现后甚为吃惊，认为这套图纸是总结了苏联电机厂十几年经验设计出来的，而中国在缺乏运转试验的情况下就做如此重大的修改，是不适当的。由于中方坚持，苏联专家又建议至少对头两台机组不要修改，可待试验后再做修改。为此，苏联专家扎依采夫难过地流了眼泪，说自己到中国来没有发挥作用，也不知道怎样发挥作用。[④]

与此同时，莫斯科也不断接到有关情况的报告。如苏联政府得

---

① 吉林省外办关于对外国专家工作检查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59 年 3 月。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2，卷宗 80，页码 66～72。

② 第一汽车制造厂关于建厂以来专家工作情况的简要报告，1960 年 9 月 3 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6，卷宗 23，页码 40～43。

③ 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1959 年 2 月 3 日整理)，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2，卷宗 48，页码 8～15。

④ 哈尔滨市中苏友协关于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检查报告，1958 年 7 月 7 日。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 134，目录 2，卷宗 32，页码 19～21。

知,1958 年下半年,中共工业企业撤销了所有按苏联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设立的技术部门,取消了必要的技术规格和标准。苏联专家表面上仍留在岗位上,享受薪金,承担合同规定的生产责任,但实际上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在水利和电力系统工作的专家别斯托夫斯基 1959 年 2 月报告说:"中国同志决定简化电力装置,这将降低它们的可靠性",并警告说,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导致事故的发生"。1959 年 4 月在武汉冶金公司工作的 12 位苏联工程师也抱怨说,他们已经有 3 个多月被禁止工作了。在企业里,苏联的所有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章都被取消了。①

到 1958 年底,"大跃进"的错误逐渐被中共领导人所认识,中央开始纠"左"。国务院也感到专家工作中问题的严重性,并极力加以纠正。1959 年 2 月 4 日,李富春指示:"凡是科学技术问题,一定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如果双方意见不同,可以提出来研究,如果经过研究意见还不一致,那就应当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去办,绝不能采取不尊重、不重视苏联专家建议的态度"。3 月 7 日陈毅又指示:"一定要抓专家工作,一年应当抓四次"。接着,在 3 月 12 日至 23 日召开了外国专家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苏联专家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全心全意来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他们在科学技术上也的确比较高明,所提建议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是正确的,绝不能盲目拒绝专家的建议。②

然而,庐山会议转向继续反右,随后又发生中苏领导人的严重争吵,终于未能从根本上改进专家工作。苏联专家的建议和警告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苏联专家小组负责人祖博夫 1959 年 8 月 16 日向石油工业部长通报说,玉门矿井正在对石油资源进行滥采,电焊条的生产也违背了技术规程,其结果"出现了大量废品"。哈尔滨火电厂专家组长克利莫夫在 7 月至 10 月间向中国有关方面递交了十多封抗议信和申诉信,状告工厂违反锅炉的操作规章。但一直无人

---

①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1977, с. 246。

②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 年 4 月 11 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5,卷宗 21,页码 96～106。

过问，最后引起工厂大爆炸，造成大火和人员伤亡。①

尽管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现象，但并不能说这是中国政府有意冷淡苏联专家和限制发挥其作用。② 针对苏联专家的不满情绪，中国政府尽力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稳定苏联专家的情绪，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1960 年 4 月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连续发出了两个通知，一是为了"鼓舞专家们的工作热情"，要求"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帮助建设的工程项目，有举行竣工典礼时，应当注意邀请帮助过该项工程的专家参加，并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二是为了表彰苏联专家的贡献，要求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发给苏联专家感谢信、感谢状和纪念章的办法"，并强调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十分严肃的工作"③。然而为时已晚，赫鲁晓夫还是借口苏联专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宣布撤走所有在华专家。

必须看到，1960 年初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的局面，主要还是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尽管在基层也的确存在一些对苏联专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现，使其作用和影响在客观上受到制约，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苏联专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态度是诚恳的，评价也是公正的。接受笔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几乎都谈到了这一点。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苏合作时的情景，都认为"那时中苏团结一心，生产蒸蒸日上，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他们特别怀念那段日子。④ 所以，赫鲁晓夫撤走专家的粗暴行动，本意是借撤走专家打击中国，警告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伤害的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对苏联本身也并无利益。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苏联驻华使馆。契

---

①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c. 246。

② 苏斯洛夫 1964 年 2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苏联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政府为苏联专家的工作创造正常的条件，但中国政府的答复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侮辱地对待专家，把他们看作是"保守分子"，并千方百计地诋毁苏联的经验和技术。*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c. 248～249。

③ 国务院外专局关于注意邀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参加竣工典礼的通知，1960 年 4 月 10 日。辽宁省档案馆，全宗 ZE1，目录 2，卷宗 413，页码 61；国务院外专局关于加强对发给外国专家感谢信等管理工作的通知，1960 年 4 月 13 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36，目录 12，卷宗 235，页码 14～15。

④ 笔者在核工业部 202 厂、大连造船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及一些军事单位采访时，听到有关这方面的看法最为突出。

尔沃年科大使得到消息时非常“震惊”，并向莫斯科发出紧急电报，认为撤走专家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苏联国内也有许多官员认为这是一种感情冲动的外交政策。[①] 就是在华工作的许多苏联专家，也对此颇有微词，认为突然撤走专家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甚至有人在酒后对赫鲁晓夫破口大骂。[②] 正如有些苏联学者批评的，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脚和含糊其辞的，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使得中苏关系走到无法恢复的地步。[③]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向他国大量派遣专家是仅仅发生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像苏联专家在中国这样，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又是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苏两国在专家问题上从最初的良好愿望出发，最终却走到了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笔者在研究中苏关系的过程中发现，在冷战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时存在一个通病，就是把党的关系等同于国家关系，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④] 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

---

①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Versu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Hong Kong，1996.1。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1997 年 10 月，北京）上，原在苏共中央有关中国事务部门工作的杰柳辛和库利克教授也都讲到过这种情况。

② 笔者 2001 年 8 月 10 日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在 50 年代任核工业部 202 厂技术员，后任该厂总工程师。笔者采访纪亭榭记录。

③ 罗伊·麦德维杰夫、诺莱斯·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83 页。

④ 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

间的两难境地。[①] 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此时，一旦两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隐含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就会逐渐显露，如果双方力量失衡，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苏联在华专家的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中国的问题出在一开始就从心理上把苏联提供专家和其他援助作为在国际主义原则下理所应当的政府行为，那么赫鲁晓夫的问题就在于把撤走专家作为迫使中国在理论和政策出现分歧时就范的外交筹码，其最终结果，导致在华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① 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三、对华援助

6. 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 1945 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①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 4 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

①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参见沈志华、冈察洛夫：《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3 期。

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①]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首先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仅占 5.5%。[②] 加上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 1950 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 50%，钢铁工业达 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在 50%～70%之间。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 45%左右。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 150 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③] 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 年粮食平均亩产 137 斤，棉花 21 斤。[④] 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 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 2100 亿公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 75%，粮食减产 150 亿公斤以上，灾民达 4000 万人。[⑤] 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 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 229.6 吨公里，仅及 1936 年的 52.7%。[⑥] 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政府

---

① 通常对经济发展的阶段不是这样划分的。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这一时期包括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阶段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笔者如此划分，是考虑到从苏联援华方针的变化来看，这一时期大体反映了斯大林时代最后 4 年的对华政策。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档案馆编:《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63～64 页。值得提出作为比较的是，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在革命前的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分别为 42.1%、38%和 30%，即使在最落后的保加利亚也有 20%。

③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24、40、65 页。

④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6 页。

⑤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29、38、82 页。

⑥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5 页。

的财政困难,1949 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 46.4%。[①]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 1951 年 7 月 5 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②] 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③]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④] 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⑤] 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中国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⑥] 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惟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 300 万美元左右。1949 年 10 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补偿 450 万军队及 150 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开销。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达五六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 1950 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 1950 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

---

①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年,第 119～120 页。

②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年,第 35 页。

③ 当然,在联合国通过对华实行经济封锁的决议之前,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并未中断,但中共由于其主观意识的原因,已经很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性。

④ 罗申与朱德谈话记录,1949 年 10 月 24 日。АВПРФ, ф. 100, оп. 42, п. 288, д. 19, л. 34～36。

⑤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记录,1949 年 10 月 25 日。АВПРФ, ф. 100, оп. 42, п. 288, д. 19, л. 37～43。

⑥ 罗申与郭沫若、罗申与董必武谈话记录,1949 年 10 月 28 日。АВПРФ, ф. 100, оп. 42, п. 288, д. 19, л. 63～65, 69～71。

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① 显然，中国领导人期望罗申将这些情况转达莫斯科，从而为毛泽东亲自访苏解决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进行铺垫。

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长达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是成功的，达到了缔结新盟约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预期目的。不过，苏联被迫接受中国的缔约条件，也的确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和不满意的阴影。这对于中国期望从苏联得到大量经济援助前景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改变了一切。当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急速逆转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而毛泽东在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特别是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毅然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作出让步，决心单独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② 毛泽东在危急关头作出的决定，不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由此摆脱了因作出朝鲜战争的轻率决策而在冷战格局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其结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转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对此，中国领导人深有体会。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③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④。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苏同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⑤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

---

① 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1949年10月28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记录，11月15日。АВПРФ，ф. 100，оп. 42，п. 288，д. 19，л. 58～62，81～95。

② 笔者关于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论述，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五章。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

④ *Юдин П.*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 107。

⑤ 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因素》，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为苏联对华援助，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是以苏联援华的内容为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经济状态正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中苏双方对于他们之间将要形成的经济关系既没有准备，又缺乏经验，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混乱、重复、遗漏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乱庞杂的。笔者在考察中，把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分为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这种划分或许不够科学，而采取这种条理化方式考察的尝试，无非是希望把复杂纷乱的经济现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贷款

早在 1949 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在 2 月 6 日至 7 日同米高扬的最后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请求苏联提供 3 亿美元的贷款，并希望从 1949 年起的 3 年内就得到这笔款，将来新中国连本带息一并偿还。[①] 当刘少奇于 6 月 27 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当天的会谈中就告诉刘少奇，联共（布）中央决定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共提供 3 亿美元贷款，利息 1%，为期 5 年。[②] 7 月 30 日刘少奇与马林科夫签订了贷款协定，但中方一时无法提出全部货单，要求苏联专家来华组成共同委员会协商确定，事情便拖了下来。[③] 1950 年初毛泽东访苏时，

---

①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9, л. 85～86。详见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3, с. 99～104。中国有论著说，周恩来提出贷款 4 亿美元，而米高扬只答应给 3 亿美元。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1 页。

②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 年 6 月 27 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9, л. 1～7。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19～220 页。

双方以政府名义再次签订了贷款协定。[①]

3亿美元数量并不多，据说比苏联最初对东欧国家的援助要少。[②] 但这里的问题不在斯大林，而是中国不愿意多借外债。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③]。至于贷款期限，毛泽东再次希望缩短至三四年，而斯大林以苏联来不及供货为由没有答应，也确是实情。[④] 但无论如何，这笔贷款对于中国政府收拾满目疮痍的经济烂摊子确属雪中送炭。不过，苏联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这一点则使毛泽东深感不快。

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⑤]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非常满意。[⑥]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⑦] 后来苏方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

① 协定文本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87～88页。

② 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42页。作者是前苏联高级外交官，曾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据查，仅1948年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备一项，即贷款4.5亿美元。参见《人民日报》1948年2月2日。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④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 29～38。

⑤ 参见1950年1月22日联共（布）中央决议及附件，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41～45。

⑥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 29～38。当时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利息为2%，而中国规定银行给予工业的低息贷款为月息2.7厘（《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99页），合年息3.24%。

⑦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26日。苏方对中方草案的修改稿，1月28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20，д. 248，л. 38～55，74～79。斯大林最初对中方草案的大段删改，表现了他的不满情绪。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其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万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万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①] 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年至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年产分别为22401吨和1204.77吨，1937年至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年至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万吨，自给略有剩余。[②] 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希望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③] 尽管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但这个附加条件的提出，以及苏方坚持要在协定中解释年息1%是对中国的特别优惠条件，[④]已经有理由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的味道。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觉，当刘少奇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苏条约等七个文件后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鉴于苏联因为战略原料（钨、锑、锡）之不足而处在一种被限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照顾苏联愿望”数句似可删去时，毛泽东复电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⑤]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巩固国防和解放台湾的需要，特别是后来应

---

① 中方对贷款议定书的修改草案，1950年1月31日；苏方关于贷款议定书提交的草案，2月2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23～26，39～49。

②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47～49页。

③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3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29～34，50～55。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95～996页。

⑤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4、407～408页。

付朝鲜战争的需要，中国只得将本来就不多的贷款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进口军事物资和装备，而此期真正在经济建设方面使用的苏联贷款则是有限的。例如，贷款协定尚未签字，中国已经把 1950 年度 6000 万美元贷款中的 4000 万用于购买飞机(340 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 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器材等军事目的了。① 因此，1950 年 9 月 1 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通令强调：苏联贷款已列入国家预算，故各部门应把贷款物资作为国家财政的正式投资，扣顶其当年预算，而不能视作预算外拨付。有关此项贷款的管理、使用、还本付息等事宜，均统一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负责办理。②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为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设立了专用军事贷款，并根据 1951 年 2 月和 9 月的协定，分别提供了 4 亿和 6 亿卢布的军事贷款。③ 但中国仍然不得不将部分国家预算用于战争，如 1951 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 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 32%。④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 年 9 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 5 年中再贷款 40 亿卢布，其中用来购买工业设备的仅 8 亿卢布。⑤

尽管如此，苏联的 3 亿美元贷款按 1950 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 9 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 62.99 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 14.3%。⑥ 而且，中国将苏联贷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

---

① 《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996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年，第 627～628 页。

③ 关于军事贷款的情况散见于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 年 1 月 14 日；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 月 19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9 月 20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7，л. 4～5，26～35；д. 341，л. 125～127。1950 年 1 美元折合 4 卢布。参见《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551 页。

④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 年 11 月 14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2，л. 16～19。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58 页；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9 月 3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3，л. 89～90。

⑥ 投资总额参见《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107 页。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参见 1951 年 2 月 24 日罗申给苏联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电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9 卷，第 2067～2070 页。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上，所以，这笔贷款对于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援建重点项目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一　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①

	项目总数	按建设性质分		按建设地区分	
		改建扩建	新建	东北	内地
一、能源工业					
1. 煤炭工业	10	5	5	8	2
2. 电力工业	11	5	6	6	5
二、原材料工业					
1. 钢铁工业	3	2	1	3	
2. 有色金属工业	3	1	2	3	
3. 化学工业	5		5	4	1
三、民用机械加工	7	2	5	7	
四、国防军工	7	7		4	3
五、造纸工业	1		1	1	
合　计	47	22	25	36	11

表中的3个数字，即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有些项目是可以分阶段建成

① 《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投产的。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年至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其中上述企业中已经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8个项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①] 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与恢复时期全部新增固定资产金额和生产能力数量比较，以下重点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如表二所示）足以说明1950年至1952年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表二　恢复时期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基本情况[②]

建设项目名称	开始建设时间	建成投产时间	累计投资（万元）	新增生产能力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一、煤炭工业						
辽源中央立井	1950	1955	5770	采煤	万吨	90
阜新平安立井	1952	1957	8334	采煤	万吨	150
阜新海州露天矿	1950	1957	19472	采煤	万吨	300
鹤岗东山1号立井	1950	1955	6512	采煤	万吨	90
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	1950	1956	7178	采煤	万吨	150
二、电力工业						
阜新热电厂	1951	1958	7450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5
抚顺电站	1952	1957	8734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5
丰满水电站	1951	1959	9634	机组容量	万千瓦	42.25
富拉尔基热电站	1952	1955	6870	机组容量	万千瓦	5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第386～387页。

②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270页。其中不含军工项目。

续表

建设项目名称	开始建设时间	建成投产时间	累计投资（万元）	新增生产能力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郑州第二热电站	1952	1953	1971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2
重庆电站	1952	1954	3561	机组容量	万千瓦	2.4
西安热电站	1952	1957	6449	机组容量	万千瓦	4.8
乌鲁木齐热电站	1952	1959	3275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9
三、钢铁工业						
鞍山钢铁公司	1952	1960	268500	生铁	万吨	250
				钢	万吨	320
				钢材	万吨	250
四、有色金属工业						
抚顺铝厂（一、二期）	1952	1957	15619	铝锭	万吨	3.9
				镁	万吨	0.12
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	1952	1958	32681	铝材	万吨	3
五、机械工业						
沈阳风动工具厂	1952	1954	1893	风动工具	万台/吨	2/554

1950 年至 1952 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 59 亿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 22.2 万千瓦，煤炭开采 1563.7 万吨/年，生铁 76.4 万吨/年，钢锭 55.8 万吨/年，钢材 33.6 万吨/年。① 而表二所列部分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 41.39 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 87.55 万千瓦，煤炭开采 780 万吨/年，生铁 250 万吨/年，钢锭 320 万吨/年，钢材 250 万吨/年。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如 1951 年 1 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苏联对此十分重

①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266、268 页。

视，组成了以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与中方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为 3000 台发动机和 600 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 1500 台，飞机 300 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审批，只用三个小时就批准了。在这个基础上，1951 年 4 月中国政府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①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这一点，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 年 1 月 16 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张闻天认为，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厂和矿场的建设，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直到成套设备订货及安装，都应全部地、彻底地采用苏联的计划、装备与专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业工厂。这样的工厂，只要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帮助，即可最迅速地建立起来，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会发生乱子。因为苏联同志们有充分的经验，有足够的设备，并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今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一方面。张闻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极大重视。毛泽东于 1952 年 2 月 8 日批示："关于工业问题，请陈（云）、李（富春）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加以讨论"。中财党委组干事会于 2 月 18 日讨论了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一、凡属开办新工厂或在旧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进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对于接收订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二、初步设计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三、因今后贸易部进口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购买工业装备和器材，一切工

---

① 参见《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12、131～132 页；维辛斯基与何长工谈话记录，1951 年 1 月 10 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4，п. 322，д. 11，л. 1～3；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95～307 页。

业部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苏联设备和器材的干部及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四、凡属向苏订购成套装备或订购大量器材的厂矿,必须派出该厂矿的第二负责人带队常驻苏接洽订货、催货。不派重要负责人者,不予订货。五、对于重要工厂的设计和订购装备工作,中央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必须十分重视,必要时必须亲去苏联接洽。六、中央各部及各厂矿所开订单,事前必须慎重确定,一经我方商务代表团与苏方签订了议定书之后,就不能变更。七、各部门各厂矿经中贸部向苏联提出的订货单的金额及订单中的主要装备,必须仍由中财委批准,未得中财委批准不得变更。八、已征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个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专送财经信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于同年3月7日致电张闻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①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1952年8月至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苏联政府在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了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后,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年至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120万吨至150万吨;8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钒钛精矿13万吨;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1990万吨,3个洗煤厂,年产煤450万吨;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7.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6万吨,载重汽车6万辆,拖拉机1.5万辆,轴承1000万个;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36万千

①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363～368页。

瓦,并能扩大到60万千瓦,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个化学厂,其中3个化学厂年产氮肥18万吨,合成橡胶1.5万吨;10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41.3万千瓦;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91项。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①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② 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③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个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④

---

① 《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第332~364页。上述稀有金属供应量包括了1950年协议中规定的数字。另外,笔者询问本卷编纂者董志凯得知,上述91个项目与35个军工企业有部分重叠。

② 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25页。

③ 《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第359~364页。

④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

(三)发展双边贸易

通过商品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的生产资料是建国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新中国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建国前夕,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46 年至 1948 年间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份额平均分别为 27%和 51%,即使到 1949 年,也分别保持在 13.7%和 24%。①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政策,1950 年至 1951 年期间,中美贸易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同苏联与东北民主政府的贸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一样,中苏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 年 1 月 5 日包尔汉和王震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反映了各地要求尽快开展对苏贸易的强烈愿望。报告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坚决执行中苏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复和苏联的通商,来克服本省经济上的困难,和依靠苏联的帮助进行各项生产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要求在中苏两国通商条约尚未签署之前,允许新疆与苏联开展地方非正式的贸易往来。② 是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的货物便达 2.838 亿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运输、能源等方面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③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例如,1950 年至 1952 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

①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15。

② 包尔汉、王震致周恩来、陈云电,1950 年 1 月 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75,目录 2,卷宗 112,第 7～9 页。

③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 75。据周恩来在莫斯科谈判时发回的电报,年初中国提交的进出口货单均已接近 2 亿美元。参见《周恩来传》下卷,第 996 页。

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虽然有些品种的供应对于苏联来说也具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没有议定价格和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中国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如 1950 年秋为帮助中国稳定糖价,苏联从远东地区调拨大量食糖卖给中国。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口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鱼类产品等。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①] 到 1953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苏贸易在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化建设中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而同"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成套设备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经过对 1953 年中苏贸易总货单的认真研究,1953 年 2 月 13 日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李强等联名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认为,"苏方交来之货单是经过慎重考虑研究的,进口方面绝大部分满足了我们的需要"[②]。

不过也应该看到,此期中苏贸易往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还在 1950 年 2 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就在汇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作为中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年,第 500~507 页;《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547 页。关于价格问题,周恩来在 1950 年 4 月 9 日给李富春等谈判代表的电报中提到苏联进口价格偏高而中国出口价格偏低(《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31 页)。笔者以为,周电所说,只是当时谈判代表的感觉,而外贸部和海关总署的报告则是根据后来实际情况写的。

②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第 603 页。

方谈判代表，伍修权认为由于中国有求于对方，而作出了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①] 当时的合理汇率应如何确定，现在恐怕很难考察了。不过，苏联对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此颇为计较。

1951 年 2 月 24 日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 1950 年 12 月 19 日起连续 4 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 1 美元兑换 30410 元人民币（旧币）降到 11890 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 1 卢布相当于人民币 7500 元降低到 5720 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 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 1951 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②] 至于苏联政府如何处理罗申提出的问题，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看到下文，但据多勃雷宁回忆，此后苏联外交部和财政部曾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文件，其决定是有利于中国的。当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向政治局宣布将葛罗米柯贬为驻英国大使，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③]

---

①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46～247 页。

② 罗申给苏联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电报，1951 年 2 月 24 日。笔者保存的俄国档案复印件（馆藏号缺失），编号 SD00388。

③ 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 21 页。1953 年中苏商定人民币与卢布的非贸易兑换率为 1∶2，1956 年实际调整为 1∶6。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20 页。

此外,在要求中国供货方面,苏联也曾提出过一些强人所难的条件,橡胶问题就是其中一例。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①] 20 世纪初中国从马来西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 29332 亩,年产橡胶约 7500 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②] 而且随着西方国家开始实行禁运,中国要进口橡胶也是有困难的。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 1951 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 4800 吨橡胶。[③]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于是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 50%以上,而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提供。[④]

不知是中方有意拖延还是保证苏方要求的数量确有实际困难,总之,直到 1952 年 9 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才签订了橡胶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说:"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 1.5 万吨至 2 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

---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 年 12 月 16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 9～17。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4 日。

③ 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1951 年 7 月 17 日。АВПРФ,ф. 100,оп. 44,п. 332,д. 13,л. 36～39。

④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6 月 21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 年 3 月 28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8,л. 91;д. 339,л. 69～70;д. 342,л. 126～130。

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①] 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万吨至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8%的价格售与苏联。[②] 为了保证朝鲜前线的运输和供应，周恩来签订这样的协定确有些勉为其难。于是，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来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的计划。[③]

但无论如何，中苏贸易的发展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中苏贸易额仅有2630万美元，1950年即为24190万美元，增长8倍多。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苏贸易额的比重1949年占第三位，1950年则跃居第一位，为30%，1953年更上升为56.3%。[④]

（四）开办合股公司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认为股份公司协定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后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看，中国领导人对股份公司也颇有不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⑤] 这样

---

①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3，л. 89～90。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0～41页。

③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

④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499～50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⑤ 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47页；罗申与毛泽东谈话记录，1956年3月31日。АВПРФ，ф. 100，оп. 49，п. 401，д. 9，л. 87～98。

说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①]

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很有兴趣,早 1939 年 9 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一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 10 年),1949 年又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②] 到 1950 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③] 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当米高扬在西柏坡时,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④] 1950 年 1 月 2 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 45 年缩短为 20 年或 25 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以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⑤] 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然而,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

---

① 葛罗米柯回忆说,中国不愿意在股份公司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斯大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恐怕也属不实之词。参见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下卷,伊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164～165 页。

② 详见翟韶华主编:《航空史料——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三)》,中国台北:国史馆,1991 年,第 358～363、377～384 页;Donald Gillin and Ramon Myers ed. ,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 Calif. :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9;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6, с. 112。

③ 联共(布)中央关于中苏谈判的决议及附件,1950 年 1 月 22 日。АВПРФ, ф. 07, оп. 23а, п. 18, д. 235, л. 41～45;《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993～997 页。

④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ис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 ～ 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3, с. 99～100。

⑤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219～220 页。

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①]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②]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现在看来，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 1950 年 3 月 27 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 1951 年 7 月 28 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③] 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 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 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 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缴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缴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④] 尽管从现在的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⑤]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⑥]

---

① 《参考资料》，1950 年 4 月 1 日第 122 号，第 1～5 页。

② 1950 年 3 月中央关于中苏签订两合股公司协定后应注意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01，目录 5，卷宗 5，第 5～6 页。

③ 上述协定参见《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88～9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790～794页。

④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 年，第 1331～1333 页；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90～394、404～405、412～427 页。

⑤ 石油、金属公司 30 年，造船公司 25 年，民航公司 10 年，均超过中方最初设想的合作年限。

⑥ 《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47～248 页。

事实上，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1955 年 2 月 23 日苏联驻华使馆曾向国内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述 4 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详细情况报告，反映了这些公司运营的基本状况：①

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 2800 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 1 亿卢布，每方资本 5000 万卢布。公司职工共 8924 人，其中苏方 400 人。公司经营正常，产量逐年增长（见表三）。

表三　中苏金属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总产值（万卢布）	1501.46	2589.48	3883.31	4805.10
产　量（吨）				
10%绿柱石精矿	873	1004	1204	1300
4%锂辉石精矿	1095	3155	3863	5000
钽一铌精矿	0.98	4.1	5.5	6.0
50%铅精矿	—	—	—	9000
50%锌精矿	—	—	—	5000
云母（半成品）	19	205	122	100
含量 15%的铅锌矿石	2100	10300	18700	—

注：总产值按 1951 年计划不变价格计。

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 3 年总支出的 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 年又开缴营业税（184.2 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 1953 年 9 月 1 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 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 1953 年公司亏损 686.8 万卢布。此外，苏方的亏损还

① 伊万年科关于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1954 年 12 月 11 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53，д. 384。除特别注明外，以下关于中苏股份公司的材料均出自于此，其中表格为笔者计算后设置。

要额外加上支付苏方工作人员生活补贴费用 719 万卢布。不过，除去汇率变动的因素，这种亏损应该说是正常的。所以，苏联使馆的结论是：金属公司目前已经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并且继续发展生产的前景美好。

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公司协定总资本 4600 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 2 亿卢布。公司职工 5603 人，其中苏方人员 357 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 100 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 2～3 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 7 吨左右。到 1952 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 10 口，日产原油 200 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 250 吨。[①] 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1951 年至 1953 年生产情况如表四所示：

表四　中苏石油公司主要产品产量

	1951 年	1952 年	1953 年	1954 年计划
石油开采(吨)	3500	52100	70200	75000
石油加工(吨)	2500	52000	70100	75000
其中：汽油	600	11500	20400	33300
煤油	600	1600	3900	7500
柴油	300	3500	17500	18000

表中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经营是赢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 1951 年为 52 万卢布，1952 年为 66.4 万卢布，1953 年为 239.5 万卢布。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 1951 年比较，1953 年的钻井生产增长 6 倍，勘探面积扩大 10 倍，原油产量增长 18 倍以上。公司还培养出了 2000 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②]

---

① 中共中苏石油公司党的工作报告，1952 年 7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0，目录 4，卷宗 95，第 6～7 页。

② 《人民日报》1953 年 10 月 6 日。

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① 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

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根据双方协定，公司最初股本1.4亿卢布，股东利润的20%交付中国。② 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万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订货。1953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5000万卢布的105.6%，造船19艘，总排水量1万吨，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订货3200万卢布。

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致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认为如此

① 据中国史料，该公司为中国民航培养各种技术人员340名，还接受中国民航局实习人员32名。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215～217页。

②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90～794页。

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①] 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部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甚至产生了“没有看见苏联同志先进经验”的错误想法。同时，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致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②]

此外，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在1954年2月25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山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③]

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的政府行为，更不能证明合股公司的形式不可取。总体说来，建国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3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④]而1950年至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

---

① 中共中苏金属公司党委会致中央新疆分局的报告，1952年8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0，目录4，卷宗95，第38～40页。

② 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1952年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0，目录4，卷宗95，第74～76页。

③ ЦХСД，ф. 4，оп. 9，д. 1933，л. 22～31，*Ганшин Г.*，*Зазерская Т.* Ухабы на дороге “братской дружбы”（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с. 68～72。

④ 按美元与人民币1：3和美元与卢布1：4的汇率计算。

亿元[①]，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建国初期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给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②] 据表五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

表五　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③]

	企业(个)	百分比	职工(人)	百分比	产值(亿元)	百分比
总计	2815	100%	1189569	100%	459729	100%
国家公营	2522	89.6%	1049708	88.2%	410466	89.3%
公私合营	255	9.1%	105771	8.9%	33559	7.3%
中苏合营	38	1.3%	34150	2.8%	15704	3.4%

注：工业产值按1950年6月企业不变价格计。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建国初期苏联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资产。虽然移交是根据中苏协定办理的，说不上是对中国的特别援助，但这些企业和资产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950年苏联政府将大连市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而且，苏联在移交前还为以后照常生产做了重要准备。如中苏合营的远东电业公司，所属工厂从12个扩大到21个，工人增加

①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266页。

②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67页。另据中财委计划局统计，1950年共有中苏合营企业20个，职工2655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793页。

③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76～277页。

了 4.5 倍，产品种类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几百种。某机械厂的设备比建厂初期增加了 200%，生产总值提高了 439%。大连修造厂的生产率也比战后初期提高了 36 倍。对中国建设尤为有益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仅上述 3 个工厂就培养出技术人员 4650 余名。①

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② 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以及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与 1950 年至 1952 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 22.8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22.4 亿元。③ 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 1950 年 5 月开始工作到 1952 年 12 月无偿移交给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 53.3%，劳动生产率提高 56.8%，运输成本降低 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 年比 1950 年增长 110%，1952 年又比 1951 年增长 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 39138 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铁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铁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 32 个月中，中长铁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 1500 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④

---

①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33～135 页。

② 有关协定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 年，第 26～32 页。

③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交通通讯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6 年，第 30～31 页。

④ 《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 年，第 274～285、243～247、254～255 页；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5 页。

(五)提供技术资料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

在1949年索菲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苏联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查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指示还提出"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图书交换,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人民民主国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因此,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提高了给中国的寄书量(见表六)。1953年,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①

表六　中苏图书资料交换情况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总计
苏联给中国(套册)	9955	31653	37098	42136	120842
中国给苏联(套册)	2948	4082	6327	12062	25419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

①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65,с. 7～8。

用，也不是每每收齐。而 1953 年 5 月 15 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①] 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联总是能够及时给予满足。如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以下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现行的工业产品标准，即国家标准、全苏标准、暂行技术条件及各企业的制造规格；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的典型设计；工业及交通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便答复同意满足中方的要求。[②]

从 1950 年至 1953 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 2928 套(件)，具体情况如表七所示：

表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③]

	整套技术设计文件	基本建设设计方案	机器和设备草图	整套技术文件	整套部门技术文件
1950 年	30		30		
1951 年	338	24	294	1	19
1952 年	507	25	385	27	70
1953 年	599	32	398	28	141
总计	1474	81	1107	56	230

(六)派遣苏联专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建国之初陈云便告诉苏联大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

---

①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7～8。

② 1952 年 9 月 6 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的信，载《党的文献》1999 年第 5 期，第 3 页；《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58 页。

③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102.

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①] 情况确实如此，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②] 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③] 直到恢复时期结束，全国也仅有16.4万工程技术人员，地质专家总共不到200人。[④] 显然，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后，又带来一批帮助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建国前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⑤]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当第一批苏联顾问团到达沈阳时，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告诫中国同志，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⑥] 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来京的全体苏联专家及苏联专列的服务员，周恩来则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随后，毛泽东又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前往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参加专家工作会议，

① 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1949年10月28日。АВПРФ，ф. 100，оп. 42，п. 288，д. 19，л. 58～62。

②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③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记录，1951年7月24日。АВПРФ，ф. 100，оп. 44，п. 322，д. 13，л. 44～51。

④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7～8。

⑤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6，с. 84。

⑥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5～8页。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伍修权、杨放之主持。[①] 中国领导人对这批苏联专家的生活起居也给予特别的关照，刘少奇曾专门致电周恩来，对到京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代。[②]

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最初是柯瓦廖夫，因其给斯大林写报告攻击中共领导人，很快便被调回国内。接替柯瓦廖夫职务的是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调回国。1952 年年中来华担任总顾问的是毕考尔金，曾负责协助中国政府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年后阿尔希波夫再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一直在中国工作达八年之久，经常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③]

关于 1950 年至 1953 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有俄国学者说，到 1952 年 3 月，在中国已有苏联顾问和教师 332 名，各种技术专家 471 名。1953 年 7 月中国政府又要求在现有 277 名专家的基础上，再增派 172 名。[④] 而据 1952 年 9 月 21 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的信上说，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有 252 名，除明年需辞聘 31 名和聘期满后回国需另聘 37 名外，请在明年再增派 237 名来。鉴于他们人数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许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脱离其他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⑤] 就专家总数而言，据中国档案材料，自 1950 年至 1953 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 1093 人，截至 1953 年底已回国 741 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 342 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 159 人，燃料

---

①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87～89 页。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6～47 页。

③ 《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90 页。

④ АВПРФ, ф. 06, оп. 12, п. 22, д. 337, л. 14; ф. 06, оп. 13, п. 21, д. 334, л. 1; *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 76。

⑤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60 页。

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①] 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②] 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特别是由于最初派遣专家工作缺乏计划性，想要得到精确数字也未必可能。不过，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在本文考察时期，苏联来华的经济技术专家(不算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大约保持在250人到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③] 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④] 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

① 《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第386～388页。

②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11。

③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7～8。

④ 《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请求苏联帮助。[①] 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是尽量予以满足的。据李富春和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也"勉强接受设计"。[②]

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万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③] 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年到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去年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

---

①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369、374页。

②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6年，第784～785页。

③ 《人民日报》1953年4月10日、1952年12月15日。

60 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仰望了 40 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 10%降到 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将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 25 年缩短为 5 年。农业部水利局修建浑河水库的设计，经过苏联专家修订，蓄水量增加 2.25 倍，节约投资 2000 亿元（旧币）。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表报、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 1952 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 3 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①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的。据重工业部报告，为了正确的规定设计任务书中的产品方案，吉林铁合金厂苏联设计小组收集了中国所有铁合金厂的设备能力及生产情况，并研究了钢铁工业发展远景，经过 5 个月时间的研究，编制了 4 个方案，加以反复比较，才将产品方案最后确定下来。② 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 4～5 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 19 个小时。③ 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

①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6 年，第 753～776 页；《人民日报》1951 年 2 月 15 日、1952 年 1 月 20 日。

② 《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 年，第 410～418 页。

③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6 年，第 776 页。

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① 1952 年 1 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②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十分强调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1952 年 2 月中财委的总结报告说,"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③ 1952 年 3 月 5 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凡属举办性质重要,其产品在我国尚未生产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建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接收订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若干新工厂在开工之前还需派实习组到苏联工厂中去实习。④ 1952 年 12 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⑤

当然,在专家问题上中苏之间也曾有过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

---

① 《人民日报》1952 年 1 月 20 日。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14~115 页。

③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370 页。

④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6 年,第 781 页。

⑤ 《1949 年~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374~375 页。

在支付苏联专家的待遇和报酬方面。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遇只需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①] 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 2500 斤小米"，另须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具体事宜与柯瓦廖夫商议。[②]

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中方提出关于中长铁路等新条款后，情况有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补偿费用。在 2 月 11 日与米高扬会谈时，周恩来表示不理解第一条款的含义，即苏方提出中国政府应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 2000 卢布到 4000 卢布的补偿费用，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应交给苏联政府，这一条款适用于所有专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希望中国可以用实物支付这笔费用的要求，米高扬回答，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③] 第二天，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会晤周恩来。周恩来要求罗申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转告，昨天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定的第四款，并同毛泽东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规定每月支付苏联专家的补偿费用 2000 卢布到 4000 卢布以美元结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 1 万斤至 1.8 万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 3400 斤小米，部长们只有 2800 斤小米。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如果采用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④]

然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苏方同意将

---

①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 年 6 月 27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 1～7。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64 页。

③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12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64～69。

④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50 年 2 月 12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70～74。

补偿金降到1500卢布到3000卢布,但坚持应以外汇(卢布)结算。在3月8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会谈中,中方又提出,根据一些在华专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将这笔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其目的当然还是希望减少外汇的支出。对此,葛罗米柯予以否定。此外,苏方准备把在华苏联军士的工资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对于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实际生活费以外,也应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卢布至600卢布,因此不应该把对专家的条件扩展到军士身上,况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样的标准也太高了。葛罗米柯则认为,苏方的立场"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的"。尽管王稼祥后来暗示,暂时不要提出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但苏方坚持己见。①

情况汇报到北京,3月19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复电:关于专家协定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简专家,亦甚有利"。② 1950年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签字,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根据这两个协定,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出差补偿费用,按每人每月1500卢布至3000卢布计。③ 但实际上中国支付苏联专家的工资是高于国内标准的,以1952年的水平为例,共分七级,其工资由348万元(旧币)至180万元不等。④

此外,由于中方缺乏经验,派遣专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和矛盾,主要表现在聘请专家没有计划性,管理混乱,以及不能满足专家要求的工作条件等等。由于没有统一计划和管理,造成有些专家已经来到中国,而用人单位尚未接到通知。有些单位聘请专家时,没

---

①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1950年3月8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д.8,л.36~40。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③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8~9。

④ 《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6年,第778~780页。

有考虑住处和翻译等相应条件，不得不一再削减人数，造成双方被动。[①] 为苏联专家进行设计而收集原始资料的工作也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不能按时交付齐备的资料，致使苏联专家的设计进度受到影响。如1951年鞍钢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以致造成了零星分散和缺乏专责制的现象，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工作互相配合不起来，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②] 为此，中国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和领导。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代总顾问布拉金时，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聘有苏联专家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并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决定送中央批准。9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③]

（七）培养中国专家

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

---

①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记录，1949年12月29日。АВПРФ, ф. 100, оп. 43, п. 302, д. 10, л. 50～52。

② 《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第410～418页。

③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6、308页。

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本来旧中国的高等学校就不多，而在校学生的成分又令中共很不放心。如同郭沫若对苏联大使所说，“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①]然而，从中共党员中培养科技人员则受制于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陆定一说，中共领导准备用2年至3年时间在上述党的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②] 显然，对于这些可以依靠的力量近期是无法指望的。同时，直接从科研机构中选拔和培养人才也很困难。解放前夕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共有科研人员42名。[③] 因此，迅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年8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④]

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

---

① 郭沫若与罗申会谈记录，1949年10月28日。АВПРФ，ф. 100，оп. 42，п. 288，д. 19，л. 63～65。

② АВПРФ，ф. 0100，оп43，д. 10，п. 302，л100；*Кулик Б.*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 117。

③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 5。

④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①]

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名到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②] 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③]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④] 到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

①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9。

② 参见《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6年，第787～791页；*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11。其中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③ *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11。

④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0～131页。

建设的任务》。文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 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的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①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订，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 年 8 月 15 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8 月 23 日和 28 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②

在 9 月 3 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一、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 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 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 20%。二、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 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整个供货申请单。三、

① 《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070～1071 页；《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54～255 页。

② 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3 页。

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①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②

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

---

①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75～87。

②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39～40页；《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7～18页。

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①

1953 年 5 月 18 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各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 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 1953 年至 1957 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 20.4% 改为 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此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指导手工业的发展，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养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作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方的意见通知李富春。② 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

①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84～285 页。周恩来的复信参见《党的文献》1999 年第 5 期，第 3～4 页。

②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69 辑，第 1～4 页。文件提供者陈夕向笔者说明了中共中央收到和处理苏方意见书的大体情况。

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1]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2]

对建国初期中苏经济关系状况进行考察的结论如下:

一、中苏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因而在经济上也需要密切双边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此,苏联的经济援助是及时的,且为中国所必需;

二、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战争环境中,因而其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苏联。而苏联的全面援助确实对于中国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在经济利益方面颇有计较。所以,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

四、尽管苏联政府在援华专家的条件方面毫不让步,但苏联的经验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且苏联专家确实做到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员感动不已;

五、中国方面全无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在战争的条件下,苏联也没有把经济援华作为一项特别突出的任务,因而整个对华援助工作显得缺乏计划性,出现了不少矛盾和混乱现象。

总之,从 1950 年至 1953 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

---

[1] 此后,"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又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先后提出过多次方案。1954 年 11 月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广州用 20 天时间审核修改了"一五"计划的草案初稿。1955 年 2 月计划草案编制完成。同年 3 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这一计划草案的决议。7 月 5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参见《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086 页。

[2] 《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08 页。

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至于对苏联援华政策的评估，应该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对华经济政策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未免有些牵强，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确是有条件和有保留的。这就是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面对的现实。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 年第 3、4、5 期

7. 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中国行政权力所及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所有外国列强在中国大陆的租界地，惟有一块地方仍旧被苏联占用，成为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这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到 1955 年，旅大地区才完全回到祖国的怀抱。苏联为何能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租用旅顺口，这个海军基地又是如何归还中国的？对于这段历史，凡研究共和国史的论著多有提及，但均语焉不详。笔者在俄国解密档案及苏方当事人回忆录中发现了一些材料，最近又因考察 50 年代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到大连市查阅档案文献并进行采访，了解到许多情况，从而对这个历史过程有了基本的认识。

（一）斯大林得以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旅顺口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旅顺口与庙岛列岛及山东半岛蓬莱角共扼渤海海峡，构成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是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中国清政府于 1880 年建造旅顺港，费时 10 年，耗资 430 多万两白银。[1]

1895 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辽东半岛被日本强行割让，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以 3000 万两白银让中国赎回。沙皇俄国乘人之危，借口保护中国，于 1897 年 12 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次

[1]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79～83 页。

年3月迫使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为期25年，其中旅顺口及大连湾内一个港口专门辟为军港，仅供中俄两国兵舰使用。[①] 实际上，当时大清舰队已不复存在，海军基地自然为俄国独占。

191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旅顺基地转为日本人占有，不久以后，整个东北都陷入了日本的魔爪。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斯大林以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条件，答应出兵远东，对日作战。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之后，美苏联手，一暗一明，一软一硬，劝逼中国接受苏联的条件。苏联在8月9日以百万大军进入东北的情况下，迫使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②] 有关协定规定，旅顺口作为纯粹的海军基地，仅由中苏两国舰船使用，为期30年；基地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进行管理，委员会由2名中国代表和3名苏联代表组成，苏联为主，中国为副；旅顺地区的民事行政权力属中国，但人员任免须征得苏联军事当局同意；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开放；大连行政权属中国，但如发生对日作战，则受该区域所设定之军事统制；大连港口的工事及一半设备无偿租与苏联，为期30年。[③]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22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250名空降兵在旅顺口土城子机场着陆，并就任旅顺警备区司令。日军驻旅顺守备司令官小林海军中将向苏军投降，驻旅顺日军武装遂被苏军解除。同日，雅曼诺夫少将也率250名空降兵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并就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后由高兹洛夫中将接替）。当天下午，一批苏军乘火车抵达金县石河驿。8月24日，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的首批坦克部队抵达旅大地区。同时，太平洋舰队空降兵部队在旅顺口降落。8月底，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兵力约1万余人。9月1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柳德尼科夫上将率司令部作战组飞抵旅顺。9月6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

---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41～742页。

② 参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34～1337页。

斯基元帅、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元帅、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和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以及其他将领视察了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在日俄战争中阵亡官兵的墓前祭奠亡灵。华西列夫斯基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为40年前牺牲在这里的父兄们报了仇,我们把日本鬼子打败了。"这批苏军高级将领向墓地献了花圈,缎带上写道:"1904年为保卫俄国要塞旅顺口而牺牲的战士们永垂不朽! 1945年8月22日夺取了这座城市和要塞的红军官兵敬挽。"9月28日,苏联太平洋舰队部分军舰开入旅顺口,齐帕诺维奇海军少将任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官。[①]

此后,旅顺、大连地区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军事管制区。旅顺口海军基地名为中苏共用,实为苏联独占。而大连市的主权虽属中国,但苏军占领当局既不允许国民党军队从海上登陆,也拒绝国民党政府设立航空站,空运部队接防,甚至以成立自治地方政府等方法阻挠国民党中央政府接收大连的地方行政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始终配合苏军当局行动,以保证旅大地区成为一块受苏联保护的革命根据地。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的确为支援中国革命作出了极大贡献,但应该承认,其主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苏联手中,至于旅顺基地,更是中国人无法问津的"特区"。[②] 这个问题,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才开始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45年苏军占领旅大地区后,斯大林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③] 从历史上地缘政治中利益

---

① 《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未刊),第6～7页;笔者2001年6～9月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在50年代曾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彭德怀的参谋。

② 有关详情参见沈志华:《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 ,Москва,1977,с. 190～193;《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未刊),第7～21页;《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39、133～139、335～340页;笔者1996年5月对韩光的采访记录。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③ 《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38～439页。但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根本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沙皇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权和欧洲资产阶级。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4～142页。

冲突的角度看,中苏两国共同关注的有三个问题,即东北问题、蒙古问题和新疆问题。不过,到中共即将执掌政权的时候,蒙古问题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和1946年的全民公决,外蒙古已经如斯大林所愿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新疆问题则已不在苏联的考虑范围之内——经过1945年对三区革命的调停和1949年对刘少奇的许诺,斯大林表明了莫斯科将不再插手新疆事务的立场;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而可能导致新中国与苏联利益冲突的只有东北问题了。俄国在亚洲地区安全战略的核心是取得一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这一战略就是通过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终点旅顺口的占领来实现的。实际上,斯大林所说的收回沙俄在中国的权益,指的正是东北问题。因此,对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口,苏联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不过,从利益的角度看,长春铁路主要在经济方面,而旅顺基地则主要在军事方面。斯大林心里很清楚,新中国急于收回长春铁路,却没有守卫旅顺基地的军事力量,所以,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斯大林缄口不谈长春铁路问题,而提出苏联可以提前从旅顺撤军。①

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处理意见,斯大林表示,由于形势的改变,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从旅顺撤军。但如果中共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这一愿望。② 中共当时根本没有海军,自然无法接受斯大林的"好意"。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

---

① 关于中苏谈判在长春铁路问题上的争议,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沈志华:《中苏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л. 106,№3,с. 101。

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年至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① 显然，斯大林原来的考虑是，中方不会让苏联立即撤军，即使同意，因原条约保留，苏军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回来。现在原条约已废除，但苏方也很难再收回撤军的承诺了。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之前，成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而民事行政直属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权力及苏联借用和租用的所有财产立即移交中国；大连港的问题待对日和约缔结后处理。协定中还有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国政府同意，苏军可与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② 这自然是中苏结成军事同盟的需要和结果，同时也为苏军继续驻守或将来重返旅顺港留下了机会。对于毛泽东来说，关键是必须签订一个新条约，以示中共的民族立场及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于旅顺口，当时中国的确无力驻守，也就乐得借用苏联的海军力量。

根据新的协定，苏联政府解除了对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并将行政权力移交旅大地方政府，同时还将苏军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等，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但大连造船厂改为中苏合股企业，大连铁路局和铁道工厂等属双方共同经营的长春铁路财产，也不在移交之列。③

此时，驻守在旅大地区的苏军部队有：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辖直属工兵团、通信团和加农炮兵旅；近卫步兵第五军及所属炮

①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235，пор. 18，л. 1～7。

② 正式发表的中文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8～523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3～135页。

兵旅、高炮团、火箭炮团、近卫十七师、十九师、机械化师;第二十五机炮师。空军——第五十五歼击机军及所属3个歼击机师、1个侦察大队和1个对空勤务团。海军——太平洋舰队红海军旅顺口基地及所属1个水鱼雷机师、岸防司令部、潜艇基地、快艇总队、水警总队、高射炮兵团、水上飞机大队、抢险救生大队、海道测量区和海军修船厂。炮兵——加农炮兵三十三师、突破炮兵师、防坦克歼击炮兵旅和高射炮兵十四师。总计约30万人,同以前一样仍分别驻扎在旅顺、金州、长海等地区。①

中苏条约签订后,根据双方协定,为磋商和处理旅大地区防务的管理和交接问题,成立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中苏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组成。苏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驻大连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中方军事代表团主席是海军司令肖劲光,代表团成员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晋年、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旅大市长韩光、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等。别洛博罗多夫担任联合委员会第一年工作的主席。1951年3月24日,在大连召开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和明确了苏联军事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规定了中苏公民和军人进入旅顺口区域及出境的手续,确定了旅顺口区域和海军基地在海上和陆上的境界,制定了旅顺口区域的飞行管制办法、舰船航线及中国军用舰只进入基地的手续,以及提交两国政府审议的关于交接旅顺问题的措施。1952年9月,双方又草拟了一份《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章程》。但此时中苏两国政府开始商议推迟苏军撤离的事宜,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遂搁置下来。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远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51年9月8日,美英等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时,美日还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没有邀请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苏联代表虽然出席了会议,但鉴于邀请中国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动议被拒绝,且和约条款中又没有规定将萨哈林岛南部

---

① 《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未刊),第23页。

②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未刊),第23~24页。

和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苏联，所以苏联代表拒绝在对日和约上签字。[①] 以上国际形势的变化，自然牵涉到旅顺基地的命运。

苏军撤离旅顺口的日期已经临近，但中国尚未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军，而美日联盟对远东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则日益严重，中国不得不考虑继续请苏联海军留在旅顺基地。1952 年 3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 1952 年底不撤出旅顺口。"[②]这一要求当然符合莫斯科的意愿，不过，斯大林的考虑更加全面。他在 4 月 2 日回电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口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 1950 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作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 1952 年底撤出旅顺口。您 3 月 28 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 1952 年以后留在旅顺口，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作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③]

1952 年 8 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

① 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最新研究参见：*Славинский Б. Н.* Сан ~ Францн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gипломати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1；张盛发：《50 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载《世界历史》2001 年第 2 期。（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参见《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

②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 年 3 月 28 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42，л. 126～130。

③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 年 4 月 2 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43，л. 2～3。

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1] 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国的照会在陈述了理由后，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2] 中国没有海防力量，请求苏联援助，在中苏同盟的情况下是顺理成章的，但照会提出的撤军期限或条件似有不妥：倘若中国或苏联对日和约的缔结遥遥无期，不知中国何时或以何种理由收回旅顺口。

（二）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归还旅顺口

由于苏联履行1950年协定，如期归还了长春铁路，又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以中苏会谈公报发表后，中国国内普遍表示拥护，据当时报道上海各界的反应时说，这与两年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公布时的混乱状况相比，已有极大改变。虽然也有人对延长旅顺基地使用期限不满，但总体来说，反响不大。[3] 不过，旅大地区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之初纪律很差，奸污妇女、强夺民财等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4] 虽然后来苏联军事当局采取极其严厉的惩治措施（包括就地枪决），改变了这种状况，但给当地居民留下的恶劣印象却难以很快消除。因此，苏联延长在旅顺驻军，引起了中国当地军民的不满。据旅大市甘井子区苏军飞机场负责人反映，"中苏关系不如以前密切，最近有些工人、学生对苏联同志不够尊敬。苏联妇女抱小孩上电车时也不让座。对上电车的苏联军

①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29，л. 54～72。

② 周恩来给维辛斯基的照会，1952年9月15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2184页。

③ 《参考资料》，1952年9月30日，第225号，第455～457页。

④ 《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未刊），第227页。笔者1968年至1969年曾在旅顺土城子机场服兵役，常听当地农民说起这种情况。另外，2001年9月大连造船厂厂史办主任徐金成接受笔者采访时也有同样的说法。

官,过去不推不挤,现在又推又挤,个别的还有打人现象。"[1]此外,1952 年 11 月 10 日还报道了旅大市某些职工对苏军不友好的大量事例,有人在买卖时欺骗、糊弄苏联人,有人看不起苏联的技术和经验,还有人甚至在争吵中解除了苏军战士的武器和摘掉军官的军帽。[2]

中国政府当然非常重视苏军驻守旅顺基地的作用。1953 年 2 月 22 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旅大市,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同日下午,周恩来出席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曾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军队所走过的艰辛的、英雄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苏联军队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旅顺口地区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队驻在旅顺口地区,对于制止和打击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阴谋,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心更加努力地"向苏联军队学习,加强国防建设,充实现代装备,改进编制制度,提高各种训练,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会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将锦旗和纪念章授予苏军将士。次日,周恩来向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敬献花圈。[3]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当时苏联的领导核心中,马林科夫兼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最高,贝利亚掌管安全部和内务部,势力最大,再加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老近卫军"重返政治舞台,赫鲁晓夫所处的地位最不起眼。然而,凭借长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权术,赫鲁晓夫先是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与 1953 年 6 月击败了贝利亚,又利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 1955 年 2 月把马林科夫

---

① 《参考资料》,1952 年 11 月 10 日,第 252 号,第 118~119 页。

② 《参考资料》,1952 年 11 月 10 日,第 252 号,第 119~120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86~287 页。

排挤出核心圈子，从而逐步树立起个人的领导权威。[①] 在这场政治和权力的斗争中，赫鲁晓夫所依靠的，在国内是他掌握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和人事关系，在国外则是通过党的系统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联系。而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 1958 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苏联派遣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而率领代表团的不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却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许是为了说明赫鲁晓夫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作为给中国准备的厚礼，赫鲁晓夫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的确定。这包括：帮助中国新建 15 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 141 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 5.2 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从政府的角度，苏联当时尚未把对华关系摆在显著的地位。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从草案内容看，苏联政府最初确定的出席中国五周年庆典活动的政府代表团规格较低，团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作为苏方的庆祝活动，不过是在北京举办苏联成就展览；在苏联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委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

---

① 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党内的斗争情况，近年俄国学者披露了大量档案文献中的新史料，参见：*Зубкова Е. 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Наумов В. 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екретный наследник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

对外文化协会等群众团体发祝贺电；组织科学、文化著名活动家和著名劳动能手发表广播讲话和寄个人贺信；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中国的成就，以及播放中国电影和中国流行歌曲，张贴巩固苏中友谊的标语等等。惟一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就是确定在10月1日成立全苏苏中友好协会，这算是对中国自1949年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系统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的回应。①

但接着又出现了一份文件，完全改变了问题的性质，这就是1954年8月5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的有关事宜给副部长维辛斯基的请示。根据这份文件，苏联代表团访华绝不仅仅是参加庆祝活动，而是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重大举措。库尔久科夫的请示全文如下：

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在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它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

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文件上有手笔将此句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引者）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给中国，并从那里（文件上有手笔将“从那里”一句划掉——引者）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

众所周知，根据1950年2月14日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应于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所有。1952年9月，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远东形成的紧张局势（朝鲜战争），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将共同利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时间延长至中日和苏日缔结和约时为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2年9月15日至20日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双方交换照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

远东司认为，在当前已经变化的形势下，苏联军队继续留在中国领土上，留在旅顺口地区，对我们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在苏联军事和技术援助下，中国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保证海军基地的健全

① 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关措施的决议草案，1954年8月，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9卷，第2254～2255页。（实际上，苏中友好协会直到1957年10月才成立。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

和运转的。至于在非常局势下苏联使用旅顺口基地的问题，可以与中国政府就此问题缔结单独的协定。

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的问题。应该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情。

三、关于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问题。该协定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四、与中国政府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如您同意，远东司将起草相应的提案报上级机关批准。[①]

远东司起草这一文件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表达了赫鲁晓夫力主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图。不过，这一文件在苏联外交部遇到了阻力，而不同的意见主要是针对旅顺口撤军问题的。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当天在文件上批示：“葛罗米柯、佐林同志，我认为第一条很值得怀疑。你们的意见如何呢?”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意见是：“我认为第一条不能接受。其余建议值得研究。”几天以后，副部长佐林表示：“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于是，9 月 9 日远东司再次提交的报告，以及 9 月 15 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关于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事宜的请示及所附决议草案，都没有提到旅顺基地的问题，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②]

在目前笔者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没有关于此后情况变化的材料，但当事人的回忆弥补了文献上的缺憾。苏联对外贸易部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部长科瓦利在回忆中谈到了苏联代表团赴中国之前的准备工作。[③]

---

① 库尔久科夫给维辛斯基的请示，1954 年 8 月 5 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3，пор. 40，л. 4～5。

② 费德林给葛罗米柯的报告，1954 年 9 月 9 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的请示，9 月 15 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7，п. 383，пор. 40，л. 10～19。

③ *Коваль К.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Чжоу Эньлаем в 1953г. в Москве и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1954г. в Пекине//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89，№5，с. 104～118。以下关于苏联代表团准备工作的描述，均依据科瓦利的回忆。

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由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米高扬全面负责，经济援助方案的制定由科瓦利主持，外交方面的事务由外交部部务委员费德林负责。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不断详细地过问援华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一次又一次地召米高扬去汇报。赫鲁晓夫“处事果断，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直到9月25日，即代表团出发的前两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有关协定最终方案和其他有关文件的修改和整理。看来，外交部9月15日的方案是被苏共中央否决了。因为9月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的方案，代表团团长已经改为赫鲁晓夫本人，而且包括了交还旅顺基地的内容。据科瓦利回忆，这种想法很早就在赫鲁晓夫的个人计划之中了，由此判断，库尔久科夫的建议很可能是秉承了赫鲁晓夫的旨意。

9月25日晚上，米高扬再次认真地阅读了前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所讨论的为北京谈判准备的全部协定草案和其他文件草案。当确定已经吸纳了主席团成员的所有意见后，米高扬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说：“我认真地、从头到尾地阅读了准备在中国讨论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中央主席团昨天会议上的所有意见，文件已经全部印完。”米高扬建议不再召集主席团会议进行表决，而由赫鲁晓夫和他本人带头在文件上签字，然后派科瓦利连夜专程送主席团各成员传阅签字。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后，米高扬便确定了表决顺序。米高扬告诉科瓦利，最后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因他住在郊外别墅，且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估计不会有什么意见。传阅和表决一直很顺利，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文件，并签名同意，他们指出，“文件对发展和加强苏中友谊和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令人意外的是，恰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那里出了问题。午夜12时以后，科瓦利最后来到伏罗希洛夫的别墅，伏罗希洛夫正穿着睡衣在前厅等待。他把文件拿去看了约一个小时，随后说：“向米高扬报告，我反对。”说完就去睡觉了。此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在克里姆林宫等待消息。他们对伏罗希洛夫的表态十分惊讶，立即决定第二天上午召集主席团会议。

9月26日上午11时，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出席了会议。科瓦利简短地报告了表决的情况以后，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要求伏罗希洛夫谈谈反对的理由。伏罗希洛夫回答说：“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党和中

央委员会今天并没有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逮捕我，把我送进监狱，而是让我自由表述意见。我认为，目前随处可见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战争而造成的可怕后果，我国人民无力承担在中国的这样一番大事业。需要设计和供应复杂的设备，谈何容易！这需要我们成千上万的专家去工作。此外，就在不久前我们还解释说，我们宣布对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作战，目的就是收复旅顺口和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又要把它们交出去。或许，应该就这件事问问大家的想法，即使不问，至少也得让人们对此有所准备。”伏罗希洛夫发言后，赫鲁晓夫感到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便开始以强硬的口气述说自己的理由。

赫鲁晓夫强调，现在所说的原沙俄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根据租赁协定，也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由双方共同使用。后来根据中国政府 1952 年 9 月 15 日的请求，有关旅顺口的协定已经延长了。赫鲁晓夫语气坚定地指出，如果不是建立在经济互利、相互需要和彼此承担义务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两国之间的任何友好条约都不可能是长久的。“这是一个重要时期，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自己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改变其几百年的落后状态，而我们不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即将来临的五年采取最重要的措施，那么，我们就将失去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机遇”。赫鲁晓夫还表示，没有这些实际内容，苏联派如此高级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典、同毛泽东的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伏罗希洛夫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会议就此结束。可见，在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以及提前从旅顺口撤军的问题上，赫鲁晓夫本人确实付出了极大努力。

（三）苏联军队撤退及旅顺基地的交接

苏联代表团的确是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北京的。国庆活动结束后，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会谈。赫鲁晓夫在 10 月 2 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便谈到了旅顺口问题。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当苏

方提出从旅顺口撤军，并将基地及其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时，毛泽东最初曾表示犹豫和担心。毛泽东提出：现在是否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美国可能会利用苏军从旅顺口港撤出之际，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进攻。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大相信美国人会这么做。不但如此，我本人坚信，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当然，对此不可能有任何保证，因为美国执行的是一条侵略政策，而且在朝鲜的战争才刚刚结束。但是，我们也正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派军队，这与撤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的话，我们当然会帮助你们的。"最后，毛泽东表示不再反对苏联撤军了。①

然而，双方在旅顺口武器设备的处理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周恩来提出，中国希望苏军撤退时，不仅将基地的设备留下，而且把炮兵武器也留下。赫鲁晓夫表示，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无偿留给中方，苏方也同意把重武器留下，但要付钱。周恩来坚持想无偿得到这些武器，赫鲁晓夫没有让步，他回答说：这是非常昂贵的武器，我们可以按照最低的价格卖给你们。我们希望，这批武器能够按照我们建议的条件进行移交。我们还没有从损失惨重的战争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已经遭到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同意我们的意见。请正确地理解我们！于是，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②

双方发表的公报说，"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设备移交应于 1955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③ 这次中苏公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欢迎，认为在苏联身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友谊"。特别是对于苏联归还旅顺的做法，普遍

①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 356～357。

②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 356～357。

③ 《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12 日。

的反映是消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心，相信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①

苏联领导人从战略利益出发采取的政治举动的确感动了中国人民，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苏军在撤退前还是做了一些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蠢事，这就是所谓的旅大苏军纪念塔事件。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在回国途中，于10月13日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苏联领导人指示，苏军撤走前应修建一些纪念物，并整修原日俄战争的纪念物。11月13日，苏军指挥部派代表到旅大市委，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指示，具体计划是：修建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塔，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口陆地防务要塞司令官康特拉琴科少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中将的两座纪念塔；建造一个巨型建筑物，上面镌刻斯大林为战胜日本的《告公民书》；修建12座各种纪念碑。此外，要把两次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官兵和苏军官兵墓地及俄军博物馆加以整修。所有费用均由苏方负担，有关雕塑物，将由莫斯科制作运来。中共中央接到旅大市委报告后，可能是对详细情况不清楚，也可能当时未加认真考虑，遂于11月27日复电同意，并表示可予以协助。②

后来，当苏联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明确要求后，中方提出了不同意见。1955年1月3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时通知，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下述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1. 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2. 在军人墓地建立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3. 在城里修建斯·奥·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纪念碑；4. 在2号炮台建立两座方尖碑；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大使馆受托同中国政府协商建筑上述纪念碑以及由中国当局保护现有的保卫旅顺英雄纪念碑的问题。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已从中

---

① 《参考资料》，1954年10月15日，第234号，第192～193页；《参考资料》，1954年11月1日，第248号，第11～12、14～15页。

② 采访王亚志记录。

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报告中得知。中国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对于建立马卡洛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他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周恩来提醒说，列宁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周恩来表示，还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必须在中共中央进行商量。[①]

2月17日周恩来接见刚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尤金大使，谈到苏军撤退前拟在旅顺修建五个纪念物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苏军当局提出的两个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一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在旅大市；另一个是苏军死难烈士纪念碑，在旅顺郊外苏军公墓），当然是完全应该建立的。关于修建另外三个有关1904年日俄战争的纪念物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我们认为，在联共党史上关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性质，是说得很清楚的，列宁同志对这个战争也作了极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觉得不好去纪念日俄战争中的人物和战绩。而且，反映日俄战争的苏联小说《旅顺口》，是一部不好的小说，这部小说中没有写中国人民，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两个中国人，都是日本间谍。同时，表示原则同意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的计划。最后，周恩来请尤金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考虑，并希望苏方对此提出看法。[②]

《旅顺口》是苏联作家A.斯杰潘诺夫撰写的小说，曾获得1943年至1944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47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翻译出版了中文本，在中国大量发售。周恩来在1950年1月乘火车赴莫斯科途中看了这本书，印象很不好。周恩来认为，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书中的英雄马卡洛夫只不过对腐朽的沙俄军队制度做过一些技术性的修补、改革，比其他将军们稍好一点儿，但对沙皇的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特别是书中丑化中国人，把中国人都描绘成坏人，周恩来感到十分气愤。[③]

---

① 洛马金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55年1月30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48，п. 394，пор. 10，л. 188～189。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50～451页。

③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01、102页。

周恩来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说，“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失败中得到了好处”。[①] 旅顺口要塞司令康特拉琴科在战争中英勇阵亡，被俄国人誉为旅顺防御的“灵魂”。马卡洛夫原是海军彼得堡喀琅施塔得港口司令，很有才华，战争开始后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在海战中触雷，舰毁人亡。在沙皇制度腐败，众多将领庸碌无为的日俄战争期间，康特拉琴科和马卡洛夫确是俄军中的佼佼者，是俄国的民族英雄，但对于革命来说，他们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占领者和侵略者。试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能容忍为这样的人树碑立传!?

2月20日，周恩来将中央的意见电告旅大市委，并叮嘱即将到旅大地区慰问苏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说，如苏方再提出此事，可答复由两国政府商定。如苏方讲建立的理由，可以列宁和苏共党史的表述进行回答。[②] 3月8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共旅大市委：苏联政府考虑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后，已决定不再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并对中国修建苏军烈士塔、中苏友谊塔和中苏友谊纪念碑表示感谢。[③] 事情总算过去了，但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印象很不好。

1955年1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东海岸回国，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2月至5月，中央军委又陆续调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2月5日，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组成，肖劲光为主任，邓华、甘泗其、刘亚楼、曾绍山、郭述申为副主任。2月11日成立了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为保证顺利、按时接收和担负起防务，进驻旅大地区的各部队迅速开展了向苏军学习的活动。2月中旬，接防部队在苏军协助下，举办了1.5万人参加的二百多个训练班，由苏军从技术上培训防区的指挥员、参谋、军械、政工、坦克、通信、防空、工兵、防化和后勤等有关人员。海军部队则开展了“兵对兵，将对将”向苏军学经

---

① 《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4～141页。

②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0～591页。

③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50～451页。

验、学技术的活动。通过向苏军学习的活动，各级干部不仅熟悉了防区，掌握了技术，而且对接收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的状况和性能都有了全面的了解。[①]

2月16日，中苏交接联合委员会举行会谈，通过了《苏军自辽东半岛撤离与中国军队进驻的计划》、《防务移交与中苏军队同驻期间保持备战实施的计划》和《技术装备交接计划》。为预防交接期间突然事件的发生，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作战方案》。其中规定，4月16日零时为防务交接时间，此前两国军队统由苏方指挥，此后统由中方指挥。4月15日13时，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中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兵团副司令曾绍山、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罗华生、空军第三军军长刘丰；苏方代表签字的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什维佐夫、海军基地司令古德利切夫、空军第五十五军军长切德利克。4月16日零时以后，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②]

接收军事设施和装备武器的工作，从3月7日开始，至5月16日全部完成。有偿接收的装备有：

海军——鱼雷快艇39艘，护卫艇6艘，辅助船18只，伊尔－28轰炸机64架，另配伊尔－28教练机12架，里－2教练机2架，180毫米海岸炮1个连(4门)，130毫米海岸炮28门，130毫米列车炮14门，100毫米海岸炮8门，85毫米高射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鱼雷80条，水雷332个，各种炮弹235万发，炸弹2624吨，各种车辆1684辆，雷达35部，油料2.2万吨，共2.7亿卢布。

陆军——各种大炮1113门；坦克和自行火炮357辆，其中ИС－2重坦克18辆，T－54坦克16辆，T－34坦克224辆，CУ100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一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

空军——接收295架飞机，内有281架米格－15，12架米格－

① 《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未刊)，第26～27页；彭林：《接收苏军防务，组建旅顺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载《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② 《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未刊)，第27页。

17,2 架雅克—12。陆、空军武器装备共 4.53 亿卢布。上述苏军武器共7.23亿卢布,加上安东苏军(抗美援朝时进驻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撤走时移交的装备共 2.47 亿卢布,合计 9.72 亿卢布。

无偿移交的设备和器材有营房 151 万平方米,机场 9 个,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仓库、医院等,还有布雷舰 1 艘、护卫舰 2 艘、护卫艇 2 艘,约值人民币 4 亿元。[①]

移交谈判开始是在双方军人之间进行的,互相合作不错,价格也定得较为合理。但不久莫斯科从对外贸易部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专门谈价格,把以前的方案全部推翻,重新评级定价,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如谈判空军装备时,苏方均按出厂新品的半价计算米格—15 和米格—17 飞机价格,而且不供应喷气飞机的燃料。刘亚楼听后生气地说,那么一架也不接收了。邓华也说对方是“老奸巨猾”,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后报经双方上层调解,又确定飞机折旧计价,并供应燃料油,才解决了问题。[②] 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后来谈到接收旅大装备时认为,在经济上不合算,但从政治上考虑,这笔钱又不能不花。[③] 现在看来,这批装备是中国主动提出留下的,苏联要求部分装备有偿转让,并无不合理之处。即使苏方外贸人员对价格有些计较,但并没有超出周恩来确定的 8 亿卢布的总额限定,[④]而中国军队则增添了一批急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对加强国防是极为有利的。

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以后,5 月 24 日下午 4 时,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签署了最后议定书。确定驻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队将在 1955 年 5 月 31 日以前全部撤退回国。[⑤] 自 5

---

① 采访王亚志记录;《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 年(未刊),第 27～28 页;彭林:《接收苏军防务,组建旅顺基地》,载《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242 页。另参见《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111～112 页,其中对海军接收的装备有不同计算。

②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2001 年 10 月 18 日采访纪亭榭记录。纪亭榭 50 年代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另参见《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111～112 页。

③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18 页。

④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57 页。

⑤ 《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25 日。

月 25 日至 27 日，苏联驻军指挥机关及陆、海、空三军约 12 万人分批撤离。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苏联军队实际占有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达 10 年之久，这也算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苏联来说，控制旅顺口确实有其安全利益和军事战略的考虑，但客观地讲，对于中共并无不利。苏军占据和控制旅顺地区，在 1949 年以前有助于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政权；在 1949 年以后则有利于中共巩固政权，保障其远东地区的安全。惟其如此，中共对此始终持赞同和理解的立场，甚至主动要求推迟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不过，从民族感情和权利的角度，允许在本国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加强中苏友谊，巩固中苏同盟，苏联才主动提出提前归还旅顺基地。在这方面，尽管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赫鲁晓夫个人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首脑，赫鲁晓夫对于弱国的民族感情似乎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和体会，所以当他在几年后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时，恰恰因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对外国军事基地问题的敏感反应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①]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9 期

①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一篇文章论述《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8. 关于 19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

20 世纪 50 年代，特别是 50 年代的中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1960 年 8 月 9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 1950 年到 1956 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 13 亿美元(52 亿卢布)的贷款，其中 4.3 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1] 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 22 亿美元(合 88 亿卢布)，其中 4 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2] 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 26.5 亿至 30 亿美元(120 亿卢布)。[3] 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

本文拟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 1950 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儿考察。

---

① Reproduc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 RG263, CIA NIE Box8, NIE 100～3－60, 9 August 1960。

②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gman Group Limited, U. K., 1985, p. 16。

③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生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99 页。

(一)关于贷款数额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成下表:[①]

序号	时间	金额(旧卢布)	用途
1	1950年2月14日	12亿	经济建设
2	1951年2月1日	9.86亿	购买军用物资
3	1952年9月15日	0.38亿	种植橡胶
4	1952年11月9日	10.36亿	购买60个步兵师装备
5	1953年6月4日	6.1亿	购买海军装备
6	1954年1月23日	0.035亿	有色金属公司
7	1954年6月19日	0.088亿	有色金属和石油
8	1954年10月12日	5.46亿	特种军事用途
9	1954年10月12日	2.78亿	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苏联股份
10	1955年2月28日	2.47亿	转售安东苏军物资
11	1955年10月31日	7.23亿	转售旅大军事基地苏军物资
总计		56.76亿	

《外交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1960年7月14日至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1965年可还清。[②] 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57~258页。

② 笔者2001年6~10月对王亚志的采访。

说，苏联1950年至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①]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年至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年至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②]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M.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③]

序号	时间	金额（新卢布）	金额（旧卢布）
1	1950年	2.7亿	12亿
2	1951年	4.33亿	19.269亿
3	1952年	2.415亿	10.747亿
4	1953年	1.352亿	6.016亿
5	1954年	1.882亿	8.375亿
6	1955年	2.182亿	9.710亿
总计		14.861亿	66.117亿

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这个差额与最近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所说几乎完全一致。《杨尚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

① 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7页。

②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8～319页。

③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1977, с. 277～278。

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 56.76 亿,不是 66 亿,苏联多算了 9 亿。抗美援朝贷款为 9.86 亿,而算作了 19 亿。[①]

现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也出在 1951 年的贷款数额上。1952 年 9 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 7000 万卢布,[②]但 1953 年 5 月 1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③] 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 3800 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④] 1954 年 10 月 12 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 5.2 亿卢布,[⑤]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 万)。其他项目均无问题,关键是 1951 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 9 亿多卢布。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 1951 年 2 月 1 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 9.86 亿卢布,《经贸史》说 1951 年 2 月贷款为 19.161 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 9.297 亿计算在内了,[⑥]减去折扣,恰好也是 9.86 亿。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 1951 年的贷款是 19.269 亿。这就使人想到,1951 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 2 月 1 日一笔。

1951 年 2 月 1 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一译沙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 12.35 亿卢布。1953 年 12 月 3 日,周恩来在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 1954 年至 1963 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 40.08 亿卢布。这个

---

①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566~567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59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40~41 页。

③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301 页。

④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 199~200。

⑤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416 页。所谓特种贷款即军事贷款,协定中的正式说法是"长期贷款"。

⑥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 199~200。关于折扣问题,下文详述。

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 1～5 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1] 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而 1951 年 2 月 1 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 12.35 亿卢布计算的。1954 年 1 月 31 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 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 月 13 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 月 1 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 19 亿多卢布，未使用 2.4 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 3/4 计算，共为 9.8 亿多卢布。[2] 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周恩来这段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话。综合上述材料，可以作出如下判断：2 月 1 日协定贷款数额 12.35 亿，实际使用 9.86 亿，剩余 2.4 亿多由苏联收回。但苏联清算时确定贷款实际使用为 19 亿多，很可能是将 1951 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而周恩来批示中所说"只用了 19 亿多卢布"则只是针对 1951 年 2 月 1 日贷款数额而言的，不过是把实际使用 9.8 亿多与折扣 9 亿多相加而已。

鉴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既然中苏双方对 1951 年 2 月 1 日的贷款数额 9.86 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 1951 年是否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 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证据一：1951 年 9 月 5 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今年 2 月 1 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 4 月 10 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 6 月均已用完。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 2 月 1 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 6 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 1951 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 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 6 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 6 个

[1]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336～337 页。

[2]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24、349～350 页。

月内交付。[①] 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此外,毛泽东又要求新的军事贷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②] 这就是说,斯大林已经同意再提供一笔新的军事贷款。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③] 这就是说,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

如此计算的结果,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④]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

①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

②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9月20日。АПРФ,ф.45,оп.1,п.341,л.125～127。斯大林9月26日回电也提到了这6亿贷款。АПРФ,ф.45,оп.1,п.341,л.128～129。

③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3月28日。АПРФ,ф.45,оп.1,п.342,л.126～130。

④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78。

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①]

（二）关于贷款用途

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抗美援朝的贷款呢？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项，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军事贷款占76.1%，经济贷款占23.9%。[②] 显然，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确定贷款用途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外交史》将1950年2月14日的12亿卢布贷款全部算作"经济建设贷款"，是不妥当的。尽管贷款协定第二条规定，其用途是"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③]但实际上这笔贷款究竟有多少用于经济建设，值得研究。

在这笔贷款的协定商谈完毕但尚未签署时，中国方面已经确定了第一年的贷款数额的用途。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在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已购之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各种器材共值4000万美金。"[④]这笔贷款以每年同等数目

① 《杨尚昆日记》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51～657页；《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97页；*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 281。

②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8～319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84页。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95～996页。

分五年支付，即一年 2.4 亿卢布（6000 万美元），而第一年贷款中的 4000 万美元，除钢轨外，大体上订购的都是军用物资。剩余的 2000 万美元，则决定给海空军订货使用。[①]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需要苏联保证武器和装备的供应。为了得到这些军事装备，又不影响经济建设，毛泽东在 1950 年 10 月 13 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求苏联政府以租借办法保持 2 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②] 同日，毛泽东又告诉苏联大使罗申，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军事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方面决定将一部分军事装备列入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贷款协定。斯大林在 1951 年 1 月 4 日通知毛泽东，至 1950 年 10 月中旬（即中国出兵朝鲜）以前，苏联根据 1950 年 2 月 14 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 1.4 亿卢布的军用物资。[④] 此外，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向斯大林报告：经与中方商定，“在明确规定 1950 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纳入 1950 年 2 月 14 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 2.65 亿卢布（1.4 亿卢布属 1950 年贷款，1.25 亿属商品流通）。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 1 月 9 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⑤]这就说明，在 12 亿卢布的经济贷款中，至少在 1951 年初已有 1.4 亿转为军事贷款了。这笔贷款最终的使用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证明，但据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回忆，原来中央军委曾计划将这 3 亿美元军事贷款的一半拨给海军使用。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急需空军支援，结果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空军购置飞机了。1950 年和 1951 年实际执行的结果，

---

①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18 页。

②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第 88 页；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第 86 页。

③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 年 10 月 13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234，л. 1～2。

④ 毛泽东关于军事贷款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 年 1 月 14 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37，л. 4～5。

⑤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1 年 1 月 19 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37，л. 26～28。米库诺夫时任苏联外贸部驻华代表。

海军建设从原先确定的这笔经费中只开支了约2000万美元。[①] 肖劲光使用的“军事贷款”这个用语表明，在军方领导人的心目中，这笔贷款原本就是为军事方面提供的。据以上材料估计，1950年的贷款尽管未必完全算作军事贷款（军事贷款是有折扣的），但看来实际上主要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了，而且似应算在抗美援朝贷款项目下。

同时，《外交史》算在抗美援朝项下的五笔贷款也不大合理。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属于抗美援朝贷款，这一项没有问题，而1953年的海军贷款，1954年的特种军事贷款，1955年的转售安东军用物资贷款，都发生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以后，而且其条件也不如战争期间的半价支付，把这些都算作抗美援朝贷款未免牵强。至于1952年11月9日签订的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情况稍微复杂一些。

实际上，这6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1951年就已经开始提供了，只不过当年提供的4个师装备中，3个师的装备经协商转给了朝鲜人民军。中国本来希望在1952年内完成其余装备的交货，后因斯大林提出1951年只能交货10个师的装备，其余将在两年内交齐，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电报，指示正在莫斯科谈判的徐向前，“提前于明年交完的问题不要再提”。7月3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自本年8月至1954年10月60个师的换装计划。[②] 以后，交货日期再次推迟。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又要求，其余应提供的装备，交付期限为1952年16个师，1953年20个师，1954年20个师。关于这批武器装备的贷款问题，毛泽东说，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③] 后来协定签订了，但用这笔贷款改装的部队，只有3个师在朝鲜停战前入朝作战，用这笔贷款购买的武器，也只有37高射炮炮弹及部分122榴弹炮炮弹用于朝鲜战场，其余均未用于朝鲜战争。[④] 另外，这60个师装备的贷款条件也不是像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那样按照援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条件拟定的。这就涉及到了所谓抗美援朝贷款的折扣问题。

---

① 肖劲光著：《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4～165页。

③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3月28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42，л. 126～130。

④ 笔者对王亚志的采访。

关于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条件，苏方提出的意见是："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目的有关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①]经中苏双方反复协商，最后确定为：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出兵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②] 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情况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不顾艰难困苦出兵朝鲜作战，直接是援助了朝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顺便说一句，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所以，苏联方面后来在讨论偿还贷款时总把这个折扣问题挂在嘴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则没有按上述条件提供。由于中国急需现代武器改装部队，又只能采取贷款的方式购买这些装备，而斯大林则表示苏联提供贷款有困难，所以周恩来提出，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中国将全额支付。在1952年9月19日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又特意提到这一问题，请周恩来确认支付中国60个师装备的军事贷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即这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当周恩来表示肯定的态度后，斯大林立即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③] 所以，这60个步兵师的贷款，从条件上看，苏联似乎也没有把它计入抗美援朝的贷款。

归纳一下，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应为前表所列第1、2、4、5、8、10、11项及1951年两笔补充贷款，总计62.88亿卢布，占50年

---

①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1年1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缅希科夫致扎哈罗夫和米库诺夫电，1月15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37，л. 26～28、34～35。缅希科夫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③ 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19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29，л. 75～87、91～101。

代全部贷款的 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应为 1950 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 1951 年贷款的数额，再加上 60 个步兵师装备贷款的部分数额，总计大约是 32 亿旧卢布。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 1953 年 3 月 11 日报告的 1950 年至 1953 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货共计 31.948 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① 因此，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计算的 60%以上，而是大约 48%。至于经济贷款，如果不算 1961 年的 3.296 新卢布蔗糖贷款(合 14.6 亿旧卢布)，那么还不到 3.3 亿旧卢布。

根据上述分析和考察，再制表如下，鉴于苏方材料使用的是新卢布，且相应的具体数字与中方材料相差无几，故此表基本采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数据：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

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 (3.4)	
4	1951.9.12	6	6	6 (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 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总计		68.713	66.163	62.88 (约 32 亿)	3.283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 年～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第 386～388 页。

（三）关于贷款条件

从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角度看，抛开战争的因素，这个贷款数额，无论就借方的能力，还是贷方的需求来说，都不算多。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截至 1957 年 7 月为止，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贷款数目达到 280 亿卢布。对于发展中国家，1954 年至 1957 年给印度贷款 10 亿多卢布，偿还期 12 年。1954 年至 1956 年给阿富汗贷款 4.13 亿卢布，偿还期 30 年。1956 年至 1957 年给印度尼西亚贷款 4.264 亿卢布，偿还期 6 年至 12 年。[①] 1959 年又增加对印度贷款共 25 亿卢布。此外，1953 年苏联向朝鲜提供无偿经济援助 10 亿卢布，以后增加的贷款 7.6 亿卢布也经 1960 年 10 月签订协议免于偿还；1955 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 4 亿卢布。[②] 与此相比，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为数应不算少，约占给社会主义国家贷款总额的 2/5，但这主要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作为经济援助的项目，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却少得可怜，即不足给印度贷款的 1/10。

这里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苏联不愿提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领导人对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的认识有关。除了战争期间对武器弹药的紧迫需求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愿意对外借债。第一笔向苏联提出的 3 亿美元贷款，数额并不大。据查，仅 1948 年 2 月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备一项，即贷款 4.5 亿美元。[③] 但当时并非苏联不愿给予，而是中国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为此对国内的解释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④]。不过，此时中国不愿过多借债，到急需贷款时，苏联又未能如愿以偿地给予援助。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

---

① 《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17 日。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46 年～60 年代初）》第六卷，盛增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年，第736～737、728 页。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48 年 2 月 2 日。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213 页。

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如前所述，1950年10月出兵前，毛泽东要求苏联在经济贷款之外，另行提供军事贷款；中国出兵以后，特别是1951年初，毛泽东又屡次要求斯大林增加军事贷款。对中国的这两次要求，苏联方面立即给予了满意的答复，但关于60个步兵师装备和海军设备供应的谈判，则进展得十分缓慢。为此，中国方面显得非常急迫，而苏联方面似乎也确有为难之处。

1951年6月，高岗和彭德怀受命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问题，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军队更换装备的事情，当时斯大林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①] 然而，在莫斯科进行预备谈判的总参谋长徐向前报告，按苏联总参谋部的安排，在这60个师的装备中，当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年至1953年提供。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安排"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的要求是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②]。

6月23日，徐向前会见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提出了与毛泽东电报中的同样要求，并提交了经过修订补充的60个师装备的最后订单。[③] 第二天，斯大林答复毛泽东说，"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只有在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这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

①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39，л. 31～32。

②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21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39，л. 64～65。

③ 索科洛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1年6月23日。АПРФ，ф. 45，оп. 1，п. 339，л. 69～70。

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①]6 月 30 日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回复,关于提供 60 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 3 年内完成 60 个师装备供应,而在 1951 年完成 10 个师的供应"[②]。此后,苏联又提出 1951 年只能完成 4 个师装备的供货,其余 6 个师的装备推迟到 1952 年上半年。毛泽东也表示同意,并提出,因此"全部 60 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 1954 年底发货完毕"。发货的时间和数量基本确定下来以后,中方提出了供货方式的问题。毛泽东在 10 月 4 日的电报中提醒斯大林,"今年 6 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 60 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 8 年内分期偿付"[③]。所谓"军事贷款",就意味着按照 2 月 1 日贷款协定,即以半价偿付的条件执行。

直到次年 4 月,斯大林才表示同意就"支付 60 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进行谈判,但提出的建议是"根据提供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④]。没有看到谈判过程的历史文献,但其结果如前所述,这 60 个师的装备贷款没有按照 2 月 1 日军事贷款的条件按半价执行,而是需要按全价付款。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提出的海军装备贷款总额,苏联则表示难以接受。关于海军装备的贷款,毛泽东在 1952 年 3 月 28 日提出的数额是 18 亿卢布,要求"订货必须在 1955 年底以前全部到位",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和两名中国海军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进行谈判。[⑤] 苏联同意来人进行谈判,但谈判实际进展极不顺利。到是年 9 月,周恩来只得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周恩来告诉斯大林,

---

①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电,1951 年 6 月 24 日。АПРФ,ф.45,оп.1,п.339,л.78。

②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 年 6 月 30 日。АПРФ,ф.45,оп.1,п.339,л.99~91。

③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 年 10 月 4 日。АПРФ,ф.45,оп.1,п.341,л.134~135。

④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电,1952 年 4 月 9 日。АПРФ,ф.45,оп.1,п.343,л.8~9。

⑤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 年 3 月 28 日。АПРФ,ф.45,оп.1,п.342,л.126~130。

中国想要得到40亿卢布的贷款，大体安排是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另外18亿的飞机货款，中国打算用现金支付。斯大林同意提供贷款，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40亿这个数字。斯大林强调，问题不在贷款多少，而是苏联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至于究竟能够提供多少贷款，需要计算，时间为两个月。① 苏联方面是如何计算的，不得而知，但众所周知的是，两个月内只确定了橡胶和60个师装备的贷款（合计11亿多卢布），海军贷款经过9个月的"计算"，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确定下来，实际数额是6.1亿卢布，而工业贷款则没有再提起。

也许是苏联方面确有实际困难，也许是斯大林不愿提供大量的经济贷款，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没有强求增加经济贷款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在1950年2月的贷款谈判中提出的贷款条件令人感到不满。最初，苏联方面并没有谈到贷款的附加条件问题。例如，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②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是非常满意的。③ 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④ 尽管后来苏方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

---

①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45，оп.1，п.329，л.75～87。

② 参见联共（布）中央决议及附件，1950年1月22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41～45。

③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29～38。当时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利息为2%，而中国规定银行给予工业的低息贷款为月息2.7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年～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第99页），合年息3.24%。

④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26日；苏方对中方草案的修改稿，1月28日。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38～55，л.74～79。斯大林最初对中方草案的大段删改，表现了他的不满情绪。

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①]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万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万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②] 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年至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年产分别为22401吨和1204.77吨，1937年～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年至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万吨，自给略有剩余。[③] 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

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④] 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多少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道："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⑤] 当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

① 关于中苏谈判详情参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中方对贷款议定书的修改草案，1950年1月31日；苏方关于贷款议定书提交的草案，2月2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23～26，39～49。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47～49页。

④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3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29～34，50～55；《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93～997页。

⑤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4，л. 23～26。

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去电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①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在经济贷款中，还有一项更能说明上述问题，这就是橡胶贷款。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的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② 1950年11月斯大林要求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5000吨，周恩来为此致信毛泽东等人，告以莫斯科来电内容，并建议不管中国如何困难，都应转卖苏联5000吨。后经毛泽东同意，并与陈云商定：多给苏联3000吨，共8000吨橡胶，并可代订5万吨至7万吨。③ 但随后美国开始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中国要进口橡胶也非常困难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1951年上半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4800吨橡胶。④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希望中国大量种植橡胶，以保证这种战略物资的供应。⑤ 20世纪初中国从马来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29332亩，年产橡胶约7500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⑥ 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斯大林没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为中国领导人所反感。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4、407～408页。

②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 9～17。

③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④ 罗申与陈云谈话记录，1951年7月17日。АВПРФ，ф. 100，оп. 44，п. 332，д. 13，л. 36～39。

⑤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6月21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38，л. 91；д. 339，л. 64～65。

⑥ 参见《人民日报》1951年3月24日。

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由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①]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签订了橡胶贷款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说：“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万吨到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②] 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万吨到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8%的价格售与苏联。[③]

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为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这是中方所不情愿的，所以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如前所述，中国就提出中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④]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

---

①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3月28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2，л. 126～130。

②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3，л. 89～90。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0～41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9～301页。

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①] 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②] 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略有修改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58、279页；*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c. 281。

②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66)》，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9页。

四、友好合作

9. 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及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冷战进程中最具震撼力、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之一。其结果，不仅引起了一系列有关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发展的深刻问题，也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乃至冷战格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因此，对于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讨论理应列为国际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苏共二十大问题主要是作为现实政治进入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视野的，那么使其成为历史研究对象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因为只是在这一时期，相关的档案文献才陆续解密并披露出来。有关苏共二十大，过去公布的只是会议代表的公开报告和发言，以及苏共的部分决议，而对于当时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几十年来在各国流传有许多文本，但始终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更不用说，还有大量涉及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决议以及各部门和地区的请示、报告尚不为人知。直到1989年，苏联才在复刊的《苏共中央通报》（第

三期)上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① 随着俄国档案的开放,特别是到199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40周年)以后,俄国学者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使用了大量在档案馆中发现的历史文献。② 从史料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2002年莫斯科出版的关于苏共二十大的专题档案文献集,其中公布了当年秘密报告起草时的3个文本,以及有关这次大会筹备、酝酿情况、苏联国内外和社会反应的198个文件。③ 此后不久出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文件汇编,又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文献。④ 在此基础上,俄国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起来。⑤ 由此可以断言,从真正学术意义上讲,对于苏共二十大

---

① 参见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3,c. 128～170。这个文本就是当时在苏联各级党团组织中传达用的印刷小册子,与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报告有些区别。3月1日赫鲁晓夫对宣读的报告文本进行了修改,主要是补充了部分即席发挥的内容,对引用文献做了技术性加工,增加反应会场效果的内容(如全场起立,鼓掌等),以及少量的文字修订。参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ⅩⅩ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c. 42～44。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以前在苏联民间流传的有关秘密报告的俄文版本,大都是从国外英文本转译的。参见裘实编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三种俄文版本》,载《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第82～83页。

② 在笔者看来,比较重要的有: *Пи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6; *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 *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на ⅩⅩ съезде КПСС//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4; *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ев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1 Февраля 1996;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ⅩⅩ съезде//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2; *Пыжиков А.* ⅩⅩ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0, №8。

③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在此之前出版的有关为政治受害者平反的文件集,已经公布了一些相关档案,参见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Март 1953～Февраль 1956, Том 1, Москва: МФД, 2000。

④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⑤ 目前已经发表的重要成果有: *Аксютин Ю. В.*, *ПыжиковА. В.*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 Н. С. Хрущева ⅩⅩ съезду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и, 2002, №2; *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3; *Пыжиков А. В.*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в годы хрущевской оттепел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4。ПыжиковА. 的另外两篇论文则着重研究了二十大以后苏联社会的心理和思想变化,参见: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в годы "оттепели"//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3, №6; 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 Молодёжь после ⅩⅩ съезда КПСС//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3, №12。

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①

至于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其研究的切入角度有两个：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冷战史。从中国史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多一些，其重点集中在中共对苏联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② 从中苏关系史方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李丹慧主编的《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论文集）里，应该说是代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③

---

① 在英语世界，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学者对苏联史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史、文化史方面。对政治史的研究则出现了新概念（New Soviet Political History），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杂志《评论》（Kritika）甚至出版专号讨论了这个问题（Volume 5, Number 1, Winter 2004）。至于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的研究，William Taubman 最近出版并获普利策传记奖的专著（*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Y & London: W. W. North & Company, 2003）值得一读，其中有专门章节讨论这些问题。此外，Lorenz Lüthi 不久前完成的博士论文（*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1966,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3）对此也有较深入的研究。笔者不久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得到了 Lüthi 赠送的这部未发表的文稿，在此致谢。中国学者中已有人摆脱了以往政治理念的羁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再版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不过，与俄国学者的研究相比，上述著作使用的材料均显得比较陈旧。

② 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董志凯：《毛泽东在“八大”前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设想》，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王真：《50 年代中期我国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武力：《论八大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局限》，载《教学与研究》1996 年第 6 期；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载《俄罗斯研究》2000 年第 1 期；刑和明：《1956 年中共对苏联模式认识的转变及启示》，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12 期；林蕴晖：《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之原因》，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林蕴晖：《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对个人崇拜和思想解冻问题的专门研究不多，只有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等少数论著。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论述。西方学者从中国史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代表作应属 R. MacFarquhar1979 年出版的专著，中文本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翻译组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③ 该文集 2002 年 10 月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相关的论文有：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牛大勇：《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李捷：《从同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等。

本文利用的史料，除现有的公开文献外，主要是最近俄国发表的历史档案，以及相关的中方文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拟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实质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共当时的政策方针，才可以看清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二十大纲领和斯大林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以此观察苏联历史的发展，才可以判断其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三，毛泽东最初对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是什么心态，是怎样考虑的，并以此分析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发展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对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认识及评价无疑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的看法。在1963年9月6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一文中，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评述。文章断言，在二十大会议上，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共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斯大林问题，文章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而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由于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①] 这种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说法至今没有在官方

① 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5～63页。

史学中得到修正。[①]

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仅就内容而言，把苏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归结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和平过渡"理论，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因而很难对其实质作出正确和全面的判断。所以有必要首先对二十大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然后对其实质作出评判。现在所有相关的文件几乎都已经公开，总括起来看，苏共二十大是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确与斯大林主持的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

在国际方面，苏共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

苏联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经瓦解，而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有道义的手段而且也有了"物质的手段来阻止侵略"。于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虽然继续有效，但"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未来的世界"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看到，"历史已经把这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事实上，两个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它不仅是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主要的目的是消除战争的威胁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

同样由于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依照列宁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观点，苏共中央指出，"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其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政策，认为中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许多独

① 特别是"全盘否定"的说法，仍为官方所使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9～360页注释。

特的贡献”。因此,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惟一途径”。从理论上讲,“这种过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制度革命式地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因而,任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就是革命,激烈的程度有轻有重,然而都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人民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就是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在右翼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越来越多地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他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改变政权的性质,而在反动势力仍然强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只能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重要的是,“无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如何,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通过武装干涉内政的办法,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不是通过“革命输出”,“不是用大炮和侵略,而是由于它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它能够保证人类达到比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生活水平”。

大会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一些根本的、带有原则性的、有关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问题,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

今天看来,苏共中央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路线,是

① 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8 日;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22 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23 日;苏共中央关于工作总结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26 日。1956 年 1 月 3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二十大总结报告的文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集中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只有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提出不同意见,而多数人完全支持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并批评了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的看法。卡岗诺维奇最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莫洛托夫没有表态。详见 РГАНИ,ф. 3,оп. 8,д. 389,л. 43~51об.,*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88~93。

极具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正如许多俄国学者现在认为的那样，“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成果首先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①] 当然，这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新思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时局认识逐步成熟的考虑。

在国内方面，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这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 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

2. 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在工业和运输业中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技术和先进经验，使现有设备现代化，改善和改进劳动和生产组织，更广泛地在工业中实行专业化和协作，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3. 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其基本路线是加快东部地区的开发，今后 10 年到 15 年间，在那里建立起采煤和电力生产的最大基地、第三个大冶金基地以及新的机器制造中心。

4. 在所采取的措施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消灭农业的落后现象和消除由此产生的工农业发展之间不均衡的现象”，为此需要在农业中实行可以发挥集体农庄庄员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新的计划制度；在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中，加强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鼓励；从城市和工业中心派遣人员到农村，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技术装备，增加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干部；增加国家对发展农业的拨款；继续集中力量大力发展谷物业，开垦生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

5. 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此，除进一步提高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以及集体农民的收入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措施，如实行七小时(特殊行业六小时)工作制或每周五天工作制；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住宅建设增加一倍；国家为老年人建立房屋和设置相应的养老金；实行免费教育；普遍设立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其他改善保健和国民教育事业的种种措施。

①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 15。

6.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作无情的斗争,充分确立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自主权利;“吸引工人群众广泛参加拟定和审查经济计划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决定生产管理的问题”等。

7.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制。建立党和政府对国家保安机关和其他权力机构的监督,完全恢复并且加强检察机构的监察权力。①

可以看出,与对外政策相比,二十大提出的对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和过于表面化,根本没有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际情况恐怕也确实如此,二十大提出的国内问题,只是苏联新领导人感受到而不是深刻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已经有所认识但不敢坦白讲出的问题。

在党内方面,除了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等一般号召外,引人注意的是二十大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问题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在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地“谴责个人崇拜”,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于“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同时却“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贬低他们的创造性的努力”,并曾使党的工作“发生严重的缺点”②。不过,这个问题在大会上并没有占据突出地位。尽管全体代表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正确的”③,但是从整个会议发言的情况看,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有人统计过,在大会上发言的共126 人,直接提到“个人崇拜”问题的只有 8 人,其中 6 人是苏共中央

① 赫鲁晓夫关于苏共中央工作总结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8 日;米高扬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22 日;马林科夫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23 日;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25 日。

②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8 日。

③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26 日。

主席团成员，即阿里斯托夫、苏斯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2人是达吉斯坦州委第一书记达尼亚洛夫和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①] 而在所有公开发言中，点名批评斯大林的只有米高扬一人。按照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在其得意之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分析"未必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未必是正确的"；实际上由斯大林授意和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没有全面、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②] 目前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米高扬何以会有如此惊人之举——几十年来在苏联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以致许多外国共产党代表当时认为他与赫鲁晓夫或其他苏联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③] 不过人们很快就了解到，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仅与米高扬没有分歧，而且很可能还对他轻描淡写的批评方式感到不满。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问题确实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10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只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④] 在这个冗长和充满激情的秘密报告中，作为个人崇拜现象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这些内容已经有太多的论著讲述，因此没有必要在

---

① [俄]尼古拉·津科维奇：《权力与争斗》郅友昌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03～204页；*Пыжиков А.*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с. 51。在苏联领导人中，只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发言时没有提及个人崇拜问题。参见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ⅩⅩ съезде，с. 110～111。

② 《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著名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在发言中也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提出了批评。

③ 参见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回忆录，АПРФ，ф. 3，оп. 83，д. 117，л. 2504～2575，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с. 6；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7～18页。

④ 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秘密报告的时间是在24日～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而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24日晚间进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选举，由布尔加宁主持，而赫鲁晓夫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РГАНИ，ф. 1，оп. 2，д. 17，л. 89～9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250～251。另见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ⅩⅩ съезде，с. 111～113。

此重复了。[①] 为了评判和对比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里要强调说明的只有两点：

第一，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最后又谈道，"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他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②] 此外，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许许多多的错误，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无情镇压、推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对内实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外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蛮横专断和老子作风（毛泽东对此最为愤恨）等等，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

第二，报告在谈到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时，仅仅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如"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最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等，而没有深刻地分析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斯大林问题的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很显然，既然在这种政治体制里没有言论

---

① 关于这个报告公开出版的中文本至少已经有三个。1988 年 2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同年 10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拉齐奇所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夏平译），这两本书作为附录收入的报告文本都是来自西方久已流传的 1956 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英文本，而 1991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麦德维杰夫著《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述弢译）所附录的报告文本则译自苏联 1989 年首次公布的俄文本。经过核对，笔者发现俄文本与英文本的内容和文字几乎也是完全一致的。俄国学者从文本来源考证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同（参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30）。尽管如前所说，这个文本与赫鲁晓夫宣读的报告有些差别，但并不影响人们对报告实质和基本内容的了解。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据新华社查对，美联社和合众社播发的报告原文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3 月 16 日印发的那本文件。除个别用词外，"段落和文字都相同"。

② 本文使用的秘密报告原文，均引自《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一书的附录，以下不再注明。

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现象，而报告中所谓“党内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也只能是天方夜谭而已。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出发”的，“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如此推理的结论自然是好心办坏事：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问题。

由此看来，苏共二十大确实从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不过，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观察，麻烦并不在于提出了非斯大林化的问题，而是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方式。

（二）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综上所述，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纲领和路线，无论其认识是否正确，思考是否到位，都是针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称之为非斯大林化现象毫不为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由苏联自身开始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并不是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就在莫斯科新领导层逐步形成的共识。本来这些对内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在不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情况下悄悄推行的，但在筹备二十大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为成千上万3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的问题，于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便被提到了二十大的议事日程。

还是先看对外政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的国际局势就已经显现出来。由于战时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关系重组，以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标志的统一的国际体系相继建立，以及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功能趋向成熟，为修正苏联传统的对外政策创造了国际环境和基本条件。雅尔塔体系区别于凡尔赛体系的根本标志之一是建立了各大国认同的国际体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而莫斯科也是这种体系和规则的倡导人和缔造者。因此，斯大林陆续地、不自觉地从战略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观念。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解散共产国际这个对苏联外交已经不起作用的工具，

以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谅解；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明苏联已经感受到其可以对世界命运发挥主体作用；促进欧洲各国及中国通过选举组成共产党与其他各党的联合政府，说明苏联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验；最后，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如在伊朗、希腊和中国表现的那样，不再是推翻旧世界，而是要改造旧社会。所有这些政策的本质及其归宿就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然而，因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敌对，因美苏各自的过度反应而采取的过激措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互动作用，终于使冷战思维成为双方政策的出发点，同美国一样，苏联也很快就回到了战前发展的老路。斯大林不仅在国内继续高唱军事共产主义的"凯歌"，进一步巩固标榜为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而且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则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推至极限。

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了机会。及时地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显示，也是克里姆林宫新主人集体作出的非斯大林化的第一次尝试。[①] 1954 年 3 月 12 日，马林科夫在对选民演说时宣称，朝鲜停战是国际紧张局势走向缓和的标志，"苏联政府坚持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坚持牢固而持久的和平，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一个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而在拥有现代武器的条件下，这样一场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②] 这种表述不仅在观点上，甚至在话语上，已经与斯大林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大相径庭了。由于党内继承权的斗争，马林科夫公开发

---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相关的档案文献参见沈志华编《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4 期，第 150～175 页。

② Правда，13 Марта 1954г.。

表的惊人言论受到指责，并成为其被罢黜的理由之一。① 但实际上，这个理论框架和思维逻辑是苏联新领导人普遍接受的。二十大在提出“三和路线”时只从政治角度强调了时代变化的背景，而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则欲言又止，一笔带过，但这并不说明赫鲁晓夫没有把这个问题也作为苏共改变外交政策的根据之一。

自1949年8月29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苏联的核武器研制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美国。据俄国的解密档案，在国家银行特别账户的秘密用途拨款中，按当时价格统计，1947年至1949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145亿卢布，而在1951年至1955年期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648亿卢布。② 在1953年7月3日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型机械制造部副部长扎文亚金骄傲地宣称：美国人将看到他们的核优势正在消失。苏联即将爆炸的氢弹威力比普通原子弹要大数十倍，“它的爆炸意味着美国人正在准备的第二次核垄断已被打破，这将是世界政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果然，8月12日苏联成功地试验了世界上第一枚可运载氢弹，而美国的氢弹爆炸是在7个月之后。③ 与此同时，苏联核武器的运载能力也在不断提高。1947年至1949年，P—1型导弹（射程300公里）和P—2型导弹（射程600公里）相继试制成功并装备部队。而在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0日，P—5型导弹携带着核弹头，以1500米/秒的速度飞越1000公里，在预定时间内将其“有效负载”送达目的地。④ 这个射程还不足以把原子弹送到美国本土，但打到欧洲则绰绰有余。⑤

---

①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 Г. М. Маленков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1，c. 31。

② *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1996，c. 242～244。

③ Y. Smirnov and 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4，fall 1994，p. 14。

④ *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c. 239～240、248。

⑤ 1957年8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P—7型），因未装置弹头，称洲际弹道火箭。《人民日报》1957年8月28日。

自然,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同时也了解核战争危害的并非马林科夫一个人。1954 年 4 月 1 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著名物理学家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了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科学家们在一系列文章中生动而有力地论证说,建立在利用热核反应基础上的核弹,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一枚炸弹中所包含的爆破能量,而对这种武器的防御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过不了多少年,其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人类正面临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胁。① 无疑,这使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感到震惊。9 月 22 日,在关于防止核扩散谈判中一直采取对峙立场的苏联政府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不久,苏联又提出了一项禁止核试验的新建议。②

因此,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一方面是基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对核武器发展及其后果有了明确认识的结果。于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的时间里,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以实现与西方的缓和: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赞同奥地利中立并同意从那里撤走苏联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起义采取冷漠态度,积极推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主动提出裁减军队并单独实现裁军,向美国建议签署苏美友好与合

① 马里舍夫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1954 年 4 月 1 日。TsKhSD, f. 5, op. 3, d. 126, ll. 39～41,转引自 Smirnov and Zubok, 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pp. 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65～488页。

② 详见本书《援助与限制:1950 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一文。

作条约，如此等等。[①] 在1956年1月30日主席团会议研究大会工作总结报告草稿时，最集中讨论的就是议会道路、和平共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经过一番争论，所有人一致赞同报告的宗旨——和平，会议的结论是："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②]尽管苏联的举动在美国没有立即看到积极反应，但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却是"深入人心"的。[③] 确如美国情报专家分析的，"苏共二十大的整个旋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似乎确信，只有和平才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④]无论如何，1950年代"被合情合理地认为是东西方缓和的第一时期"。[⑤] 这是苏共中央提出的"三和路线"的结果，也是二十大试图改变国内政策、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

1917年的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在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构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囿于历史的条件和战争的环境，布尔什维克选择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巩固革

---

① Vojtech Mastn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saw Pact in 1955, Niels Erik Rosenfeldt, Bent Jensen, and Erik Kulavig ed., *Mechanisms of Power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 243～254; Csaba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6, 1996; Matthew Evangelista, Why Keep Such an Army?: 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 *CWIHP Working Paper*, №19, 1997; *Обичкина Е. О.*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и война в Алжире 1954～1962г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МИДРФ//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1, с. 19～24; *Катасонова Е.* 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955～1956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3, №5, с. 121～132; *Фурсенко 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с. 69～71、906～90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87～608页。

② *Фурсенко 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с. 88～95。

③ *Афиани В. Ю.*, *Иванов Н. 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уэц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ЦХСД，复印自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 保存的手稿；[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27～28页。

④ 国务院情报研究办的报告：《苏共二十大与"战争不可避免"论》，1956年6月22日。MF2524607～0807, 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⑤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命的政权，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当时历史环境为苏联提供的第一次制度转型（或曰改革）的机会。但是，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集权统治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畸形发展，生活贫穷落后。是战争掩盖了苏联的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战时经济）性质恰恰适合了战争的环境和需要。但战争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线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人们开始抱怨，社会开始思考。

然而，斯大林却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他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所创造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和优越性——1946 年 2 月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②] 再加上冷战爆发和国际关系趋向紧张，刚刚开启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关闭了，铁幕再次降临俄罗斯大地。拟议于 1948 年召开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的苏共十九大无声无息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改革经济体制的尝试尚未启动便夭折了。与此同时，党内和社会生活也悄悄地再次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的乌云之中。一切又恢复到战前的状态。[③]

---

①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著述颇丰，在中国学者的论著中，笔者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有：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至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② 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441～454 页。

③ 关于战后苏联社会状况的详细史料可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2、23、25、26、28、30 卷，也参见俄国学者的论著：*Пыжиков А. В.* Советско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хрущевских рефор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2，с. 33～43；*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 массов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4，с. 29～30；*Зубкова Е.*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чистки в КПСС（1949～1953）//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9，№3，№4，№6；*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45～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0。

俄国学者说的不错，1953 年的苏维埃国家确实已经处于社会大爆炸的前夕。[①] 人们不仅要在恐惧和惊慌中煎熬，还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斯大林的逝世给那些一向视沙皇为神明的俄罗斯人带来了由衷的悲伤，也使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产生了希望。这种思考首先是从直接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党和国家的高层开始的——他们感受到了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

50 年代初苏联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是国民生活水平低下，食物、日用品和住房的短缺严重困扰着苏联人民。以食品为例，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主义搞了 30 多年，直到 1952 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牛奶及乳制品、鱼类及水产品)甚至还低于(面粉、大米、肉类及油脂)1913 年的水平。[②]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落后。统计资料显示，按 1926 年至 1927 年不变价格计算，与 1945 年相比，尽管消费资料产品的增长率(169%)要大大高于生产资料产品(57%)，但是到 1950 年，在工业总产值(2400 亿卢布)中，生产资料产品(1620 亿卢布)仍占 67.5%，而消费资料产品(780 亿卢布)仅占 32.5%。[③] 至于农业，问题就更加严重了——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主要生产指标几乎都低于十月革命前。如谷物总产量(按 1939 年以后疆界计算)，1913 年为 8600 万吨，1953 年为 8250 万吨，1946 年至 1950 年平均为 6480 万吨。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如此，1913 年为 8.2 公担/公顷，1953 年为 7.8 公担/公顷，1946 年至 1950 年平均为 6.7 公担/公顷。谷物出口量差得就更远了，1913 年出口 910 万吨，到 1953 年只有 310 万吨。与美国农业相比，也能看出同样的问题。1949 年至 1953 年苏联平均谷物产量为 8090 万吨，仅为美国同期产量(13350 万吨)的 60%。[④]

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

---

① *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c. 29。

② 李仁峰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3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94 页。

③ РГАЭ，ф. 4372，оп. 96，д. 693，л. 161～162，转引自 *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c. 201。百分比为笔者计算所得。

④ 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年，第 35、41、135～137、164～165 页。

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农业改革纲要，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增加日用品生产，发展居民住宅建设，扩大商业销售网点，降低农业税收标准，加速开垦生荒地，所有这些措施，无论最初是谁提出的，其结果都是为二十大进一步提出的改革方针提供了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①] 不过同时必须指出，苏共中央当时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提出挑战。可以对此作出注解的是，1955年1月马林科夫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导经济界"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大提出的对国内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修改才局限于一些治标不治本、治表不治里的零星措施。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被斯大林注释和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曰斯大林主义）的程度，而不在于对斯大林本人的畏惧，否则就无法解释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对斯大林的点名批判了。

如前所说，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在二十大期间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认识水平，显然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即使这样，在全党和全世界面前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是极富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因为从本质

---

① 关于1953年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争先提出经济改革措施的情况，详见 *Зубкова Е. 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4, с. 109～111; *Пи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с. 8～11。

② 苏共中央决议指出，马林科夫在195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九月会议上的发言"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作为重要的结论，他还提出了加快轻工业发展的口号。因此，某些可怜的经济学家抓住马林科夫同志的这个错误讲话，在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宣扬明显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要求优先发展轻工业，并不是偶然的"。参见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 пленума, с. 31。

上讲，批判斯大林无疑就意味着以其为标志的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那么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①] 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

对斯大林产生恐惧感的首先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到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已经处于一种人人自危、难以容忍的紧张状态。通过 1952 年 10 月召开的十九大，斯大林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全部赶出了新的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上都是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少数第二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几人也整日战战兢兢，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从晚宴邀请名单中除名。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虽然导致斯大林最后死亡的真实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斯大林能够再次站起来。在斯大林昏迷和弥留之际召开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以及会议作出的对党和国家进行机构及人事调整的决议，充分证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②] 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便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并形成一个共识：今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担任可以凌驾于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之上的职务。[③] 应该说，苏联领导层的“非斯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500～511 页；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8 页；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60 页；尼古拉・津科维奇：《权力与争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210 页。

② 有关史料参见 *Медведев Ж. А.* Загадка смерти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0，№1；*Пихоя*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70～377 页，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③ *Наумов В. 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с. 19。

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

最先针对斯大林采取个人行动的是贝利亚。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星期，3 月 13 日，内务部长贝利亚就命令成立若干侦查小组，负责重新审理包括著名的“医生案件”在内的一些重大案件，而这些案件都是斯大林生前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重要内容。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医生案件”得到平反，主席团还通过决议，赞成贝利亚采取措施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尔后，根据贝利亚的倡议，在 5 月 9 日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节日期间禁止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的决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并由此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性。[①] 虽然这些措施没有直接联系到斯大林，但是其逻辑的指向是清楚的。6 月 22 日贝利亚的被捕当然不是因为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是由斯大林批准的，不过处理贝利亚事件却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提供了一个讨论斯大林问题的机会。

有学者认为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实际上导致了非斯大林化的停止，甚至出现了恢复斯大林化的现象”。[②] 实际情况未必如此。7 月中央全会形成的决议承认，苏联无论是在“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领域”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还是在遵守“列宁制定的党的准则”和“党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积累了许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例如，一再推迟十九大的召开，连续几年不召集中央全会，主席团“长时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决议往往也没有按党章规定那样事先在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讨论”。决议还特别指出了“另一种不正常现象”，即“近几年来的宣传工作”“走上了宣扬个人崇拜的邪路，从而贬低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整个党的作用”。很显然，这是在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然而，笔锋一转，决议把本来应由斯大林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80～409 页；ЦХСД，ф. 3，оп. 10，д. 22，л. 3～4；д. 20，л. 11；*Наумов В. 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с. 20～22、27～28。

②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 пленума，с. 29～30。

承担的这一切罪过都转嫁到了贝利亚头上。① 鉴于斯大林在党内的崇高威望，这样做是完全正常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了向党内传达会议精神外，苏共中央还安排了三次会议，分别向中共、东欧各党及意共和法共介绍情况，而在这里，斯大林遭到了点名批评。据参加会议的意共代表带回的材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报会。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长篇解释性讲话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通过许多具体事例，莫洛托夫描绘出一个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处事偏执、权欲熏心、甚至还有些疯癫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苏联领导人要改变斯大林生前的一些做法，自然需提出理由，但莫洛托夫强调他只是在讲述一个伟人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晚年的"病态"。莫洛托夫最后告诫说，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② 显然，此时个人崇拜的概念表面上还是没有直接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同全会的精神一样，在舆论宣传上，所有的指责都是针对贝利亚的。苏共领导人这样做，很可能是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尽管在党内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崇拜具体讲是对谁的崇拜？宣传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上，民众仍然像神一样供奉着斯大林。1953 年至 1955 年，各种报纸杂志继续连篇累牍、一如既往地颂扬和赞美斯大林。特别是 1954 年 12 月斯大林诞辰 75 周年时，各地关于斯大林的展览、集会、颁奖等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③ 在这样的氛围中，1955 年 1 月被罢免的马林科夫的罪名，有很大一部分是指责他违背了斯大林生前制定的方针和政策，并骗取了"伟大领袖"的信任。不过，中央全会决议的最后还是没有忘记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④

---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8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47～72 页。这里根据原文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见 *Наумов В.*, *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9, с. 265～273。

② R. J. Service, 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Soviet Studies*, Vol. 33, №2, April 1981, pp. 240～242。高岗代表中共听取了情况通报，遗憾的是目前有关的中方材料尚未解密。

③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4, л. 20; *Пыжиков А.*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 47～49。

④ *Рейман М.* Решение январского(1955г.) пленума, с. 30～32。

当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纷纷落马以后，召开苏共二十大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①] 然而，在为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政治镇压的问题。平反工作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千百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镇压、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期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阴谋伪造的假案和通过粗暴手段制造的冤案，揭发材料如潮水般涌来。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1月至2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达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②]

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并考虑为无辜受害者平反的问题。到1955年秋天，关于30年代大清洗以及斯大林应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③] 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1月5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时，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④] 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

---

① РГАНИ，ф. 1，оп. 2，д. 1，л. 7、4～5；*Аймермахер*，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167～168。

②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как это было，с. 196、201。

③ *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 27；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政治生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2～63页。

④ РГАНИ，ф. 3，оп. 8，д. 389，л. 33～34；д. 388，л. 61～62；*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169～172。参见 *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 27。

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会上还宣读了当事人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信中讲述了有关调查谋杀基洛夫案件的情况：在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办公室，凶手尼古拉耶夫当着斯大林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亚戈达的面，讲出他的背后指使者竟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随即遭到一顿毒打。受到震动的主席团成员要求继续进行调查。①

1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引起了领导层的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镇压和刑讯都是斯大林本人亲自设计、亲自领导的消灭异己的活动。米高扬、波斯佩洛夫和谢罗夫还谈到了一些具体事实，表明斯大林确曾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他在二十大的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

① РГАНИ，ф. 3，оп. 8，д. 389，л. 30～35；*Фурсенко А.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с. 79、171～172、912；*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г.，Москв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с. 200。

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斯大林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①] 两天以后，斯大林的名字第一次从官方公开的政治语汇中消失了。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②]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大会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多长时间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此前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令人震惊的还有如下统计数字：1935年至1940年，因被指控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而遭到逮捕的苏联公民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镇压主要集中在1937年至1938年（逮捕1548366人，处决681692人）。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在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98人被逮捕并无一例外地被枪决，在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大会代表之中，遭到逮捕的有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镇压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还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

① РГАНИ，ф. 3，оп. 8，д. 389，л. 52～54，*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175～177。参见 *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 156～157。

② Правда，4 февраля 1956г.。

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①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我们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②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和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关于个人崇拜，阿里斯托夫的话很有哲理：斯大林时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萨布罗夫也指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缺点"，

① АПРФ，ф. 3，оп，24，д. 489，л. 23～91，*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185～230。根据90年代初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披露的数字，1930年～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和处罚了3778234人，其中处决了786098人。已经查出的被镇压者的坟场约有100个。参见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546页。关于在苏联遭到政治镇压的具体人数，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恐怕与中国当年右派的人数统计一样，很难说得十分准确。不过，如果有人以为只要把受害者人数减少一些，就可以改变"大清洗"和斯大林罪行的性质，那实在是太可笑了。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说的好：无论如何，斯大林杀死的共产党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独裁者所杀死的加起来还多，提醒这一点对当今斯大林分子是有益的。参见[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

② АПРФ，ф. 39，оп. 3，д. 120，л. 115～116，*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 157；РЦХИДНИ，ф. 39，оп. 3，д. 120，л. 115、116，*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 27～28。

“而是犯罪”。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① 会议通过了在 2 月 13 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②

2 月 13 日首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③ 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④ 这就是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

直到大会召开了几天以后，2 月 18 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 30 年代实行政治镇压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 40 年代至 50 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⑤ 随后在这两个

---

① РГАНИ, ф. 3, оп. 8, д. 389, л. 56 ～ 62об,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234～237。

② РГАНИ, ф. 1, оп. 2, д. 182, л. 1; ф. 3, оп. 10, д. 223, л. 25,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238。

③ РГАНИ, ф. 3, оп. 8, д. 389, л. 64 ～ 66; ф. 1, оп. 2, д. 1, л. 64,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239～240。

④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184, л. 6～8,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241～243。

⑤ АПРФ, ф. 52, оп. 1, д. 169, л. 1 ～ 28об、29 ～ 63,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120～133、134～150。参见 *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с. 163～164。有学者认为，秘密报告是赫鲁晓夫私下秘密完成的（*Барсуков Н.* 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закрытый доклад”），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做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②]

苏共二十大路线及其产生的过程告诉人们：第一，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前进的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活动和社会趋向预示了改革的基础，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内苏共新领导人的措施反映了变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论前提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苏联社会变革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并不是个人或小集团谋求权力的工具（尽管不排除在党内斗争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为铺垫改变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历史冤案的社会浪潮不过是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机会。苏联要摆脱危机，必须破除个人崇拜的罗网。这是苏共中央集体的决定，分歧只在于问题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第三，囿于认识能力和传统思想，二十大并没有从社会变革的层面提出改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任务，而仅限于政策性调整和某些具体措施的实施。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传统力量击败了政治对手，而他本人也受到传统势力的束缚。赫鲁晓夫并非要、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第四，无论如何，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毕竟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

---

① 参见 *Аксютин Ю.*，*Пыжиков А.*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с. 114；*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 163～164；*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с. 15。各种修改文本似乎尚未发表，但在关于二十大的文件汇编中收入了有关目录。参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119。

② 据俄国学者考证，赫鲁晓夫做报告时有一些即席发挥的内容，在会后整理并传达的小册子里，只有少数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对引文做了技术性加工，基本上就是会前准备的和目前人们看到的那个报告文本。参见 *Аксютин Ю*，*Пыжиков А.*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закрытого доклада，с. 114；*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с. 165～166。

路问题了。更准确地说,二十大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世界引起的反应却是复杂的,其命运也是难以预测的。

(三)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共就提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①。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仍然为很多研究者所坚持,他们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② 如果说中共当时出于政治目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尚可理解的话,那么现在的历史研究者还保持这种观点就多少有些令人可笑了——作为学者,对于基本的史实岂能视而不见。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国当时的国内外政策究竟有多少区别?二十大路线与中共八大路线到底有多大分歧?

首先是和平过渡问题。对于二十大的提法,毛泽东心里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共自认为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得意之作,是中共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宝贵经验。③ 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都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④ 因此,苏共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5~56页。

② 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240页。

③ 这里有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删去《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二两节。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复信同意了英共的意见。毛泽东在审阅复信时指出,中宣部和英共都犯了错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30~532页)。值得注意的是,被删去的两节文字所论述的核心思想恰恰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④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应该注意到,苏联强调的是全面缓和,而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更注重的是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

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得到了广泛共鸣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在党内生活中强调集体领导是对的。斯大林的功绩不能否认，也没有否认；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集体领导不够，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①]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3月4日的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②] 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③] 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自然不便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个人内心的不满是有的，但中苏之间的政策性分歧是不存在的。直到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中共才有分寸地提出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④]

至于国内经济方针，毛泽东当时对“以苏为鉴”思考的集大成者

---

①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13页；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631页。

② 中共中央研究室主编：《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54、579、648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84～85页；《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第12页。

③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日、7日。

④ 关于中共在莫斯科会议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的情况，参见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0～11页；《毛泽东传（1949－1976）》，第744页。俄国档案见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08, л. 28～28об. , *Фурсенко 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с. 280～281、1022。

就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①] 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苏联驻华使馆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分析后作出的评论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②] 当然，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的思考，在这方面都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模式，都没有从改变或改革制度的层面思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的经验看，否定斯大林模式必须过两道关口，即经济体制的市场关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关，而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都在这两道关口面前止步了。中国经济建设采用的做法都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恢复时期苏联的经验，所以毛泽东认为需要引为借鉴的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而这正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已经考虑并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的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956 年毛泽东所谓的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从本质上讲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所指引的苏联道路，只是中国要通过采用那些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法比苏联走得更快些。再者，同苏共领导人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模式的原则没有错，只是方法有问题。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共八大继续探索而产生的思想火花，很轻易地就在突然爆发的波匈事件和反右派运动中熄灭了。总之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何谈“根本的分歧”乃至“严重的分裂”？

问题似乎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确形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波。但是要说到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事情远非人们想象的

---

① 该报告当时只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1965 年底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1975 年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再次整理成文，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1976 年 12 月 26 日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汪裕尧执笔：《关于〈论十大关系〉的产生、整理和发表》，载《文献和研究》1982 年第 8 期，第18～19 页。

② 利哈乔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 年 8 月 22 日。ЦХСД，ф. 5，оп. 28，д. 407，р. 5174，л. 129～147。

那么简单。

首先对二十大作出反应的当然是出席大会的苏联代表,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斯大林问题。据会议参加者证明,如往常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受到普遍赞同,人们继续对党歌功颂德。但对斯大林问题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大会讨论的过程中,除潘克拉托娃外,米高扬关于个人崇拜的发言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还在会议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地方组织负责人就发来电报称:“我不同意米高扬的右倾讲话,这一讲话是对活在整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中的斯大林光辉形象的一种亵渎,并且将会为整个资产阶级所欣然接受。”[①]人们作出如此反应,显然是不了解米高扬发言的背景。因此,当赫鲁晓夫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宣读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意外和震惊,会场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②] 这种局面本该使苏共领导人意识到处理斯大林问题应当特别慎重,但苏共中央的做法却是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外,不断扩大秘密报告传播的范围,以致最后引火烧身。

在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对报告的补充提纲中,强调指出的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不能超出党的代表大会的范围。[③] 但是在2月25日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便把知情者的范围扩大到会议代表之外:“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④]主持人布尔加宁在大会通过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后再次强调,目前还不公布报告和决议,但“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这个建议也被一致通过。[⑤] 不久,范围又扩大到党外。3月5日主席团的决议“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报告的内容,并决定取消下发材料上的“绝密”标志。[⑥] 3

① ЦХСД, ф. 1, оп. 2, д. 81, л. 228, *Наумов В. П.* К истории секретного доклада, с. 147。

②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XX съезде, с. 113～114;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с. 48。

③ АПРФ, ф. 52, оп. 1, д. 196, л. 29～63,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4～134～150。

④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59页。

⑤ РГАНИ, ф. 1, оп. 2, д. 17, л. 89～90,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250～251。

⑥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4, л. 66,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253。

月7日，根据主席团的决议，将赫鲁晓夫于3月1日提交给主席团的、经过校订的报告文本寄发给了各级党组织。[①] 据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报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是很快的，到3月20日左右就普遍传达到了基层组织”，而各种流言传播得更快。[②] 或许像俄国学者估计的，最初莫斯科希望对国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③] 但无论如何这个界限很快就取消了。3月24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建议，在各民主国家，可以向党团中央及各地区和部门主管干部介绍秘密报告。[④] 3月28日，联络部又建议，向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各民主国家兄弟党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介绍和宣讲秘密报告。[⑤] 主席团则作出决议：向16名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活动家介绍《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⑥] 就在3月28日这一天，《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格格不入?》，第一次正式地指出所谓批判个人崇拜，就是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⑦] 于是，秘密报告不再秘密，斯大林问题的冲击波在秘密报告那颗炸弹爆炸后一个月产生了最大的震荡力。

几乎没有人怀疑，积极推动将斯大林问题从党内高层扩展到基层和一般民众乃至国外的，正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本人。[⑧] 赫鲁晓夫的目的，究竟是想以此打击政治对手，为个人争夺统治地位，[⑨]还是要排除保守派的干扰，为进一步改变传统政策打开通道，亦或纯粹为形势所

---

①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43～44。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

③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18。

④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381，л. 81～82，*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646～647。

⑤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381，л. 83～83об，*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654～655。

⑥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2，л. 71、118，*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253～254。

⑦ 《人民日报》1956年3月30日。

⑧ [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97～99页；[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赵敏善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4～45页。

⑨ 参见 *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 30～31。

迫而身不由己，[①]这些都只能是研究者的推断。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斯大林问题如此迅速而无限制地扩散和传播，用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是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还要按照斯大林指引的方向走下去？[②]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观察，苏共的做法也确实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和非斯大林化的方针带来了诸多困难和阻力。

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苏联社会本身。目前披露的丰富档案文献显示，在广泛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有些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身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国家的罪人”，“没有资格葬在列宁墓里”。更极端的意见认为，30 年来的苏联社会是“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还不如“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甚至有人提出应取缔苏联共产党，烧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著作。[③] 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平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将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④] 尽管观察者和研究者对当时苏联社会的主流倾向有不同的判断，但明显的是，斯大林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层面展开讨论，其结果的主要特征就是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⑤] 这一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3 月 7 日至9 日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在这次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发生

① 关于国内外共产党员强烈要求知道内情的材料，参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20～21、623～624；*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с. 60。

② 无论是在苏共党内还是年轻的一代中，新的思潮和不同政见就是从此开始出现的。详见 *Пыжиков А.* Истоки 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а；*Пыжиков А.*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8～9。

③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ⅩⅩ съезде，с. 114～118；Пыжиков А. ⅩⅩ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8，с. 78～81。第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托洛茨基的亲属致信苏共二十大主席团，请求为托洛茨基及其他在 20 年代受到镇压的反对派成员恢复名誉。参见 РГАНИ，ф. 1，оп. 2，д. 14，л. 48、68，*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609、610。

④ *Пыжиков 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с. 6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559～573；*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ⅩⅩ съезде，с. 119。

⑤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ⅩⅩ съезде，с. 119；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 101；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第 41 页。

的最大一次自发性示威游行中，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人被判处1年至10年的徒刑。[①]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反应同样十分强烈。在刚刚被纳入阵营的南斯拉夫可以听到一派赞扬声，而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却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东欧各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迫不及待地公开发表文章赞扬和吹捧苏共的新精神，阿尔巴尼亚表面上赞同二十大，而在私下则表示了不满和否定的倾向，在波兰和匈牙利，改革派受到鼓舞，而保守派垂头丧气，其他几个国家则是一片茫然，不知所措。[②] 至于亚洲国家各党，则采取了比较保守的做法，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都严格限制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③]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当时的心情很具代表性，她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④] 究其原因，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斯大林问题的提出，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对这一点，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

① 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档案资料参见 *Фурсенко 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с. 929～93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257 ～ 265；*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 33。由于事发突然，3月7日到达第比利斯访问的朱德也不得不取消原定计划，提前离开。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8～19页。

② 详细材料参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22、28～29、31～32、611～612、613～621、625、704 ～ 705；*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1995，с. 222～224；*Мусатов В. П.*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с. 4 ～ 6；*Путилин Б. Г.* Будапешт — Москва：год 1956—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с. 242 ～ 248；*Волков В. 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8，с. 28～30、35～40、85～87；*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Н. С. Хрущев，Й. Броз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2，с. 12。

③ 苏驻越大使齐米亚宁与越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阮维清谈话记录，1956年4月27日。АВПРФ，ф. 079，оп. 11，п. 13，д. 5，л. 84 ～ 95。另参见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27、30。

④ *Аксютин Ю.* Новое о ⅩⅩ съезде，с. 114。

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①] 恐怕这才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②]

总之，苏共二十大所面临的局面是，长期以来的残酷镇压手段和疯狂造神运动已经使斯大林成为真理和理想的化身，如果不解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任何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更不用说要改变斯大林体制和模式了。但正是因为个人崇拜的病毒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骨髓和细胞，所以任何细小的手术都必须谨慎从事，否则就会引起整个功能紊乱。这种混乱的局面，加上舆论压力和党内本来就存在的意见分歧，苏共在召开二十大后不久便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方针，放慢甚至停止了解冻的步伐。4 月 5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议，解散了苏联科学院热力工程实验室的党组织，将部分党员开除出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其理由是在党的会议上有人对二十大总结报告进行恶意攻击，声称苏联社会是不民主的社会，而该党组织不仅没有奋起谴责这些言论，甚至还为部分发言者鼓掌。[③] 同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党的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批评各种“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旗号企图怀疑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人。[④] 为政治镇压牺牲者平反的工作也受到极大限制，不仅拒绝重新审理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的政治案件，甚至对许多在 30 年代大清洗中蒙受冤屈的人，虽然给予法律上的平反，却没有恢复他们的党籍，因为他们曾经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⑤] 6 月 30 日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虽然保留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观点，但口气已经缓和了许多，并特意强调“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中作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是从苏维埃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就是严

---

① 《参考资料》，1956 年 4 月 8 日第 1861 号，第 385～390 页。

② 周恩来在 7 月 8 日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曾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认为，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着想，把这个问题放在党内解决更为有利。《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596～597 页。

③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3，л. 20、76～79，*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288～290；*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 31。

④ *Пыжиков А.* Проблема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с. 52。

⑤ *Наумов В. П.* Хрущев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жертв，с. 31。

重的错误”。[①] 接着，很多人因发表了超出二十大规定的讨论范围的言论而被扣上反苏反共的罪名关进监狱。[②] 笔者对 50 年代由苏联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反苏鼓动和宣传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和对比的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1953 年是最高峰，为 1229 件，1954 年就猛降到 151 件，1955 年为 71 件，1956 年反而有所上升(93 件)，到 1957 年又猛增到 1056 件。[③] 难怪有人认为，“到 1956 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④]

与苏联相比，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因此，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也就有很大的区别。总体的趋势是，苏共在二十大提出的非斯大林化方针并不坚定，而且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日益趋向保守，直到 1961 年 10 月的苏共二十二大才真正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共立场的变化历程恰好相反，一开始基本上是赞同二十大的路线，波匈事件后有了新的思考，到 1960 年与苏联分歧公开化以后，才提出了一整套与苏共二十大对立的方针政策。无论如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如后来中苏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 30 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⑤] 通过新华社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

---

①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39，л1、30～34，*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352～368，中译文参见《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6 日。

② 详见 *Пыжиков А.* ⅩⅩ Съезд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с. 82。

③ 1958 年以后则迅速下降。参见 *Козлова В. А.*，*Мироненко С. В.*，*Эдельман О. В.* Россия ⅩⅩ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Надзор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по делам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агитаций и пропаганде，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каталог，март 1953～1991.，Москва，1999。

④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54～62 页。

⑤ 《参考资料》，1956 年 2 月 20 日第 29 号，第 177～179、184～188、190～195、195～197、200～202 页。

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上旬。[①]

实际上，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变化的迹象，中共中央早就有所感觉和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②] 苏共也并非有意在斯大林问题上对中国搞“突然袭击”。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如2月6日赫鲁晓夫接见朱德和刘晓时，就大谈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的错误。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会议。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③] 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毛泽东的贺词则提到苏共是“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④] 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⑤] 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

---

① 《参考资料》，1956年2月25日至4月4日各号。

②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84～485页。不仅毛泽东本人提出了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甚至中共中央早于苏联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作用和个人崇拜的问题。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92、407、473、52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③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7页；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载《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第86～87页。师哲也回忆了一些赫鲁晓夫在会前的谈话内容。参见师哲回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95页。另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④ 《人民日报》1956年2月9日。

⑤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30页。

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不过，社论没有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①]

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②] 这显然不对。吴冷西说，26 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 3 月 10 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③] 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 6 月 5 日才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所以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消息。李、吴对研究中苏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据朱德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2 月 26 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④]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 2 月 26 日看到报告文本的。[⑤] 不过，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 月 27 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 30 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 13 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要求是“离开莫斯科之前应该将材料交回”。[⑥] 27 日和 28 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反

---

① 《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9 日。

②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年，第 87 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3～5 页。

④ 赵仲元：《1956 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载《中共党史资料》2004 年第 2 期，第 89 页。回忆中谈到所谓波兰代表团的贝鲁特和匈牙利代表团的拉科西出席了秘密会议，只是传言，没有得到证实。

⑤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с. 11～12.

⑥ РГАНИ，ф. 1，оп. 2，д. 18，л. 116，*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252～253、42。

复强调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①] 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②] 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③] 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④] 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⑤] 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及时作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内部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⑥] 甚至那些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专家也是一无所获。[⑦]

不仅如此，中共反而在得到报告文本后，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

---

①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30页；赵仲元：《1956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载《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第89页。

② РГАНИ，ф. 1，оп. 2，д. 18，л. 188、190～210，*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43～44。

③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5页。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6年3月31日。ЦХСД，ф. 5，оп. 30，д. 163，л. 88～89，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 101～111。刘晓的回忆也说，苏共中央把秘密报告复本分送给各兄弟党，也送了一份给中共代表团，还特地给他送了一份，封面印上了刘晓的名字。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④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31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2页。有人以为是米高扬正式将秘密报告带给中共中央的(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2页)，实在是不了解情况。

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38，л. 107～124，*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с. 613～621。

⑦ 《参考资料》，1956年3月20日第58号，第320～322页。

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致抢购一空。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露出去”[①]。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种心态：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党内讨论，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公开表态，以及俄国的档案文献——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数次谈话。

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②]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破题”定了调子，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

---

①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年，第4～5页；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据韦君宜回忆，她本人就听过两次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达。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5～26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51页。

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邓小平主要谈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并强调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还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4月4日毛泽东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①。

所谓公开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② 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而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联党来完成。③ 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④ 看来，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毛泽东的修改部分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9～67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20页。

④ 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便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立即在党团员中和党外人士中，广泛地进行切实的学习和讨论，并且随时将学习的情形和讨论中的问题报告中央宣传部”。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0，第43～46张。

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错误在所难免。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是说,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认识问题。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是需要分析和鉴别的。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这里显然是有误会的。苏共中央在 6 月 30 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 20 万册。①

如果说在报纸上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则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 3 月 31 日与尤金进行的三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就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言,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26 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后来,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话,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搞投降主义活动。

① 《人民日报》1956 年 7 月 6 日。

共产国际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长的工作时期才转变了看法，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季米特洛夫的功劳。毛泽东特别讲到，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坚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斯大林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秘密电报，坚决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怀疑中国的革命力量，坚决主张同蒋介石讲和。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以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接着，毛泽东又大谈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大国主义错误。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任何否定意见，反而对其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 7 个问题。看过以上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①

4 月 6 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苏联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 55 项重点工程的协定。会见中，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毛泽东感谢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② 在 5 月 2 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和完全赞同苏联对英

① ЦХСД，ф. 5，оп. 30，д. 163，л. 88～89；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 101～111。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31 页；《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563 页。

国采取的缓和立场，而“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①。

在苏联人看来，直到是年 9 月召开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②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到：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作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③。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④

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

①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10，д. 9，л. 124～130。

②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 38～39。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204、138 页。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92 页。

"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终于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①] 按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②]。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③]的确,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数落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满腹怨言。[④] 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⑤] 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⑥] 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倾向无疑是为中共打开了

---

① 米高扬与毛泽东谈话后就有这种感觉。参见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46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09~612页。

③ 尤金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1957年10月29日。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589, л. 173~179。

④ 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56页;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5~26页。

⑤ 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如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的讲话。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371页。

⑥ 在一次讨论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无兴奋地说:"这个报告(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者)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25~26页。

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宝座的大门，毛泽东没有理由不暗自高兴。[1]

其次，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上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所谓“原则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后来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2]。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但是，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3]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4]。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5]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什么是个人崇拜？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6]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7] 在 4 月 5 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黑龙江省机关干部中还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

---

[1] 斯大林逝世的讣告广播后不久，苏共中央工作人员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曾听一位在中国党内地位很高的干部说：“鉴于斯大林的逝世，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毛泽东了。”*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с. 38。

[2] 毛泽东 1958 年 3 月 10 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吉林省档案馆，1/1～14/68，第 6～16 张。

[3] 《参考资料》，1956 年 3 月 7 日第 45 号，第 55～56 页。

[4] 《参考资料》，1956 年 2 月 28 日第 37 号，第 293～295 页。

[5] 《参考资料》，1956 年 3 月 13 日第 51 号，第 150～151 页。

[6] 《参考资料》，1956 年 3 月 20 日第 58 号，第 369～370 页。

[7] 《参考资料》，1956 年 3 月 23 日第 61 号，第 557～558 页。

导下、毛主席万岁等等,是否算个人崇拜?[①] 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②] 于是,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③] 显然,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崇拜。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同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④] 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才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问题,批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⑤] 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否共产党内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

① 《参考资料》,1956年4月10日第80号,第221~222页。

② 或许正是担心这种情绪汇入整个共产党世界的迷惘和混乱当中,中共中央在4月12日专门发出通知,禁止主动与外国人谈斯大林问题,即使被问到,也"应避免深谈多谈","支吾过去"。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101。

③ 1956年10月31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夫的谈话,转引自李捷:《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④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 с. 38;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409, л. 108; оп. 49, д. 128, л. 36, *Аймермахер*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27~28。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毛泽东后来又说,"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叫"缺乏革命道德"。

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1]这或许也是引起毛泽东担忧的一个问题。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无的放矢,因为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3月28日的《真理报》文章,以及6月30日苏共中央的决议,都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意思。

最后,既然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那么就可以断定,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实际情况是,从此后发生的波匈事件、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乃至1958年上半年的种种合作情况看,中苏关系仍然处于"蜜月"时期。[2] 当然,中苏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如果谈到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应该强调的是,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紧随苏联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中共固然不如苏共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但就领袖魅力而言,赫鲁晓夫则完全不能同毛泽东相比。至少在中共眼中,斯大林倒下了,站起来的应该是毛泽东!从历史过程来看,导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大概埋藏在这里。

原载《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① 《参考资料》,1956年3月9日第47号,第81~83页。

② 参见本书《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一文,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31~264页。有关中苏在波匈事件中合作的情况,参见笔者提交2004年6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波匈事件与中国——中国在处理1956年危机中的角色和影响》(该文已发表在《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0. 中国在1956年10月危机处理中的角色和影响①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中共在1957年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决定性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②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

① 本文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4年6月)、"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海，2004年8月)宣读，茅海建、陈兼、章百家、牛军等同行对文章提出了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② 目前历史学家查阅有关1956年危机的档案文献，除了去俄国、匈牙利、波兰的档案馆外，还可以去布拉格的中央国家档案馆(SUA)和军事历史档案馆(VHA)，以及柏林的前东德共产党档案馆(SAPMDB)。此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收藏了各种文字的有关这两次危机的档案文献。

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①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 1992 年 11 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 1956 年 4 月到 1957 年 7 月的有关文献 115 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 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② 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 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③ 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④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⑤ 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

---

① 参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4、5、6；Csaba Békés，New Findings on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Issue 2，1992；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Khrushchev's CPSU CC Presidi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24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Leszek Gluchowski，Khrushchev，Gomulka，and the "Polish October"，*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Mark Kramer，The "Malin Notes" on the Crisis in Hungary and Poland，1956，*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A. Werblan and J. Stepien，Rozmowy kierownictwa PZPR z delegacja KPZR. Nieznane dokumenty z pazdziernika 1956r.，*Dzis*，nr. 4/1995；A. Werblan，Rozmowy Wladyslawa Gomulki z Zhou Enlaiem w 1957r.，*Dzieje Najnowsze*，Rocznik ⅩⅩⅨ，nr. 4/1997。感谢波兰华沙大学扬·罗文斯基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波兰档案公布的情况。

② 参见 Janos Rainer，The Yeltsin Dossier：Soviet Documents on Hungary，*CWIHP Bulletin*，Issue 5，1995，pp. 22～24。

③ 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and Christian Ostermann(eds.)，*The Hidden History of Hungary 1956：A Compendium of Declassified Documents*，Washington：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1996.

④ 参见 *Волков В.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Csaba Békés，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s*，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实际上，在研究中可以利用的还有东德、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档案文献。

⑤ 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以下一些：波兰学者 Tony Kemp-Welch 的论文讲述了波兰危机的起因[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and Polish Politics：The Spring of 1956，in *Europe-Asia Studies*，Vol. 48，№2，1996]，而 Leszek Gluchowski 的文章则详细讨论了波兰危机的过程，特别是波兰内卫部队的作用[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in *CWIHP*

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①]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②]究其原因，一则是中

(接上页注文)

Working Paper №17,1997]，俄国学者 *Мусатов В. П.* 和 *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的两篇论文研究的是匈牙利事件以及苏联在其中的作用[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3，№1；*Хрущев Н. С.*，Броз Й. Тито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2]，美国学者 Mark Kramer 的论文专门讨论了苏联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决策过程[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and the 1956 Polish and Hungarian Crisis，in *CWIHP Bulletin*，Issues 8～9，1996/1997]，匈牙利学者的论述集中反映在两本论文集中[Terry Cox ed.，*Hungary 1956——Forty Years On*，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1997；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而 Csaba Békés 的文章[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in *CWIHP Working Paper*，№16，1996]和 Johanna Granville 的专著[*The First Domino：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College Station，2004]则重点研究了西方大国对事件的政策及其影响。此外，Granville 在另一篇文章[1956 Reconsidered：Why Hungary and Not Poland? in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 80，№4，October 2002]中，还对这两次事件进行了比较研究。

① 例如 Granville 在其 300 多页的专著中，提到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地方仅有几处。就笔者所见，研究中国与波匈事件关系的，只有美籍华人学者陈兼(Chen Jian)在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1997 年)上提交的一篇论文(Beijing and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后来被修改并扩展为他的一部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专著[*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中的一章。

②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除一些通史类著作对此略有涉及外，主要是一些回忆录，如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担任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李海文整理载《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的文章(《1956 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载《国际问题研究》1981 年第 1 期)和当时驻波兰使馆工作人员骆亦粟的文章(《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吴冷西的回忆录(《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比较集中地谈到了中国对事件的反应和作用。至于研究著作，涉及波兰问题的有一些论著，如王逸舟的《波兰危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刘祖熙、刘邦义的《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等，其中论述十月事件的内容均比较简略，且使用的资料已显陈旧。利用最新解密档案研究匈牙利事件的惟一学术成果，应属胡舶刚刚出版的

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①]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②]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先讨论前者，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和内部的新闻报道。[③]

（接上页注文）

博士论文《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辟专章讲述了中国与匈牙利事件的关系，其结论是“中国的影响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第250页）。在笔者看来，这个结论似乎过于简单。

①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现在已经对外开放，而且解密的文献年限在一二年后即可到1960年，学者期待的是那时可以看到有关波匈事件的中方档案。

② 过去中国官方对匈牙利危机的定性是“反革命事件”，公开出版的史料也仅限于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当时公布的文献，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新闻局编的《匈牙利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和《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等。其实，早在1980年代末匈牙利政府就已经为1956年的事件平反了（详见 Terry Cox, 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in *Hungary 1956*, pp. 1～13），外人又何必为此战战兢兢？至于这次事件能否算作“起义”或“革命”，那只是一个还可以再讨论的学术问题。

③ 应该承认，除中国档案外，已经发表的各国文献和口述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其中充满了矛盾和疑点，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解读，小心考证。限于篇幅，本文只以经过笔者梳理和对比后确认的材料构成叙述主线，至于许多史料和论著中的偏差和舛误就不再一一指出了。

(一)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在东欧地区同时爆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作出基本判断。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了冷冻状态。[①]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随着舆论开放和政治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苏共二十大后,波兰舆论提出了追查枪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②] 另一方面,改革派在波兰党内逐渐得势,一致呼吁过去受到批判的哥穆尔卡出山。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

---

① 有关档案文献参见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МурашкоГ. 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 2,1949~1953,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相关的中译文史料,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17、19、22、23、24、2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② АВПРФ,ф. 0122,оп. 40,1956г,п. 336,д. 10,л. 31~32;*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1995,с. 222~224。

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①] 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尽管保守派领导人拉科西在 1953 年 6 月受到严厉谴责,但继续担任党的第一书记,而改革派代表纳吉·伊姆雷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后所推行的改革进展缓慢。由于苏联党内斗争的结果,1955 年 4 月纳吉又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指拉科西本人。特别是在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7 月,莫斯科迫不得已决定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对此非常不满,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②]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③] 此时,不仅东欧各国仰望着北京,莫斯科也开始指望得到中共的帮助。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58 年上半年。[④] 尽管赫鲁晓夫的有些做法令毛泽东担忧,

---

① 有关情况中国有详细报道,《参考资料》,1956 年 6 月 1 日第 1895 号,第 585～597 页。

② 详见 *Мусатов В. П.*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г., №1, с. 4～6; *Путилин Б. 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год 1956 — 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 242～248;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28～30、35～40、85～87; *Гибианский* Н. С. Хруще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2, с. 12。

③ 《参考资料》,1956 年 3 月 5 日第 1817 号,第 17～19 页。

④ 参见笔者在《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头上的“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总体说来，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是一致的。[①] 莫斯科越来越重视中国党的意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拥护，苏共中央还把全文重新翻译后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供全党学习。[②] 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③] 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因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⑤]。

（二）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⑥]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⑦] 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

---

①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载《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发王甫对苏联若干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吉林省档案馆，1～12/1～1956，第101张；《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③ 荣植《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新年宴会》，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9～20页。

④ ЦХСД，ф. 5，оп. 49，д. 41，р. 8862，л. 16～17。

⑤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99～600页。

⑥ 《参考资料》，1957年10月18日第2236号，第3～13页。

⑦ 《参考资料》，1956年10月27日第2036号，第1283～1284页。

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①]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里涉及三个问题。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9日至20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作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20日至23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日至31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②] 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③] 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在15日至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④]

---

① Andrzej Werblan, 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Dzis*, nr. 10/1996, c. 123～124。该文系笔者请陈世泽译自波兰《今日》杂志，谨在此表示感谢。

② *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 225～226；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于欣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24页。

④ 罗科索夫斯基1896年出生在华沙，后加入苏联国籍。卫国战争中成为苏联的著名将领，因解放波兰有功获波兰元帅衔。1949年11月被斯大林派往波兰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回到波兰后仍然保留着苏联国籍，后来又兼任华沙条约部队副总司令。因此在波兰人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对波兰实行统治的象征。详见 Gluchowski, 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pp. 63～70；*Носкова* *А. 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1, с. 109～110。

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将军①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②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两个决定：(1)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俄国档案显示，通告的全部内容是："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而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③ 俄国国防

① 科马尔是哥穆尔卡的亲密战友，1952年被捕，1956年4月恢复政治名誉，8月出任内卫部队总司令。

② 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2～143页；*Орехов*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с. 227; Gluchowski, Khrushchev, pp. 38～39。

③ *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с. 228～229; Johanna Granville, From the Archives of Warsaw and Budapest: A Comparison of the Events of 1956,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16, №2, Spring 2002, pp. 548～549;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áth, Additional Data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Millitary Occupation, in *Soviet Military*, p. 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七空降师一〇八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①]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一大批高级军官。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10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大会仅进行了半个小时。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做其他人事变动。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哥穆尔卡等人拒绝。

(接上页注文)

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27、55～82页。只有吴冷西的回忆说,苏联调动军队的命令是17日下达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4～40页),这显然是记忆错误。

① A. Kirov,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in *Soviet Military*, p. 132。Kirov引用这条史料是要说明匈牙利的紧张局势,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要对付波兰的,因为当时匈牙利的局势尚不足以让莫斯科作出这样的决定。

此时，波兰内务部开始不断得到苏军从西面和北面向华沙前进的消息，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不过，波兰人一时无法判断苏联的举动是已经决心进行武装干涉，还是想以此施加压力，迫使波兰让步。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任何莽撞的决定都只会引起更加复杂和危险的结果。哥穆尔卡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向苏方提出了抗议。赫鲁晓夫谎称是以前布置的军事演习，并答应立即停止。会谈继续进行，除了波兰领导层的人事问题，又在波苏关系中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下午 6 时，奥哈布返回全会，向中央委员们做了简要汇报，并建议因需要连夜与苏联人进行会谈，全会推迟到第二天上午再开。晚饭后双边会谈继续进行。这时，并未停止前进的苏联部队还在缓缓向华沙迫近，而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的指示也在向华沙移动。此前，罗科索夫斯基曾向赫鲁晓夫表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随时听候莫斯科的吩咐。与此同时，得到苏军行动消息的华沙工人、学生纷纷涌向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强烈谴责苏联干涉波兰内政，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改革派，要求贯彻民主化。① 苏联使馆及时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断言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游行具有危险性和反苏性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谈的会场。晚 9 时，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随后，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等待苏联人尽快作出决定。其实，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特别是在 18 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并做了军事准备。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成立了两个司令部——军事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波兰的海军和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一

---

① 王炳南：《1956 年波兰“十月事件”的回忆》，载《国际问题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38 页，《参考资料》，1956 年 10 月 22 日第 2029 号，第 1075～1076 页。

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起纠察队和自卫队，并得到了武器装备。[①] 此时，必须作出选择的赫鲁晓夫得到了两个情报，第一，通往华沙的道路已经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除非进行战斗，否则苏军无法前进；第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于是，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待命，一方面决定接受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恢复会谈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同时，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双方商定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会谈到20日清晨结束，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②]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显然，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证明，苏联仓促作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③] 此

---

① ЦХСД，ф. 5，оп. 49，д. 5，л. 102～103，*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с. 232～233。

② 以上关于苏波会谈情况的描述，除特别注明外，均根据波兰的档案文献（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40、55～63页），赫鲁晓夫的回忆与此基本吻合（参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23～326页）。还可参见：Gluchowski，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p. 4～51；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p. 549；*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с. 230～232。

③ 《参考资料》，1956年10月18日第2236号，第3～13页；1956年10月20日第2031号，第1135～1136页。

外还可以断定,中国的因素在这里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甚至中共也还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①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北京似乎还很平静。关于19日苏联是否通知中国准备在波兰使用武力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到毛泽东是否出面阻止苏军调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否对苏联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史料中的不同说法作出判断。

10月19日,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据刘少奇的翻译师哲回忆,尤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尤金通知说,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师哲还特别指出: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此时已出动了军队,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十分紧张。② 师哲是直接当事人,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的档案材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判断,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另一种说法是骆亦粟和吴冷西提供的,据他们回忆,尤金19日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吴冷西说:2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晚7时,毛泽东接见尤金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还回忆说,22日毛泽东听到苏联已经撤军的消息时又说,这主要是在波兰

① 笔者2004年4月17日对骆亦粟进行访谈时得知,23日刘少奇、邓小平到莫斯科后,中国驻波兰使馆参赞余湛来汇报波兰情况(骆随同余到莫斯科汇报),其中说道:19日晚华沙街头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邓小平说,这个提法不好。以笔者的理解,这个标语不过是表明了当时波兰人对中国的期望和信任。

②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1页。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采用了这个说法。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01~602页。

遇到了坚强抵抗，但中国党的表态对此也有一定影响。[①]

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②] 但在笔者看来，此言疑点颇多。首先，说中国收到了苏共中央关于出兵干涉波兰的通知，这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及目前看到的通知内容不符——那里根本没提出兵的事。其次，说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问题，与逻辑不符——尤金不可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将军事调动的机密告诉中国人。最后，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怎么可能劈头盖脸地指责苏联领导人呢?[③] 退一步讲，即使毛泽东在20日晚上(华沙时间20日中午)对尤金表示了中国反对出兵的意见，正如吴冷西自己分析的，这个消息对于20日凌晨苏联作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那时苏联代表团已经返回莫斯科。所以，上述回忆史料如果没有档案文献加以印证，是难以被接受的。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的局势仍然放心不下，接连召开会议讨论。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片段显示，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会议研究了在波兰的军事演习问题(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记录还显示，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为慎重起见，会议最后决定邀请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4～44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0～13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骆还说，毛泽东把中共的答复也告诉了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在访谈时骆告诉笔者，他当时在华沙，对于国内发生的情况他是听说的。

② 甚至一些很有影响的论著也引用了这种说法，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4页;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146～147。

③ 19日晚关于苏联部队进军华沙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所以北京有可能通过新华社记者或外电报道知道这一情况。但这只是传说而已，中共不大可能以此为根据当面指责苏联，且按照吴的说法，毛泽东自称得到的是“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

商议,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去中国通报情况。①

在2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还在犹豫,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他提出:“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同意撤销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时间确定在23日,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信中只提了一句“鉴于波兰的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还说要派一架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② 会议当天,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通了电话,他在谈话中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③ 显然,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④ 后来的情况表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⑤ 会后,毛泽东连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49,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42页。

②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1～3;оп. 14,д. 67,л. 129;оп. 14,д. 67,л. 1、4、5,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3～48页。

③ АВПРФ,ф. 0122,оп. 40,1956г,п. 336,д. 10,л. 108,*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с. 234。

④ 这里尚待解决的只是罗科索夫斯基的去留问题。但Gluchowski认为,直到23日苏联似乎仍然没有放弃武装干涉,理由是据波兰材料,那时苏军还在向华沙前进(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p. 65)。这个说法与俄国档案关于21日至23日情况的记载相矛盾,而“波兰材料”究竟是什么,是否可靠,都需要进一步拿出证据。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4～45页。

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 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① 由此看出，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大约是在 10 月 21 日至 22 日，中共也向波兰方面表明了对波兰国内政策的倾向性态度。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回忆，10 月 1 日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他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少奇接着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政治局通报中国对波兰改革的态度，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最后，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 3000 万美元的无偿贷款。马热茨回国汇报后，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②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10 月 23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10 月 24 日 11

---

① 逄先知：《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602～603 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2 页。这个讲话内容可以证明，吴回忆的毛泽东 20 日与尤金的谈话，在内容上也是值得怀疑的。

② Werblan, 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 c. 128～130。

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①] 然而，未等集体会见，赫鲁晓夫便抢先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于 23 日午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赫鲁晓夫一路陪同刘少奇来到宾馆，并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并表态支持他。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介绍说，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②]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在出席 10 月 24 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同时也指出，“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刘少奇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最后，刘少奇表示，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③] 会议记录非常简单，以致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还无法确定。对此，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忆，可以帮助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作出较好的榜样。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

---

①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5、5об,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9 页。

②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3 页；金冲及：《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804 页；逄先知：《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603 页。

③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5, л. 52,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52～53 页。

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而且帮助很大。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就值得研究一下，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说，有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有错误。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人家没有时间考虑。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不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世界工联。刘少奇还批评说：你们随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兄弟党，如1950年1月《关于日本形势》一文，批评日共。这种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是不适当的。这回《真理报》批评波兰，也在波兰引起很大反感。何必这样呢？这种事情要很慎重，这种方式要改变。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们保证中共会跟苏共站在一起。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陶里亚蒂曾提出一个多中心的议论，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我们不赞成这个多中心。中心只有苏联，十月革命40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帝国主义最怕苏联，不怕中国，不怕波兰。但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赫鲁晓夫当场表示：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否则，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刘少奇笑着说：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需要站在一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其他的争论都

是小问题。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①] 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②]显然，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中央决定，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批评多了，怕他们接受不了。还说：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邓小平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问得很仔细。他指示：“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但对一方讲的话，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讲，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③]这表明，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还是存有戒心的。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度量要大一点儿，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中国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

---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3～14页。另参见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42～43页。

②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1956年11月10日。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5页。

③ 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41～42页。

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后来汇报说,我们在莫斯科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了成功的。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①]

尽管这条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②]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证据如下: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哥穆尔卡请求于11月8日进行会晤,此其一。[③] 据师哲和骆亦粟(二人均在莫斯科)回忆,26日中苏会谈时,赫鲁晓夫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电话的内容,并请求刘少奇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哥穆尔卡的工作,此其二。29日双方会谈时,赫鲁晓夫再次通报了他与哥穆尔卡通话的内容,此其三。[④] 在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确定,将与哥穆尔卡在布列斯特地区举行会晤,讨论匈牙利问题,此其四。[⑤] 实际上,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是11月15日至18日访问苏联的。[⑥] 因此,10月23日至31日哥穆尔卡根本就不在莫斯科,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5~46、56~58页。

② 如《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3期,第162~163页)刊登的一篇文章就采用了这个说法。

③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5、5об. 关于这个问题,诺沃提尼的另一个记录是:"哥穆尔卡同志告诉苏共中央他将接受邀请并在11月11日后抵达"。参见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p. 53。

④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5页;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42~43页。骆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肯定地讲,那时波兰代表团没有来莫斯科,如果有这方面的会谈,一定会要他做翻译。另据波兰报载,哥穆尔卡出席了10月27日开幕的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军官全国会议。

⑤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15~18об,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79~484,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⑥ 会谈情况详见刘祖熙、刘邦义:《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00~102页。

做工作。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 10 月 26 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①] 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②] 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 月 27 日深夜 2 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 24 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③] 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

---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53，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54 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5 页；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第 42～43 页。

② 据骆回忆，这个情况是后来刘少奇自己说的（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11 月 2 日赫鲁晓夫与铁托会谈时，也提到他曾劝说刘少奇去华沙，但中国人一直没有得到签证，毛泽东为此很生气。参见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达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 年，第 179 页。

③ 基里洛克致哥穆尔卡电，1956 年 10 月 27 日，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c. 124～126。

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作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 28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①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其原因显然是对当时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作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 月 29 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建议: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谈话一直进行到夜里两点。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② 在 30 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

---

① Gluchowski, 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 pp. 81～82。

②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5～16 页;骆亦粟:《1956 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 年第 3 期,第 43 页。

和合作的基础》。[①]

至此,在刘少奇看来,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不过,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三)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与波兰事件相比,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10 月 23 日至 24 日),反应非常迅速,决策也非常果断。这里的问题是:第一,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第二,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第三,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加剧烈。[②] 格罗执政后的举动令人颇感失望,他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去访问南斯拉夫,直到 23 日上午才回国,国内问题都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作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以致危机步步逼近。

10 月 6 日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了重新安葬仪式,前往送葬的群众队伍多达 20 万人。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而政府的默许也使民众从心理上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新闻影片中出现纳吉参加送葬的

---

① АПРФ,ф. 3,оп. 64,д. 484,л. 25,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17 页;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6～14,*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57～463。公开发表的宣言文本见 1956 年 10 月 31 日《真理报》和《消息报》,以及 1956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② 有许多历史文献反映了莫斯科在挑选拉科西继承人时的考虑及决策过程,详见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138～139、152～157、172～173、176～182。

特写镜头时，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①] 10月14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决议：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称纳吉仍是犯有错误的，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②] 这时，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中央委员会，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③]

从16日开始，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学生的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激烈，而且得到了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和给予新闻工作者以豁免权。大会特别提出赞成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致电匈党政治局祝贺恢复纳吉的党籍。[④] 10月22日在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学生集会上，成立了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16条要求，其中包括：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通过秘密投票自下而上地选举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基层、中层和中央机构领导人，在纳吉领导下进行政府改组，罢免在斯大林一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审判拉科西，在多党制基础上进行全民选举，制定工人最低生活标准，平等对待单干户农民，释放无辜的被捕者并为他们恢复名誉等。[⑤] 此时，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三股力量已经聚合在一起了。

学生们的纲领没有提出任何进行根本经济变革的要求，但是其

---

① 山多尔·科帕奇：《匈牙利悲剧》，龚新康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194；《参考资料》，1956年11月28日第2063号，第664页；笔者2004年6月8日采访夏道生记录。夏当时任中国驻匈牙利使馆随员。

② 详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7日。

③ АПРФ，ф. 3，оп. 64，д. 484，л. 64～75，*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300～306。

④ 《参考资料》，1956年11月28日第2063号，第673页，*Путилин Е. Т.*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с. 257。

⑤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316～318；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in *Soviet Military*，pp. 134～135。

主要的政治要求在激进程度上却超过了以往几个月以“裴多菲俱乐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党内改革派提出的口号。[①] 为了表达和宣传自己的纲领，学生们提出在第二天下午2时30分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支持。刚刚回国的格罗等人担心局势失控，于10月23日12时53分由内务部通过广播电台宣布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命令，但是很快就因激起民愤而不得不在集会前几分钟取消了禁令。当天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声援波兰人抵制苏联的文章，以及各种群众倡议和通告，舆论明显地倾向于民众。于是，游行参加者的人数逐渐增加，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下班之后，布达佩斯市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入了游行行列，工人们也从市郊的工业区涌进城里。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喊出的口号也越来越激进，愤怒的人群开始行动起来——象征着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被吊车和钢索拉倒了，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情绪十分激奋。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②] 正当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回答时，格罗在晚8时发表了广播讲话。令群众失望和激愤的是，格罗一口咬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这不啻火上浇油，人们被激怒了，一些青年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的纲领性要求，结果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晚9时以后，冲突过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伤亡(关于谁打第一枪的问题至今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这时，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搞到了武器。午夜时分，匈党中央下令实行戒严，镇压开始了。[③]

---

① 与以往宣传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同，裴多菲俱乐部不是由学生组成的机构，而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松散地组织起来的辩论团体。在23日危机爆发以后，俱乐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了。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专题研究参见 András Hegedüs, The Petöfi Ciercle: The Forum of Reform in 1956, in *Hungary 1956*, pp. 108～133。

② 俄国档案证实，苏联大使馆有两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三秘克留奇科夫)是游行的目击者，他们认为，白天的示威游行组织得很好，并且是可以控制的。参见 *Мусатов В. 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 10。

③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321～323、349～356; *Мусатов В. 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 10; *Пушилин Б. Г.* Будапешт — Москва, с. 258～260; Jenö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in *Soviet Military*, pp. 15～19、26～27; 笔者采访夏道生记录。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1956年7月，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来到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随后，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定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队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随着局势发展，10月6日至19日，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21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安全措施。① 由于10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的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10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了。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于10月22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以亲自掌握局势的变化。② 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也于23日赶到匈牙利。③ 相反，匈牙利军队的举措却显得犹豫不决。国防部长巴塔19日下达了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同时批准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以致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很多军官都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压的命令。④ 显然，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在回忆录中说，10月23日下午5时，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了电话，要求准许命令

---

① Kirov,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oviet Military*, p. 132。

②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300～309、315～316；Y. I. Malashenko, The Special Corps under Fire in Budapest: Memoirs of an Eyewitness, in *Soviet Military*, pp. 221；Jenö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in *Soviet Military*, pp. 7～8。

③ *Путилин*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 258～260。

④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4, п. 6, д. 5, л. 88～96//*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337～343；Jenö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in *Soviet Military*, pp. 25～26。

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得到批准后,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处于待命状态,并向在场的匈牙利军官宣布,部队将于午夜后某一时刻抵达布达佩斯。[①] 另据马拉申科回忆,同样在下午 5 时,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他,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拉先科回答说,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命令——准备战斗。[②] 还有材料说,喀尔巴阡军区的第一二八步兵近卫师于 19 时 45 分,而驻匈特别军于 20 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③] 无论如何,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处理危机的措施作出决定之前,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④]

23 日夜晚,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

据俄国档案记载,在 23 日 22 时至 23 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首先由朱可夫通报了匈牙利的局势,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但米高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而对苏联来说,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就会自找麻烦。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不行再派军队去。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认为,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与波兰的情况不同,所以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主席团其他成员随声附和。会议还决定派米高扬、苏斯洛夫以及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去布达佩斯。赫鲁晓夫最后说,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

---

① Miklós Szücs, *I was Colonel Miklós Szücs in 1956 with the General Staff*, Budapest: Szabad Tér Publishing House, 1989, pp. 60～62, in Jenö and Miklós ed., *Soviet Military*, pp. 12～14。

② Malashenko, The Special Corps, in *Soviet Military*, pp. 222～223。

③ Jenö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in *Soviet Military*, pp. 10～11。

④ 根据布拉格的档案记载,赫鲁晓夫本人在 10 月 24 日向东欧国家领导人介绍说,23 日(傍晚)格罗曾与他通电话,说因匈牙利局势恶化不能去莫斯科参加关于波兰问题的会议,但没有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因此,当过后不久朱可夫报告格罗曾向苏联驻匈使馆武官试探给予援助的可能性时,被拒绝了。参见 Kramer, Hungary and Poland, in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p. 54; *Путилин Б. 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 261。

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①] 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晚10点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绝对需要,而且必须立即干涉"。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在简短交谈中,格罗扼要地介绍说形势很复杂。赫鲁晓夫告诉他,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苏联愿意给予任何的军事援助,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此外还通知说,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②]

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房间里,神经更为紧张,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非常吃惊,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在场的人一致同意。不久,纳吉被请到党中央大厦,并毫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2时22分,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立即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这次紧急召开的只有1/3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24日凌晨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格罗的建议,马上给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并发布戒严令,因为匈牙利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除国家安全部队外,正规军被禁止开枪,除非他们自身遭受攻击,有的士兵甚至投靠到"自由战士"一边。[③] 然而,在接到正式邀请之前,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④]

10月23日23时,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的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

---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4~4об,*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356~359。

②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9,№1,с. 48~49、79~80。

③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陈之骝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86~298页;*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349~352;Granville,From the Archives,pp. 535~538。

④ 据赫格居斯回忆,在讨论邀请苏联军队的问题时,会场很乱,纳吉疲惫地坐在沙发里,没有明确表态。决定通过后,格罗和安德罗波夫认为纳吉已经同意了,并千方百计要他在后来起草的邀请信上签字。但纳吉始终拖延没有签字,直到10月26日,在莫斯科的催逼下,由已经不再担任政府首脑的赫格居斯勉强签了字。参见《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86~298页。

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了战斗警报，这些部队共计5个师31550人，拥有113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门火炮和迫击炮，185门高射炮，380辆装甲运兵车，3930辆汽车。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4个空军师，共计歼击机159架，轰炸机122架。各部队的任务是：特别军主力进入布达佩斯，占领该市重要设施并恢复那里的秩序，同时以部分兵力在奥匈边境担任掩护；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负责占领匈牙利东部各大城市；独立机械化集团军进入匈牙利南部地区。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10月23日夜间已越过苏匈边界，特别军于当地时间24日2时至4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4时15分至6时20分进入匈牙利领土。歼击机部队起飞掩护陆军行动，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①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前后不足1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其原因在于，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不轻易表态”，二则情况不明，也不便发言。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而中国使馆对匈牙利的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作为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但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在危机过程中，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只能通过收听广播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10月24日邮电局停业后，一切国际通讯中断，使馆只能偶尔通过匈外交部向国内发送简短的密码电报。②

---

① АПРФ，ф. 3，оп. 64，д. 484，л. 85～87、88～89，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9～281页；*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368～369。

② János Rádvany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in *The China Quarterly*，№43，Jul. —Sep. 1970，pp. 122～123；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载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5页；笔者对夏道生的采访。

至于中国领导人对危机的态度,直到10月30日之前,在所有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中,都没有丝毫反映,甚至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论著都很少提到这一点。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刘少奇23日晚上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从24日至31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①] 但是,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的档案记载和师哲的回忆录,23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格罗来电话说,因国内离不开,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过了一会儿,朱可夫来电话说,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部队被群众缴了械。因此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又过了约一个小时,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当时赫鲁晓夫表示,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可以考虑。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了,明天主席团开会,请你们参加。说完就走了。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其他问题都已解决了。人民欢迎苏联红军,欢迎苏联的坦克。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②] 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了一下出兵的原因,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作出评论。[③] 俄国

---

① 逄先知:《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04页。

②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2,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5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3~14页。

③ 对来到莫斯科的东德、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赫鲁晓夫甚至连解释也没有,在10月24日晚上,赫鲁晓夫只是向这些东欧国家代表通报了处理波兰和匈牙利问题的经过。关于这次会议,目前没有发现俄国档案,捷克斯洛伐克档案中的记载全文见 *CWIHP Bulletin*, Issue 5, 1995, pp. 53~55。

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根本就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月24日至28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但无论如何到28日晚上,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①] 同一天,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按照后来制定的计划,接替的部队应于10月29日20时至30日6时进入阵地。[②] 此时中国领导人作何感想仍然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在28日和29日两天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了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布达佩斯暂时停火,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正在进行谈判等。[③] 或许正是如此,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完全撤退回国的主张。

没有人会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从天而降。但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四)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作出的话,那么在苏联

---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5,л. 54～61об,*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39～441。据赫格居斯回忆,纳吉于28日11时从苏联使馆回来后,告诉格罗和赫格居斯,苏联人也认为他们应该下台(《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28日17点25分,纳吉代表新政府发表声明,谴责那种将目前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视为反革命运动的观点,政府宣布各地立即停火,号召所有手持武器的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允诺政府将与苏联签订一个苏军在最短期限内撤离布达佩斯的协议。18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政府声明及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参见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41～444。

② Jenö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in *Soviet Military*, pp. 70～71。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8日和29日。

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影响和引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①]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问题的大致脉络是可以说清楚的。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以致美国驻苏大使波伦认为："纳吉于28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无非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②] 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军事行动，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袭击"。[③]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29日到31日，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而中国的主张也是前后不一。只不过无论进退，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了。10月29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8000多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被释放，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到了武器；在一些大城市，居民们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党委已经转入地下，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④] 当日晚又收到

① 苏共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60年9月17日～20日，转引自 *CWIHP Bulletin*, Issue 10, 1998, pp. 172～173；苏共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610, л. 100～120。

② 査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刘裘、金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18页。

③ Malashenko, The Special Corps, in *Soviet Military*, p. 277。

④ АПРФ, ф. 3, оп. 64, д. 484, л. 151～161，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8～311、447～449页。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电报，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①] 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说，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会谈到29日深夜，苏联终于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并决定于第二天讨论通过。[②] 赫鲁晓夫的回忆与中方材料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据赫鲁晓夫回忆，会谈进行了一个通宵，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中苏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一会儿主张出兵，一会儿又决定放弃。正在这时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来了，于是作出决定，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让事态自然发展，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③]

30日，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上午，莫斯科接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报告："党的领导机关感到束手无策，党组织正在解体。流氓分子横行霸道，强占区党委，杀害共产党员。组建党的纠察队的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居民闲坐在家，铁路停止运行，无赖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改变策略，表现十分猖獗。"广播电台已经被占领，"叛乱分子发表声明，只有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才能放下武器"，"匈牙利军队采取观望立场"，"有可能与叛乱分子联合"。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建议，"停止向匈牙利派兵，而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他们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④] 是日14时，匈

---

① АВПРФ, ф. 059а, оп. 4, п. 6, д. 5, л. 13～14,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50～451。

②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5～16页；逄先知：《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04页。

③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 359～360。

④ АПРФ, ф. 3, оп. 64, д. 484, л. 122～124，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2～314页。

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作出决议: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14 时 28 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开始与苏联政府就苏军从匈牙利领土撤出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①] 按照 28 日的计划,苏联军队于 16 时停止战斗,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②]

然而,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显然是受此影响,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根据讨论记录,30 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昨晚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说,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在随后的讨论中,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但还是同意了准备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莫洛托夫建议,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至于华沙条约问题,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关于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莫洛托夫认为,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但谢皮洛夫认为:"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他还提出,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朱可夫赞同撤军,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福尔采娃和萨布罗夫也赞成通过宣言。赫鲁晓夫最后总结

---

①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70～471。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 日。关于苏联从布达佩斯撤军的具体情况见 Jenö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Malashenko, The Special Corps, in *Soviet Military*, pp. 71、244～245。其中说,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苏军撤出布达佩斯是在 17 时。

说，大家意见一致，首先应发表宣言。随后，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①] 傍晚时分，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看，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晚 8 时宣言定稿，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②] 显然，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尽管原先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却导致了 30 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由此可以判断，29 日至 30 日苏联经过一段犹豫，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对此，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③]

直到这时，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此后几小时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双方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6 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30 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回家时，作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经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所以在 31 日晚刘少奇回国前，赫鲁晓夫带领整个主席团赶到机场，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④] 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作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 月 30 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看。由于一直不太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整整讨论了一天。经研究提出了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6～14，*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57～463。

②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6 页。

③ 在中苏两党论战时，中共中央指责"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64 页），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研究者坚持这种说法。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④ Хруще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 359～360；《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年，第 968～971 页。

有结果。因此,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压,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当晚,应中共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在发言时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邓小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入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共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问题,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他说,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我们已经考虑过,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因此一致主张退让。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31 日)晚上,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同苏方再度会谈。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刘少奇表示赞同,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①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 30 日和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可以对上述说法作出是非评判。根据 30 日会议的第四十九号记录,大约在夜晚(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是否可以信任他?"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会议记录表明,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而对赫鲁晓夫随后发言的记录是:

---

① 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载《百年潮》1997 年第 2 期,第 16～17 页;逄先知:《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604～605 页;金冲及:《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805～806 页。吴冷西回忆的过程与此大体相同,但有两点差别。按吴的说法:第一,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向苏联提出的意见不是商量的口气,而是严厉的指责,第二,刘少奇紧急约见赫鲁晓夫不是在 30 日夜晚,而是在 31 日。于是,中共代表团离开的时间也不是 31 日,而是 11 月 1 日(《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51～53 页,《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第 14～15 页)。笔者以为,在这里又是吴的记忆错误。

“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是倾向中国的意见：“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①]这说明30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了新的立场，而苏共还在犹豫。31日的会议记录显示，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撤出，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接着，赫鲁晓夫指出，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由明尼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与铁托会谈，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②] 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以上安排进行的。

显然，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这个过程表明，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月30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更准确地说，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在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实际上，中国官方的观点从10月27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在11月2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从11月3日开始变调，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③] 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

①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6～14，*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57～463。

② ЦХСД，ф. 3，оп. 12，д. 1006，л. 15～18об，*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с. 479～484。

③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

出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求援。实际上,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 11 月 1 日晚上,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①] 至少在 11 月 4 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②]

说到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 30 日电报是一个因素,同时也有史料显示,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和骆亦粟回忆,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这种状况。11 月 1 日晚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郝德青,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纳吉说由于苏联违背华沙条约,他的政府决定退出该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但他恳请郝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匈牙利新政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现在苏联又要插手,派军队开进布达佩斯,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郝德青允诺他将把被告知的一切立即报告北京。但实际上郝在此之前已经建议北京,请求给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由于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在 1959 年 5 月 5 日与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对 1956 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指着坐在陈毅后

---

① **АВПРФ**, ф. 095а, оп. 4, п. 6, д. 5, л. 20～22,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522～523。

② 实际上,从 25 日晚卡达尔取代格罗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直到其突然失踪,包括请求苏联撤军在内的所有匈牙利政府的决定,都是纳吉与卡达尔共同作出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卡达尔到莫斯科后就改变了态度,而纳吉则始终坚持反对苏联出兵的立场。参见 Huszár Tibor, *Kádár János Politikai Eletrajza(1912～1956)*, Budapest: Szabad Tér Kiadó-Kossuth Kiadó, 2003, pp. 301～302。朱丹丹为笔者翻译了这部很有影响的匈牙利著作——《卡达尔的政治生涯》的片段,谨在此表示感谢。

面的郝德青说，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 1956 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他追述道，在那年的 10 月底，中国使馆报告说，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那么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说，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①]

至于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其他外界因素，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例如 10 月 27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作潜在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把杜勒斯的话重述了一遍。10 月 29 日，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10 月 31 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②] 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此外，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了决心——西方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时已经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了。[③] 当然，莫斯科盟友的立场也并非不重要。意

① János Rádvanyi,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Hundreds Flowers Campaign, in *The China Quarterly*, №43, Jul. —Sep., 1970, pp. 123、126；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还有研究者认为，甚至卡达尔的出走都与郝德青有关。众所周知，11 月 1 日夜里明尼赫和卡达尔突然神秘地失踪并转道苏联军营去了莫斯科，这是苏联得以建立匈牙利新政府和取得出兵合法性的前提。胡萨尔·蒂伯尔对比了各种材料，对这个问题的论断是：当夜，卡达尔与郝德青进行了谈话，然后就来到明尼赫在内务部的办公室。在那里，明尼赫接到安德罗波夫的电话，要他们去苏联使馆。两人在使馆门口等待时，来了一辆苏联汽车将他们带到了苏联军营，并很快转送到莫斯科[Huszár Tibor, Kádár János, pp. 329～333]。前匈牙利驻华大使叶桐(Otto Juhasz)2004 年 3 月 26 日与笔者交谈时也肯定地说，为明尼赫开车的司机曾告诉他的朋友，明尼赫是在苏联使馆门口被苏联人劫持走的。看起来，卡达尔和明尼赫失踪之谜现在是可以解开了。至于卡达尔与郝德青谈话，还有其他材料提到[Jenö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in Soviet Military, pp. 79～82]。不过，据夏道生告诉笔者，卡达尔只是参加了纳吉与郝的谈话，但并未开口。后来也从未听说郝与卡达尔有私下接触。

② Jenö and Miklós, Additional Data, in *Soviet Military*, pp. 31～32；时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第 97～111、122 页。

③ 关于这两个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参见：Terry Cox, Reconsidering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in *Hungary 1956*, pp. 1～13；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in *CWIHP Working Paper* №16；*Путилин* Б. Г.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 271～273。

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10月30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①] 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在前一天曾非常尖锐地指出，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②] 还有学者指出，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使克格勃非常担心：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③] 不过，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

11月1日至2日，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④]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⑤]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以后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目前不要与(匈牙利)军队闹翻”，“再等10天到15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会议决定维持31日的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占领。米高扬最后提出，“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⑥] 但是，一切都

---

① АПРФ, ф. 3, оп. 23, д. 200, л. 60～62,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76～477。

② ЦХСД, ф. 3, оп. 64, д. 485, л. 2～3。

③ Kramer, 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 pp. 370～371；胡舶：《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8～120页。

④ 除哥穆尔卡有些勉强外，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支持苏联出兵的决策。详见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in *CWIHP Working Paper* №16；*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510。关于赫鲁晓夫与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会谈的详情参见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172～182页；*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с. 235。

⑤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30,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512～513。

⑥ ЦХСД, ф. 3, оп. 12, д. 1006, л. 19～22, *Волков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 494～497。

晚了。11 月 3 日下午，在布达佩斯的 50 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全部到使馆避难。[①] 当晚 24 时，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 12 个师、总兵力达 10 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莫斯科时间 11 月 4 日晨 6 时，口令“霹雳”下达后，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②]

（五）结论：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而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等，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继承权斗争接连不断，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然而，保守势力的存在，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一

① 笔者 2004 年 4 月 17 日采访中国前驻匈牙利大使（1985～1989 年）朱安康记录，朱于 1954 年至 1957 年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文学院留学。

② 对苏联第二次出兵过程的详细描述参见：Malashenko, The Special Corps, in *Soviet Military*, pp. 244～266。

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但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这也是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之间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他们也无法承担国际共运和党内分裂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对于苏共二十大，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由此出发，在处理波匈危机时，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②] 另一个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实际上，中

① 详见沈志华：《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和思考》，载纪宗安主编：《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顺便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能否真正实现平等原则，是另一个问题。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一书的结论部分。

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①] 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出兵匈牙利？[②] 其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对后者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纳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举措失当，但从来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如果说到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那么可以认为，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作出的，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本文更注意的，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正是因为如此，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声望才会显著提高。1957 年 1 月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穿梭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 1 月 16 日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匈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希望由中国出面提出建议，并促成匈波、匈南双边会谈。[③] 波党中央则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专门考察中国党和群众的关系，学

---

①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刘少奇在与尤金大使会谈时说：当时的情况是严重的，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波兰同志不能应付这种情况的话，复辟是不可避免的。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0, д. 5, п. 423, л. 48,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 178。

② 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Inc., 1963, p. 54。

③ Csaba Békés, Malcolm Byrne, and Janos Rainer e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pp. 498～499。

习中共的“群众路线”，甚至波兰军队在其建设中也开始采用中国军队的经验。[①]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在处理1956年秋天的危机中，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②] 开始介入东欧事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K4)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

① 笔者采访骆亦粟记录；谢皮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7年1月4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1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2810～2813页。

②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p. 53;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161～162。

11. 援助与限制:1950 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

有关核问题的历史——包括各大国核技术的发展、核政策和核战略的演变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控制和禁止核试验谈判等,无疑是冷战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一个侧面:1950 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①]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苏联的核政策、中国的核发展以及中苏关系三个角度来考察现有的研究成果。在近年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②]不过,其中很少谈到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或政策。[③] 1980 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历史的论著和回忆录已经发表了不少,但主要篇幅都是讲中国如何在苏联背信弃义后自力更生试制

---

① 在严格的意义上,核武器仅指核弹头,从广义讲,这个概念包括了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导弹(亦称火箭、飞弹),当时在中国也称为尖端武器或国防新技术。

②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 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 Issue 4, Fall 1994, pp. 14~18; 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rk Kramer, Documenting the Early Soviet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 266~271; John Gaddis et al. ed., *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笔者所见,只有一篇论文专门讨论苏联核政策中的对华援助问题[Viktor M.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 in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12, №4, December 1999, pp. 1~53],其中使用了一些最新的俄国档案资料及口述史料。

了原子弹,而较少论及在此之前苏联是如何帮助中国的。[①] 在中苏关系研究中,专门讨论核武器问题的论著也不多见。[②] 这样,就为本文留下了一些研究空间。

本文使用的材料,除了中国的公开出版物外,还有一些俄国的档案文件和当事人口述史料,而这些是很多中国研究者没有看到或没有引用的重要资料。在研读这些史料的基础上,笔者拟考察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方针及其形成的基础、变化的原因,以求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增加一点新内容。

(一)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斯大林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当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③] 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8月29日,[④]而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有学者怀疑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

---

① 最重要的有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三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李觉等主编:《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研究中国核问题的英文论著不计其数,在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和薛理泰的专著[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其中一节简要论述了中苏核关系。

② 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可参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76~85页、第5期,第62~72页。该文第一次将中国发展核武器与苏联的关系做了比较完整的描述和客观的分析,其缺陷是只依据中方的史料,故对有些并非不重要的问题语焉不详。

③ 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1;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0页。

④ 关于苏联第一次核爆试验的情形参见 *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6, с. 224~225;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pp. 213~219。

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①] 斯大林这样做,可能是在应付中国人——他不知道即将开始的试验是否能够成功,也可能是对毛泽东的动机有所怀疑——中国人是否也想拥有原子弹。

确实,中共很早就想拥有核武器。尽管毛泽东一再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②],但中共对这种新式武器并非不重视。有资料说,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就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③] 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钱三强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此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20万美元。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还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进一步表明支持的态度,还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④]

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无论如何,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已经可以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了。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信心十足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

①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 71。后来俄国的核武器专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参见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p. 3。

② 毛泽东在1946年8月发表的这一著名论断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135~1136页。但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表示了这种看法。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中共《解放日报》在同日刊登这条消息时,称其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毛泽东对如此宣传美国的原子弹感到不悦,便召集胡乔木等宣传干部谈话,教育他们"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6~617页。

③ 林中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刘戟锋等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78页。

④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8页。

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1]。在苏联刚刚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无疑在向西方暗示：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核保护。如果进一步分析，斯大林或许也想以此向中国人暗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理解斯大林的用意，不得而知。不过，中国领导人由此对原子弹有了感性认识，却是实情。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曾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儿嘛。"[2]

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3]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在1952年底，即以中国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4]。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的管理事务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可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果然，中国代表团在参观中"只接触到了几名丝毫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5]。而当钱

---

① 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16～19。双方最后签字的文本用语与此相同，参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518～519页。有国外学者认为，这一保证的条款，即"尽其全力"，是周恩来提出的，并且是在经过激烈争吵后，苏方才被迫同意的[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p. 5]。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苏联外交部的这个草案是1月6日完成的，而那时周恩来还未启程来莫斯科。

② 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温卫东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5～186页。

③ 俄国军方档案中记载，在朝鲜战争最危急的时候，即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以后，苏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四个可供选择的预案之一就是动用核武器对抗美军。参见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pp. 7～8。

④ ЦХСД，Ф. 5，оп. 30，д. 7，л. 18～20，*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 215～216。

⑤ 维克托·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载[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笔者是在国际互联网中文网站(http://www.scol.com.cn)上看到此文的，目前尚未找到原文。

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①] 虽然双方对此可能有所接触，但至少在当时尚未看到任何结果。没有技术来源，再加上战争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②]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并一再讨好毛泽东。[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次考虑到研制核武器的问题。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趁此机会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准备，稍做迟疑后他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赫鲁晓夫最后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和培训技术力量。[④]

赫鲁晓夫的这个最初反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而不是核技术，乃是苏联的既定国策。苏联人强调的“核试

---

①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第 29 页。

② 笔者 2001 年 6 月至 8 月采访王亚志的记录。王亚志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彭德怀的参谋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③ 有关此期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辑的《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二辑（2001 年 7 月）刊登了数篇俄国学者的论文，极有参考价值。至于赫鲁晓夫极力向中国表示友好的举动，笔者在《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9 期）一文中有详细介绍。

④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572～573 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78 页。还需考察的细节是，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关于这次会谈的另一种依据——苏联军方人士回忆录的说法是，在赫鲁晓夫拒绝中国的要求后，毛泽东坚持中国哪怕拥有一两枚原子弹也好，并以美国可能会在当时的台海危机中使用原子弹为理由[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pp. 20～21]。笔者以为，这个说法不大可信。

验耗资巨大,以中国的国力难以承受",确属实情。[①] 不过,莫斯科的主要忧虑并不在此。同斯大林一样,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也心存疑虑。[②] 此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即当时美苏正在谈判防止核扩散问题。实际上,早在苏联成功地进行核试验之前很久,美国就试图禁止核试验,从而垄断核武器。1946 年 6 月 14 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伯纳德·巴鲁克提出了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③],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计划。[④] 从此,美苏之间就开始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当苏联拥有核武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意识到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之后,莫斯科对防止核扩散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1954 年 4 月 1 日,苏联有关部门向赫鲁晓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等人关于热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看法:战后短短的几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核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从而使核军备竞赛达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科学家们在一系列文章中生动而有力地论述说,建立在利用热核反应基础上的核弹,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一枚炸弹中所包含的爆破能量。而对这种武器的防御从根本上

---

① 据俄国的解密档案,在国家银行特别账户的秘密用途贷款中,按当时价格统计,1947～1949 年苏联研制核武器的开支为 145 亿卢布,而在 1951～1955 年期间,仅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科研和试验设计单位的计划开支就有 648 亿卢布[*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с. 242～244]。而中国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仅 62.99 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89 年,第 107 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投资实际完成额也只有 250.26 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 年,第 2 页],按 1961 年的汇率计算,分别约合 22.5 亿和 56.4 亿卢布,远远低于苏联研制核武器的经费。

② 赫鲁晓夫曾回忆说,他在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时就产生了不信任感。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665～666 页。

③ 关于巴鲁克计划可参见 Larry Gerber, The Baruch Pl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1982, Vol. 6, №1, pp. 69～95。

④ *Батюк В.* План Баруха и СССР//*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с. 85～98。

讲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将导致交战双方的毁灭。核爆炸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过不了多少年，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为不可能。人类正面临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胁。[①] 这对赫鲁晓夫无疑是一个震动。9 月 22 日，即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政府向美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愿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上继续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②] 苏联人刚刚做此承诺后，中国就提出要自己制造原子弹，并要苏联提供帮助，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不过，赫鲁晓夫毕竟有求于毛泽东，因此他比斯大林进了一步，答应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帮助中国，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无疑将为核武器研制奠定技术基础。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原子弹是爆炸的反应堆，而反应堆则是不爆炸的原子弹，所不同的是，反应堆是控制能量缓慢地释放，用来产生动力，而原子弹则是在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形成爆炸。至少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10 月 23 日，毛泽东便与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兴致勃勃地谈起原子弹，并有意透露中国“正在开始研究”那个东西。[③]

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恰在此前，中国地质队又在广西找到了铀矿，引起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④]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

① 马里舍夫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1954 年 4 月 1 日。TsKhSD, f. 5, op. 3, d. 126, ll. 39～41, in Smirnov and Zubok, 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pp. 14～15。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卡皮察的文章及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65～488 页。]

② 苏联驻美大使扎鲁宾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谈话备忘录，1954 年 11 月 3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0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 年，第 2274～2277 页。苏联驻美临时代办多勃雷宁与英国大使馆参赞比利的谈话备忘录，1954 年 11 月 5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0 卷，第 2278～228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67 页。

④ Lewis and Xue, *China Builds the Bomb*, pp. 75～76；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第 29 页。

究所的前身)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①] 随后,毛泽东便发表了《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讲话,虽然讲的还是用中国的小米加步枪对付美国的飞机加原子弹,但已经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就将在地球上被消灭。是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也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美国的核恐怖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②] 国防部长彭德怀则在2月18日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问题。[③] 最后,毛泽东在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④]。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为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⑤] 作为合作条件,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个协定,中苏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对有

---

①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4页;Lewis and Xue,*China Builds the Bomb*,pp. 38~39。

②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著:《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5~35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45页。

③ 参见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62页。

④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13~14页。

⑤ 苏联的声明参见《新华月报》1955年2月28日,第53页。中国对此的热烈反应参见《人民日报》1955年1月28日、2月1日。

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1] 4 月 27 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苏联将在 1955 年至 1956 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 6500 千瓦～10000 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使粒子获得 12.5～25MeV（百万电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还要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能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的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2]

8 月 22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3] 是年 10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 601 厂，1959 年改称 401 所），并将苏联援建的一堆仪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4] 同年 12 月，以诺维

---

①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441 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0 页。关于铀矿勘探详见 Lewis and Xue, *China Builds the Bomb*, pp. 73～87。由于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对铀矿石的需求不断增大，1956 年 12 月 19 日中苏重新签订协定，铀矿勘探由中国自主经营，苏联提供援助。

② 参见 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Harlow: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p. 4; Sergei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Odd Arne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7;《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5 日；《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0 页。

③ 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宜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提案，1955 年 8 月 19 日。ЦХСД, ф. 4, оп. 9, д. 1347, р. 571, л. 121～123；苏共中央主席团第 142 号会议记录摘录，1955 年 8 月 22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0 卷，第 2552～2553 页。

④ 吴玉崑、冯百川编：《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1987 年印刷（未出版），第 15～17 页。

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在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①

苏联的帮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原子能研究工作。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已经决定对于原子能的研究和建设事业,采取最积极的方针,并且在苏联的帮助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接近和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必须迅速地全面地开展对于铀及各种特殊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冶炼工作,进行各种化工材料的生产、各种特殊机械及仪表的制造,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设计和建造,以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干部培养等一系列新的工作。"通知认为,"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是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②。在同年5月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所确定的57个重点学科中,原子能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③

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4月7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④ 同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

①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29~530页。

② 《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20~21页。

③ 杨明伟:《创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30~31页。

④ 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

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① 在这一基础上，11 月 16 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 2 月 11 日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② 1957 年 3 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 1962 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③ 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派遣了称职的专家。是年 5 月，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科学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是库尔恰托夫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据他的中国同事反映，此人确实有很深厚的功底。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并编制教学大纲，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沃尔比约夫与钱三强所长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同周恩来总理也有过亲密接触。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沃尔比约夫刚来时，在研究所里只有 60 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而到 1959 年 11 月他离开这里时，这个集体的人数已经增长到 6000 人。④ 时任该所负责人的孟戈非后来回忆说，不仅在技术问题上，而且在反应堆、核动力的研究体制建设方面，沃尔比约夫对中国都给予了不少帮助。⑤ 苏联能派出如此优秀的科学家，可见是诚心帮助中国的。

总之，由于苏联的帮助，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帷幕下于 1955 年初逐步展开了。

---

①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1 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605 页。

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87 年印刷（未出版），第 29 页。

④ *Негин Е.*, *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 как СССР делился с Китаем своими атомными секретами//Итоги, октября 1996, с. 43～44。根据中国的资料，到 1960 年上半年，原子能所的职工队伍由 1954 年底原物理所的 170 人（科技人员不足 100 人），发展到 4345 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 1884 人。参见《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87 年印刷（未出版），第 28 页。

⑤ 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4～30 页。

(二)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却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具有各种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美国和苏联跨出这一步用了 5 年到 7 年,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当时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同等时间里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能够以震惊西方的速度成功地爆炸原子弹,无论如何是离不开苏联援助的,虽然是不完全的援助。[1] 不过,莫斯科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对中国的援助最初却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核武器尚处于基础理论研究阶段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其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问题了。1956 年 1 月 12 日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已经提高的基础上,加快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并打算研制火箭武器,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彼得鲁舍夫斯基无法表态。1 月 20 日彭德怀主持军委第五十七次例行办公会议,讨论了研究和制造导弹的问题。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提出报告。彭德怀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2]与此同时,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副总参谋长陈赓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导弹专家钱学森也提出了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3] 3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5 月 10 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

---

① 如果把苏联援助的反应堆和加速器于 1958 年夏天建成作为中国拥有核武器研究的基础,那么到 1964 年 10 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 6 年多时间。

② 《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12 页;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③ 《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544 页。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第 29 页。

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周恩来在会议上指示: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① 是年7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了10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走上轨道。②

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更带有纯军事色彩,又与原子弹运载有直接关联,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毫不拖延地停止进行,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定,随后由其他国家加入这个协定;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定。③ 1957年1月14日,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作为防止核扩散手段的片面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副外长佐林在大会上指出,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数量的任何增长都会使局势复杂化。而苏联提案的实际结果是:即使一个现在尚不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已经掌握了这些武器的生产秘密,并已拥有必需的材料,他也不能有效地试验这些武器。④ 这个方案的提出,必然会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

就在核工业援助协定签字的当天,1956年8月17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给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

---

① 《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44~546页。

② 《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48页。后来为了减少层次,提高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经聂荣臻提议,1957年3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五局,所属机构和人员合并到五院。

③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8日。

④ Morton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Cambridge: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7, p. 118。

助,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1] 9月13日苏共中央复电中共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人才的培养,将派专家到中国学校去工作和授课。已经指示苏联有关机构把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及其技术说明送给中国。从1957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小组,可以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以便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2] 这与中国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3]

苏联的如此态度再次影响了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1956年10月12日聂荣臻召集航空委员会的委员和导弹专家开会,共同商议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及解决办法。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苏联帮助也搞,不帮助也要搞。因此,不要等谈判,一方面准备谈判,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我们自己的筹建工作。"[4]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于15日上报给周恩来、彭德怀。报告说:按照苏共中央9月13日复电的精神,"对我国的援助目前仅仅是为我培养干部。这当然也需要,但较我们原提要求相距甚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试制和生产","这就大大地推迟了我国掌握导弹(包括无线电子学等新技术)的时间,对巩固国防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都不利"。因此建议,在继续与苏联谈判的同时,自力更生,积极筹建。[5]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以聂荣臻代拟的电稿复电苏共中央。复电说:为了尽快培养导弹方面的干部,除了按照苏共中央来电

---

① 《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69页。

②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8页。

③ 《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69页;《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800~801页。

④ 《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95页;《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70~571页。

⑤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91~592页;《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71~572页。

的意见，中国将在1957年新学年派去50名留学生外，还打算将一批目前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直接有关的专业去学习。同时，准备在中国几个主要高等学校增设有关导弹技术的专业，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教学工作。复电还要求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① 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由于苏联的消极态度，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国防建设项目。聂荣臻和三机部部长宋任穷于1957年1月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制造原子弹的关键环节——生产浓缩铀－235的扩散工厂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②

对于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拟与苏方进行谈判，以解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究竟对中国的原子弹、导弹和飞机生产给予何种援助的问题，半年后才有了一些结果。莫斯科态度松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处理波匈事件中得到了中共的帮助。③ 1957年3月30日，中苏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特种技术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苏联将派遣5名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教学组织工作，并在有关学校讲授有关（火箭）喷气技术的课程；按照喷气技术课程制定和提交教育计划和大纲；苏联有关高等学校在1957年至1958年教学年度，接收50名中国大学生；提交两枚供教学用的P－1导弹样品及技术说明书。中国政府将偿付苏方给予技术援助的有关费用，并保证承担保密义务。④ 但这仍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且如下所述，该协定执行得也不顺利。

作为执行协定的条件，苏方又提出很多要求。5月11日苏联经

---

①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2～593页。

②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06页；《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2页。

③ 作为当事人，聂荣臻就有此感受，参见《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803页。有关波匈事件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文件，可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572页。

④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5页。

济联络总局驻北京副代表加里宁少将会见聂荣臻时，传达了苏联为了在喷气技术方面帮助中国而需要了解的问题：一、中国在喷气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二、中国已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还可能训练多少干部；三、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四、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所必需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五、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武器时的保密条件和应有的制度。苏联方面也希望知道中国方面授权何人在莫斯科就火箭技术问题进行商谈。6月18日，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再次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正式请求，阿尔希波夫答应请示政府后给予答复。6月29日苏方把皮球踢了回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来电称：苏方回复，中方对阿尔希波夫和加里宁今年5月提出的有关火箭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答复。苏方希望以书面形式尽快地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在苏方得到对问题的书面答复后，再考虑邀请中国专家组来苏具体商谈。[①] 看起来，随着美苏禁止核试验、限制核扩散谈判的深入，苏联政府在原子能和平利用与核武器研制之间所划出的界限，是越来越明确了。

正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同1954年的情况相似，又是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导致赫鲁晓夫放宽了在核援助方面对中国的限制。[②] 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指责和批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进行非法的反党组织活动，并把他们排除出中央领导层。这次斗争是继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苏联党内思想路线分歧的又一次大暴露。[③] 赫鲁晓夫采取非常手段制伏了其对手之后，非常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7月3日，即中央全会结束三天之后，苏联副外长巴托里切夫便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

---

①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8、612～613页。

② 此外，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还有一种推断，认为赫鲁晓夫提供核援助是基于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同盟的考虑。参见作者提交"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2年8月，中国武夷山）的论文。会议论文集即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集已经出版，参见参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③ 有关这次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详见《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永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Наумов В. П.* Борьба Н. 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с. 10～31。

使节，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和苏联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还分别找中国使馆的陈楚和张映吾参赞，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7月5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专程前往中国杭州，向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详尽地介绍了苏共六月中央全会的经过，以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表示希望中共能支持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① 在此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因此，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② 于是，赫鲁晓夫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积极性。

鉴于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尚未定案，需对1956年8月的原子能协定进行修改，7月18日聂荣臻再次写报告给周恩来，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周恩来批示交外交部办理。③ 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0日阿尔希波夫便答复愿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约定时间面谈。22日聂荣臻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在客厅里，两个人都显得很高兴。阿尔希波夫对聂荣臻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并表示将圆满答复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委托聂荣臻负责筹组代表团。④ 8月6日，周恩来致函布尔加宁明确提出："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7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

③ 《聂荣臻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卷，第614页。

④ 《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75页；《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5页。

计划和远景计划,我们考虑在我原子能工业建成后,需要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①

在苏联答复同意后,中国派出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的代表团,还聘请了 21 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共 40 多人,于 9 月 7 日抵莫斯科。谈判从 9 月 9 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等 5 个组同时进行。中方分别以陈赓、宋任穷、钱学森、张连奎、王诤为组长,苏方分别以科涅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斯拉夫斯基(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道玛尔切夫(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别良斯基(航空工业部副部长)、晓金(无线电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为组长。尽管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和热情,苏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 月 14 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开会时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中国得到这些援助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国防物质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②消息传到国内,9 月 29 日上午,周恩来委托彭德怀、李富春召集国防工业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宋任穷和张连奎的汇报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必需的,因此积极表示赞成,并同意照苏联提出的协定签字,签订后再从各方面继续具体商谈。③ 10 月 5 日,周恩来致函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并告聂荣臻:中央同意由聂荣臻代表政府签订苏方所建议的协定。④

10 月 15 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

①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67 页。

② 《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575～579 页;《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19～620 页。

③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22 页。

④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80 页。

定》)。协定共5章22条,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① 鉴于有些工业援助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向中国交付设计和设备的期限等在协定中都未做具体规定,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简称《核协定》),其中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也有了大致的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年和1960年。②《国防新技术协定》和《核协定》是中苏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③ 在此之前,苏联对中国核工业的援助都非常小心地避开军事用途,据中国核工业部部史编研室的工作人员谈,在这次协定以前的文件档案资料中,均未出现过核武器研制的字句。④ 另外,有关核工业方面的苏联专家,以前虽然是由军队系统负责聘请和管理,但其在华活动,除工作时间外,都是由外国专家局统一安排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字以后,所有涉及尖端技术的苏联专家再也没有参加过外专局统一组织的活动。⑤ 由此也可

①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3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东方鹤:《张爱萍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28页;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72～174页;Lewis and Xue, *China Builds the Bomb*, p. 62。在这次谈判中,中方的主要要求中只有一项没有得到满足,即苏联拒绝提供有关核动力潜艇的任何技术资料。《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②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1～22页。

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50～1985)》,1987年印刷(未出版),第29页。

④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⑤ 笔者2002年12月22日采访宣淼记录。宣淼在50年代长期在外国专家局聘请处任职。

以看出,《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确标志着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对华援助的性质已经改变:苏联真正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技术装备援助了。

(三)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

尽管 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关于原子弹的著名讲话曾一度引起世界舆论的非议,也令赫鲁晓夫感到惊异,[①]但是

① 参见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1 辑,第 191 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394~395 页。毛泽东 18 日关于原子战争对人类的毁灭并不可怕的讲话,确有一语惊人之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的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只是后来中苏论战时谈到核武器的政策时,中国政府才在声明中引用了这段话(参见《人民日报》1963 年 9 月 1 日),后来整个讲话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第 630~645 页)。但苏联政府也在论战中拿出了当时苏方的速记记录,根据这个记录,毛泽东的原话是:"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要这么做,而是他们,是他们将战争强加给我们。假如我们打起仗来,那么就会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我个人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遭受这样的灾难,那时人类将会损失一半,也许,一多半。我问过尼赫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个问题上情绪要比我悲观得多。我对他说: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毁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着,而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里人口又将得到增长,甚至增长多半。""中国还没有真正展开建设。假如帝国主义者将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准备停止搞建设;让我们先试验一下武力,然后再回过头来搞建设。"[Правда,21~22 Сентября 1963г.]对比一下中苏双方发表的文件,主要是后半段话有一些区别,而目前尚难以判断哪一个更准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原话。不过笔者可以再提供两个材料,也许有助于了解事情的真相。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毛泽东讲话的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 11 月 14 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夏皮罗的谈话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问:"您是否认为在爆发原子战争和氢战争的情况下这个世界还能有一部分保留下来?"赫鲁晓夫答:"当然。会有非常惨重的损失,人类将会经受很多灾难,但是人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掉,社会将会生存下去,并且得到发展。"(《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20 日)这与毛泽东讲话的前半段主旨是完全一样的。其次是见过该讲话的俄文速记记录的俄国学者库利克的说法,他认为,1963 年 9 月 22 日《真理报》刊登的毛泽东讲话的记录"显然没有经过文字加工,而且俄文的翻译水平也不高"。[见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 217。]这就是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即由于翻译的用语不准确而导致理解的偏差。

在1957年底和整个1958年，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援助还是正常的和顺利的。1958年6月苏联援助的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从而显著改善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技术装备和条件。同时，在建造过程中培养的人才，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提取的数据，不仅为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也将间接地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和发展奠定基础。得到消息后，毛泽东在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充满信心地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①]此外，苏联还根据协定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聂荣臻承认，苏联的帮助，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导弹研制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加快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在此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消化资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②]。于是，1958年8月，二机部党组在呈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方针和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的方针，并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首肯。[③]

在原子弹研制方面，苏联不仅提供设备、图纸和技术资料，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从工厂的选址、设计，到设备安装、调试，特别是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原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回忆说，"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④]就原子弹的制作程序而言，共有6类厂(场)，在苏联专家的

---

①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126，第1～12张。

②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803～804页；《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79页；《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1页。

③ 杨存堂：《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6页。

④ 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第25页。俄国学者提供的数字是，帮助中国进行核武器研制的苏联科学家共640人。参见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俄]《新闻时报》2003年8月6日。

帮助下,这些企业或基地于1957年底以后陆续进入设计(苏联专家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施工和辅助设计)和施工阶段,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铺开。如开采矿石的铀矿场(湖南郴县、大浦和江西上饶),粉碎矿石、"沙里淘金"的水冶厂(湖南衡阳),提取二氧化铀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厂(包头核元件厂等),制造浓缩铀的核扩散厂(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制造原子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0基地),以及核实验场(21基地)等核工业的首批主要工程项目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均于1958年5月以后陆续开工建设。[①] 同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和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国,标志着中国正在"向原子能时代跃进"[②]。聂荣臻在移交典礼仪式上说:"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将促进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原子武器并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垄断得了的。"[③]随后的1959年,是中国核武器大发展的一年,核燃料生产与核爆炸研制两个系统齐头并进,形势喜人。

在导弹研制方面,1957年11月26日苏联代理军事总顾问沙甫琴科少将转达了苏联国防部的通知,将于12月下旬以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为教会中方使用和维护,苏方将派103人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④] 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其器材的3770次国际列车,缓缓驶进满洲里火车站,因中苏铁道轨距不同,必须在满洲里车站完成卸车、装车的交接工作。当时在炮兵教导大队任技术副大队长的黄迪菲回忆说:来自苏联的那趟列车,由十多节车厢组成,头尾两节载有苏军官兵,共102人。其中军官37名,士兵65名。车上载有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一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

---

① 笔者2001年8月10日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曾任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总工程师;《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554页;《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59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2~27页。

② 《人民日报》1958年9月28日。为此,中国拍摄了一部电影,就取名为《向原子能时代跃进》。

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1987年印刷(未出版)第21页。

④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7~628页。

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 45 件。当 12 月 24 日列车顺利到达炮兵教导大队驻地时，彭德怀亲手解开了系在 P—2 型导弹上的红绸带，满含深情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①]几天以后，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②]

1958 年 1 月 11 日，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训练班开学。P—2 型导弹虽说已从苏军的战斗序列中退出现役，但对中国军人来说，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负责炮兵教导大队业务领导的钱学森说：P—2 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参加训练的学员共 533 人，另有见习人员 150 名，分成 23 个专业教学组，采取按职务对口教学的方式，由苏军导弹营官兵直接任教。前三个月完全是接受苏联官兵手把手的教练，以后是自己独立组织培训。到 1959 年 7 月 24 日训练结束，共培养了地对地导弹专业技术骨干 1357 名，为中国导弹部队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教员和管理干部。[③] 在此期间，1958 年 9 月，在空军建制下正式成立了导弹学校，负责培训全军所需地对地、地对空、岸对舰等导弹兵器的工程技术和指挥干部。学校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编制，并聘请古谢夫、尼古拉耶夫等 12 名专家授课。[④]

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协商和谈判，1958 年 10 月 6 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代号为五四三部队。11 月 27 日和 29 日，苏联提供的 4 套萨姆—2 地对空导弹运到北京，其中 2 套装备空军部队，1 套给五院进行仿制，1 套给 20 基地做试验用。前来任教的苏联专家共 95 人同时到达。当时负责组建导弹部队的张伯华回忆说：苏联专家组来后，我们一起研究了教学大纲、计划，按专业进行编班。12 月 21 日，改装训练正式开始。为了保证苏联专家讲课，我向空军机

①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载《党史博览》2002 年第 9 期，第 11～12 页。

② 《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32 页。

③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载《党史博览》2002 年第 9 期，第 11、14 页。

④ 王定烈：《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的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481～485 页。

关要了 53 名俄文翻译,组成翻译小组配合教学。参加这期训练的有一营全体和二营、三营的营连干部,以及机关、院校、基地等 16 个单位共 464 人。理论训练分 17 个专业进行,兵器和操作训练分成四类,其中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包教。1959 年 4 月经过实弹打靶考核,成绩均为优秀。随后,在靶场举行了兵器装备交接仪式。苏联专家及导弹营官兵完成训练任务后便陆续回国了。[①] 1959 年 10 月 7 日,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率部在北京上空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 1 架,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苏联顾问对此也十分高兴。刘亚楼后来总结说:1959 年这一仗,完全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②]

不过还需要提到,从政策上讲,苏联的核援助并非是无保留的。对于这一点,来华苏联专家自己也深有体会: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的尼古拉·帕夫洛夫局长负责派遣核武器设计专家的工作,1958 年这批专家来到中国前,帕夫洛夫告诉他们,"应该到中国同志那里去,并向他们讲述什么是核武器","他们想制造原子弹,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怎样制造原子弹"。但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是有严格规定的,根据上级的要求,每一位苏联专家都必须围绕着苏联 1951 年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讲述自己负责的内容。因为根据美国图纸设计并于 1949 年爆炸的那颗原子弹的技术已经过时了,而"苏联领导人又不允许把比 1951 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尽管如此,作为科学家,这些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还是尽职尽责的。加夫里洛夫讲解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物理图片,以及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现象和释放出的物质状况;涅金讲述了原子弹的制造及其结构原理——从外形直到中子点火装置;马斯洛夫讲授了如何在弹道装

① 张伯华:《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的回忆》,载《空军回忆史料》,第 489~493 页。

② 岳振华:《击落美制 U—2 飞机作战追记》,载《百年潮》2002 年第 6 期,第 17~22 页;笔者 2002 年 3 月 2 日采访恽前程记录。恽前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60 年 11 月 5 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的第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于 1962 年投入生产。1963 年 5 月进行了射程为 800 公里到 1.1 万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就是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年多前,中国已经拥有了运载工具。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两年后,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携带 2 万吨 TNT 当量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年,第 63 页。

置里安放原子弹,以及自动装置和仪器。开始,专家们仅限于在黑板上画出结构示意图,因为他们没有带来文献资料——根据中苏协议,转交文件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当中国的专家们反映对讲课的内容可能记录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错误时,苏联专家便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总之,苏联当事人认为,在莫斯科允许,以及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①

当然,这种界限有时是很难掌握的,一些被派到机密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由于害怕泄露秘密而感到困苦和不安。据 1957 年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份被派到中国的顾问,从未被告之哪些东西可以透漏,哪些东西不该透漏。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②。孟戈非详细地回忆了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长沃尔比约夫的一次谈话,这位资深而诚恳的老专家既要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谈话双方确实都苦费了一番心思。③

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被派往中国约一年的时间,负责培训中国军人使用导弹装备。1959 年秋天临行前,他应召到莫斯科接受指示。炮兵主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叮嘱他,只能讲授已经交付给中国的装备,"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必要时应当通过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国内请示,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与主帅联系。后来,在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以外的内容的问题上,萨韦利耶夫与苏联军事专家组长真的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请示涅杰林。这位主帅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机密。不要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我保护你们。"④所以,聂荣臻后来的判断是

---

① *Негин Е.*,*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c. 44~45。

② TsKhSD,f. 5,op. 49,roll. 8862,no. 41(April—December 1957),p. 146,in D.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 123。

③ 《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4~29 页。

④ *Долинин А. Д.*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г.。

不错的: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①

其实,苏联在尖端技术上对中国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中国自身也是认可并实行这种“内外有别”的原则的。举出这些事例只是要说明,赫鲁晓夫后来宣扬的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②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莫斯科延缓以致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1958年上半年,中苏在核政策方面还采取了互相配合的方针,但此后双方的政策性分歧日益扩大,中国的所作所为令赫鲁晓夫十分恼怒。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同意了西方的建议,即在日内瓦召开一个专家会议来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查监控体系的可行性。5月30日赫鲁晓夫又提交了一封信,同意了美国的建议,认为英国和法国科学家可以参加专家会议,并表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也要参加。赫鲁晓夫还暗示应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信中说,从印度或“其他一些特定国家”邀请专家来参加会议也许是明智的。③ 尽管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但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对核试验的监控网时,没有忘记把中国包括在内——会议报告提出的监控网中有8

① 《聂荣臻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42页。

②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12~414页。

③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pp. 136~137.

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1]

日内瓦专家会议于 8 月 21 日结束，会议公报乐观地宣告：科学家已经发现"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能力和限度而又可行和有效的监督体系，来侦察违反可能缔结的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办到的"[2]。这项工作惊人的进展受到全世界的欢呼。[3]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发表了声明。美国"准备迅速着手同试验过核武器的其他国家谈判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的协议。"英国也准备进行同样的谈判，并保证从谈判开始时起，"在一年内，不再继续试验核武器"。[4] 尽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美英政府在应付莫斯科，但对赫鲁晓夫来说，却是他长期努力获得的一点儿令人欣慰的功绩。缓和的曙光似乎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金门战役，这不啻是向赫鲁晓夫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与苏联试图对美国进行说教的做法相反，中国摆开了一副诉诸武力的架子。如果说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大发雷霆，尚能容忍的话，[5]那么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任何通气的情况下，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就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藐视。[6] 况且，在美英刚刚答应签署停止核试验协定后，苏联就向一位自行其是、"无法无天"的盟国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无论如何都是有心理障碍的。从赫鲁晓夫推行的以缓和为目标的外

---

①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pp. 136～138;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2.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4 日。

③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 191。

④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4 日。

⑤ 详见本书《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一文。例如，赫鲁晓夫回国后，仍然批准了中国核专家参观苏联核试验场的请求，并向他们展示了一枚原子弹。苏联国防部还派遣第十二研究所的两位专家前往中国进行教学。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pp. 25～26。

⑥ 关于 1958 年炮击金门行动事前是否告知苏联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对此笔者将另文考察。参见本书《1958 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一文。

交战略来看，同美国和西方保持稳定和良好的关系，优先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因此，如果二者必择其一，那么在核武器问题上，苏联宁愿停止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援助，也不愿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以免对苏联的国家利益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无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①] 这种推断有其合理性。如此看来，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期间一再公开表示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除了有尽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责任，向美国示威之意，还有可能是在暗示将以此替换继续对中国的核援助。[②]

不过，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导致苏联暂停向中国提供核帮助，很可能还起因于台海危机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它极大地伤害了赫鲁晓夫的个人感情，以致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常常提到这件事。[③] 在 9 月 24 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几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④] 苏联军事顾问得知后便报告了莫斯科，立即引起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 P－12 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

---

①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生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39、547 页；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第 66 页。

② 关于苏联 9 月 7 日和 19 日两次表示愿意给予中国核保护，以及提出在危机期间直接提供海空军援助的情况，可参见《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78～183 页；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pp. 150～151；《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403～405 页。

③ 同撤走专家一样，在决定暂停供给原子弹样品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关于这一点，1960 年春外贸部长李强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时，苏方代表团成员就表露过这样的看法：按协议应该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但就是有人（指赫鲁晓夫）不同意，没有办法。笔者 2001 年 10 月 29 日采访宿世芳记录，宿世芳 50 年代曾在驻苏商贸参赞处工作。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 日、15 日。

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苏联人看来，这个部件或许已经丢失，或许是中方有意扣留，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赫鲁晓夫后悔与中国签订了援助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协定，并感到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为此，赫鲁晓夫与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进行商议后，决定 P－12 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尽管原子弹技术已经不是秘密，但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自己研制还需要很长时间，苏联是否继续提供援助，要看中苏关系的变化，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他们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①]。

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根据协定应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先是要求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中国将专门的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中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于 1958 年 10 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 11 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期限已到，莫斯科还是没有发出启运的命令。[②] 俄罗斯报纸刊登的一则口述史料证实，为准备提供给中国的原子弹样品（即教学模型）及技术资料早在半年前就装在二三节加了铅封的车厢里，并由警卫人员日夜守卫着。但是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③] 与此同时，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首的中国国防科技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也在核潜艇问题上“搁浅”了。[④] 事情一直拖到 1959 年年中，在中方以及在华苏联专家的一再催问下，中型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直接给苏共中央挂了电话。[⑤] 最后，赫鲁晓夫

---

①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1 辑，第 196～200 页；*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7, с. 334；谢·赫晓鲁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266～268 页；《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414～415 页。

②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2 页。

③ *Негин Е.，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 44～45。

④ 《未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2～13 页。

⑤ *Негин Е.，Смирнов Ю.*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 45。

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暂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①] 1959 年 6 月 20 日,就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为此进行谈判时,苏共中央通过了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为不影响苏、美、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暂缓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和技术资料",因为"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待两年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时,再决定这一问题。苏联认为,这样做不会影响中国的研制,因为"中国生产出裂变物质至少还要两年,到时才需要核武器的技术资料"。6 月 26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苏达里柯夫向周恩来递交了这封信。[②]

应该说,苏联这时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只是一个信号,试图以此向中国提出警告,而并非全面断绝在尖端武器方面援助中国。就在赫鲁晓夫为中国拒绝提供响尾蛇导弹实物而烦恼时,1959 年 2 月 4 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按此协定,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海军五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艇及水翼鱼雷艇)、两种导弹(潜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呐、无线电、导航器材等 51 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装备器材,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中国海军领导人为此兴奋不已。[③] 而在苏联决定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处则讨论并批准了关于向中国派遣国防专业技术方面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的报告。赫鲁晓夫亲自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国防部于 1959 年 9 月派遣 6 名国防专业技术的苏联专家和高校教师到中国国防工业的科研院所去工作,派遣期限为 1 年至 2 年,其任务是培养下列专业的中国技术人员:军事

---

①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412～413 页。

② 《张爱萍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741～742 页;《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80 页。

③ 《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65 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181～182 页。

一电子一光学仪器;多级火箭的设计;水声学设备;操控火箭的仪器的计算和构造;红外线技术和热力自动导向头;坦克炮的稳定系统及高射炮瞄准随动系统的设计;用于大能量火箭的液体燃料技术。①

但是,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十分气愤,而且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后来,中国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名为"596"工程,充分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人员对苏联的"义愤之情"。②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③周恩来还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为此,二机部提出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④ 11月11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呈交了一个《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的报告,其中也说道,现在有若干新型材料长期依靠进口,影响了新技术研究的进展速度。"发展我国的新技术材料,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⑤

当然,在具体工作中,中国有关方面继续坚持要求苏联方面执行已经签订的合同。1959年9月23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政府按照协定在1960年内向中国供应总值约为1.65亿卢布的国防新技术装备物资和试制这些装备所需要的原材料、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⑥ 12月29日,聂荣臻同陈毅联名致电刘晓大使,要他以

---

① ЦХСД,ф. 4,оп. 16,д. 653,л. 51~54,*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 ~ 1960годы),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2000,с. 104~105。

② 刘柏罗:《从手榴弹到原子弹——我的军工生涯》,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11页;《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67页。

③ 宋任穷:《春蚕到死丝方尽》,载《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43~1744页;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63页。

⑤ 《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3页。

⑥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

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提出,在 1960 年内,请苏联政府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一、按照中苏两国政府 1957 年 10 月 15 日协定,供应两种新型号导弹,以及为研究和制造导弹的全套技术资料。二、派遣必要数量的苏联专家来华,在试制这两种导弹方面提供技术援助。三、按材料清单成套供应试制这两种导弹用的全套零部件和原材料,以及试制所需的专用设备。1960 年 1 月 4 日,中国要求苏联按协议规定,尽快提出援助中国建设一个"航空及火箭科学研究院"的换文草案,并尽快派遣选址专家小组来华。是月 20 日中国请求延长 25 名导弹试验靶场专家的工作期限并增聘 8 名苏联军事专家,3 月 28 日要求供应两发 8Ж38 火箭和进行点火所需的液氧等燃料,并派遣 9 名专家帮助训练操作人员和进行实弹射击的技术指导工作。[①]

然而,苏联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在 1959 年 10 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以后,[②]苏联的方针渐渐确定下来。据 1960 年 2 月中国使馆的一份报告,苏联对中国有关国防新技术方面的一切要求,都作出了明显冷淡、拖延或拒绝的反应。[③]不仅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技术资料的工作缓慢下来,而且对在华工作的专家们加强了管制。1959 年 12 月 21 日,一份编号为№3766－ш的报告呈交给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谈到了拉博特诺夫院士访问北京力学研究所的情况。在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企图从拉博特诺夫院士那里得到有关一系列秘密问题的情报和消息,同时又不为拉博特诺夫院士提供机会,使其了解该研究所多数实验室的情况"。报告提出了中苏科技交流中涉及的秘密研究领域的问题,认为那些"参与秘密工作的重要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被派遣到国外去工作"后,常常违反苏联的保密制度。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1960 年 1 月 8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建议,"为确保在苏联科学家和高校工作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保守国家机密",应专门作出一个决议。

---

① 《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02～703、705、708、715 页。

② 1959 年 10 月 2 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全文参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c. 94～106。

③ 《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12 页。

于是，2 月 25 日安德罗波夫、苏共科学和大中学部部长基里林以及国防工业部部长谢尔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在苏联科学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确保保守国家机密》的决议文稿，并于 3 月 16 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得到通过。决议规定，“要严格遵守所确定的了解秘密和绝密材料的程序，不要让外国专家了解超出事先所达成的协议范围的秘密材料，以及现有的关于准许接触秘密工作的保障措施”[①]。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聂荣臻曾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说：“苏方执行协定的态度，1958 年下半年以前还是较好的，一般能按协定条文办事，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还是积极热情、愿意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1958 年下半年以后，控制更严，步步卡紧。协定已定的问题，往往节外生枝，寻找借口，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推说由两国政府重行商谈，但一经我政府正式提出，则又一声不吭、置之不理。对我多次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的项目、提前交付的设备，也拒不支持。协定中没有做具体规定的问题，即强调条文文字，根本不予以考虑。总之，苏方的态度是：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和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儿，越是特种的就卡得越紧；聘请仿制专家比较容易，聘请基建设计专家则较困难，聘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②]1960 年 7 月 6 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 8 名专家（其中 6 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7 月 8 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 5 名专家也突然撤离。赫鲁晓夫宣布全面撤走专家以后，到 8 月 23 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 233 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③]

---

① ЦХСД，ф. 4，оп. 16，д. 767，л. 18，参见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с. 106～107、122～123。

② 《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42 页。

③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3 页。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个人行为，许多苏联专家在临走时给中国同事留下了重要资料。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71～403 页。

(五)简短的结论

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确给中国的核工业发展和尖端武器研制造成了极大困难。有些项目因中方未掌握设备调试技术而推迟了正式投产的时间,有些项目因设备材料供应不上而影响了整个建设进度,有些项目则因设计尚未完成而不得不从头做起。① 但是,客观地讲,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核工业基础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还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没有中苏在核工业方面的 6 个协定以及苏联根据协定提供的设备、图纸、资料和专家的帮助,中国的原子弹是不可能在 1964 年就试验成功的;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和苏联专家的培训,中国也不可能在 1959 年 10 月以后就基本排除了国民党飞机对大陆上空的肆意骚扰。如果要判断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那么可以说,苏联在 1960 年停止提供技术、设备和撤走专家的举动,可以延缓但已经无法阻止中国的核试验成功了。② 对于这一点,别人可能不了解,但苏联人自己心里是有数的。1964 年 10 月,即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几天,赫鲁晓夫会晤了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谈话中日本人询问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核试验,赫鲁晓夫坦率地回答说,中国人完全可以进行核试爆,因为苏联已经提供了许多核技术和核设备,并向他们示范了如何去做这些事情。③

本文的结论是:中苏同盟的存在,特别是在两国全面合作的背景下,确定了苏联必然要在核武器方面帮助中国——提供核保护或者核技术;1954 年至 1955 年,苏联决定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方面打开

①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3～34 页。

② 还需要补充的是,1961 年中苏关系短暂和缓期间,已经停运的部分重要设备又陆续运抵中国。例如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1961 年莫斯科红旗制造厂的三台球面车床,以及电解槽、交换塔等设备到货,其中球面车床是核部件生产的关键设备。中国当时无法生产这种车床,直到 10 年以后,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球面车床才问世。(采访安纯祥记录。)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联援助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作用。

③ Gobarev,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pp. 22～23。

对中国的核援助之窗，1957年10月又将这种援助的范围扩大到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方面，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毛泽东；苏联不断地提高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帮助的层次和力度，是中国能在短短10年内制造出原子弹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赫鲁晓夫在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不信任，特别是中苏在核战略和核政策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显露，苏联的帮助是有限度的，且时刻都在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有所制约。[①] 总之，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表现出一种既要给予援助又要进行限制的复杂心态。

最后还应该补充一句：在核武器的研制方面，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愿意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尖端技术进行交换。同样可以说明苏联有意制约中国掌握核技术的是：中苏关系刚出现一点儿分歧的迹象，苏联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

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① 在这方面美国人的估计是，苏联不会把核武器交给中国人，即使提供了核武器，也会加以控制。1958年8月19日国务院情报与研究署给执行国务卿的报告，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Affairs 1955～1959,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in Library, MF2523166～0306。

12. 同志加兄弟:1950 年代中苏边界关系

——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一

一个国家的国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严格遵守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考察中苏边界关系由和睦、平静到纠纷、摩擦,再发展至冲突、军事对峙的历史,却很难用遵守还是侵犯了国家领土的完整这个内容来进行简单的概括和评价。事实上,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中苏双方边界关系的发展,带有很重的冷战色彩,有着深厚的中苏同盟关系演变的背景。

1950 年代中苏边界关系的状况,基本上可以说是中苏两国同盟关系建立并发展的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和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中苏政治和军事同盟关系形成。特别是从 1954 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到 1957 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中苏双方全面合作达到高潮,两国关系进入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状态。虽然在以后的两年中,中苏两党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矛盾冲突不断,但是总体言之,整个 1950 年代,在中共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上,中苏边界问题尚处于基本搁置,只进行调查摸底的阶段。而中国毗邻苏联边境省区的各阶层民众、党政机构中各级干部则普遍在对苏国家观念、边界概念上认识模糊。中苏双方在处理界务问题时,采取的是同志加兄弟的方式,

中苏边界也是一条和睦的疆界。[①]

此期中苏同志加兄弟式界务关系建立的基础在于，一方面，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中，中国需要依靠苏联的力量抗衡美国敌视中国的遏制政策，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不宜过早提出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边界问题；而中共新政权建立伊始，百废待兴，边界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与盟友之间领土争议的处理并不急迫，加之中苏边境地区的调查工作展开得不充分，对中苏界务情况掌握得不够，有关历史材料不完备，有关地图不精确，以及还需要时间了解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惯例和一般原则，等等，提出并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由此，中国没有触动双边关系中这条最敏感的神经，引发苏方的猜疑和戒心。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标准便成为中国处理与苏联国家关系的首要依据。于是，当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密切时，与中国同周边民族主义邻国的边界问题相比较，中苏边界事务处于次要地位，中国方面也能够和平友好地处理因界务问题而同苏联方面发生的各种纠纷。

本文根据所掌握的国内外档案文献材料，包括口述历史材料，从此期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方针政策的发展脉络、中苏边境省区舆情、社情的变化情况等几个方面，力争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出 1950 年代中苏边

---

① 关于 1950 年代中苏边界问题，至今还没有什么人做过专门的研究。笔者目前尚未见到中国国内有这方面的研究专论或专著；而笔者了解的国外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英文研究成果不多，并且偏重于 1960 年代，特别是 1969 年的中苏边界冲突；苏联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苏]A·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年；俄国近几年来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四种：1、*Мясников В. С.*，*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в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Москва，1996； 2、*Мясников В. С.*，*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 3、*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2001； 4、*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Владивосток，1999。不过，这些著作中关于 1950 年代苏中边界问题的内容都很单薄。最近，中国驻苏联前大使李凤林先生提供给笔者他收到的国外学者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最新著作：Iwashita Akihiro，*A 4，000 Kilometer Journey Along the Sino－Russian Border*，Sapporo：Slavic Research Center，Hokkaido University，2004。该书主要讨论的是中俄边界现状，如 19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中俄东段边界谈判及边界变化等情况，只简要涉及 1960 年代中苏争议岛屿及边界冲突问题。

界关系的概貌,并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等问题进行考量和评估。[①]

(一)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苏边界全长约 7600 公里,[②]实际上存在着三条界线:1. 条约线。从 1689 年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起,至 1915 年中俄霍尔果斯河划界文据止,旧中国政府同沙皇俄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划定中俄国界线总长约 1.1 万公里,[③]割去中国领土 150 多万平方公里。[④]

---

① 多年来,中国学术领域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边界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除了边界问题的政治敏感度较高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档案文献材料的匮乏。苏联解体后,俄国曾解密大量档案文件,但其中有关苏中边界问题的文件所占比例很小,其档案材料更多地见诸于俄国学者的著述之中。中国方面正式出版的档案文献中,也较少涉及这个题目。这种状况无疑给中苏边界问题课题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局限性。相比较而言,俄国方面关于苏中边界问题(集中在 1960 年至 1990 年)的研究,无论在材料的利用,还是在史事的剖析论说方面,都大大领先于中国。事实上,随着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几个国家边界问题的相继基本解决,中国的中苏边界问题研究,无论在档案材料的解密上,还是在选题设立的限制和研究成果的发表上,都应该放宽尺度了。近几年,笔者曾与沈志华赴比邻前苏联的中国边境省区地方档案馆查阅解密档案文件,搜集到一些相关材料。遗憾的是在查档过程中,一些材料或只限于调阅目录,或可阅卷但不准复印及摘录,这即使得我们的收获与几十年来丰富多彩的中苏边界斗争相比照,依然十分有限。另外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所掌握的俄方有关 1950 年代苏中边界问题的材料不多,故本文主要是从中国的角度考察中苏边界问题。

② 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724 页。

③ 参见 1960 年 9 月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编:《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6,卷号 12(以下简化为../../..),第 47~57 页;马叙生:《梳理中苏边界变迁史——找回失落的国界线(之一)》,《世界知识》2001 年第 11 期,第 41 页。

④ 参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42 页;《中国外交辞典》,第 724 页。根据 1964 年 3 月 5 日中苏边界谈判第二次全体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的发言,沙皇俄国借助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 15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参见 *Мясников В.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Москва, 1996, с. 351; *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2001, с. 90。

在 1964 年 3 月 27 日中苏边界谈判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中方还列出了根据不平等条约侵占的领土的具体数字:1858 年根据瑷珲条约,侵占了 62.8 万多平方公里;1860 年根据北京条约,侵占了大约 40 万平方公里;1864 年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 44.4 万平方公里;1881 年根据圣彼得堡条约(中俄改订条约),侵占了 1.3 万多平方公里;1882 年由于在伊犁地区进行划界,侵占了 1000 多平方公里;1883 年根据圣彼得堡条约的条款规定,在新疆北部进行划界时占领了大约 1.5 万平方公里;1884 年在新疆南部进行划界,侵占了 4.2 万平方公里;1886 年根据议定书(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划分图们江边界线,侵占了 10 里;1911 年根据条约(中俄满洲里界约)文件,侵占大约 1400 平方公里;1915 年根据划分霍尔果斯河议定书(中俄沿霍尔果斯河划界文据),侵占了 30 多平方公里。参见 *Мясников В.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с. 359~360;1960 年 9 月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编:《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吉林省档案馆,77/6/12,第 50~51、53、54~55 页。据此计算,共计侵占约 154.4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946 年 1 月 5 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北段国界大部分成为苏蒙边界后，[①]中苏国界东段长 4200 多公里，西段长 3300 多公里，[②]中俄历史条约规定的两国边界最终确定下来。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沙皇俄国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悬案始，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过中俄之间签订的割让中国领土的条约和协定，但是也从来没有正式对外宣布过不予承认，[③]这即在实际中客观上承认了这些条约和协定。此条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本确认的中苏边界线。2. 苏图线。即苏联方面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东段为十万分之一，西段为二十万分之一）所标的边界线。苏图线在许多地方偏离条约线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地方偏离的幅度还相当大，事实上违约划走了中国的领土。如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的边界线几乎全部划到中国岸边，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划归了苏方。中国历届政府也一向不承认苏图线。3. 实际控制线。苏方的实际控制线在有些地区同条约线或苏图线一致或基本一致，而在有的地段则不仅大大越过了条约线，而且还越过了苏图线，实际占据了一些中国的领土。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基本没有越过条约线，但在有些地区越过了苏图线。[④]

---

① 参见《中国外交辞典》，第 730 页；1960 年 9 月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编：《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吉林省档案馆，77/6/12，第 47、49 页；马叙生前引文，《世界知识》2001 年第 11 期，第 41 页。

② 参见《中国外交辞典》，第 724 页。

③ 参见 *Мясников В. С.*，*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2001, c. 191～194；1963 年 10 月 31 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中苏、中蒙边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七个文件，附件五：关于中苏边境我方实际控制线和巡逻线的调整方案，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 9 页；"帝俄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回顾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中国台湾"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四册《新疆卷》（二），2001 年 12 月，第 440～443、448～454 页。

④ 参见 1963 年 10 月 31 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中苏、中蒙边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七个文件，附件五：关于中苏边境我方实际控制线和巡逻线的调整方案，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 9～10 页；马叙生：《踏勘边界 谈判交锋——找回失落的国界线（之二）》，《世界知识》2001 年第 12 期，第 42 页；《中国外交辞典》，第 726 页；"徐源达撰'东三省中俄边界问题'（下篇）"，"苏方派兵占黑瞎子岛案"，中国台湾"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一册《东北卷》，2001 年 12 月，第 149～151、364～368 页；"关于帕米尔未定界问题事"，民国 32 年 6 月 26 日，中国台湾"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2001 年 12 月，第139～141 页。

中苏国界三条边界线并存的这种复杂状况,造成了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形成了许多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其总面积为3.5万多平方公里。[①] 具体情况为:中苏边界西段共有争议地区19块,面积3.4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帕米尔地区2.8万平方公里,其他地区6400平方公里。[②] 中苏边界东段,水界共有争议岛屿600多个,加上有争议的洲渚(河滩地),总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其中黑龙江、乌苏里江两江600余岛屿750平方公里,抚远三角洲(又名黑瞎子岛)一地350平方公里,苏方控制的"界外领土"额尔古纳河地区苏联地图线中国一侧的河滩地,即额尔古纳河十八洲渚281平方公里。[③] 另外,还有争议水面约600平方公里。[④] 陆界上有些地区苏方实际控制线越过了条约线,但面积很小。在吉林省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58处,长度共约16公里,深度最大者不过160米;在黑龙江省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12处,面积共约11平方公里。在内蒙古满洲里地区陆界,苏方偏入中国一侧两处,共约7公里,面积约3平方公里。总计约

---

① 笔者根据下述中苏边界西段和东段争议地区具体面积估算而出。这个数字应该是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之前中苏边境省区边界调查的统计数字,而在1950年代,由于有关中苏边界的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实地勘察刚开始不久,对中苏争议地区面积的了解还不完整。事实上,中苏争议地区、争议岛屿的数量和面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进行不断增加的。另外,关于中苏之间争议地区总面积的表述还有:1. 3万多平方公里(见《当代中国外交》,第243页)。2. 3.5万平方公里(见1964年5月16日中苏边界谈判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的发言,*Галенович Ю.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еке: Граница, с. 97;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с. 368)。

② 参见1961年6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边界办关于边界调查给国务院边委会并外交部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2/44/182,第85~87页;马叙生前引文,《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第43页。

③ 参见1969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马叙生:《中苏边界问题的研究和第一次谈判》,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外交史资料与研究》第12期,2001年12月5日,第17页;*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9, с. 50; 2004年1月2日李丹慧、沈志华采访李凤林大使记录;1963年10月31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中苏、中蒙边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七个文件,附件五:关于中苏边境我方实际控制线和巡逻线的调整方案,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12~13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87页。

④ 《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

16.56平方公里。[1] 在这些争议地区中,有些地方中苏双方都进入,争夺控制权;有些地区为一方控制,另一方不进入;少数高寒地区,双

① 参见1963年10月31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中苏、中蒙边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七个文件,附件五:关于中苏边境我方实际控制线和巡逻线的调整方案,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13页。总计面积数为笔者计算所得。另据公安部报告,兴凯湖至图们江口一段陆界上八个界碑,被俄(苏)方偷移了6个,侵占中国领土570多平方公里。参见1963年9月25日谢富治关于东北中苏边境见闻给彭真及中央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86页。这种说法未见其他材料支持。

关于中苏边界东段陆界争议地区的面积,根据1987年2月至1991年5月中苏第三次边界谈判、勘界的结果,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中苏边界陆界争议区的具体情况为:1. 兴凯区(位于今黑龙江省密山县)。按照中俄有关界约和1991年5月16日中苏签署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该区边界线走向应按分水岭而行,勘界后,俄方划给中方223平方公里、中方划给俄方98平方公里土地。2. 乌苏里区(位于今吉林省珲春地区),即"帕(П)"字界牌地区,面积10平方公里;3. 哈桑区(位于今珲春地区)。根据1886年中俄珲春东界约的规定,土字界牌由木牌改为石碑后,从原距图们江入海口20华里处移至30华里处,江下游的洋馆坪和会忠源江岸地方立1、2号界标,该地区属于俄方。由于多年来江水冲刷,会忠源、洋馆坪两处中方江岸一侧的陆路通道断绝,人畜通行须经苏境,以此形成了中俄双方有争执的地段,距离为14.5公里。1957年中方曾商请苏方借路,苏方让了一条通道,后又被冲毁。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苏方同意将该地段调整给中方,并于1972年达成协议,由苏方借路125平方公里给中方,以保证陆路巡逻和人畜通行。后根据《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第2条款,苏联将此地区总面积为300多公顷(中方材料记述为125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中国(参见2004年1月2日李丹慧、沈志华采访李凤林大使记录;1960年9月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编:《有关中苏国界条约及其相互关系》,吉林省档案馆,77/6/12,第52页;赵中孚著:《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5),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8年4月二版,第154～158页;"[签注]:珲春东界约",《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一册《东北卷》,第228页;1962年8月8日中共武警部队吉林省总队委员会关于贯彻"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边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几项请示,吉林省档案馆,1/1～18/245,第3页;1962年8月21日武警部队吉林总队1962年上半年中苏边境发生问题与会晤联系情况纪要,吉林省档案馆,77/8/3,第163、167～168页;1965年12月15日吉林省军区司令部、吉林省人委外办关于同苏会勘洋馆坪、会忠源通路和我修路、拆苏铁丝网未及时请示报告问题的检查报告,吉林省档案馆,77/11/3,第31～32页;*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 с. 182、179;1963年10月31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中苏、中蒙边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七个文件,附件五:关于中苏边境我方实际控制线和巡逻线的调整方案,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12页)。不过,上述一、二两区的面积与前述中苏东、西段争议区面积之和达3.6万多平方公里(加哈桑区面积亦如此),超过了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宣称的3.5万平方公里的数字。

方均无人进入。①

此外,还有两处按照中俄历史条约规定属于中国的领土被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占有,面积共约17万多平方公里。其一为唐努乌梁海地区(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方向俄国的东西伯利亚),面积约17.1万平方公里。②1914年4月5日沙俄政府宣布俄国为乌梁海的保护国,并于是年派军队开进这一地区。1921年8月14日乌梁海宣布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10月11日图瓦作为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州加入苏联,1961年10月10日改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过图瓦的国家主权。② 一为江东六十四屯(位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黑龙江对岸俄国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面积约4500多平方公里。③ 根据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中国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但保留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辖权。1900年7月沙俄军队违约占领该地后,发布命令,宣称江东六十四屯"已归俄国当局管辖"④。该处以后始终没有归还中国。

在中俄国界形成并演变的过程中,1840年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发端,随着中国国力的日趋衰微,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割地划界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的苏俄政府在推行新的对华政策,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沙俄政府遗留问题,谋求与中国建交时,

①② 参见1963年10月31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中苏、中蒙边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七个文件,附件五:关于中苏边境我方实际控制线和巡逻线的调整方案,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10页。

② 参见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с. 342、34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翻译:《苏联百科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314页;罗志刚著:《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 185.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7页。该书根据有关方志记述说: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江口以南至霍(豁)尔莫勒津屯、黑龙江左岸沿岸地带,南北长200余里,东西宽90余里。笔者据此数字计算出面积。另有材料记述不同:1、面积约1700平方公里(参见马叙生前引文,《外交史资料与研究》第12期,第18页)。2、东西长12里,南北34里(参见"满苏国境纷争处理问题",《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一册《东北卷》,第365~367页)。

④ 参见《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上册,第248~255页。

事实上始终坚持了旧的中俄不平等条约不包括界约和涉及边界的条约的立场，其所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是涉及沙俄在华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租界、最惠国待遇、自由免税贸易、中东铁路权益等种种不平等特权的政治性条约和条款，而并不包括中俄 19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订立的有关两国边界问题的条约。苏方代表在废弃涉及两国边界的中俄旧约问题上态度极为强硬，宁可决裂也不肯让步。中苏两国在 1924 年 5 月签订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两国将重新划定彼此疆界，在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①] 两年之后，1926 年 3 月至 6 月中苏双方举行界务谈判，中方要求苏方实现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和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关于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的第三条款，以及重新划定疆界的第七条款，本着平等、公平的原则另行签约，并重新划界和归还帝俄所侵占的中国领土。苏方继续否认中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同时辩称“重新划定”疆界是“恢复界线”之意。双方意见分歧，谈判无果而终。[②] 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

---

① 参见薛衔天、黄纪莲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以下简称《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8、198、206、212、215、218、242、244、247～249 页。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0 页。

② 参见《中国外交辞典》，第 732 页。根据苏方文献，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七条规定的是：将彼此国界重新“审查”，在国界未行审查以前，允仍维持现有国界。苏方以后曾辩称：在这份协定的惟一正式文本——英文文本中，第七条款规定的是双方对边界进行“重新勘界”。而根据国际法，重新勘界就是检查已确定的国界线并恢复或者替换已被毁坏的边界标志，其与中国政府所说的“重新划定”疆界，性质是不同的（参见[苏] A·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年，第 188 页；*Дальн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81 №10, c. 83～8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 1969 年 6 月 13 日声明，《人民日报》，1969 年 10 月 9 日）。事实上，1924 年中苏谈判解决悬案问题大纲时，中国方面提交的大纲文本即用的是“重新勘界”一词。因当时苏联方面要求所有问题在会谈中解决，而会上无法勘定边界，所以中方讨论将措辞改为“划界”。这样，中方于 3 月提交的大纲文本中改用“重新划界”一词（参见笔者 2004 年 10 月 14 日采访徐曰彪先生记录）。

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年12月中苏两国恢复因1929年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邦交关系。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对苏交往中没有再涉及划定中俄边界走向的不平等条约问题。[①] 对于中苏领土争议上的悬案,中国政府虽曾就一些案例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交涉,双方界务纠纷不断,[②]但是在确定对苏方针政策时,则基本回避此问题,以求保证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1937年8月中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其各项条款中没有包含关于两国之间边界问题尚未解决的任何暗示,并且规定其条款不得解释为对条约生效前两国签订的任何双面或多边条约对于缔约国所发生的权利和义务有何影响或变更。而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也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③]

当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希望于战后获得苏联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书面报告中赞扬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④]这其实即从政治意义上肯定了中苏之间已不再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只是斯大林当时已经做出了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定。但是进入1948年到1949年的冬天后,亚洲形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的半壁江山,国民党败迹明朗化,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共,开始了对华关系的转轨。其间,斯大林为了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将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初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在与米

① 参见《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48页;*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 196.

② 参见:"苏联私移国界案","苏军擅在金县境内树立界牌案","兴安省界标被移案","苏方派兵占黑瞎子岛案",《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一册《东北卷》,第353~370、375~378、364~370页;"新苏界务案","帕米尔未定界问题案",《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第67~117、132~147页。

③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105页;*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 195~196;《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114~116、310~314页。

④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借介绍中共立场和政策之机，试探性地提出了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可能性，遭到斯大林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只得表示以后不再提此问题。[①] 这应该是领土议题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苏联代表正式谈判的过程中。关于中苏边界走向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没有任何特别要求，毛泽东在 3 月 10 日给斯大林的函中，同意苏方关于将界标放置在黑龙江两岸的意见，并在表示中方将严格遵守这些规则时，未提及水界以河流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问题。[②] 这说明毛泽东此时或者是对于这一事项并无明确的概念，或者是还无暇考虑到这样具体的问题。此后 6 月至 8 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在 7 月 4 日向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未来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对内、对外政策。关于蒙古问题，报告指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③]。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泽东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并得到斯大林对中共慷慨援助的允诺之后，于 6 月 30 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④]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与此相应，中共处理中苏边界问题政策的框架，实际也已构建出了雏形。

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苏边境地区的形势基本稳定而平静。不过，上述沙皇俄国以源于西方国际法的条约形式占据的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苏之间 3.5 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以及 17 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和江东六十四屯，事实上已成为三笔"领土账"，潜在性地遗留下来，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和新

---

① 参见米高扬就 1949 年 1～2 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 年 9 月 22 日，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1～17；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40 页。

② 参见 И. В. 科瓦廖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 第 1 期，第 87 页。

③ 参见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4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8，л. 11～50。

④ 参见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148 页。

的中国政府去解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它给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

(二)新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态度和方针

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建国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外交政策一章除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①]之外,没有涉及历史上中国旧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有关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的问题,这即在事实上对此类条约和协定采取了一种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次日,苏联即予以承认,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友邦"[②]。此后,建立、巩固和发展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在中国外交工作中居于首要地位。此期新中国创业伊始,百废待兴,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亟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从事经济建设,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强国和盟友,是中国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在中国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实现工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囿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只有苏联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规模援助中国,因此中国只能以获得苏联经济援助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中,中苏两国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由此,巩固与苏联的团结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贯穿于整个 1950 年代。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始终保持了慎重的态度。这一时期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态度和方针,主要反映在对中俄不平等条约和争议领土的处理标准等两个方面。

其一,对于中俄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和方针

在中俄国界形成并演变的过程中,伴随着签订一系列条约、割地

---

①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 页。

② 《中国外交辞典》,第 732 页。

划界痛苦而来的，是中国领土机制的近代转型。软弱而保守的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以具法律效力的条约形式确立中俄之间的国界，由此，传统的模糊而含混的“天朝内地”与“外藩”之间的疆界，逐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际边界所取代，中国的领土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中俄近代意义上的国际边界的确立，中国在这条疆界之外丧失了封建相对主权，却在这条疆界之内获得了近代绝对主权。[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旧政府遗留下来的中苏之间第一笔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账”，是中国新的政府需要接受而非清算的历史现实。如前所述，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中共中央确定与苏结盟国策和中国新政府筹备的过程中，就已经提了出来。

1949 年末，为了实现与苏联缔结新约、确立同盟关系的目标，毛泽东出访苏联。12 月 16 日他抵达莫斯科，在火车站的演说中再次提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②]这实际上重申了他在中共七大上所表明的从政治意义上肯定中苏之间不再存在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中国方面如此表态的初衷，虽然主要是为了促进中苏同盟关系的及早缔结，还不是成熟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方针，但这种指导精神，事实上已为如何对待中苏界务的历史遗产确定了基调。

具体考察 1950 年代中共中央对于旧有的中外边界条约问题及边界问题的认识发展脉络和方针变化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 1950 年代初期，由于对边界问题情况不明，中共中央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方面，实行了三项措施：其一，对于历史上中国“旧政府同外国签订的有关边界问题的条约和协定等”，继续遵循《共同纲领》的精神，“采取了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其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采取了暂维现状的方针”；其三，积极准备，要求有关部门抓紧研究问题，积极做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备。[③]

---

① 参见刘晓原：《中国领土机制近代转型刍议》，“冷战与中国周边关系”国际学术全会(2003 年 8 月，中国武夷山)论文，第 6、7 页。

②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89 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指示》，1956 年 10 月 31 日；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办法》，提交 2004 年 8 月 14～16 日上海复旦大学“195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 2～3 页。

此后到1950年代中期,为了保障国内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了回应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打破帝国主义的对华包围,中国需要及早消除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由边界纠纷而致局势紧张的隐患,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同民族主义邻国的良好关系,以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并争取到更多亚非国家的支持。这样,1956年,中共中央将边界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期,中共领导人对边界问题和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解决边界问题的认识也随之有所发展。与此相应,中共中央在首先着手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进行了调整,其主要变化如下:

一方面,进一步缜密。如关于对待边界历史资料的具体原则,中共中央认为:一般的历史资料只能做参考,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这三个朝代的有些边界谈判的资料,可以作为法理根据。要求研究历史资料必须遵循三项原则: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割断历史,但要看到历史的发展;要根据今天的情况和国家的政策来看待历史。中共中央还提出,根据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边界问题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并确定了关于谈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①

一方面,有了重要的转变,其突出表现在对待旧条约的具体原则上。这时,中共中央指出:"我国和外国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②周恩来则在1957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中缅边界南段"一九四一年线"的问题时说:如果否定这条线,"就要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个条约,这就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绝不是一个条约为止。一九四一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是已经签订的边境条约。"时隔不久,他又于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时,除提出"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

① 参见廖心文前引文,第9~11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指示》,1956年10月31日,转引自廖心文前引文,第8页。

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外，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①]这实际上就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此类旧条约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方针，而采取了事实上予以承认的态度。中共中央此时已开始用国际法的原则和惯例来考量其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而国际法的原则和惯例就是：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不能单方面宣布取消或修改边界。[②]

中共中央 1950 年代中期确定的这些方针和原则虽然是针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出的，但其对于解决中国与其他邻国，包括与苏联的疆界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这样，在 1950 年代，尽管中国政府并未正式对外宣布承认不平等的中俄界约和涉及边界条款的中俄条约，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这些界约和条约，接受了中国原有领土的法律地位。[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之间的第一笔"领土账"已经销账了。

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不属于中俄不平等条约的范畴，它是 1945 年 8 月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达成的一项协

---

①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306、1309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233、237～238 页。

② 参见廖心文前引文，第 8 页；徐曰彪：《中苏界务三题（提纲）》，提交 1995 年 8 月同江"二战后中苏关系史走向（1945～1960）"学术讨论会论文，第 2 页。

③ 在苏联，1950 年出版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辞典》明确指出，1860 年的中英、中法和中俄北京条约"是英国、法国和俄国由于 1859 年至 1860 年英法同中国的战争而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1961 年出版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辞典》也作了同样的论断。对此，苏联方面的解释是，说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指的是其所包含的领事裁判权等政治性条款，而非承认其有关边界的条款具有不平等性质。苏联方面坚持政权更迭时一切政治性条约一般不予继承，但涉及划定边界和确立边界制度的条约一般予以继承的国际法惯例。参见李汇川：《中苏边界谈判的症结何在?》，《国际问题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13 页；*Дальнев П*. В чем ж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ть затруднений на советско — китайс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81 №10，с. 87～89。

议的结果,[①]尽管这个条约事实上也是有损中国权益的不平等的双边条约。[②] 不过,虽然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审查此条约后,可以按其内容提出废除或修改、重订,中共新政权还是继承了这一结果,并在1949年10月16日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蒙古还成为最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③]

1950年初,中国方面在同苏联进行签订新约的谈判中,又提到了蒙古问题,但这一旧话重提,只是为了给中国谈判目标的实现增加砝码。周恩来巧妙地把蒙古问题与东北问题捆绑到一起,以中国新政权承认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东北问题的交换条件,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④] 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冲突的解决,使中苏同盟关系得以在法律的基础上确立了起来。此后,1954年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在与其进行会谈时再次提到了让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遭到赫鲁晓夫的否定。[⑤] 中国领导人的这次试探,只是对苏方当时所给的此类信息的一个回应,并无考量领土主权之意。此后直至1950年代结束,中国方面没

---

① 当时中国方面在条约附加的换文中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赞成独立,中国政府当予以承认。参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330页;

② 参见《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第310~319页。

③ 《中国外交辞典》,第625页。

④ 参见本书《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一文。尽管这时中蒙已经建交,但是,随着中苏签订新约,外蒙古独立作为中苏旧条约的成果,重新成为中国新政府可以承认也可以不予承认的问题。

⑤ 参见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5/116,第40页。对于这件事情,师哲曾叙述说:在国庆节中有不少文艺演出……在观看他们的演出时,我坐在刘少奇左侧,我的左侧是布尔加宁,布尔加宁的左侧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一边看演出,一边向我嘀咕,说他乘飞机经过蒙古上空,看见那里是一片荒凉,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经济发展会困难的,还不如回归中国。赫鲁晓夫敏感地问布尔加宁在说什么? 布告诉了他,他叫布不要说。刘少奇也感觉到了什么,问我:"你们谈什么?"我告诉了他。刘少奇很快就将这句话向毛泽东汇报了。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听说你们有意让蒙古回归中国,我们是欢迎的,那就请你们给蒙古同志谈谈。"赫鲁晓夫立即说:"没有,没有此事。我们没有和蒙古谈过。"回过头来当即埋怨布尔加宁:"就是你多嘴!"(参见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7~448页。)

有再从领土议题的角度向苏联提出过蒙古问题。[1]

其二，对于中苏领土争议问题的态度和方针

历史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于中苏之间并一直令苏联方面十分敏感的中苏边界走向、领土争议问题，尽管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但也更关系着处于建国初期阶段的中苏同盟的稳固与否。另一方面，作为同一阵营的盟友，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标准也往往会淡化彼此之间的领土纠纷问题。面对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在中央领导层的观念中，当中国边防力量有限，无力对一些有争议的岛屿、山脉、地区行使防守责任时，维持苏联占据的现状，依靠苏联的国防力量进行守卫，符合中苏两国共同的安全利益，也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故而，中苏之间不大的并且很容易解决的领土争议、边界问题，不值得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因此可以说，此期中共中央处理中苏领土争议问题的标准，带有浓厚的冷战思维的色彩。纵观 50 年代中国解决与苏界务的方式，反映了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谨慎回避和宽容的方针。而就某种意义言之，此期中苏友好睦邻关系的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双方没有因为相互提出领土要求而再度发生信任危机。

中苏两国 1950 年 2 月 14 签订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中苏双方将“遵照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在这条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保证中，没有关于双方之间还存在领土争议的保

---

① 不过，1949 年 11 月，上海出版了一幅比例尺为一比六万分一的《新中国地图》，蒙古方面认为该图将其领土的 12%划入了中国的版图。1952 年，北京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又把蒙古大面积土地划入了中国的领土之内。后来这幅地图未经任何修改出版了四次。1953 年，私营出版商益昌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简史》中附有一幅“帝国主义割取中国领土图”，也将蒙古的全部领土和一些国家的部分领土绘入其中。蒙古曾多次提出解决双方边界纠纷的建议，到 1962 年 12 月，中蒙签订了边界条约。参见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台湾兰溪出版社，1983 年，第 2563～2564 页；《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 209 页；《中国外交辞典》，第 709 页。

留性示意。[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于对苏交往中,不仅从未表示过中苏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从未对中苏边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过异议,[2]而且还对涉及边界走向和领土纠纷的事务持一种宽松谦让的态度。

例如,1951年1月2日中苏双方签订的国境河流航行及建设协定规定,双方船舶可在黑龙江等国境河流的主要航线上无阻挠通航,不受划定的国界线之限制。[3] 这个协定实际上为苏联在国境河流上不按国际法惯例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做法提供了依据。中国方面则没有将该协定视作具有界约的性质。[4] 在1950年代初期,苏联应中国方面的请求,将全套标有边界线的现代大比例尺地形图交给了中国政府。如前所述,苏联地图上的苏中边界线在许多地方都偏离条约线画到了中国境内,但当时中国方面并没有就苏联地图上所标的边界线走向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意见。[5] 尽管中国当时出版的一些中国地图集仍然按照中俄历史条约划定的中苏国界标明边界线,

---

①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第25页;《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199页。毛泽东后来在成都会议上曾谈到他1950年初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就签订新的条约等问题争吵了两个月,其中包括有国境问题(参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对于此说,笔者认为,其一,"国境问题"一词用语含混,难以作为提出了中苏边界、领土问题的凭据,有可能是指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的问题;其二,毛事隔多年后的这一说法准确与否也很难说;其三,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看,均无涉及中苏之间国境问题或边界、领土问题的内容(参见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5年〈未刊〉,第7、8卷)。

② 参见[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21页。

③ 参见《中国外交辞典》,第731页。

④ 1960年代中苏边界冲突肇始后,苏联方面就曾指出该协定是根据"两国边界的条约订立的",并以此证明其所坚持的主航道中心线与边界线不一致的原则。中国方面则认为这个协定根本不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协定,更不能证明中苏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参见"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George Ginsburgs, *From Soviet to Russian: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Cambridge, 1998, p. 266.

⑤ 参见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拉赫马宁的报告(1969年9月8日),ЦХСД, ф. 4, оп. 19, д. 555, лл. 2～3;"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苏中关系1945～1980》,第220～221页。

可是直到1950年代末期，中国才通过国家测绘局长之口向苏方表示了中方认为中苏国界线方面的老问题依然存在的意见，而且同时还阐明了中方的宽容态度，即：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可以按照苏联地图上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标明边界线。①

中共中央对于中苏争议地区的宽容谦让方针，突出反映在对苏联蚕食中国领土的做法及中苏领土争议、边界纠纷的处理原则上。如果追溯历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不仅是沙俄政府，就是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斯大林执政的年代，苏联政府也常常以单方面竖立或移动界碑、扩大检迹地带（用推土机推出松土带，以便检查人畜越界的痕迹）、架设铁丝网等方式，蚕食中国的领土。② 苏联方面的这种行为到1950年代时继续存在，只是程度收敛了许多。

如在中苏边界东段，根据黑龙江省的调查，日伪时期苏、日双方以黑龙江、乌苏里江的安全航道中线为分界线，线以南及线之左侧岛屿由日本占领，线以北及线之右侧岛屿归苏联所有；陆地上的国境山脉以分水岭为分界线。自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解放后至50年代中期，两江分界线以南和线之左侧靠近中国江岸应属中方所有的约100余个大小岛屿，绝大部分陆续由苏联边防军守卫。东北内

---

① 如上海195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上海1955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等；1959年中国国家测绘总局局长致苏联内务部测绘总局局长的信，参见 *Мясников В. С.*，*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с. 198～199。

② 参见“亚西司整理之新疆塔城、裕民县等地俄人入侵占我领土概要说明及附图”，“外交部电驻新疆吴特派员为令绘中苏边界侵移图事”，民国33年9月13日，《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新疆卷》(一)，第106～107、109页；“驻东北特派员公署电部关于合江省密山县境内中苏国境标识被苏方私自移动一案，请鉴核由”，民国36年8月2日，“中国国民党电部请查苏联私移国界案”，民国36年7月31日，“附图五：满洲里市北方小北山地区苏军私移国界界标，入侵我国略图”，《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一册《东北卷》，第353、385页；1961年3月30日自治区边界办关于伊犁州察布查尔县境中苏边界界牌移动问题的意见，1961年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边界办关于霍尔果斯河河源地区中苏边界问题及意见，伊犁州档案馆，11/1/134，第67～70，50～51页；1963年12月伊犁区委外办关于伊犁州中苏边境苏方军事理论资料，伊犁州档案馆，11/1/120，第274～280页；1964年1月27日伊犁区委外办关于伊犁直属县中苏边界争议地区情况的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131，第50～57页；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情况通报》第14期，1993年8月20日，第24～28页，等等。此类案例还很多，由于非本文着重考察的对象，故仅简略注之。

河航运局则反映说: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上有56个应属中方的大小岛屿现由苏方管理,当中方人员前往一些岛屿设置航标时受到苏联边防军的阻挠。冬季封江期间,由苏方插树枝于河床中线。在苏方守卫的岛屿上,树枝则插于岛屿和中方江岸之中线,双方走爬犁不得逾越此界。至于国境山脉,过去曾以分水岭为界,现在苏方已将整个山脉予以防守。过去几年中,中国边民将这些由苏方守卫的岛屿和山脉视为中方所有,随便前往捕鱼打柴,结果遭到苏联边防军的阻挠,有的还被扣押送回,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1954年瑷珲县曾向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意见,请求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联系,将现由苏方管理原属中方的大小百余岛屿归还中国。1955年时萝北县又有少数渔民致函外交部,要求与苏方交涉收回个别岛屿。是年3月,黑龙江省外事处曾向外交部正式反映这些情况。对此,外交部指示说:可暂不处理,向居民进行教育。黑龙江省委和省人委即据此精神要求边境各县,教育干部和居民从保卫中苏边境安全的整体观点出发,不应单纯强调居民的局部利益。[①]

又如在中苏边界西段,新疆伊犁州哈巴河中苏边界争议地区,1957年初苏联边防军一位中校前往中国边防军驻地进行交涉,指责中方在河右岸巡逻是越界,表示"苏联不侵犯别的国家一寸土地,但也不要别人侵占",并出示其边防图做证,质问中方在该处巡逻有何凭证。苏方还禁止这一地区的中国边民利用水渠灌溉中方的农田。对此,中共伊犁州委根据中央的精神,以中苏友谊等为由向当地干部和群众进行解释教育,指示中方边防部队再与苏方接触时必须先报告上级批准,以免有些问题处理不当,并提议新疆自治区党委、军区党委派人测绘地图和了解情况及搜集资料,采取妥善方式早日解决中苏双方争执,以利两国边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年,在伊犁州裕民县中苏边境某处中国境内,两个乡民为争种一块地相持不下时,遇苏联边防军人。苏边防战士逐走两人后,该地成为苏方领土。伊犁军区将此案例写入调查报告上报,上级有关领导也只是将其归入了

① 参见1956年12月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关于中苏边境有关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337,第88页。

解边境地区情况的材料之中,不做处理。[1]

这一时期,中苏双方边防部队曾发生过一次较严重的国界纠纷事件。1956年2月10日,中国新疆伊犁霍尔果斯边防检查站两人巡逻组在有争议的英塔尔地区与苏方巡逻组相遇,苏方指出中方巡逻人员已越入苏境,中方巡逻人员则提出该地属于中国境内,双方争执不下,苏方巡逻人员与上级电话联系未通,于是朝苏联境内连放10枪,中方巡逻组也向中国境内放了一枪。随后苏方一位大尉营长前来说明此地边界情况,指出中方巡逻组已无意越入苏境3公尺。双方人员接着各自继续执行任务。事后,苏联潘非洛夫边防司令部参谋长伊万诺夫中校邀请中方边卡站长去苏方边卡商谈此次事件问题,提出中方巡逻组越入苏境500公尺,中方认为与实际不符。经去现场观察,双方认识取得一致,中方承认中国巡逻人员越入苏境3公尺,并当即向苏方表示歉意。这样,双方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了结了纠纷。[2]

此后,鉴于中苏之间国界纠纷的发生,9月,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参赞根据苏联外交部的委托,向中国外交部通报了关于在是年9月至10月间,举行苏联边防部队代表与中国边防警卫部队代表协商会议的建议,对此中国方面表示同意。但是由于波匈事件的爆发,一个月后,苏方又请求将这次苏中边界问题协商会议推迟到11月底举行。11月17日,该参赞向中国外交部通报说,"苏联政府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局势,认为目前不适宜开始这样的谈判,并建议推迟这些谈判",因为,正如所认为的那样,"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在当时可能会被敌对集团利用,作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的证据。"中国方面表示同意,认为苏联政府的这个考虑是正确的,而且今后在边界问题上,两国政府将能够很容易地达成一致意见。[3]

---

① 参见1957年5月23日伊犁州委黄浴尘关于哈巴河中苏边界情况的报告,1957年9月25日伊犁军区关于伊犁区边境情况调查总结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57,第41～42,15～16页。

② 参见1960年9月24日伊犁外州事分处伊犁地区中苏边境调查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134,第3～14页。

③ 参见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 199。

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央解决中苏领土争议方针的宽容性,以及对处理此类问题的权限和方式三令五申得不够,导致了中国毗邻苏联边境省区基层机构在处理争议地区问题上的随意性。如在黑龙江省,各县不能认真执行有关对外联系问题的请示报告制度,很少将与苏方交往的情况及其他有关边境问题定期向上报告,而上级主管部门也督促检查不力。个别县对外联络无专人负责,边境上发生日常事务性问题时,往往由当地沿国境区、村政府负责人直接与苏方进行联系,有的县政府对一些重大问题不经省政府批准即自行前往接洽,从而发生了一些十分有趣的事例:饶河县政府径自与苏联方面交谈有关岛屿的归属问题,抚远县政府还在同苏方的交涉中收到了两个岛屿。①

1957年1月,周恩来根据苏联领导人的请求出访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帮助赫鲁晓夫协调解决波匈事件后莫斯科与华沙和布达佩斯之间的尖锐矛盾。其间,周恩来在与赫鲁晓夫等人的一次会谈中列举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入苏联的事实,认为激发社会主义阵营里不满情绪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不公正地解决了一系列领土问题。② 这种批评事实上引起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但是,周恩来并没有提及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③

---

① 参见1954年9月黑龙江省政府外事处关于中苏边境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257,第72～74页。

② 参见《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210～3222页;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谈话记录。

③ 关于此问题,还有不同的记述:1964年7月19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回忆说,早在1957年1月他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就曾经要求苏联处理好与日本、中国、中欧和东欧国家,包括芬兰之间的领土问题(参见周恩来总理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记录摘录,《朝日新闻》,1964年8月1日,转引自 Dennis J. Doolin,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Documents & Analysis*, Hoover Institution Studies:7,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65, p. 45)。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事隔多年后的一些追忆性谈话,有时不够准确。从笔者目前掌握的相关材料看,特别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的那次会谈中追述此事时,毛泽东1964年9月与法国客人谈及此事时,都没有提到周恩来当时曾涉及到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同上注);另外,从对当时中苏关系背景情况的分析,以及前述中共中央关于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和中苏边界问题的方针和态度、周恩来关于此问题的思考情况看,周恩来在那次会谈中也不可能涉及此项问题。不过要证实这一估计,还有待于该次会谈记录的解密与公布。

时隔不久，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发动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和建议。在一些批评性言论中，涉及到了中苏之间还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和边界问题等议题。这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触及中苏边界领土争议问题，不过它属于争鸣言论，并不代表中共中央的态度。而且很快，这场运动的主题就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此类批评性的鸣放言论也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中共的猖狂进攻。[①] 对于中苏边界领土争议问题，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了谨慎、宽容和谦让的宗旨。

总的来说，从 1949 年到 1959 年十年中，中苏边界纠纷共发生 22 次，中国方面坚持了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方针，苏联方面采取的也是讲友好、讲团结的态度。[②]

（三）一条基本无界无防的兄弟友谊国境线

50 年代，在中国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基本情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所谓有边无界，指的是中苏边境上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并存，在许多地区事实上分界线不清。所谓有边无防，则指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大部分地段，中国方面长期不设防，边防力量十分薄弱。如在中苏边界西段的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 1500 公里，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 300 余公里，而且只有 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而在中苏边界东段，如吉林省珲春县约 500 余华里的中苏边界

---

① 参见《苏中关系 1945～1980》，第 222 页；《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 206 页；Mark Kramer, The USSR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 September 1959,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 178；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第 84 页。

② 参见 1963 年 9 月 24 日沈阳军区刘转连副司令员在军委边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 68～81 页。

陆界上,中方从无任何布防。黑龙江省边境各县除城区驻有二三十名公安部队,配合当地公安局维持社会秩序外,整个国境线无边防力量。[1] 总之,按以后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的话说就是,在中苏边界线上,长期以来一直只有为数不超过200人的边防警卫人员。苏联方面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向边界地区调派边防部队,"自认为向哪里派兵,哪里就应该出现实际上保留下来的、历史上形成的边界线"。[2] 这种无界无防的情况不仅导致了前述中国边民与苏联边防人员、双方边民,以及中苏双方巡逻人员之间对一些地段的零星的小争执、小纠纷,而且还造成双方的人、畜,主要是中方的人员和牲畜根据多年来形成的渔猎放牧习惯,经常在边界线上随意往返流动,越境行为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此种状态的存在,不只是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其更主要的还是滥觞于中苏两党两国兄弟情谊的浸润。对于中国来说,中苏边界是两国共同的边界,苏联的国防力量事实上也发挥着保卫中国边界的作用。与此相应,在一个时期内,中国边民对于国界存在的意义认识淡漠,中国中苏边界地区的边境管理则无序,没有一定制度,控制较为松懈。[3]

中国边民国界意识的模糊

中苏同盟关系确立后,一方面是苏联大力援助中国,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中苏友好、兄弟情谊得到充分渲染;一方面则是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抗美援朝,国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这种状况,使得国人对中苏国界的认识也很自然地建立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国境线意识普遍比较淡薄或模糊。不过,这种情况在不同的层面上反映也有所不同。

---

① 1962年10月10日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54～155页;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边防第一团司令部关于中苏边境有关事宜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77/2/17,第24页;1954年9月省政府外事处关于中苏边境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257,第70～72页。

② 参见1964年3月27日中苏边界谈判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的发言,*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с. 361。

③ 参见1956年12月5日黑龙江省关于中苏边境有关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337,第87页。

中苏边境省区各级地方党政领导机构作为中央政策的执行者,能够较为准确地领会中央的有关精神和指导思想,他们对现代国界的含糊理解中,更多的掺杂进了一种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意识。地方官员不仅向群众强调中苏两国要联合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苏联帮助中国防御帝国主义分子颠覆和破坏活动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引导边民在争议地区、争议岛屿的问题上不要计较一时、一地、一己之利。事实上,苏联方面边境省区各级政府在苏中边界问题上,也十分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赫鲁晓夫后来甚至还对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边界纠纷,对共产党人来说边界是一个历史范畴,到共产主义社会,边界问题将会完全取消,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只不过,苏联自己从未照此实行过,涉及到领土问题时,苏联一贯是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在中国边境省区的宣传材料中,国界认识的冷战色彩颇为鲜明,例如,认为中苏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友好的,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应该明确,中国不是对苏联,苏联也不是对中国,而是中苏两国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派遣特务和间谍的活动,双方密切配合,保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安全。[②]1954年时,黑龙江省饶河县政府曾就苏联占据中方岛屿问题与苏联边防军进行交涉,对方答称:"目前帝国主义很疯狂,为防止坏分子暗藏,须提高警惕,我们不是要小岛子,如果你们有边防军并保证无敌人,可完全交还你们。"萝北县某居民就此类问题与苏边防战士争执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答复。对于这种情况,黑龙江省政府外事部门认为:由此可见苏方主动防守这些中国的岛屿和山脉、加强边境防卫,是从中苏两国安全与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这是完全必要的。况且

① 刘晓著:《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21页。

② 参见1957年10月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伊犁州档案馆,11/1/57,第38~39页。

上述岛屿、山脉在经济利益上对中国居民的生活影响不大。进而提出:现在国际斗争复杂,帝国主义无时不在派遣特务和间谍分子伺机潜入中苏两国,目前我们无力防守一些岛屿山脉,假如苏方也置之不管,则无疑将给坏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使他们藏身其间,从事破坏活动,这对中苏两国均为不利。因此关于目前边界变动问题,暂不向苏方提出以求解决,待将来有了足够边防力量以防止帝国主义敌特的破坏活动时,再行考虑。边境各县政府应向边民进行防奸防特和中苏友好的教育,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使之不仅要认清中苏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并且要积极协助中国政府与苏联边防军做好边境防卫工作。①

而在普通边民的层面上,由于在一些有争议的地区渔猎放牧事关边民的日常生计,因此他们除了边界概念、国界意识非常淡薄和模糊外,还夹杂了追求经济、生活上的个人利益的内容。在这些普通并朴素的边境居民看来,苏联是咱们老大哥,到那边吃点儿拿点儿没什么。中苏两国是朋友,越境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些岛屿本来是属于我们的,可以随便去捕鱼砍柴。觉得“苏联是咱们老大哥,为啥占我们地方?”“在咱们这边江套子上搞副业,苏联老大哥还不允许吗?”等等。②

在边民国界意识问题上,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那就是在中苏边界西段,尤其是新疆的伊犁州,边界问题与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甚至混淆了边民的国家观念。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苏联境内的一些相应民族有着深厚的血缘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加之历史上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上的

---

① 参见1954年9月省政府外事处关于中苏边境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257,第70~72页。

② 参见1954年9月黑龙江省政府外事处关于中苏边境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257,第72~74页;1957年9月25日伊犁军区关于伊犁区边境情况调查总结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57,第13~18页;1956年12月5日黑龙江省人委关于中苏边境有关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337,第86~88页。

渗透和影响,①苏联在伊犁特殊地位的保留等诸多因素盘根错节,使得该地区的边民不仅边界意识淡薄,就是国家观念也十分模糊。直到 60 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 25 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兹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②

中国边民越境行为的随意而多采

国界意识的淡薄和模糊,构成了边民越境的心理基础,而中苏边境地区有边无界、有边无防,边境防务薄弱的现实,则为边民的越境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由此,在 1950 年代,中苏边境省区的中国边民越境者成分复杂,越境行为随意,目的五花八门。

就人数而言,1954 年至 1957 年,中苏边界东段和西段地区中方每年的越境人数从数十到数百不等,有的人是反复过界,屡教不改。相比较之下,苏方越入中国境内者则是少之又少。以黑龙江省为例,1954 年中方越入苏境者 94 人,苏方则只有少数人骑马打猎越入中国境内十余次,旋即返回,还有两个农民醉酒后跑到中国境内;1955 年中方越境 50 余

---

① 关于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情况见俄国学者专著:*Бармин В. А.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以及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ng*, 1944—194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参见沈志华 1998 年 8 月 27 日采访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张克迅记录;《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伊犁州公安局史志办 1988 年编印,第 38 页;1963 年 3 月 28 日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伊犁州档案馆,11/1/120,第 228、231 页;1962 年 10 月 10 日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 143 页。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李丹慧:《对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 年第 4 期,第1～5 页。

人,苏方只有一名工人越境到中方,一名居民因采野菜迷路进入中国。

从越境者成分看,有学生、乡民、失业人员、精神病人、小偷、逃犯、苏联侨民、迷路人,以及误人苏联国境的地质勘探人员和国家干部。另外,还有原居苏联、后被动员回朝鲜参加建设的朝鲜侨民。

越境者的目的更是多种多样,主要为采摘野果、野菜、木耳、山药,打柴、打猎、捡拾鹿角、捕鱼,收获的成果或拿到城里去卖,或贴补生计。次之是放牧、撵马、追赶牲口。如牧民放牧时发现苏方水草茂盛,即有意越境放牧自己的牲畜。一些牧民和国营牧场紧靠边境放牧,管理不好,造成大量牲畜越境,边民随之过境寻找。其他者,有的人为找职业、求学,或准备到苏联去生活,或因家庭纠纷负气出走;有的人欲往苏联探亲担心申请遭拒绝而越境,苏联侨民则是怕要求回国不被批准而越境;有的人偷越国境,贩卖黄金和羚羊角,进行走私活动;有的则单纯就是过境去游玩,或者随便越界游逛,向苏联边防军要东西;有的人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联究竟是什么样子;有的人则是故意越境,在苏方松土地带踏上脚印再返回,迷惑苏联边防军,借以取乐;个别单位对劳改犯管理不严,犯人趁劳动地点距国境线近而逃入苏境;苏联朝侨则是取道中国越人苏联过境。在种种越境行为中,中方认为比较严重的情况是越入苏境的盗窃行为。如在黑龙江省,1953年密山县某地5名合作社社员越境偷铁丝52公斤,被苏联边防军鸣枪撵回;1954年富锦县先后有16人潜入苏境偷盗沙滩上的废铁300余斤、日伪被毁地堡上的废铁筋板2000斤,以及河岸边的木排200余根,等等。[①]

① 以上有关越境人数、越境者成分、目的等项,参见1954年9月黑龙江省政府外事处关于中苏边境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257,第72~74页;1956年12月5日黑龙江省关于中苏边境有关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337,第86~87页;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边防第一团司令部关于中苏边境有关事宜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77/2/17,第24页;1957年5月14日伊犁军区关于中苏边境上人员、牲畜越境情况的补充报告,1957年9月25日伊犁军区关于伊犁区边境情况调查总结报告,1957年10月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7年11月26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关于边境工作的指示,伊犁州档案馆,11/1/57,第49~50,13~18,39,10~11页;1958年9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专员公署关于中苏边界1952年以来所发生问题的综合材料,伊犁州档案馆,11/1/68,第86~89页。有关1950年代新疆地区中国边民和牲畜的越境情况,在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档案馆所存各期"边防情况简报"中有详细报告,笔者虽阅览过,但未获准进行摘记。

中苏两国地方政府对越境事件的处理方式

中国边民越境频繁发生，屡禁不止，除了上述思想观念和边境防务状态的因素外，与中国边境省区边境管理制度不严的状况也有一定的关系。事实上，有的边境省区在5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抓对边境居民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如1953年12月，原松江省领导机构即颁发了《边境各县对外联系的暂行规定》，指示各边境县份加强对居民的管理和教育，防止越境事件发生，并规定在与苏方联系上除指定的县领导同志和公安局长外，其他人不得随便进行联系。[①] 1955年初，中共黑龙江省委也曾发布有关问题的各项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本省边境居民的中苏友好及遵守国境规则的教育，加强边境管理，杜绝越境事件的发生。提出对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越境犯，应给予必要的惩罚。为了加强边界的行政管理，黑龙江省还于翌年末向中央请示说，是否可以考虑在村落稀少的地区增设军事的或公安的检查卡哨或派出所，以配合群众杜绝越境事件。伊犁军区则在1957年进行边境情况调查，根据人畜越界等问题提出了对边防工作的意见和要求，通告说：严禁中国边境农牧民越境到苏联去拾鹿角、砍柴、找牲畜、打猎等非法行为发生。要求牧民加强对牲畜的看管，防止牲畜越境。警告那些经批评教育不改初衷仍然越境者，政府要根据其越境情节的轻重依法处理。并建议各地各级公安机关，指定专人负责边防工作，建立制度，建立边防工作档案。[②] 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下，边境管理的松懈状态依然存在，边民越界的行为也是禁而难止。

此期中国方面在对边民加强遵守国境规则、尊重双方边界教育的同时，加大打击力度，对越境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依法给予必要

① 参见1956年12月5日黑龙江省关于中苏边境有关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337，第87页。

② 参见1955年2月17日黑龙江省外办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257，第72～74页；1956年12月5日黑龙江省关于中苏边境有关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337，第86～87页；1957年9月25日伊犁军区关于伊犁区边境情况调查总结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57，第13～18页。

的惩罚,对于盗窃分子,公安机关则予以扣押法办。[1] 苏联方面对中国人畜越境采取的处理措施,一般是暂时扣留越境者,与中方交涉后送回,或当即撵回;越境牲畜则直接赶回中国境内。中苏双方边防部门定期进行会晤,交涉人畜越境等问题。苏方并能在与中方协商的基础上,对中方在某种情况下的越境行为做出让步。例如,在吉林省图们江下游紧靠江岸、临界苏联的会忠源、洋馆坪两处,中方位于图们江与苏联中间的通道极其狭窄,被洪水冲断后,中方的人员和牲畜通行必须经过苏境。1957年,中苏双方就这两处的中方通道进入苏境问题进行协商,中方请求苏方借路,苏方同意并让出了一条通路。[2]

可以说,尽管边民越境的深层心理原因与中苏国界领土争议的悬而未决有关,但其主要的、更多的还是属于边境事务管理、政策法规教育的问题,而非领土纠纷。当中苏双方都能以友好的方式处理越境情况时,中苏边境线上的平静也就多了一份保证。

(四)中国准备着手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在波匈事件爆发至平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必须平等互利和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两个原则,在苏联处理危机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

---

① 参见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边防第一团司令部关于中苏边境有关事宜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77/2/17,第24页;1954年9月黑龙江省政府外事处关于中苏边境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257,第72～74页;1957年5月14日伊犁军区关于中苏边境上人员、牲畜越境情况的补充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57,第49～50页;1955年2月17日黑龙江省外办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257,第72～74页;1956年12月5日黑龙江省关于中苏边境有关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档案馆,34/3/337,第87～88页。

② 参见1962年8月8日中共武警部队吉林省总队委员会关于贯彻"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边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几项请示,吉林省档案馆,1/1～18/245,第3页;1962年8月21日武警部队吉林总队1962年上半年中苏边境发生问题与会晤联系情况纪要,吉林省档案馆,77/8/3,第167～168页;1963年10月31日中央批转军委关于中苏、中蒙边防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七个文件,附件五:关于中苏边境我方实际控制线和巡逻线的调整方案,吉林省档案馆,1/19～1/243,第12页。

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声望不断提高。随着毛泽东在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与各国共产党领袖轮番谈话,进一步修补苏共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得到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 1958 年后,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开始在中国发动大跃进运动,于超英赶美的同时,暗中与苏联展开竞争。这时,中国在经济上的跃进和在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运中政治地位的巩固,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作为保证,而中国同不少邻国之间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实际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由此,中国加快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

1958 年 4 月,中国外交部向边境省区发出通知,提出:今后要逐步解决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鉴于这类问题比较复杂,急需首先充分地搜集资料,进行研究。这项工作,除中央现已由我部联合其他有关部门着手进行外,并请各省区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指定专人,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通知指出:边界问题的研究,应以未定国界和已定界中有争议的问题为重点。继之 7 月份,国务院边界委员会成立,由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民族事务委员会、地图出版社、总参军事测绘局和总参警备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直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陈毅副总理领导。边委会的任务是全面规划划界工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和提出谈判方案,以便有步骤地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关于边界纠纷和边防事宜仍归相关部门处理,不属于边委会职责范围。边委会设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个组。前者的工作计划是,争取 1958 年解决中蒙边界问题,1959 年解决中苏、中越、中朝边界问题。其中关于中苏边界的工作进行情况和计划要点是:中苏边界是由清朝政府和沙皇俄国间划定的,东段主要以河流为界,西段大部分建有界碑。除帕米尔一段系未定界外,其他均属已定界。但由于河流改道等原因,有些地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双方对黑龙江内的二百多个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看法,新疆段内也有两处存在问题。这些情况均需进一步搞清。资本主义国家组的计划,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准备在 5 年至 10 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问题,

大体顺序是:中缅、中印、中阿和中克。[①]

8月,国务院又决定有关边境省区相应成立边界工作小组,负责本地区的边界工作。此后,中国边境各省区相继成立了边界工作小组或调查组,展开调研工作,整理材料、绘制地理详图,以及提出今后划界和立标方案等等,并不断逐级向上汇报情况。[②] 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边界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国边界线很长,在未定界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解放后新发生的纠纷都不少;在已定界部分,也有一些地方界线不清。目前我们对于边界情况掌握不够,有关边界的历史资料和外交档案极不完备,又无精确的地图,特别是对未定界地区了解更少,这就给我们边防警卫和对外交涉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指示》强调说:边界问题事关我国和有关的邻国,因此不能单凭我们的主观愿望急于求成,但是,我们应该抓紧时机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在有必要和有条件同某一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致处于被动。不过,在此期中共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日程表上,社会主义国家还居于后位。中共中央在要求有关各省、区党委注意抓紧对边界工作的领导时,特别提出:与民族主义国家接壤的省、区党委,更应该把边界工作列入党委经常的议事日程中。督促还没有成立边界工作小组的省、区迅速将小组成立起来,并规定各省、区一般每半年应向中央及国务院书面汇报边界工作一次。[③]

是年,中苏边境省区的各边界工作小组、调查组勘查地形、调查研究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友好、信任的状态下,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

---

① 参见1958年4月25日外交部关于边界问题的通知,吉林省档案馆,77/4/1,第15~16页;1958年7月16日外交部关于边界委员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广西自治区档案馆,X50/2/290,第5~10页。

② 参见1958年8月8日国务院关于组织边界工作小组的通知,广西自治区档案馆,X50/2/290,第4页;1958年9月2日伊犁区委、州委关于成立工作组调查中苏边境的联合指示,1958年11月2日博乐县边境调查工作报告,1958年12月7日塔城中苏边境调查组工作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68,第69~70,141~142,122、124页;1958年9月吉林省人委边界小组关于中朝、中苏国界上存在问题的请示,吉林省档案馆,77/6/12,第75页,等等。

③ 参见1958年12月13日中央关于加强边界工作的指示,广西自治区档案馆,X50/2/258,第37~3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行着。例如,在吉林省珲春县中苏接壤地区,双方接触线以 1938 年苏联架设的铁丝网为界。据当地居民反映,洋馆坪一带历史上有一块面积约 500 小垧的平地原属中国,后来不知何故被俄国占去了。对此,吉林省边界小组组织的珲春县勘查小组经研究相关材料及勘查地形后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新疆伊犁州,边界工作小组接到一些报告和反映,称裕民县某处有个别地带界线与三区革命时不同,发现有深入中方境内 200 米的现象;察布查尔县有界牌被苏方搬动的现象,等等。工作组没有草率予以肯定或否定,而是提出:这些情况真假尚无定论,还需做重点调查。对于察布查尔县的情况,工作组访问了一些在边界线上住了很久的老人,并根据他们关于自中俄划界以来该县界牌从未更动过的说法认为,该县境内中苏边界线基本没有问题,应维持现状。[①]

进入 1959 年后,边界问题成为中国外交斗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中最紧张的是中印边界,所以,这一年,边委会以中印边界为重点,大力进行调查测绘,与其他邻国的边界调查工作基本暂缓进行。根据边委会的总结,是年内,在调研方面,除了汇编中印边界问题的各种资料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三所按边委会决定,清理了有关的边界历史档案,共整理出"界务历史资料"36 册和"中蒙边界问题参考资料"10 册。在地图绘制方面,完成了边界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国庆十周年前,边委会组织了地图检查小组,对北京 11 个展览馆展出的地图中有关边界线的画法进行了检查,发现有的地图国界轮廓绘制不准确,有的地段画进来,有的地段画出去等一些问题。据此边委会认为,目前中国地图发行工作存在混乱现象,特别是对国界线的画法不一致,易给外人以把柄。于是专门就此进行研究,提出意见报请国务院审批。在勘察测绘方面,时间的安排和方式是视外交斗争的形势和具体情况而定的,主要围绕中印边界问题展开工作,并非凭主观愿望,全面开花。由于尚未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正式商谈边界问题,为了避免刺激和引起对方边民的思想混乱,各地的勘察

① 参见 1958 年 9 月吉林省人委边界小组关于中朝、中苏国界上存在问题的请示,吉林省档案馆,77/6/12,第 75、80 页;1958 年 9 月 2 日伊犁区委、州委关于成立工作组调查中苏边境的联合指示,1958 年 12 月 25 日伊犁州人委中苏边境情况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68,第 69～70;156～159 页。

测绘工作一般以隐蔽摸底的方式进行。[①]

边委会的责权和机构设置此时进一步明确化,鉴于边界问题涉及外交、军事、民族等各个方面,各部门均已有专职分工,如边界谈判和边防斗争由外交部和国防部管,重大的问题则由中共中央直接抓,因此,边委会的职责主要是为外交斗争做好材料调查研究的后勤支援工作。边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边委会办公室和下设的三个边界工作组(由外交部有关地区司组成)与总参测绘局、国家测绘局、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和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密切配合进行。边委会今后的任务则被明确规定为: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组织实地勘察,指导边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边界问题的调研工作,以及外交部的三个边界工作组和地方边界小组的工作。必要时,召开研究一定问题的会议,集思广益,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摸清边界情况,为解决边界问题做好准备。而调研工作必须确立为外交斗争服务、为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服务的指导思想。[②]

中国同社会主义邻国的边界,在这一年形势基本稳定。国务院边委会评估说,中国与社会主义邻国的边界情况分为三类:第一为原有纠纷未获解决,但未产生较大问题者;第二为原有纠纷未获解决,而且又出现了新问题者;第三为双方已协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未进行,但又发生了枝节问题者。中苏边界属于第一类情况。根据外交部苏欧司的工作规划,1959年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方针主要是:继续加强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同苏联的团结合作,积极而又适当地支持各兄弟国家特别是苏联对内对外的重大措施,进一步密切同各兄弟国家特别是苏联在国际斗争中的相互配合。对于同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在国际斗争和反现代修正主义问题上某些认识上不一致的问题,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既主动又耐心的态度,逐步解决那些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既要反对骄傲急躁,也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在处理同东欧兄弟国家的关系时,还应注意尊重苏联的领导地位,照顾到中苏的团结。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

① 参见1960年3月14日国务院边界委员会1959年工作总结和1960年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50/3/37,第85~89页。

② 参见1960年3月14日国务院边界委员会1959年工作总结和1960年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50/3/37,第85~89页。

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具体工作规划仍然是研究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等。调研工作仍以动态为主，加强综合动态的报道，并保证不遗漏重要动态。专题研究要求提高质量，主要根据外交工作的需要进行。[①]

在具有大面积争议地区的中苏边界西段，[②]1959 年 3 月新疆自治区边界小组正式成立。该小组根据伊犁区边界调查组调查中苏国界现存问题情况和所掌握的中俄、中苏边界历史档案资料，整理出了中苏国界情况资料，并提出了解决中苏国界问题的初步看法和意见报送边委会。在所确定的 1959 年自治区边界工作任务中，居于首位的是大力协助进行中印边界勘察，继续复查中蒙边界，搜集有关历史资料，为中蒙划界谈判做准备。作为次一级的中苏边界工作，对国界的调查以地方为主分别进行，自治区帮助配备调派一批技术人员参加此项工作。按照规划，边界小组要争取于当年 9 月完成中苏国界现存问题的深入调查，根据自治区关于解决中苏国界问题的初步意见提出解决方案。[③]

当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循序渐进时，1958 年至 1959 年中苏两党关系的变化成为一种外力渗入到这个进程中来，给这项工作良性发展的前景投下了阴影。

中苏两党 1958 年中后期在建立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和炮击金门事件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而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采取沉默和冷淡态度，赫鲁晓夫还公开表态提出不同看法的行为，更进一步激怒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毕竟在他看来，这两项创举前者显示了快于苏联的建设速度和优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后者则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

---

① 参见 1960 年 3 月 14 日国务院边界委员会 1959 年工作总结和 1960 年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50/3/37，第 85～89 页；苏欧司 1959 年工作规划，吉林省档案馆，77/5/3，第 76～77 页。

② 如前所述，中苏边界争议地区总面积 3.5 万多平方公里，其中 3.4 万多平方公里在中苏边界西段。

③ 参见 1959 年 3 月 11 日新疆自治区人委关于成立边界小组的通知，1959 年 3 月 4 日自治区边界小组关于成立区边界小组工作发展情况的报告，伊犁州档案馆，11/1/74，第 16，10～14 页。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有了这两条,中共无疑就具备了掌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资格。[①] 中苏之间的芥蒂加深了。

1959年初,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虽然赫鲁晓夫宣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但是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苏联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在同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会谈时则抱怨说,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另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②]。4月,康生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声明:关于裁军的国际协定,以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参加和没经其代表签字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将不可能产生任何应有的效力。[③] 这其实已是在阵营内部向赫鲁晓夫全面彻底裁军的方针提出了挑战,示意苏联不要在一些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即做出了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实际上单方面废除了苏中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④] 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后,苏联方面迅速意识到,中国采用的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很可能会被同样运用于与其他国家的边界争端之中,苏联外交部为此于9月8日即向苏共中央提交了题为"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⑤] 而9月9日塔斯社发表的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则令中国方面认为作为盟友的苏联偏袒印度一方,率先对外公开了中苏

---

① 关于此问题的评述,详见本书《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和《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一文。

②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之三),《人民日报》,1959年1月28日;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27~228页。

③ 中国观察员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27日。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21~222页。

⑤ 参见 M. Y.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p. 252。

两党的分歧。[①] 如此种种，中苏之间的不和谐音愈益强烈，领土和边界问题开始摆到了桌面上，中苏这对亲兄弟要明算账了。

是年 9 月 15 日，在为赫鲁晓夫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做准备时，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提交了长达 30 页的关于中国状况和苏中关系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国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对此，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②]。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中国关于中苏边界问题态度的反映。换言之就是，苏联官方于此时第一次正式注意到中国方面有人提出的“领土要求”。虽然当时中苏之间嫌隙已生，齐米亚宁对中国旧案重提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立场和态度。不过事实上，苏联方面以后还是将 1957 年当作了潘朵拉盒子首次正式开启的日子，[③]即如苏联的苏中关系问题专家、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拉赫马宁（笔名鲍里索夫）在 1978 年时评说的那样：“中共领导人击退了右派的进攻，但对他们提出的对苏领土要求没有做出回应。”[④]对于莫斯科来说，这不啻于就是一种纵容了。

---

① 参见 1960 年 1 月 26 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283～284 页；邓小平在 1960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 Longman Group-Limited, UK, 1985, pp. 21～22；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71 页。关于此问题的评述，详见本书《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几个问题》一文。

② Mark Kramer, The USSR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 September 1959,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 178.

③ 参见 Su Chi, Sino—Soviet Border Negotiations: 1969～1978，林恩显编：《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台湾台水，国立政治大学，1985 年 4 月 30 日，第 849 页。

④ *Борисов О. Б.*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转引自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итязания пек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история, М., 1979, c. 13。

9月末至10月初,赫鲁晓夫访华,10月2日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在这次会晤中,赫鲁晓夫回忆了1957年1月周恩来对他所做的关于苏联在领土问题上处理不公的批评,一吐耿耿于怀的不快,借机批评中国解决中印边境冲突的方针,以作为对当年挨训的因应。其结果却招来中国方面更为严厉的回击,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是机会主义。[①] 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此次大伤感情的争吵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这实际上就奏响了以后中苏之间大论战的序曲。转入60年代后,中苏两党两国似乎走上了一条关系恶化的不归路,边境冲突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正式公开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方式也逐渐从友好、协商向冲动、缺少沟通的摩擦转变。中苏边界晴朗少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五)结　语

纵观整个50年代,中苏国境上蜿蜒着一条和睦的边界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的约束下,中国毗连苏联的国界实际成为一条与苏联共同的国界,苏联的国防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也承担着保卫中国边界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搁置了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对现实中发生的领土争议的矛盾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中苏界务关系呈现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状态。双方因边界问题发生纠纷的次数不多,程度轻微,并且都能很快地以友好方式化解。1958年中国启动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步伐之后,尽管中苏两党分歧加深,冲突不断,但是在强调继续加强同苏联团结合作的党的总方针的指导下,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的舆论宣传氛

---

① 参见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 - 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2, с. 111～126。

围中，[①]有关中苏边界的历史和现实的调研工作仍然继续平和地进行着。事实上，如果在中苏同盟继续牢固、两党两国关系继续友好的基础上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随着调查摸底的深入，俟条件成熟后，双方应该可以寻找到各自都能接受的结合点，达成某种共识，进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是中苏两党的原则性分歧越来越大，在各个方面都已很难达成共识。于是，事务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中苏同盟在短短几年里就从蜜月走向破裂的历史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其根源就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在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独立主权。于是，一方面，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利益和主权的完整性很难得到保证；另一方面，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盟主便会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则必然遇到挑战，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根本原因，也是中苏同盟最终解体的深层原因。[②]

---

① 参见1959年《人民日报》。在国庆期间与赫鲁晓夫发生激烈争吵之后，毛泽东于回答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关于"苏中是否联合得像十个手指一样?"的询问时，仍然做了肯定的表示，并且还补充说：如果我们之间存在有不同意见时，这些分歧就像是半个手指一样。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联合得就像是十个手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像是出现在许多个手指上，而不是在一个上，但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参见安东诺夫关于赫鲁晓夫访美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1959年10月14日，SCCD. F. 5，Op. 49，D. 235，LL. 89～96，CWIHP Bulletin，Issue 3，Fall 1993，pp. 56～58)。

② 参见沈志华：《1950年代中苏关系若干问题》(2004年3月19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学术报告会发言提纲)。

50年代结束后,一方面,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苏关系的未来走向,而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则取决于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各种冲突因素的成功抑制或是放纵;另一方面,中苏边界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冲突因素,对这个因素的掌握和控制,反过来又影响了中苏关系演变的前景。到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中苏边界问题愈益被政治化,非但不能理智地得到解决,而且还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成为两党两国领导人决策中的一个砝码,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三笔领土账的问题被中国方面提了出来,在毛泽东的对外谈话中又触及到了外蒙古独立的旧事。中苏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从谨慎、克制逐渐发展到主动反击、军事对峙,由此,两国关系也完成了由盟友到敌人的转化过程。

李丹慧,原载《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此处略有修订。

五、矛盾分歧

13.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

——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

这里所说的军事合作，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即双方在战争状态下协同作战，或在和平时期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讲的在交流军事技术、提供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援助和协作。从这个角度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意义。此期的联合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应该说，这些军事合作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①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

① 详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载《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本书《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一文。

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然而，随着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始终未能取得成功。

综观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苏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同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在这里，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特别是 20 世纪共产党在各国（或各地）兴起的时候，这种党际关系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各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性和先导性，苏联共产党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其本质是排斥被领导各党的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同盟关系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种事例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

本文着重分析 50 年代中后期在中苏军事合作方面所发生的三个事件，即远东防空协定、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问题。在以往涉及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多有讨论，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方史料，其结论也比较简单——苏联有意侵害中国主权而遭到抵制，导致中苏合作失败。本文则结合近几年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及苏方当事人的回忆，从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及其政治特征的角度，对上述事件的历史背景、缘由以及两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动机和方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或许不同以往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双方的合作愿望与苏联的领导者心态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在争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过程中，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和加大了援助中国的步伐，中苏关系进入“蜜

月"时期，两国在经济、外交和政治领域都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态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双方都有此需要和意愿，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却未能在朝鲜战场共同作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个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而赫鲁晓夫则没有及时调整原有的心态。

1955 年 1 月，苏联国防部提议中苏两国在远东的防空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中国即派出由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防空军副司令成钧等 9 人组成的代表团，于 1 月 24 日到达伯力（哈巴洛夫斯克），同苏联远东军区及太平洋舰队商谈防空合作问题。2 月 6 日双方签署了苏联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联合防空协议，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文件：1、关于防空兵力、兵器歼灭越境敌机的协同作战计划；2、关于防空兵力、兵器协作演习的实施计划；3、中苏防空作战协同方案图。然而，全部文件只有俄文本，却无中文本，且中国根据协定增设的情报机构和增加的通信设施还要用俄文向苏方通报。陈赓等人回国汇报后，彭德怀认为这个防空协定没有按照国际惯例以双方文字体现，因而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建议，暂不批准该协定。[①]

防空协定的搁浅，并不说明中国不愿进行军事合作，应该说，中国在远东防空方面对合作的需求更甚于苏联。显然是苏联军人在言语和行动中流露出来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心态引起了中国的反感。如果在斯大林时代，即使苏方再傲慢的举动（如中苏领导人会谈从来不许中方做记录等），中国也未提出异议。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中国军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还要求助于中共的支持。此时，尽管苏联仍是同盟当然的领导者，但中国已经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这一点，在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集团需要调整社会主义各国的军事战略时开始显露出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和日益明显的军事化趋向，迫使苏联

---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86 页；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2 页。笔者 2001 年 6～9 月采访王亚志记录。

也组织起东欧军事集团，以显示其抗衡的力量。虽然华沙条约的宗旨是“保障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是否主动提出过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苏联确曾在以后几年提议接纳中国或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例如古巴)加入这个条约，只不过这一动议受到了东欧各国的抵制而已。[①] 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及对抗西方集团的军事威胁方面，中国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5 月 12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大会上发言说：美国在远东签署的一系列安全条约以及频频发出的战争叫嚣，“使亚洲各国人民同欧洲人民一样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战争的危险”。因此，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作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彭德怀在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欧洲和平受到破坏”，中国“一定同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进行共同的反侵略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②]。彭德怀的声明似乎是非正式地把中国在 1950 年中苏同盟条约中对苏联承担的军事义务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华沙会议前后彭德怀在短暂访问东欧各国期间，也作了类似的保证。[③] 这至少说明当时中国对参加社会主义军事同盟的立场是积极的。

彭德怀在参加会议来回途经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及国防部长朱可夫进行了深入会谈，中苏双方都希望在 1950 年条约的基础上使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具体化。然而，中苏对于华沙条约的防御性要求在总体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在具体的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分歧。

会谈中，赫鲁晓夫开诚布公地向彭德怀讲述了华沙条约国部队的战略意义，及其与北大西洋集团军事力量对比的状况，介绍了苏联新式武器的发展和威力，特别讲到大型远程轰炸机和空对地、空对舰导弹，并表示可以考虑用这些武器帮助中国。谈到苏联的政策时，赫鲁晓夫说，华沙条约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促进和平。因此，苏联要提出裁

① 美国学者克雷默引证捷克斯洛伐克的档案文献说明了这一点，参见 Mark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5～1964, 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Gong, 1996。

② 《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14 日。

③ Mark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军方案，并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将撤回驻在奥地利的军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内部还有意见分歧。彭德怀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认为应该缓和国际局势，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时期进行建设，训练整编军队，建立国防工业和加强沿海国防工程。双方讨论了中国与华沙条约的关系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两次提到，华沙条约不仅是针对西方的，也是针对东方的，希望考虑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中苏之间已有同盟条约，一旦形势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可执行这一条约，也可以把这一条约与华沙条约结合起来或考虑把中苏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上一定要同华沙条约完全一样，但要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这就可以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赫鲁晓夫还说，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太平洋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如果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军队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问题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彭德怀认为，华沙条约国会议对稳定当前国际局势是一个及时的、具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对亚洲和中国的安全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发展中苏同盟条约，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互相配合。彭德怀表示，中国支持苏联的国际政策，中国也需要并已经在裁减军队，这是在政治上配合苏联。至于双方的军事合作，彭德怀表示，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海军、空军的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他将请示中共中央考虑和研究这些意见。彭德怀还提出要求苏联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军事新技术的援助。赫鲁晓夫说，感谢中国对华沙条约的支持，特别是彭德怀亲自参加，这是中国支持华约的最有力的表现，并表示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要彭德怀与苏联国防部或派专门代表团来苏进行谈判。①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内部在对外政策方面是有分歧意见的。当时，赫鲁晓夫虽然已经成功地将马林科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但自己的地位尚未巩固，特

①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13页。

别是在外交和军事领域,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程度。[①] 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的,不仅是主管外交工作的莫洛托夫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苏联军方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虽然也参加了对马林科夫所谓“核战争无法预计的破坏性”言论的谴责,但强硬路线于事无补及核武器发展的现实使他很快就转向了灵活的个人外交。赫鲁晓夫未与其盟友商量就作出的单方面裁军64万人的决定,不仅受到东欧国家的怀疑,也引起了苏联军方的强烈不满和消极抵制。[②]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华沙条约的重要性不在于内部,而在于外部,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冷战的环境中获取一种与西方进行缓和谈判的资本。而在莫洛托夫看来,华沙条约完全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凝聚力的军事组织和防御工具。这种分歧在苏联的报刊宣传上也可以隐约看出:作为党报,《真理报》强调缓和,并高度评价赫鲁晓夫对欧洲形势的分析,而军方报纸《红星报》则不断重复莫洛托夫的警告,认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需要增强华沙条约各缔约国的防御力量。[③] 5月22日朱可夫在与彭德怀讨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思想时,反映了苏联军方领导人的这种思考。朱可夫认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过时,在目前条件下的战争,以核武器实施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常规武器战争,不能听任对方先动手。中方的意见恰恰相反,彭德怀出国前(4月29日)提出,拟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协同作战与苏联进行磋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明确: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④] 于是,彭德

① 参见 *Зубкова Е.Ю.* 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щ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4; Наумов В.П. Борьба Н.С. Хрущёва 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

② Vojtech Mastny, 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 Soviet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1949~195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35,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March 2002, pp. 79~83。由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卷中刊载了19件有关苏联裁军的档案,其中一些文件反映了苏军下层人员对裁军的抵制和不满。

③ 罗宾·艾莉森·雷明顿:《华沙条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页;Mastny, 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 pp. 81~82。

④ 《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5页。据参加这次谈话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讲,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

怀到莫斯科时便带了这样一份关于中国战略思想和军事方针的国防部文件草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彭德怀便将中苏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只是无可奈何地表示双方还可以再讨论。[①] 中苏军事合作的前景已经不容乐观，苏联军人却在与中国的具体合作中继续表露出同盟领导者的傲慢态度。

1955 年 9 月，苏联国防部再次提出外贝加尔军区与沈阳军区订立协同防空协定的问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周赤萍受命同苏方进行商谈。行前，总参谋长粟裕和空军司令刘亚楼向周赤萍交代，此行谈判仅限于双方在防空情报方面的合作问题。但周赤萍于 9 月 23 日到达赤塔后，苏方把已经准备好的协议拿出来要周赤萍签字，其内容包括苏联飞机可进入中国领空并在中国机场降落，而事先不必通知中方，但中国飞机在本国飞行或进入苏联领空，均须事先向苏方通报，北京军区所得敌机情报也要通报给苏方。议定书还要求中国在东北北部地区增建几个机场，以满足苏军飞机降落之需要。此外，在为对方提供油料及食宿方面，条件也不对等。因为超出了事前协商的谈判范围，周赤萍便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刘亚楼回电答复：不能同意，应只谈防空情报合作。但周赤萍收到的复电却是同意按苏方的议定书办，于是 9 月 27 日便在防空协定上签了字。周赤萍回国进行汇报时，刘亚楼感到惊诧，彭德怀则愤怒不已，并报告给周恩来。由于中国代表团与国内的往来电报都是经苏军通讯系统传递的，很可能苏联人从中作了手脚。周恩来指示，在查清事情真相之前，不理会苏联顾问关于在 12 月开始执行协定的意见。12 月 29 日中央军委召开办公例会，会议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投资增建飞机场，并决定告诉苏联总顾问和转告苏联国防部：周赤萍违背总参和空司的指示，擅自在两国防空协定上签字，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受到处分。此协定不能执行。[②] 对事情真相调查的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苏方提出的协定本身确实没有把中国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无疑是导致此期中苏在防空领域军事合作未能具体实施的主要原因。

类似这样不平等的做法，并非仅有。例如，50 年代苏联专家帮

①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9～13 页。

②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1～63 页。

助中国开展了军事测绘方面的各项业务，在此基础上，中国绘制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于是，苏方提出每绘制一批新图都应给他们一份，但同时却不愿意将苏联绘制的中苏边界地区军用地图交给中方，而只同意提供缴获后经过改制的日本地图。军委测绘局自然婉言拒绝了苏方的要求。又如，1955 年 5 月驻旅大地区苏军撤走时，苏方移交了海军基地的设备，却扣留了旅大附近海区的测量资料和海图。后在中方交涉下，才提供了一份《旅大地区测量标志坐标资料》。[①] 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联人在同盟中始终保持着那种领导者的心态，尽管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大趋势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1956 年 1 月 28 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为中国派出的观察员，聂荣臻指出，“欧洲和平和亚洲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六万万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奋斗。”[②]

中苏关系表面上的变化是中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继续全力配合苏联，这主要表现在帮助苏联处理与波兰的冲突、解决匈牙利事件、支持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以及召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等问题上。同样，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也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与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1957 年 11 月的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力量和空前团结，也把中苏同盟关系推向了高潮。然而，就在此后不久，中苏领导人之间为军事合作问题爆发了一场严重分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③]”事件。人们普遍认为，中苏领导人之间第一次发生的这场正面冲突是中苏国家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而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说，苏联

---

①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

② 《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9 日。

③ 俄文 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译为“共同舰队”的。

的做法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赫鲁晓夫的意图在于控制中国。[①] 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历史定案。[②] 然而，人们没有看到，表面上的"蜜月"关系掩盖了中苏双方在同盟中所处地位的微妙变化。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争吵，正是因为一方对同盟关系现状已有不满，且在努力促成和显示这种变化，而另一方对此则没有相应的察觉，行为方式依然如旧。

（二）中苏实现军事合作的良好条件和背景

莫斯科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中苏友谊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后，军事代表团继续在苏联参观访问。11 月 27 日，赫鲁晓夫在彭德怀举行告别宴会上即席讲话，真诚感谢中国党对苏联的理解和支持，盛赞中苏两国、两党的团结和友谊。当时的气氛和场面，使在场的中国人颇受感动。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③] 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确有把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军事一体化推向扩展和深入的趋势。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12 月 14 日，中国向苏联提交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中苏委员会来管理国防工业，委员会由双方的几位代表组成，每年会面一到两次。"中国设想的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二、讨论诸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各种武器生产方式一类的问题；三、讨论技术规格的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

① 毛泽东 1966 年 3 月 28 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 1958 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24 页。

②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12 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727、728 页。

③ 对此，彭德怀告诉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有些问题正在讨论中，有些是苏方的想法，也有些是猜测。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60～61 页。

品及测量器具；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及援助的步骤、期限和数量；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或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便进行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提高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九、研究在武器生产方面提供技术资料的保证问题；十、讨论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其他问题。"[①]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历史文件。问题并不在于该建议的内容实际上几乎完全是苏联对中国单方面提供援助，而在于中国提出建议的方式——没有像以往那样"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而是以平等合作的形式表现这种要求。更值得引人思考的是，这个无疑体现了军事一体化内涵的建议本来似乎应该是处于同盟领导地位的苏联提出，现在却是由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提出。这也许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变在中苏同盟处于不平等和被领导地位的意向。

没有进一步的史料证明苏联是如何对中国建议作出回应的，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

1958 年 1 月 27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周恩来说，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党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复。[②] 2 月 1 日，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参赞克鲁季科夫(尤金生病)，告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这一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周恩来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去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③] 同日，周恩来接见印

---

① 该文件以英文刊登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专业杂志上，参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Washington, D. C., pp. 160～16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21～122 页。

③ 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 年 2 月 1 日。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39, р. 8893, л. 10～13。

度临时代办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场。[①] 3 月 31 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②]4 月 4 日，向美国和英国政府首脑提交了备忘录，强调苏联已单方宣布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迅速达成协议。[③] 同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这一倡议。[④] 4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苏联的倡议，并发表社论表示支持。[⑤] 4 月 9 日，周恩来即在一次外交场合说，苏联政府“这个造福于人类的伟大和平创议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支持的”。4 月 13 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⑥] 同时，中国也向苏联通报了调整对日政策的打算。5 月 9 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对苏联参赞安东诺夫说，中国将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日本国会选举中加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张闻天要求将这一情况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⑦]。

在外交方面默契配合的同时，中苏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双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虑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1958 年 2 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对于这次谈话的内容，苏联方面尚未通知驻华使馆，中国领导人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2 月 28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

---

①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24～125 页。

② 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 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 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 *CWIHP Bulletin*, Issues 4, 1994, p. 16.

③ Morton Halperin, 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 1957～1960, Morton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Cambridge: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7, p. 136.

④ 《赫鲁晓夫言论(1958 年 1～4 月)》第八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年，第 522 页。

⑤ 《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7 日。

⑥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36～137 页。

⑦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备忘录，1958 年 5 月 9 日。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36, р. 8893, л. 77～81。

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①]3 月 9 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朱德还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此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起来。”朱德赞扬，“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由苏联负责。至于经济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首领——苏联来做。”[②]5 月 20 日至 23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了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共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说，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无疑“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③]。

在政治方面，中苏更是紧密配合。由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是铁托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会议的做法，使赫鲁晓夫大为光火。于是，苏联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并要对南共纲领提出批判。为此，赫鲁晓夫首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4 月 5 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尤金，表示非常赞成苏共中央来信中对南共所做的结论，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说，关于如何对待南共纲领草案，是

---

①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8 年 2 月 28 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6，л. 86～96。不过，关于赫鲁晓夫与刘晓谈话的详细内容，目前在中俄双方的史料中均未有反映。

② 尤金与朱德会谈备忘录，1958 年 3 月 9 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6，л. 97～103。另参见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 102。

③ 《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6 日。

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在4月5日和6日召开会议，进行详细讨论。毛泽东保证，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周恩来当场给在北京的刘少奇打电话商量，因时间来不及，确定推迟一天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表示同意后，又对尤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虽然会议尚未召开，但应该现在就把政治局的答复通报给莫斯科，即"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毛泽东强调说，在这样的问题上表明中苏两党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尤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祝贺，并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①]。4月9日，周恩来向尤金介绍了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交给了尤金。周恩来特别说明，这封信尚未发出，因为中共需要先了解一下苏共中央给南共信件的内容。尤金当即递交了苏共的信件，周恩来接着询问了苏共曾向哪些兄弟党通报过这一情况，并得到了答复。[②] 几天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又分别会见尤金，互相通报了各自得到的各国共产党对南共纲领及七大的态度和立场的情况。[③] 在4月18日与克鲁季科夫交谈时，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批评南共的纲领草案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指出，由于它的虚假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一些兄弟党，因此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产生瓦解作用。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在谈到南共纲领草案时，则声明说，南斯拉夫人是在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挑衅，对这种挑衅应该给予坚决的反击。[④] 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

---

①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备忘录，1958年4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22～134。

②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8年4月9日。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41～147。

③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备忘录，1958年4月12日。АВПРФ，ф.0100，оп.51，п.172，д.6，л.150～160；尤金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1958年4月17日。ЦХСД，ф.5，оп.49，д.131，л.71～74。

④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8，л.231～233；д.9，л.80，*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л.321。

了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应该受到谴责》的文章。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就是在这样友好合作的气氛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1957年底，在军事上，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海军如何在新技术、新装备方面有所发展，而苏联遇到的则是怎样在战略上发挥太平洋舰队作用的问题。中苏各自的需要驱使他们共同谋求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然而，赫鲁晓夫提出的合作方式却令他意外地受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愤怒谴责。赫鲁晓夫显然没有察觉到，当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之前强调的是各国的独立发展道路和各党的平等地位，而在此之后更多强调的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统一，是各党协调一致行动的必要性。这种变化表明，中国党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处于被领导地位的政党了，而中共领导人一再提出"应以苏联为首"的本意似乎是在提醒赫鲁晓夫：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需要的是一位更加革命的和朝气蓬勃的新的领导者。

（三）赫鲁晓夫的一相情愿与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1958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①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外出潜艇与本土的通讯和联络问题，那时还没有卫星，只能依靠无线电台。在此之前，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向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超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分别承担与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联络的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对于海南岛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

① *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1996，c. 245。由苏联402厂建造的这艘核潜艇在试航中共航行3802海里，其中水下航行2002海里。

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①] 于是，1958 年 1 月 6 日，苏联国防部的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的海军司令肖劲光，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②]

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 1954 年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 1957 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③]

建立长波电台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但如何建立呢？4 月 18 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 1958 年至 1962 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 1000 千瓦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资 1.1 亿卢布，苏联出 7000 万，中国出 4000 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4 月 24 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 5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一五二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主张，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出钱自己办，平时可向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来人，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会议确定将苏联的建议交海军和总参通信部研究并提出意见。5 月 23 日军委再次开会，确定不同苏联合办长波电台。6 月 4 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④]

---

① 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264～265 页；《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1 辑，第 208～209 页。

②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建设》，载《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509 页。

③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200～201 页。

④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80～681 页；《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第 907 页。

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察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为了不影响勘察设计工作的进行，彭德怀建议，同意苏方来人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6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①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固执态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再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6月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一个6人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中苏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双方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7月21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讨论的精神，又一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了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②

就在这一天，苏方又提出了"联合舰队"的问题。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要求提供海军援助而提出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解决长波电台问题的一种变换方式。

通过《国防新技术协定》，解决了中国陆军和空军发展新式武器的问题，海军自然不甘落后。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肖劲光向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65～266页。

② 《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2～113页；《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508～50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7～160页。

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1] 回到北京后，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于 1958 年 4 月向彭德怀和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提供的 5 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于是，在彭德怀和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6 月 28 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2] 同日，周恩来还批转了聂荣臻关于开始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聂荣臻报告说，"关于设计和试制原子潜艇问题，二机部刘杰同志曾与该部苏联专家谈过，专家表示，他个人愿大力支持。"[3]

7 月 21 日，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日晚 10 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苏方有使馆参赞安东诺夫和魏列夏金，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尤金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尤金谈了中东局势、南斯拉夫、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及苏联国内经济情况等 4 个问题，会谈持续了 3 个半小时。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毛泽东立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尤金汇报结束

---

①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175～182 页。

②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第 183～184 页；《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49 页。

③ 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553 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43～644 页。

后，毛泽东即抓住联合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是否只搞合作社，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要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提供帮助，中国可以不搞核潜艇。①

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毛泽东反对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尤金随即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并于天亮发出。②

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毛泽东似乎是在强调，他的谈话表达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谈话内容的主要部分现已在中国正式发表，根据这个节选的谈话记录，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③除此之外，毛泽东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借题发挥，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以来积压的对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不满情绪。苏联参赞魏列夏金的回忆录补充了许多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被删节的内容——主要是对苏联的指责，如在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在中国使馆安装窃听器；苏联前任大使罗申在中国外交部发展情报员；贝利亚与高岗勾结，多次派人与高岗联络；苏联驻新疆领事馆通过非法渠道收集情报等等。此外，彭德怀也插话，讲述了在签

①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参见《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7～160页。

② 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0～101页。

③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2～333页。

订中苏远东防空协定时，苏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骗取签字的错误做法。尽管毛泽东一再声称，这些现象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但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天"，"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有关。他们感到"心情沉重"，并认识到"对中国的政策不完全理解，过高估计了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对国家利益的差异估计不足"。[①]

正是感到问题严重，尤金在谈话中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具体措施。[②] 尤金还主动提出，他赞同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③] 此外，尽管毛泽东强调要将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赫鲁晓夫，但尤金在整理谈话记录时，还是特意删去了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潜艇问题不能得到真正解决，那么，可以不举行会晤"这句话。尤金对此的解释是："我干嘛要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冲突起来呢？"[④]不过，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预料的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确实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说：莫名其妙！并问到：毛泽东是怎么啦？赫鲁晓夫认为他需要当面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但因当时为解决中东冲突的访美行程已定，无法立即与毛泽东会谈。[⑤]

显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请求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7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接见了尤金。尤金向中国领导人

① 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1～103页。笔者核对了中方记录的全文，魏列夏金的回忆相当准确，只是记述简单一些。

② 刘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0～162页。这段内容在中国发表的文献中也被删去了。

③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2日。

④ 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3页。

⑤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7, c. 334; *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c. 101～102；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3页。

通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认为苏方在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种政治条件表示很奇怪。刘少奇问，苏共中央是否提出帮助中国建立舰队要以舰队归苏中两国共同所有为条件。尤金十分明确地回答说：苏联方面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儿暗示的迹象也没有。接着，周恩来对长波电台问题提出质问，尤金仍然表示，苏方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政治性条件。刘少奇说，照他的理解，苏联方面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了。尤金回答说，上次会晤他在通报情况时已谈过此事。于是，刘少奇对此表示赞同，并再次提出，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中国的海军舰队，但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苏联不能给予这种帮助，那么，中国可以收回或者推迟提出这一请求。最后，尤金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①]风暴似乎过去了。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在巴格达公约国家的伦敦会议上没有提出入侵伊拉克的问题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②]

（四）中苏两党会谈的表面结果与潜在阴影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宣称："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③]然而，这些言辞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这次事件留在双方领导人心理上的潜在阴影。

7 月 31 日下午 5 时至 9 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为何提出潜艇舰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

---

① 魏列夏金：《1958 年 7～8 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103～104 页。

②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c. 102。

③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4 日。

过“联合舰队”或“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是尤金转达有误，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于是，毛泽东在发了一番牢骚后，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这个问题苏共中央没有讨论，是军方提出的。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①

这次会谈的气氛虽然是紧张和敏感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同样表现出毫不客气，但已经不像对待尤金那样激烈和粗暴了。毕竟，赫鲁晓夫是上门来解释问题和承认“错误”的。而赫鲁晓夫把所有问题都推到尤金大使身上，当然不是因为尤金突然中风，而未能参加这次会谈。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感觉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引起的反应，其激烈和严重程度足以影响整个中苏关

① 关于1958年7月31日和8月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出自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俄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Д. Волкогонов）私人档案。沃尔科格诺夫生前收集了大量有关苏联历史的档案文献，根据他的遗嘱，美国在2000年公布了这批档案。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研究人员祖伯克（В. М. Зубок）整理并发表了这两份档案，俄文参见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 111～128；英文见 *CWIHP Bulletin*，Issues 12～13，Fall/Winter 2001，pp. 250～262。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没有找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记录，无法通过档案文献确定苏联究竟是如何提出这些问题的。

系，而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一只替罪羊——1959年初，尤金离任回国。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看，尤金并没有歪曲赫鲁晓夫的意图，他的失误充其量是在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反对意见后，没有立即转弯、改口，反而进行词不达意的解释，结果使毛泽东抓住机会，大发雷霆。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确实都是经过苏共领导人研究后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潜艇舰队谋求一处停靠的基地。不过，所有这些考虑完全是针对美国的，而绝非有意控制中国。正如戈尔什科夫向赫鲁晓夫解释的，苏联海军坚持要在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基地就设在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尤其是在菲律宾和台湾。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苏联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以在中国港口停泊和修理，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往返的时间，提高了海军的战斗效率。[①] 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也回忆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本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于是海军就想搞一个潜艇舰队，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这样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停泊，需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进行联络。苏联学者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建立了联合舰队，苏联的核潜艇得以在南太平洋游弋，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了。[②]

的确，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更没有设想要通过建立长波电台或联合舰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至于苏联最初坚持出资建长波电台（贷款方式是赫鲁晓夫后来在北京提出的）是否考虑到所有权，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就国际合作的方式而言，即使如此，也不存在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问题在于，当时苏联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对付美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赫鲁晓夫想到的是，“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中苏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同盟条约，而且长波电台和修理基地对中国海军也是需要的，再说根据礼尚往来的原则中国舰队也可以使用苏联的基地。“无论我们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

---

① 《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4～265页。

② 库里克在1997年10月“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记录。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所以,对于这个建议,"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困难"。甚至在接到尤金的电报后,赫鲁晓夫还认为"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①]。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鲁晓夫曾亲口对儿子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②]。

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朝鲜战争使中国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猛然提高,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革命资历又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首领,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苏联的威信受到打击,而毛泽东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赫鲁晓夫渡过了难关。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至少在国际共运中北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平起平坐了。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相比,1957 年他在苏联的境遇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种时候,毛泽东怎能甘居被人指挥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鲁晓夫再重复斯大林时代的做法?! 就以苏联租借的旅顺海军基地为例,1952 年中国曾主动要求苏联海军延长驻守旅顺口的期限,甚至在 1954 年苏联提出提前撤出旅顺基地时,毛泽东还曾表示犹豫。[③] 因为那时中国的力量还不强大,地位还不巩固。现在不同了,毛泽东虽然一再申明社会主义阵营还要"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这个"头"凡事都要与中国党进行商议。至于中苏两国的关系,莫斯科此时更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例如,就在苏联提出长波电台问题的同时,中国要建立一个水声学研究站,并需向苏联购买一艘 700 吨的水声科学研究船。聂荣

---

① 《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264~265 页;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1 辑,第 208~209 页。

②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1 辑,第 209~211 页;*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с. 110。

③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 356。

臻于7月12日给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李强复电说，此事已经中央批准，“现决定我们自己在榆林建立水声研究站(不是中苏合作建)，所需设备请苏方供应，费用由我们偿付，但凡国内能解决的应自己解决”。“建站技术及研究工作请苏派专家来我国具体指导，所获资料可互相交换。”[①]如果赫鲁晓夫稍微留意一下此时中国在类似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恐怕就不会如此冒失地提出问题了。

对于莫斯科来说，的确没有任何征兆预示着将有一场风暴来临，[②]但毛泽东却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由尤金汇报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在这次与苏联领导人的交往中，毛泽东小心地把握着分寸，既要给赫鲁晓夫一点儿教训，让他知道苏联以前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而现在中国党在社会主义同盟中的地位似乎需要改变了，又要强调中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以便实现从苏联得到海军援助的目的。为此，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名批评最多的是斯大林，其次还有贝利亚、莫洛托夫、米高扬、罗申等等，但惟独没有对赫鲁晓夫本人提出任何指责，甚至在许多地方还表示了对赫鲁晓夫的赞赏和感谢。[③] 毛泽东的策略是成功的。

首先解决的是长波电台问题。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三、苏联需要使用该电台的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同年11月，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提供设备器材和派遣专家的合同。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8人专家组来到中国，与中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开始投入大型超长波电台的工程设计。1960

---

① 《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6页。

②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с. 102。

③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с. 101，可参见各次谈话的记录原文。

年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方案后,施工部队开始进入施工现场。[①]

其次解决了防空协定问题。在7月31日的会谈中,彭德怀指出,原苏联起草的防空协定不平等,对两国友谊不利,故中方没有签字。马利诺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审议。经双方商定,于11月20日在沈阳开会。为了给苏方一个台阶下,陈毅在彭德怀的送审报告上还特别批示,要淡化处理,把责任说成是下面人员的。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远东军区司令佩尼科夫斯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克列伊泽尔与沈阳军区司令邓华进行磋商,并签署了《关于雷达兵相互报知协同计划》和《防空兵力兵器在边境地带的协同动作计划》。随后,经两国国防部批准实施。[②]

最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也得到了顺利解决。赫鲁晓夫回国以后,很快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同意向中国海军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派代表团进行商谈。[③] 经过谈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军司令苏振华和曾任驻华总顾问的苏联代表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出售629型导弹潜艇、633型鱼雷潜艇、205型导弹快艇、183型导弹快艇、184型水翼鱼雷快艇和P—11ФМ型弹道导弹4枚、П—15型飞航式导弹2枚,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苏联的60名专家随即来到中国,协助开展设计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术资料和部分设备材料也陆续到货。这一协定的执行,对于中国海军从常规武器装备逐步向新的动力装置和导弹武器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④]

---

① 《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509～512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01～202页。

② 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1～63页;《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0页。

③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81页。

④ 侯向之:《忆〈二·四协定〉的签订》,载《海军回忆史料》,第413～415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81～182页;《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5页。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赫鲁晓夫也认为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并对这次访问的结果十分满意。[①] 然而，中苏关系并未因此好转，反而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毛泽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无疑使赫鲁晓夫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尽管中苏之间继续保持着政治上的一致性，但毛泽东的言辞和做法在赫鲁晓夫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在双方缺乏相互信任感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作出的出乎意料的举动都可能刺激对方，而引起双方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此后中苏关系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先是中国在事前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并拖延向苏联提供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接着是苏联暂停按《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愤怒谴责；以后是中国未同莫斯科协商而在中印边界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赫鲁晓夫恼火，而苏联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也激怒了北京；中苏领导人之间 1959 年 10 月在北京和 1960 年 6 月在布加勒斯特的直接冲突，终于导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最后，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轻率举动，不仅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最终夭折，而且使得中苏同盟条约也成为一纸空文。

本文无意追究中苏未能实现军事合作的责任所在，不过，研究的结果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点确有一些启发。在不少研究此期中苏关系的论著中，动辄就提出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

① 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 314～315 页。作者当时是赫鲁晓夫访华的随员。

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类似的状况，不仅存在于中苏之间，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朝和中越之间。[①] 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50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英译文发表在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20, №3, 2003

① 参见沈志华提交2001年10月25日汉城学术会议论文：《中朝在韩战期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该文后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26～191页。

14.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

——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1958年8月23日，由于大陆炮击金门和美国的卷入，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在此之前，中国方面是否曾与苏联协商或通知此事？这个问题涉及对当时中苏同盟关系状况的判断，以及对后来中苏分裂原因的探寻，需要作出准确的回答。对此，以往研究者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资中筠和苏格在他们的著作分别指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曾通报苏联”①。而多数学者，如韦斯塔、陶文钊、戴超武、祖伯克、普洛祖缅希科夫、张曙光、陈兼等人则相信，“中国政府决定炮轰金门事先未同苏联政府商量”，“对他们隐瞒了行动的时间、过程和目的”，甚至是“有意不让苏联知道”，其动机之一“就是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地位”②。遗憾的是，所有上述说法，无论是肯定

---

① 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04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

② 奥·韦斯塔：《中苏同盟与美国：战争、政策与理解(1950～1961)》，载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6～187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84页；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0～221; M. Y.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p. 255;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10;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p. 179。

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者其注明的史料来源不完整、不准确，都无法证明其结论的可靠性。例如，张曙光虽然注明其根据是刘晓的回忆录，但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刘晓自己的结论实际上恰恰与张的判断相反。陈兼提到赫鲁晓夫访华时与毛泽东有4次谈话，而他只看到7月31日和8月3日两次谈话记录，恐怕还不足以得出否定的结论。普洛祖缅希科夫引证的是苏联使馆1958年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朋友"是在开始行动两周后，才告知"这次行动所追求的有关政治目标"的。[①] 严格地讲，这个文献可以证明中国事前没有讲明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但却不能说明根本没有通报此事。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笔者对此一直十分关注，并尽量收集了各方面的证据，也进行过分析和推断，但总感觉缺乏直接的、有力的论据，因而始终未能作出令自己满意的结论。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因事先得知该书将披露大量中国的档案文献，故笔者在得到这部130万字的巨著后，立即进行查找。果然，该书引用了一条重要史料，即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无疑，这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证据，它的出现对于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将笔者所能找到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依时间顺序罗列于此，并进行对比分析，希望由此得出的结论能令人信服。

先看当事人的回忆。

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口述史料大概是1970年代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卡皮察对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的谈话。卡皮察当年曾随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葛罗米柯和我在1958年9月7日赶到北京，去了解中国这次行动的意图。"[②]除了对

---

① TsKhSD, f. 5, op. 49, d. 239, l. 202。

②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1974年7月6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转引自Michael Share,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 1943～1982, *Cold War History*, Vol. 3, №2, January 2003, p. 9。

访华日期记忆有误,[①]这个谈话的表述非常清楚——“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但这里存在一个当事人是否因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有意歪曲事实的问题,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接下来是1974年西方根据赫鲁晓夫的录音磁带整理出版的回忆录,在那里,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十分含混:

> 尽管中国人不愿意让我们的潜艇使用他们的港口,可是在1958年他们又向我们要求数量相当大的军事援助。他们说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因而需要这些军援。他们要求得到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
>
> 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提出要那些东西,我们都给了他们。我们没有做任何举动去约束中国同志,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要统一全中国这是绝对正确的。
>
> 然而,当我们提出在他们的领土上驻扎我们的歼击机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是极端奇怪的。他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建议冒犯了他们……
>
> 中国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行动采取了炮击两个沿海小岛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完全赞成毛泽东解放这两个岛屿,消灭蒋介石部队向大陆进犯的潜在跳板……
>
> 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似乎一口咬得太大了些。美国人开始积极支援蒋,毛的部队在旷日持久的炮战中陷入了困境。[②]

从上下文看,赫鲁晓夫在这里说的中国通知“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很可能不是指炮击金门开始前,而是指在战役期间的情况。理由是,中国希望苏联给予空军援助,是在美国加强援蒋且国民党空军使用了美国最先进的“响尾蛇”导弹,以致海峡空战形势发生了突变以后。苏联同意派空军和导弹部队到福建前线,但指挥权

---

① 9月5日晚周恩来在与苏联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谈话时表示欢迎葛罗米柯来访。葛罗米柯于9月6日到达北京并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6~167页。

②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03~404页。1993年俄国《历史问题》杂志连载刊出赫鲁晓夫回忆录,内容与此大体相同。

不能交给中国，遂被毛泽东拒绝。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事后也曾提起过。[1] 显然，仅仅根据赫鲁晓夫这段回忆无法判断苏联是否事前就得知了炮击金门的消息。

还有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回忆录，而这个回忆更是混乱，舛误颇多：

> 1958年8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8月25日我们向金门打炮，并封锁金门、马祖，美方出动了海军第七、第六舰队。赫鲁晓夫着急了，不了解我国向金门打炮的原因和目的。他亲自匆匆来访北京，直至到莫斯科机场前，才通知中国大使去送行。
>
> 赫鲁晓夫来北京与我中央领导同志谈判时，提到为什么不事先通知苏联。我们回答已通过我国国防部参谋部的苏方顾问把这一事通知了苏联国防部。[2]

首先，葛罗米柯访华不是8月3日，而是9月6日。其次，炮击金门的时间也不是8月25日，而是8月23日。再次，炮击金门后匆匆来访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葛罗米柯。最后，刘晓显然是把赫鲁晓夫1958年7月底8月初与1959年9月底10月初两次访华混淆了，而赫鲁晓夫是炮击金门一年后两党在北京会谈时才提出事先不通报的问题的。所以，刘晓的回忆同样是靠不住的。不过，他所提到的中方的答复——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却是有文献依据的。

作为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1950年代经常列席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他的回忆录被认为是颇具史料价值的。吴冷西回忆说，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谈起炮击金门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3]这里，毛泽东的说法是斩钉截铁的——对苏联人一句话都没有谈。

---

①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6～187页。

②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86页。

对上述当事人回忆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卡皮察和吴冷西的说法——中国事前没有将炮击金门的计划通知苏联——比较明确,比较可靠。但既然对这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就必须找到相关的文献证据,才能继续进行分析。

再看有关的档案文献。

赫鲁晓夫1958年访华时,与毛泽东在7月31日和8月1日、2日、3日进行了4次正式谈话。中方保留了所有这4次谈话的记录,而目前所披露的俄国档案只有7月31日和8月3日会谈的记录。[①] 笔者仔细查阅了这些档案文献,其中确实没有一句谈到关于中国即将开始炮击金门的内容。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否还进行过非正式谈话?是否在非正式谈话中提到过炮击金门的问题?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就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根据《毛泽东传》披露的中方的记录,毛泽东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对赫鲁晓夫说:

> 那时他们(指美国人——引者)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②]

这个文献与吴冷西回忆的毛泽东在同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是吻合的,甚至毛泽东这两次谈话的用语都是大体相同的。到这里,这个问题本来可以看作是已经解决了,但是两天以后,中苏两党

---

① 参见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с. 100～128。这两个苏方记录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首先披露的。根据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沃尔科格诺夫的遗嘱,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沃尔科格诺夫文件(Volkogonov Papers)于2000年1月对公众开放。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的研究人员在其中发现了这两份文件,并译成英文公布出来。参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12/13, Fall/Winter 2001, pp. 243～272。

②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55页。

领导人在会谈时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时，毛泽东的说法又变了。

关于1959年10月2日会谈的苏方记录如下：

毛泽东：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的军事总顾问，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要他向苏联国防部转达一切情况。我还可以澄清，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是成功的。

赫鲁晓夫：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尽管我们向沿海岛屿打炮，但是我们并不想解放台湾。我们也认为，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

赫鲁晓夫：美国人的确不会为台湾和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了解杜勒斯同蒋介石会谈时提到的这个指令的内容。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至于向沿海岛屿打炮，如果你们打了，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不应该打炮。我不理解你们的政策。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们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当我听说你们没有这样做，我感到很纳闷。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作为盟友谈一谈。

毛泽东：我们在炮击沿海岛屿之前一个月就向你们通报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

赫鲁晓夫：你们向我们通报的不是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些个别措施。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了。我们也很不了解你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也许你们会认为，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你们的总参谋部，向你们通报了我们的想法……①

看来，刘晓有关中方答复的回忆所依据的正是这个文献。不过，

① 参见 *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 97～98。

毛泽东在这里采取了答非所问的对策——从上下文看,赫鲁晓夫所说的"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о вашей политике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是特指炮击沿海岛屿的行动,而毛泽东所通报的只是一些"个别措施"(об отдель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由于双方在会谈时发生争执,毛泽东面对赫鲁晓夫的质问而改口,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接连三次强调事前已经向苏联进行了通报,恐怕也非空穴来风。

那么,毛泽东坚持说在炮击前一个月已经通报的"想法"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见到确切的资料,不过,炮击金门前一个月,苏联大使馆给莫斯科的一个报告或许可以说明问题。7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详细讲述了中国一年来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内外政策。但是,在这个长达75页的报告中,没有一段是专门讲述台湾问题或中国对台政策的,只是在论述中国对美政策时才顺便提到与台湾有关的问题:"在中国同志看来,坚定的反美方针'能够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与我们会谈时,陈毅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向美国作出任何让步。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无论是从对内政策,还是从对外政策意图上看,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方针目前来说都是正确的。""最近几个月里,在出现某种类似'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场合下,中国同志都使自己的立场更加强硬。同时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美国加强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1]可以推测,如果此时苏联在华外交人员得知将对国民党所控制的沿海岛屿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必定要告知莫斯科,并在报告中进行评论。[2]

---

① 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7月26日。ЦХСД,ф. 5,оп. 49,д. 135,л. 1~75。

② 苏联使馆对台湾问题一直是很关注的,在此之前已经不断有报告送到莫斯科。如1958年2月5日尤金大使在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提到,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正在衰落,为了支撑他的政权,美国已经向台湾提供了过多的军队、军舰和导弹。报告还注意到,美国通过减少援助来对蒋介石进行节制,反对他如此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两个月后尤金又报告,4月5日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时,讨论了最近杜勒斯对台湾的访问以及与蒋介石的会见。他们注意到,杜勒斯在台湾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而进行实质性谈话的时间就更短了。他们还注意到,蒋介石在谈话时显得紧张不安,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减少。转引自 Share,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 *Cold War History*, Vol. 3, №2(January 2003), pp. 7~8。

收到这个报告三天以后，赫鲁晓夫便来到了北京。确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在这些谈话中，"没有一句"提到台湾问题和炮击金门的事情。当然，随同赫鲁晓夫来访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有机会与其中国同事及在华苏联军事顾问会面，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存在这种会面，也不曾谈到攻击金门的问题。理由同上，假如赫鲁晓夫得知如此重大的情况，是必定会与毛泽东讨论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炮击行动发生后苏联的反应。

炮击金门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曾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只讲了中东问题，而丝毫没有提到在远东发生的事情。① 一个星期以后，苏联也只是以《真理报》评论文章的形式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一般性的表态。文章指责"美国侵略势力"和"蒋介石集团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国家一样，苏联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恢复对台湾岛及其他沿海岛屿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因为苏联与人民中国是用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与合作的纽带连在一起的"②。苏联作出如此反应的依据大概是中国外交部 8 月 26 日的简短通报："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无论如何要解放这些领土，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美国对于我们的打击行动持有何种立场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参与这一地区的冲突。"③9 月 4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称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不受武力侵犯，国会已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确保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安全。④ 台湾报纸也报道说，美国正在

---

① Правда 24 августа 1958。

② Правда 31 августа 1958。

③ 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1958 年 8 月 26 日。ЦХСД，ф. 5，оп. 49，п. 131，д. 8892，л. 196～198。

④ 详见林正义：《1958 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84～88 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82～383 页。

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①]。直到此时,苏联才感到问题严重,并决定派外交部长访华以弄清情况。与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紧密合作的情况[②]相比,苏联如此迟钝的反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双方缺乏及时的交流和沟通。

一年以后,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回顾台海危机的过程时总结说:“至1958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们为沿海诸岛,其中包括澎湖列岛,主要进行的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动员社会舆论界支持自己的正义要求。但是到1958年8月,出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料,包括我们在内,中国部队突然开始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美国为援助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调到台湾地区。大陆和金门、马祖对射了几个星期。远东局势迅速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件交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中声称,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③]

对上述史料进行解读和分析后便不难得出结论: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前,中国方面的确没有与苏联进行协商,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这个意图。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却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这同炮击金门决策期间赫鲁晓夫突然访华的起因和特殊形式有直接关系。

炮击金门和马祖的问题,是1958年3月5日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的。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经过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讨论”,拟定在七八月调空军进入福建,并“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3月8日毛泽东答复,同意进行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7月17日彭德怀向总参、总政和总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东局势,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总参要立即拟订部队行动计划。当晚,毛泽东又召集军委及空

① 《中央日报》,1958年9月4日。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五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9年12月18日。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军、海军领导人开会说，美军登陆黎巴嫩，英国出兵约旦，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决定在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打击蒋介石，牵制美帝国主义。地面炮兵第一次打 10 万至 20 万发，以后每天打 1000 发，准备打两三个月。两个空军师在炮击的同时或稍后转场到汕头、连城。彭德怀连夜主持军委会议，作出具体部署：空军在 27 日转场，炮兵准备于 25 日炮击金门蒋军舰艇，封锁港口，断其海上交通。①

正在解放军积极准备炮击金门的行动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7 月 21 日，刚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提出中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共同对付美国。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中国只是要求苏联提供帮助。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与中共在京全体政治局委员集体召见尤金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并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强烈指责苏联。这个谈话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感到问题严重，“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有关，因而“心情沉重”。为此，尤金主动提出，最好是由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③ 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用意所在。笔者过去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百思不得其解：苏联只是作为盟国提出了一个军事方面联合行动的建议，不同意就算了，毛泽东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怒不可遏？给人的感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借题发挥，把问题上升到“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的严重程度，似乎就是要引起赫鲁晓夫的重视。不过，毛泽东希望赫鲁晓夫访华，并非要与他协商正在拟订中的炮击金门行动。经过深思熟虑，

---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74～675、691～692 页。

② 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 年 7 月 21 日。参见《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57～160 页。

③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22～333 页；魏列夏金：《1958 年 7～8 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100～103 页；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1958 年 7 月 22 日。笔者对这个过程的详细论述参见本书《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一文。

7月27日早上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和黄克诚,“打金门停止若干天”,“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①]这个突然作出的决定确实有些蹊跷,难怪彭德怀也感到不好理解。[②] 现在看来,毛泽东是不想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发生炮击事件,以免不得不与他面对面商议此事。

更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建议的赫鲁晓夫离开中国的方式。赫鲁晓夫访华是秘密进行的,本来准备还是秘密回去,也没打算搞联合公报。但是在赫鲁晓夫临走前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赫鲁晓夫是不是公开回国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在机场组织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有仪仗队,并通知各国驻华使节。赫鲁晓夫感到意外,说昨天已经谈好,怎么来的还怎么走,来华前也是这样商定的。毛泽东说,他本来有三个方案,即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而且无论哪个方案都要搞一个公报。赫鲁晓夫请求还是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借口。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建议他秘密来访是担心敌人利用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的时候搞突然袭击,故仍然坚持公开回国的方式,并说签订公报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赫鲁晓夫只好表示同意。[③] 随后公开发表的公报说:“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④]

由于担心美国的军事干预,[⑤]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看到公报后,特别是因为双方的国防部长都参加了会谈,艾森豪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6～327页。

② 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2～174页。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1958年8月3日。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51～156,转引自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c.100～128。

④ 《人民日报》,1958年8月4日。

⑤ 8月17日在北戴河研究炮击金门问题时,毛泽东突然问起炮击时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23日下达的炮击命令中有一条是“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王尚荣谈、王凡整理:《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载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259～260页。

威尔和杜勒斯猜测中国可能会在沿海岛屿，甚至对台湾采取某种行动。[1]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毛泽东便下令炮击金门。[2] 这时，杜勒斯更认为"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7 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的行动"[3]。显然，这正是毛泽东坚持赫鲁晓夫必须公开回国并发表会谈公报所期待的效果。

总而言之，由于《毛泽东传》披露的这条史料，现在可以对 1958 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的问题盖棺定论了。当然，毛泽东最初有意对苏联隐瞒将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只是要向世人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这是所有东欧卫星国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以实际行动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不过，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毛泽东采取的这种做法，并非是有意忽视甚至破坏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面对美国的军事干涉和核威胁，苏联答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空军援助，以及中苏双方所采取的协调行动，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苏军事同盟在远东危机中仍然具有不容轻视的对抗美国、稳定局势的作用。所以，尽管炮击金门事件在客观上可以看作是对莫斯科领袖地位的挑战，也确实给中苏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中苏同盟在冷战背景下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充分地利用之。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

①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94～295 页。

② 8 月 18 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97 页。

③ 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 1958 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129 页。

15. 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

似乎无须论证，关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著书立说了。[①] 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②]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

---

① 例如：R. L. 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London, 1966; C. J. Zablocki ed., *Sino－Soviet Rivalry: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New York, 1966; R. A. Rupen and R. Farrell eds., *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1967; M. Halperin 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Cambridge, 1967; W. C. Jr. Clemens, *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Stanford, 1968。

② 只要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Sino－Soviet一词，出现的相关论著就会令人目不暇接。

究成果陆续问世。①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② 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③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

---

① 其中受到学术界注意的有：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 年；*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Mercy A. Kuo, *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3～1960*,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1；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② 除前引著作大都讨论到中苏分裂的原因外，还有一些论文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如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载《党史研究资料》1995 年第 12 期；W. Taubman, 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Делюсин Л. П.* 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ачале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 年 10 月北京)的论文；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载《党的文献》1998 年第 2 期；杨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Westad ed. . *Brothers in Arms*, pp. 141～164。

③ 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M. Y.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M. 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5～1964，提交"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6 年 1 月，香港)；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载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3、5 期；本书《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一文；杨奎松：《1958 年炮击金门与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转折》，提交"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2 年 8 月)。

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①]；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②]；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③]；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④]。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⑤]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⑥]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同盟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

---

①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8～219。

②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8～549页。

③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pp. 218～223。

④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 72～78。

⑤ 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⑥ 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载《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一）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到 50 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 1957 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作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映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

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①]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②] 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③] 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④]。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⑤]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

---

① 尤金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1957年10月29日。АПРФ，ф. 3，оп. 65，д. 589，л. 173～179。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1年，第287页。

③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 38～39；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23～133页；1998年8月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④ 关于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公开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5～645页。有关莫斯科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3～12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1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9～115、136～145页，以及2000年12月1日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

⑤ 有意思的是，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南共联盟代表卡德尔在一张字条上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73～175页。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 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①]12 月 2 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②]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时，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③]。1957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做。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道：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 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 1921 年产钢 400 多万吨，1940 年增加到 1800 万吨，20 年中增加了 1400 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儿多点儿，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④]。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毛泽东曾在私下谈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但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当然不是仅就政治而言的。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躁起来。毕竟，口号是公开喊出去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 800 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⑤]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635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692 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5，第 5 张。实际上，1957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使用了“跃进”一词。有关研究参见张志辉：《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9 期；李丹慧：《也谈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④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1998 年印制（未刊），第 44、715 页。

⑤ 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87、213 页。

回到北京后，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年到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①] 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②] 他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③]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④]。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到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儿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

①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58年2月28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51，п. 432，д. 6，л. 86～96。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376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第17～23张。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儿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儿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②。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93～695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59，第6～9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471、695～696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93、311～312页。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①]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②] 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到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③]

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④] 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①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126，第1～12张。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78、279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699～700页。

③ 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第15～17张。

④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①]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11 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 3 年,再搞 12 年,15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19)38 年、(19)39 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②]。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 1958 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 1958 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③]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④]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450 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1,第 6~11 张。

③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1,第 25~28 张。

④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1998 年印制(未刊)第 66 页。

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①]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 年 9 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 11 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 1960 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 1961 年到 1963 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②]

总之，到 1958 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 月 21 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 41 年，再搞 12 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③]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④]时，毛泽东一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596～598 页。

② 《参考资料》，1958 年 11 月 20 日第 2638 期，第 11 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2，第 1～6 张。

④ 1959 年 12 月 3 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参见《杨尚昆日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587 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93 页。

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①]。

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二）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1958 年 7 月 26 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 1962 年生产 5000 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 7000 多斤等。[②]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 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 4 年中有 70 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 4 年内才有 60 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602 页。

② 《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月 26 日第 2540 号，第 11～14 页。

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①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②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③ 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象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④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⑤。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

---

①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100，目录1，卷宗465，第69～70张。

② 《参考资料》，1958年9月5日第2575号，第8～9页。

③ 《参考资料》，1958年9月12日第2581号，第3～4页。

④ 《人民日报》，1958年9月6日。

⑤ 《参考资料》，1958年11月5日第2625号，第23～24页。

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①] 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②]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持续快速发展,广泛开展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经济领域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

① 《参考资料》,1959年5月17日第2774号,第15页。

② 《参考资料》,1959年6月20日第2803号,第12～14页。

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 15 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 2 年到 3 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①。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 年 1 月 27 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②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

① 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 年 7 月 26 日。ЦХСД，ф. 5，оп. 49，д. 135，л. 1～75。

② 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1959 年 1 月 27 日。ЦХСД，ф. 5，оп. 49，д. 235，л. 27～36。

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年到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①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1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② 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一次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③

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他们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④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

---

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2日。

② 《参考资料》，1959年6月20日第2803号，第12～14页。

③ 《人民日报》，1959年9月16日。

④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pp. 218～223；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87页。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其中有 86 个经济区承担的任务特别多),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个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采取了许多措施,及时供应机器设备。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①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 年 4 月 21 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 166 个。这些项目,在 1959 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 113 个。从 1959 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根据 1958 年 8 月 8 日和 1959 年 2 月 7 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 125 个企业的建设。②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订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 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 1956 年 4 月 7 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 55 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 年 5 月 31 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销、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 1957 年 12 月 14 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

① 《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20 日。

② 《人民日报》,1959 年 4 月 22 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449 页。

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 211 个，撤销 45 个，推迟 98 个，即占全部项目的 2/3 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 150 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销了 8 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销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①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②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 年 8 月 22 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应"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③。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 9 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④ 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⑤

1958 年 9 月 20 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

---

① 李强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建设大跃进与兄弟国家对我的技术援助问题》。

② 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pp. 153～154。

③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 年 9 月 6 日。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129, р. 8891, л. 189～192。

④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 1，卷宗 465，第 69～70 张。

⑤ 上海市档案馆，全宗 C38，目录 2，卷宗 157，第 9、11～12 张。

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①]

苏联民航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诺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调回国。在临行前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期间，他对陪同前往的专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树藩谈了一些他个人对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诺索夫说，1922年至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相信，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搞公社还太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人民需要的情况下，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②]《真理报》驻华记者杜慕嘉1958年11月至12月在广西采访时，也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分配原则等提出了许多问题。[③]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两位副领事柯华列和董卡诺夫对公社化问题议论很多，也有一些疑问。如实行供给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生活集体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④] 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访问上海郊区马桥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苏联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⑤]

或许就是因为对人民公社缺乏具体的了解，苏联报刊最初很少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引起了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

① 《参考资料》，1958年9月20日第2588号，第17页。

② 《参考资料》，1958年11月28日第2645期，第5～6页。

③ 广西档案馆，全宗X50，目录2，卷宗281，第76～77张。

④ 《参考资料》，1958年12月29日第2671号，第13～16页。

⑤ 《参考资料》，1959年6月20日第2803号，第11～12页。

人党联络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部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安德罗波夫首先报告说，“在中国报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而“人民公社则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中国报刊强调，不应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运动本身“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从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给这个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们的怀疑。”为此，安德罗波夫提出，“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中国报刊上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报告认为，“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还建议采取三项具体措施：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收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四五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三、鉴于苏联使馆8月22日的建议“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因此“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①。

---

①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9月6日。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189～192。

然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并没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专门报道农业的消息有两条，但没有报道人民公社的情况。① 新华社多次借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作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尽管建国9周年国庆纪念活动提供了明显的机会——那时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处在最高潮，但苏联报刊发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② 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其中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③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而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罗波夫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④

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那一天，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鲁晓夫谈到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时举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

---

① 《参考资料》，1958年11月5日第2625号，第23～24页。

② 《参考资料》，1958年12月9日第2654期，第24～26页。

③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8日。

④ 只是在苏共和中共展开公开论战之后，苏联报刊上才开始发表批评人民公社的文章。参见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 40。

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说到在中国的土法炼钢时,赫鲁晓夫承认这在中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适合苏联。[①] 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

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58 年 12 月 17 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美国参议员汉弗莱 12 月 4 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 8 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一直不愿意谈公社问题。只是当汉弗莱请他谈谈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鲁晓夫接着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Reactionary)。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②] 另据美国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 1959 年 1 月访美期间,虽然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也同赫鲁晓夫一样说,俄国人在 1918 年和 1919 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还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③] 尽管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④]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1959 年 1 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做报告时宣布,苏联已进入"全

---

① 沈志华、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7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87~190 页。

② 《参考资料》,1958 年 12 月 23 日第 2666 号,第 8~10 页。从赫鲁晓夫的口气看,Reactionary 一词在这里译为"倒退"也许更为贴切。

③ 《参考资料》,1959 年 1 月 8 日第 2679 号,第 16 页,1959 年 1 月 19 日第 2688 号,第 24~25 页。关于 1918~1930 年苏维埃俄国在农村组建公社、劳动组合及集体农庄的详细研究,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④ 《参考资料》,1959 年 2 月 12 日第 2706 号,第 15~16 页。

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断言在人均产量上，“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指责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①。

既然苏联领导人不想因此破坏中苏关系，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②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表明态度呢？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大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③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更真实一些。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④

无论如何，半年之后，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

---

① 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24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页。

② 1958年夏秋，毛泽东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训斥了赫鲁晓夫，又在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突然发动炮击金门战役，使得中苏关系多少有些紧张。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④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页。

争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赫鲁晓夫接着回顾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赫鲁晓夫总结说：“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①

关于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②但《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③ 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了。

（三）中共的反应：从耐心期盼到愤怒出击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④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

---

① 《参考资料》，1959年7月26日第2831号，第19页。

②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1～232页。

③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月后，在苏联外交部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背景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朋友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而且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头脑发热”，是违背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则的。参见1959年9月15日齐姆亚宁给外交部的报告，*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 170～185。

④ 《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5页。

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这种空前干劲的结果”，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道，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①]在这种氛围中，当陪同赫鲁晓夫访华的原驻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是否能实现钢铁生产指标表示怀疑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普遍愤慨，[②]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③]。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加写道：“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④]看起来，批评骄傲自满，毛泽东并不情愿。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暗中指责，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

---

①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1，卷宗60，第175～181张。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04～705页。

③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48，第8～15张。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43页。

不要说。"[①]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对于1958年形势的评价，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乱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不同，确有大跃进。一切浮夸现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实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现象以外，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确有大增产"[②]。不过，中共其他领导人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

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到，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③] 1959年6月8日，在与驻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们会谈时，外交部长陈毅承认，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性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④] 6月17日，周恩来会见扎夏迪科时承认：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定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周恩来说：继续采用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发展工业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小型传统矿井和冶炼炉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请求向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转达：他是不对的，他过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属，请原谅他以前的夸口。他还保证说，今后将会更加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还说："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混

---

① 刘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1～192页。

② 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116，第52～64张。

③ 参见胡长水：《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载《党的文献》2001年1期，第70～74页。

④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9，п.443，л.240～248，*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с.272。

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当然应该为此而道歉。”[①]6 月 26 日，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时，尽管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承认“大跃进”在速度、平衡和质量三个方面存在着缺点和错误。[②]

显然，中共党内对于 1958 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然而，毛泽东刚刚在 7 月 16 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7 月 19 日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 6 月 20 日编印的《否定和怀疑 1958 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的看法，主要是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带来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国驻苏大使馆 7 月 2 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对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其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报告建议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对外作出说明和解释。毛泽东没有答复，只是批示将这两个材料印发会议各代表。[③] 7 月 27 日，毛泽东又不动声色地批准印发了一个材料，材料上说，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5 月份以来展开讨论，有近半数的学员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④] 又过了一天，当秘书胡乔木送来赫鲁晓夫在波兰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讲话后，毛泽东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所送材料中转引的《纽约时报》

---

① 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 年 7 月 2 日。ЦХСД，ф. 5，оп. 49，д. 243，р. 8931，л. 1～8；**АВПРФ**，ф. 0100，оп. 52，д. 10，п. 443，л. 179～186，*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с. 262。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38～239 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66、367 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87～388 页。

的评论很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赫鲁晓夫先生这番话所引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争论是否——像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赫鲁晓夫先生只是在回顾过去。另一种看法是,意见分歧仍然存在,赫鲁晓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场。这次对农民的讲话显然并不是打算作为一篇重要演说的,但是它今天在报纸上的出现显然是得到了这位苏联领袖批准的。"①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7 月 29 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 月 1 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②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了。

8 月 15 日和 16 日,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上争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③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更指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

---

①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1,卷宗 60,第 237～238 张。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90～391 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447～448、451～453 页。



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①]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反击党内右倾分子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的经验传播到世界，就必须批驳莫斯科的谬论。8 月 19 日，毛泽东致信几位秀才，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②]。9 月 4 日，毛泽东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 10 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③]。

此时莫斯科也没有闲着，9 月 6 日外交部、中联部送来了苏联经济学硕士格洛托夫所写的《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④]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 月 12 日刘少奇送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507～509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462～463 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504、506～507 页。后来《人民日报》没有发表赫鲁晓夫的讲话，但立即刊登了另外两个通讯。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511 页。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 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 月 1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 19 期转载了这篇文章。①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②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致 10 月 4 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③

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苏联仍然是朋友,“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④所以,赫鲁晓夫回国后,毛泽东立即接见了苏联代办安东诺夫,并向他说明,“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⑤但是,毛泽东又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而能够纠正这些错误的,只有中国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527~528 页。

②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全文,1959 年 10 月 2 日。参见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 – 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2, с. 94~106。

③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493 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599 页。

⑤ 安东诺夫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1959 年 10 月 14 日。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35, л. 89~96。

共产党，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①。

此时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有着同样的心态。一方面，11 月 11 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周恩来说，他接到国内指示，让他通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苏中两党之间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主席团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记录烧毁。② 另一方面，12 月 18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就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对中苏分歧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说明以后，报告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倾向”，尤其是在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国被目前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骄傲和自大”。报告认为，“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作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根本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报告最后强调，“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作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③

兄弟两个谁都不愿分家，可谁都要在这个家做主，那么就看谁的主张更符合这个家庭所崇尚的理念，并且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认可了。所以说，中苏之间一场是非之争的论战迟早是要到来的。自 1959 年 10 月的争吵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传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601～602 页。

② 《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67～268 页。

③ 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9 年 12 月 18 日。ЦХСД，ф. 2，оп. 1，д. 415，л. 56～91。

观点明显的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①] 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 年 2 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②] 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如前所述，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1960 年 4 月，为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③] 5 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④]。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⑤]

---

① АВПРФ，Ф. 0100，оп. 53，д. 11，п. 454，л. 221～223，*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с. 299。与中国出版的《中苏友好》杂志相同，《苏中友好》杂志也是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发行。

② 《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252～253 页。

③ 参见《红旗》1960 年第 8 期；《人民日报》，1960 年 4 月 22 日、23 日。

④ 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 年 5 月 21 日。毛泽东与耶斯佩森谈话记录，1960 年 5 月 28 日。

⑤ 科兹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 年 7 月 13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3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 年，第 3346～3417 页。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另一个文件讲述了 1959 年以来中共加紧与各国共产党接触，试图“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活动。参见关于中共与兄弟党关系的资料，1960 年 9 月 10 日。ЦХСД，ф. 5，оп. 49，д. 327，л. 218～233。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①] 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②]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帜，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并得到中共承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② 公社的问题自不必说，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中央编译局的著名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在1950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他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性病，苏联在1920年代也犯过。列宁曾设想通过电气化道路，在10年至20年的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他说，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1页。

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①于是，出现了苏共在 1960 年 6 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② 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决定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 月 16 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③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

① 科兹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 年 7 月 13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3 卷，第 3346～3417 页。

② 详见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71～86 页；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③ 苏联驻华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全文参见：*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pp. 249～250。

16. 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

——科兹洛夫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报告评估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其间,6月24日至26日,出席罗党三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包括两次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两次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即:6月24日上午8时至晚8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月25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30分的51国兄弟党会议,中心议题为讨论中国党关于当前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6月26日就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又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公报》)修正草案和书面声明问题,先后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兄弟党代表会议。①

会后,7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的报告。② 这份材料已在1990年代解密。该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关于

---

① 参见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6、78页;阎明复:《彭真与1960年国际共运的两次重要会议》,《百年潮》2002年第4期,第12～14页;杨尚昆著:《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4～516页。

② 数年来,沈志华自费收集、整理了俄国解密档案约1.5万件,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数百件。为便于广大学者使用,沈志华已将其中大部分文件复制,存放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科兹洛夫的报告见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3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3346～3417页。

中共中央领导人"缺乏党性的活动手段"。指责中国党与其他兄弟党的密切联系,着重报告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中国代表的立场和活动,及其促使苏共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背景情况。二、关于中共领导人的主要错误。全面辨析苏中两党在时代特征、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涉及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裁军、中印冲突及对中立国家态度等各项问题。三、布加勒斯特各兄弟党会议总结。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宣布,中国领导人现在反对的实际上不仅是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且还有所有兄弟党的政策,他们把自己摆在了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为敌的位置上"。提出:"造成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行为,他们错误的宗派主义的观点的根源"在于"中共著名的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民族局限性,浮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对共产主义粗陋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善于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左'倾幼稚病,不善于正确地确定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的战术和战略任务"。而发生"这些谬误的重要原因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尤其是近来这种个人崇拜采用了丑陋的危险的形式"。

面对近年来俄国陆续解密和公布的相当丰富的有关苏中关系的档案文献材料,中国学者在利用时应当尽可能地将这些材料与中国的相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比较、鉴别和评估,这其实是档案利用的一项基础工作。通过比较,弥补双方材料的缺漏,鉴别和评估双方记载有出入的地方,以求尽量客观地勾勒出历史事件、过程的全貌,做出更为客观、公允地评说。[①] 本文即试以科兹洛夫的这篇报告为本,结合相应的中方材料做一番比较分析。限于篇幅,先择取报告第一部分中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情况进行考察。

1960年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苏方认为,中方在这次会议上对苏联采取了"托洛茨基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中方则认为苏共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错误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可参见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双方分歧实际上已公开化，使得会议成为中苏争论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苏分裂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科兹洛夫的报告（摘录）

去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①]

中央主席团向全会通报了中共领导人近来滋生并日趋严重的骄傲自大的缺点和过高估计自己成绩的危险倾向。

当时使我们吃惊的是，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黩武主义和宗派主义，明显地不再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利益，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中央主席团认为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协商是不正常的。所以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利用去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

从与中国同志们的会谈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表面上他们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崇高目标，苏共中央为在不牺牲我们的原则的前提下克服中共和苏共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对待中共领导人，我们遵守同志分寸，不公开批评他们，不在两党之外暴露我们的分歧，希望中国同志不再继续采取违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利益的步骤。

---

① 1959年12月18日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ЦХСД，ф. 2，оп. 1，д. 415，л. 56～91。关于这一文件的评估，参见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苏会谈》，《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40～154页。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大体从1958年开始,一步一步地在加深这种分歧,越来越多地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系中所不能容许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手段。

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他们在国际共运中搞宗派活动,努力宣扬自己同会议[①]宣言和和平宣言相违背的特殊观点。

很清楚,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断加大分歧。

中国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策略立场进行攻击。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中共中央理论杂志《红旗》上发表了题为《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帝国主义与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长篇文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在北京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②]

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惟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极"左"的漂亮词句和单方面解释列宁主义原则被当作是在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文章的作者教条主义地抓住列宁的一些词句,不加分析地大量引证列宁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

近来苏共中央掌握了大量证明中共领导人非同志式行为的事实。乌拉圭共产党中央书记帕斯托里诺同志和巴拿马人民党书记迪克逊同志通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积极地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

① 指1957年11月的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② 参见《红旗》,1960年第8期;《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23日。

施加影响。在他们到北京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们证明,必须重新看待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评价。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书记柯都维亚同志说,在北京召开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中国领导同志企图兜售他们的“左”倾方针,在当代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战略和战术问题上错误地指导拉美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顺便说一下,现在彻底弄清楚了,近年来在北京一直在为外国共产党员办学习班,他们大部分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来的。

中国的同志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座谈中反对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重要原则。他们在同不久前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座谈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观点。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Л. 贝利绍娃告诉我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同代表团会谈近 6 个小时。中国的领导同志们向阿尔巴尼亚人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当代形势评价和共产党的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存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这样,中国同志开始拉其他兄弟党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

此外,他们还企图利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今年 6 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在总理事会开会前,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在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会谈时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上存在原则的分歧。

正如后来查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还同其他许多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类似的谈话,企图让他们支持中国的观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6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委员(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刘宁一同志再次论证中国的立场,要求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文件中反映中国人的观点。所有发言的工会领导人都一致地坚决地驳斥中国同志的企图,抗议他们非法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施加压力,宣布他们的路线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相违背。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刘宁一同志宣布,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

会议上去。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1960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邀请近40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同志认为应该公开地谈谈这些分歧。

然后中共中央总书邓小平同志讲话,在他的发言中有许多完全错误的论断,而且公开歪曲苏共的路线。邓小平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现在已抛弃了宣言的基本原则"。同时,邓小平同志表面反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实质是在批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本原则。

在6月5日的会议上,中国同志还打算就其他一系列问题做类似的报告。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出席会议的工会活动家(共产党员)们一致宣布不仅不同意中国人的批评实质,而且也不同意他们的批评方法——背着各兄弟党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

料到自己的观点不会受到支持,中国同志重新宣布,在总理事会上他们不进行批评。但他们忘了自己所说的话,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对苏联和兄弟党的路线展开了攻击。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错误观点表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的长篇讲话里。

在总理事会各委员会里,中国工会的代表们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下干涉这一国际组织的工作。他们采取措施,试图把中共中央对国际问题的提法写进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文件。正如外国工会活动家指出的,中国同志有点儿挑衅性,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称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走卒和奸细。

各个委员会出现了不能容忍的情况,委员会主席(洛姆巴尔多·托列达诺〈墨西哥〉)和塞浦路斯工会代表向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报告了不能制定一致的符合报告精神的文件。多亏了不屈服于压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强硬立场,迫使中国代表在统一的文件上签了字。

许多国家工会中央领导人在离京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进行会谈。这些会谈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同志的行

动。法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Б. 弗拉尚说，中国人轻浮地不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建议采取立即推翻资本主义、毫不迟缓地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诺韦拉同志，保加利亚工会领导人普拉霍夫和阿列克西耶夫，捷克斯洛伐克工会领导人祖普卡同志，波兰工会领导人洛加－萨文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工会运动活动家们说，他们认为中国同志们的行为是分裂活动，中国人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中国同志们所走的道路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

（二）中方有关材料

关于这次会议，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材料比较缺乏，只有一些零星记述，好在有关的口述历史材料弥补了这种不足。

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召开前的一个背景情况。苏、美、英、法四国根据商定，将于 1960 年 5 月 16 日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讨论柏林问题。由于 4 月底发生了美国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被击落的事件，5 月 10 日，四国首脑齐集巴黎爱丽舍宫后，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苏联赔礼道歉，惩办罪犯和保证不再做这种飞行。但是艾森豪威尔只同意在他的总统任内（1961 年 1 月届满）不做这种飞行，其余要求不予接受，会议因此而流产。[①] 5 月 22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一事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这次为了 U－2 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

①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34 页。

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① 苏联击落美国间谍飞机及赫鲁晓夫在四国首脑会见中的强硬态度，表现出了对中国论点的某种趋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共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前景作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促成了以后中共中央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

6月初，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即已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6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月1日，中苏双方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这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掺杂感情色彩。翌日，在12国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日至4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②

6月5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做了会议第一项议程报告。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则在下午的会议上发了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做了呼应。马赛尔·布拉表示：世界工联谴责美国军国主义集团和艾森豪威尔及其政府的侵略和伪善的政策，他们在花言巧语的掩盖之下事实上在奉行实力政策和“边缘”政策。提出：帝国主义的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危险，同时还要加上下列各种企图：在粗暴的和隐蔽的新的形式下永远进行或重新恢复殖民主义控制和种族压迫。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放弃它们准备和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计

①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69～272页。

② 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次会议的总报告文本。

划,它们依然对各国人民要求缩减战争预算、停止原子试验、禁止制造和使用热核武器等等要求充耳不闻;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加强全世界工人和工会为保卫和平的统一行动,是必不可少的。格里申也指出:现在重要的是,提高各国人民的警惕性,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阴谋,力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巩固。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美国利用某些国家的领土作为美国间谍飞行的基地,这实际上把这些国家变成了美国挑衅的同谋者。美国这些行为破坏各国正常关系的基础,增加了军事武装冲突和新战争的危险。格里申同时强调说:在当前形势下,维护和巩固和平是各国人民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正如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不止一次所指出的:苏联今后要尽一切可能来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苏联现在和将来都主张和平共处,和平谈判争取达成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格里申还呼吁应当十分重视全面裁军。认为,随着裁军计划的实现和各国军备开支的缩减,由于裁军而腾出了的资金的一部分将用于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①] 两位世界工联领导人的讲话都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总报告中的论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工作纲领。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 月 5 日晚,中共中央召集 17 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 40 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中共领导人说明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希望他们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各自的党中央。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了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但当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谈完以后,格里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导致座谈会中断。此后,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

① 《人民日报》,1960 年 6 月 6 日、7 日。

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①

根据这一方针，翌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时发表讲话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②。为了宣传中方的观点，6 月 8 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的发言中，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明确表明了与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刘长胜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不赞成那种不区别战争的性质而笼统地提"赞成不赞成战争，反对不反对战争"的错误论调，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正义的战争也"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合乎实际的。对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一些根本原则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保卫和平的问题上走入歧途。提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要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揭穿帝国主义的丑恶的原形，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对于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刘长胜在表示赞同后说：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建议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依靠这种建议，就能根绝"战争危险"，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才能出现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世界。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着，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这个发言得到了亚非拉国家许多代表的发言支持。③

---

① 参见 2002 年 6 月 5 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阎明复前引文，《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73 页；《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第 276 页。书中所记在中共中央 6 月 5 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由刘宁一致词说明中共的基本观点，应有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487～488 页。

②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21 页。

③ 《人民日报》，1960 年 6 月 9 日。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的力争，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反复争执，终于达成了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①。

会议结束后，刘宁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把世界工联理事会这个表决机器的指挥棒打翻，在工会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认为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会会议，但是将发生深远的影响。②

（三）简要评估

以上中俄两国的材料内容基本相符，其中关于当时中苏各自观点获与会者支持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问题，恰好可以互补，使得过去一直不甚明了的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中苏双方交锋的实际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由此，也使笔者对当年的这场斗争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第一，关于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活动的目的

应该说，中共中央决定在这次会议中采取积极展开活动的方针，对与会各国代表进行宣传鼓动，是有一定目的的，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借用国际社会群众性非党组织的力量，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国的方针政策靠拢。

1957 年莫斯科会议，特别是 1959 年 1 月苏共二十一大以来，苏共领导人大力宣传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提出

① 2002 年 6 月 5 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

② 同上。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刘宁一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没有记述。参见刘宁一：《历史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年版。

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观点,①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愈益扩大之势。

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对于中苏关系问题,会议确定了以团结为重,力争赫鲁晓夫变好的方针。决定中国方面不采取分裂的步骤,即使赫鲁晓夫要分裂,我们也不要分裂,硬是拖住他。毛泽东谈到,至于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团结,估计是可以团结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要向他们做工作。会议并议定了落实这种方针的办法,即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支持民族独立运动。② 总之,这种方针的先决条件是使赫鲁晓夫"变好",也就是说中国党要坚持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重大原则立场,拉赫鲁晓夫向中国靠拢。事实上,在这里,苏联党向中国党的趋同是中苏继续团结的前提。

但是,在2月举行的莫斯科华约组织参加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这种状况促使中国要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推行拖住赫鲁晓夫转向修正主义的步骤。2月22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行为应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在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③ 4月份,中国在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之时,由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红旗杂

---

① 1959年12月30日赫鲁晓夫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诺布勒问,1959年9月18日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转引自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页。

② 刘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第241~242页。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第232~233页;刘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第251~253页。

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由《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不指明地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继之,中国方面又试图借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事件,利用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之机,于世界国际组织中继续同苏联的论争,希望获得热衷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争取赫鲁晓夫改变方向,逐渐向中国的立场趋同。

这即如后来彭真所指出的:"为了保卫列宁主义,为了将来到马克思那里作鉴定,我们不得不斗争。我们向世界工联谈话不是没有考虑的,不要估计我党中央冒失,找他们谈是为了拖住他。老实讲,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雄心,当时听说他们搞党纲,不要他走得太远,为此才写三篇文章,几个月后才找工联谈话。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攻,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把他们拖住了。这以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①

其二,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也有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开辟与苏联进行角逐的第二战场的考虑。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多数国家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中国需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毕竟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对于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策略更具有吸引力。中国工会代表团这次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活动,实际上已明显反映出了这种趋向,它预示了一种前景,即如果中国能够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者,苏联将陷于两难的境地,面临艰难的选择:或者向中国的立场靠拢,或者背负起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也正是考虑到要避免此类尴尬局面的出现,苏联方面竭力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使用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的手段,并且把中国在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期间的举措归入其中。② 对此,在后

---

① 1961年2月3日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7,第249卷,第1~13页。

② 参见上引科兹洛夫报告。

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曾经否认并反驳苏方提出的此类指摘说："在工联会议期间，我党任何派别活动也没搞。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出席。我们不在北京。当我回到北京时，通知我，会议代表之间正在就许多重要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请我参加这一工作。开始我建议让工会代表们自己去争论，我们不参加，后来我才同意并作为主席发了言。我们想就五个问题交换意见，但只在一个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不能认为这是派别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同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的反对派中间怎么进行派别活动呢？"刘少奇并要求苏方把中方的这种意见转告其他各兄弟党。①

第二，关于此次会议的结果

考察北京世界工联会议的过程，客观地说，这次会议造成了两个事实：

其一，率先在世界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说到中苏两党分歧公之于众的问题，过去中国方面一直指责苏联在 1959 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保持中立，于 9 月 9 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实际偏袒印度一方，是公开表明了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声明，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们的分歧"②。现在看来，这种认识似有失片面。应该说，苏联方面对中印冲突的立场主要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即不给美国干预冲突以口实、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场的尼赫鲁政府推向帝国主义集团。莫斯科认为，如果苏联公开宣布在中印争端中单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国，将不

---

① 1960 年 11 月 26 日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610, л. 118～119。这里与事实略有出入：6 月 5 日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开幕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则均在京。刘少奇此处应指 6 月 1～3 日时他不在北京，但周恩来 6 月 1 日已从蒙古国返回京。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24 页。

② 1960 年 1 月 26 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283～284 页；邓小平在 1960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1984, Longman GroupLimited, UK, 1985, pp. 21～22；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 71 页。另外还可参见刘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第 213～214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第 228～229 页。

可避免地导致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加入其中，因为据苏方获得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1]

中国关于苏联发表"中立"性声明就是公开了中苏分歧的这种指责，有一些强词夺理的成分。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可以说反映了中苏两国方针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双方在做表面文章。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政府无论在开战、停战问题上，还是在整个和平谈判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2] 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莫斯科采取了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是苏共领导人不赞成中共对待印度的外交方针。说苏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苏两党的意见分歧，根据不足。

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府决定于是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有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会议。康生在会上做了发言，重申国际局势出现某些和缓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指出美国修订政策的目的是想以"和平取胜战略"来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甚至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就认为，"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发言中，康生特别提出："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

---

① 苏共中央1960年2月6日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做的口头通报，参见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 292。

② 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3期。

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康生的讲稿是在国内起草并经中央审定的。2月6日,《人民日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康生的这篇讲话。① 对此苏联方面非常不满,认为中国方面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这一举措导致了前述苏方宣读口头声明指责中共的政策,以及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本人的影射攻击。不过,赫鲁晓夫的这个谈话和苏共中央的口头声明,苏联方面没有公开发表。② 在这件事情上,尽管康生的讲话有一些具体内容,但原则上也不能说中国方面以此就公开了与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道理同上。况且就表面上言之,"不承担义务"的说法毕竟是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

实际上,中苏双方通过报刊或会议,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而这一点是从1960年初渐渐开始的,③到中共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发表,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了。④ 不过,第一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分歧,还应该算是中国党在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会议上的做法。

对于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联党批评说,中国在世界工联这

---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2月4日、6日;伍修权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3～334页。

② 参见1998年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2～233页。

③ 参见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 299。

④ 这三篇文章发表后,不仅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苏联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他们第一次知道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翻译出现了错误。《参考资料》,1960年第3043、3046、3059、3062号;*Долинин А.*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13 мая 1995г.。

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①] 在苏联看来，中国工会代表对苏共的批评是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一系列委员会的工作中进行的，而"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②]。苏联方面认为，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击。于是中共领导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分裂步骤：他们不仅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而且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许多委员会里，批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这些行动实质上是在公开号召世界工联开展斗争，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③]

可以说，苏方的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在世界工会联合会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④]

其二，直接导致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之后，苏联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舆论反击：在

---

① 参见上引科兹洛夫报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② 情况简报，АПРФ，ф. 3，оп. 65，д. 597，л. 154，转引自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1960год глазам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提交1997年北京"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③ [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第174页。

④ 中苏战略、军事、经济关系及前景，1960. 8. 9，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Fiche 64，Item 255，NIE 100～3～60；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和控制，1961. 8. 8，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Fiche 84，Item 318，NIE 10～61。

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之际，苏联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直接涉及与中国论战的文章。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辩驳说，列宁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6月10日，有舆论宣传称："目前的左翼分子把达到和平共处、停止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形势中最轻微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又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则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①

另一方面就是开始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对于苏联方面来说，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以及对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的计划，事先没有与苏方通气，这其实不啻于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此，在是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当彭真就这次座谈会问题表示：为了交换意见，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会议参加者的名单时，米高扬当即反驳说：你们邀请他们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会议。他同时还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国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特别的观点。你们不该这么做，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央级的会议上进行讨论。②

总之，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议的结果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

① 参见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1984，pp. 18～19。

② 参见1960年11月26日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АПРФ，ф. 3，оп. 65，д. 610，л. 118～119。

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1] 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继续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有删节

① 《杨尚昆日记》(上)，第544～545页。

17. 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兼谈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一般国家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盟国关系，而是特指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更直接地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50年代初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于是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致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中苏关系历史的讨论，是国际冷战史，尤其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破裂(1960～1964)、对抗(1964～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①])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无论如何，到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从那时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就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90年代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

---

① 前中国驻俄大使李凤林在与笔者交谈中提到这样一个情况，即198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前，双方在讨论如何处理同盟条约时，都在考虑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涉及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硕果累累。[①] 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尽管说法各有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在这样广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希望把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一）提出问题：对中苏关系的理性分析及非理性因素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提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此，

① 在近年来有关中苏分裂原因的研究中，笔者以为值得注意的论著有：W. Taubman, 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M. Y.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 — 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 — 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O. A. Westad ed. ,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Mercy Kuo, *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 — Soviet Split*, 1953～1960,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1;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Делюсин Л.* Подоплека недавнего конфликта//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1999, №7、8;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 2000; 杨奎松：《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3、5 期；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几个问题》，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1 期；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载《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徐天新：《1958～1959 年的中苏关系》，牛大勇、沈志华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炮击金门》，牛大勇、沈志华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沈志华：《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笔者也是有感而发。2004年10月,笔者受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冷战时期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的学术会议,并因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这些被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称为"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的文件,是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①] 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中苏分裂前夕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判断,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判断几乎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危机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报告中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作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②]。事实上,3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作为威慑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③] 危机后,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④]。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

① 会后,情报委员会出版了这批档案部分影印件的汇编本及光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NIC 2004~05, October 2004。研究者也可以在网上查阅这些文件(http:\bookstore. gpo. gov)。

② NIE13~58, Tracking the Dragon, p. 124。

③ 参见本书《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一文。

④ NIE 13~59, 28 July 1959, p. 4。此文件 *Tracking the Dragon* 一书尚未收入,笔者存有复印件。

再看核武器的问题。中情局在 1958 年至 1959 年的估计是,“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向中共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①。而实际情况是,苏联被迫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核技术和核设施援助,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核按钮交给苏联人掌握。同样,莫斯科也不会为了中苏的共同利益冒险使用核武器。②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情局当时的预测中,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 1958 年夏季毛泽东因“联合舰队”问题发难及台海危机爆发前,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③。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 1959 年 2 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④。到 1959 年 7 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

① NIE 13~58,13 May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 123、137;NIE 13~59,28 July 1959,p. 3。

② 参见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3、5 期;本书《援助与限制:1950 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一文。

③ NIE 13~58,13 May 1958,Tracking the Dragon,p. 124。

④ NIE 13~2~59,10 February 1959,p. 2,此文件 Tracking the Dragon 一书尚未收入,笔者存有复印件。

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1] 甚至到 1960 年 8 月，苏联宣布全面撤走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 5 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作出评估”，但还是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2]。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作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3]。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

---

① NIE 13～59，28 July 1959，p. 3。

② NIE 100～3～60，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 218、227。

③ NIE 100～3～60，9 August 1960，Tracking the Dragon，p. 220～221、224～232。

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作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中苏分裂问题的讨论涉及方方面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印边界冲突等，也有从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方针政策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个人性格的差异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呢？笔者拟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个层面是考察中苏关系演变的具体过程，即在一系列引起中苏分歧和矛盾的现象中，寻找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事件；一个层面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这种关系的政治结构，以便发现影响这种同盟关系，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最终解体的内在因素。

（二）过程考察：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两个主要事件

从 195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中苏之间在一些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频频发生。这是事实，但这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分裂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当双方都感到无法容忍对方的观点和政策，同时又都意识到不可能修正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以消除分歧和矛盾时，同盟的破裂才会出现——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那么，在什么时候，是什么问题，使中苏双方

感到不能再容忍对方，而决定采取一种不妥协的立场来处理他们的同盟关系呢？

过去，人们常说中苏分裂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个观点最早是中苏大论战时提出的，现在仍有研究者坚持这种看法，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①]。这是一个神话。实际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并没有根本分歧。

先看对外政策。对于二十大提出的所谓三和路线，毛泽东心里可能是不满的，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似乎否定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宝贵经验。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八大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促进和平共处”、“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是当时《人民日报》上经常出现的口号。[②] 再看对内政策。过去总认为二十大以后中国提出了一套不同于苏联的经济方针，其标志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但是，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就指出：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③] 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像人们后来理解的那样，好像中苏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

---

① 参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5～63页；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240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7月2日、7日。

③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7，р. 5174，л. 129～147。

生的变化，中共中央早就有所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①] 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曾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而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②]。大会结束的第二天，2月 26 日，苏共把秘密报告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③] 与朝鲜、越南党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反而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④] 这至少说明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在中共高层讨论时认为，尽管对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仍认为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⑤] 毛泽东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政治局决定，应该表态支持二十大，同时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⑥] 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研究者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苏共中央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484～485 页。不仅毛泽东本人提出了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且中共中央早于苏联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作用和个人崇拜的问题。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92、407、473、528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129 页。

②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430 页。

③ 赵仲元：《1956 年随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载《中共党史资料》2004 年第 2 期，第 89 页。俄国档案记载的时间是 2 月 27 日，РГАНИ, ф. 1, оп. 2, д. 18, л. 116。

④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年，第 117 页；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 年，第 4～5 页；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2 页；韦君宜：《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潮》，载《百年潮》1998 年第 2 期，第 25～26 页。

⑤ 《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551 页。这里应该注意，年谱中使用了“全盘否定”的说法。实际上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当时中共中央也没有使用“全盘否定”的说法。据吴冷西回忆，最早提出“全盘否定”这一概念是在 10 个月以后，即 12 月 19～20 日。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年，第 4～5 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3～24 页。

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①] 在3月31日与尤金大使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后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②] 4月6日毛泽东对来访的米高扬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做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③] 在5月2日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指出，"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④]。总之可以看出，对于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打心眼儿里举双手赞成，他只是反对在一般意义上批判"个人崇拜"。

因此，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在后来解决波兰和匈牙利的10月危机及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请中国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中共出面帮助莫斯科缓和与东欧的关系，中苏合作更加密切。[⑤] 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促成了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这标志着苏联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苏同盟关系又上了一层楼。应该说，在1956年至1957年，中苏关系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

① 《人民日报》1956年7月6日。

② ЦХСД，ф. 5，оп. 30，д. 163，л. 88～89。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1页；《周恩来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63页。

④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10，д. 9，л. 124～130。

⑤ 详见本书《中国在1956年10月危机处理中的角色和影响》一文。

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就是针对苏联 15 年超过美国的计划，宣布中国将用 15 年超过英国。毛泽东内心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为此他已经在考虑采取某种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想法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中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958 年夏天，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①] 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首先，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其次，毛泽东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他大发雷霆，至多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苏联的建议而受到了伤害，赫鲁晓夫后来为此颇感后悔。最后，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中方不同意也就放弃了。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作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②] 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满。最近公布的捷克档案披露，在 1958 年 5 月 24 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 41.9 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

---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12 页；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727、728 页。

② 详见本书《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一文。

互不侵犯条约。[①] 这些措施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的行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毛泽东这次发火却没有提到政策问题。同时,赫鲁晓夫也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有使之产生恶果。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8月2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综观事态的发展,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明确承认,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②]后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③]。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④] 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⑤]赫鲁晓夫后来为此大动肝火,他一再向毛泽东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

---

①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达维德关于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情况的报告,1958年6月7日,参见 Из истор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54～1964гг), Документы чеш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6, 2003, c. 145～147。关于会议通过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55页。

④ 参见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9年10月2日;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2, c. 97～98。

⑤ V. Zubok and C.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3。

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在会谈中却寸步不让，一副向莫斯科领袖地位挑战的样子。① 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②。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③ 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 P－12 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④

对于中国此期对外政策的倾向以及表现这种倾向的做法，性格冲动的赫鲁晓夫确实感到无法容忍了，他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于是在 1959 年 6 月决定暂时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研制核武器的技术材料。莫斯科这种违反协定的举动反过来又激怒了中国领导人，其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引起同盟的分裂，但赫鲁晓夫显然已经不再顾忌中国的反应了。不过，让毛泽东下决心与苏联决裂的并不是莫斯科的这个决定，而是此后一个月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一次公开讲话。

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心绪烦躁，憋了一口气，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嘴上喊的是“超英赶美”，心里想的却是“苏联和中国

---

① 参见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9 年 10 月 2 日；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c. 94～98。

②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p. 223。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9～21 页；《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9 日。

④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Вагриус，1997，c. 334；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266～268 页；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413～415 页。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①]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②] 于是,15 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半年后就变成了 3 年赶上英国,5 年赶上苏联,7 年到 10 年赶上美国。[③]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提出,“后来者居上”,“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④]。为此,不仅在建设速度上要超过苏联,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于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创造的“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⑤]。因此到 1958 年 11 月,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口气说,中国不久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等着苏联。[⑥]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很快就会超过苏联,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特别是莫斯科的认可,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实际结果却使毛泽东大失所望。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⑦] 对于人民公社,苏联的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在纪念中国九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 6 篇顺带提到了公社,而苏联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

---

① 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国史学会 1998 年印制,第 44、715 页;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68,第 17～23 张。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117 页。

③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126,第 1～12 张;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01,目录 12,卷宗 223,第 15～17 张。

④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59,第 6～9 张。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450 页;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1,第 6～11、25～28 张。

⑥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4,卷宗 72,第 1～6 张。

⑦ 《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月 26 日第 2540 号,第 11～14 页,《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6 日;《参考资料》,1959 年 5 月 17 日第 2774 号,第 15 页;《参考资料》,1959 年 6 月 20 日 2803 号,第 12～14 页。

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方兴未艾的人民公社运动竟只字未提。[①] 苏共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②]。后来，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他们“盲目效仿”中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③]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 20 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④] 与前者相同，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甚至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在 7 月 21 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火，这个讲话更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中，很多中共干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⑤]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 1959 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⑥]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在 7 月 16 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

---

① 《参考资料》，1958 年 12 月 9 日第 2654 号，第 24～26 页；《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8 日。

② *Сидихменов В.*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слушали нас//Новое время，№2—3，1993，с. 40。

③ 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31 页；马贵凡：《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71 辑，第200～205 页。

④ 《参考资料》，1959 年 7 月 26 日第 2831 号，第 19 页。

⑤ 长春市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12，卷宗 48，第 8～15 张。

⑥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262、272；《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38～239 页。

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① 就在这时，7 月 28 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 月 1 日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并表示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 月 19 日毛泽东又要人去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 月 4 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信件，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②。所有这些做法都表明，同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也决心与莫斯科翻脸了。

这时，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苏联决定给中共一些颜色看；公社问题反映出中苏在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歧，毛泽东对此不能容忍，中共决定公开批评莫斯科。于是在 1959 年 10 月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中苏分别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相同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只是“局部的，暂时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66、367、387～388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90～391、462～463、504、506～507 页。

的”。但“赫鲁晓夫很幼稚”，又“不懂马列主义”，“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而真理在中共一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中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修正主义。[①] 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②]。苏共中央同样认为，苏中友好对于两党两国都是重要的，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必需的，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存在错误和缺点。因此必须“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条件下克服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③]。此时，中苏分裂已成必然趋势，除非有一方承认错误，从而达成妥协。

1960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劝说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联会议公开散发批评苏共的材料，试图压服苏联改正错误，而苏共则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试图逼迫中共就范。结果，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尽管1961年至1962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1963年7月的两党会谈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三）结构分析：决定中苏同盟破裂的两个内在因素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

---

① ЦХСД，ф. 5，оп. 49，д. 235，л. 89～9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1～602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1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③ ЦХСД，ф. 2，оп. 1，д. 415，л. 56～91。

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必须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中去寻求。

研究中苏同盟的命运有两个参照物，一个是与此同时存在的西方盟国的内部关系，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前者呈现出一种稳定性，后者则呈现出一种非稳定性。中苏同盟的状况与前者完全不同，却是后者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比如英美、英法、美法、美日之间的关系，并非和谐美满，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致出现法国退出北约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分裂。用前引中情局的方法和逻辑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之间维系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

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表现则完全不同，那里明显地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致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存在于中苏关系之中。在欧洲，苏南分裂后，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决定开除一些亲苏分子，便招致苏联大军向华沙挺进；匈牙利政府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总之，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的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伴随着同盟的存在而存在。

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首先，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茹约维奇向苏联驻南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在其他方面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认可了人民公社的原则，毛泽东追求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进一步举措也会迫使莫斯科感到无法容忍；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走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其次，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结果无疑会使某些个人性格突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上述情况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包括了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

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况且，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南斯拉夫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 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 1978 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

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导性，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 1956 年 10 月危机中的地位：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中国人常常指责苏联侵犯了中国主权，而越南人又往往指责中国人侵犯了越南的主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

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那时，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两个大国，一个领导着欧洲各国共产党，一个指挥着亚洲革命运动，如果他们像以前那样继续分工合作，相互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景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在 50 年代中期，出现了隐患，即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张。

从根本上讲，那时中国和苏联还处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苏联已经进入战后国际体系，甚至参与构建了这个体系，而新中国则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苏联党已经是成熟的执政党，而中国党才刚刚掌握政权，还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意识。由于这种时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完全不同，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也是根本对立的。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

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上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原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 5 期

六、冲突敌对

18. 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

——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

1962年春夏，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所谓伊塔事件，6万多中国边境居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越过边境前往苏联。在此期间，5月29日，煽惑、裹胁边民出走的少数坏人还煽动群众，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宁市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伊犁区党委，[①]进行打、砸、抢活动。造成这起中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是什么？三十多年来，无论是苏联、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和历史学家，

① 1950年7月中共伊犁区委员会成立，受新疆分局领导，下辖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委；1952年5月伊犁区党委撤销，伊、塔、阿地委改由新疆分局直接管辖。1955年3月中共伊犁区党委重新成立，伊犁地委撤销，伊犁区党委下辖塔、阿两地委和原属伊犁地委的9县1市党委，及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委的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67年"文化大革命"。见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伊犁自治州党委组织部、党史委、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自治州组织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由于有关档案材料的缺乏，对这个问题或未能展开比较深入的论析，或是只能通过推断进行讨论。[①]

1999 年 8 月，笔者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先生为研究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专程到新疆查阅资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和伊犁自治州档案馆看到了有关这次事件的很多材料，并就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人士。由此，对 1962 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外逃苏联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及根本原因，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现依据所掌握的材料，从历史根源、苏侨问题、国内因素和苏联因素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历史根源：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边境问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位于新疆的北疆地区，其西北、东北分别与原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以及蒙古国为界。1954 年 11 月，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区成立，后改区为州，行政区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直属奎屯市共 24 个县市，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全州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377 万。[②]

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早在 1851 年，沙皇政府就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

① 1997 年 10 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奈·韦斯塔(Odd Arne Westad)就其提交大会的论文《中苏同盟是如何瓦解的？——政治、饥荒与难民》中有关伊塔事件的问题，提请与会学者讨论。韦文引用苏联大使给中国政府的照会等俄国解密档案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认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在于"大跃进"政策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和饥荒，是中国错误的国内政策使然。1961 年春天便已出现了大批边民越境的情况；最大规模的逃亡发生在春季，是因为漫长的冬天耗尽了当地边民的口粮。而且，中国边防军人从边境撤出，留下大片无人看管地区，有意协助边民外逃。据说，这种看法在西方普遍存在。

②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 78～80 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沿革》，中共伊犁州委党史委 1998 年编印，第 1、36 页。

地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①]沙皇的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伊犁，而且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十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2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3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7万人左右"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五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十余万人。[②]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上述这种状况，为以后苏联在新疆，特别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苏联长期以来关注新疆，虽然其政策时有变化，但始终不忘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施加政治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斯大林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老沙皇实行地域扩张、建立缓冲地带的传统做法，苏联继续加强了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并在30年代中期，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初战失利，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部撤出了新疆。但随欧洲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4年夏，苏联又开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酝酿与中国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共的立场，一方面为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反对汉族政府的武装暴动。

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对伊、塔、阿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十分明

① 有关条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新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②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伊犁州公安局史志办1988年编印，第33～35页。

显。苏方不仅掌握着三区的政权机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而且还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收集各种情报;三区民族军内部自 1944 年至 1946 年,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①

1945 年 8 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放弃支持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在幕后导演了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了 1946 年 6 月和平条款的签字。此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但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苏联不仅保持了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而且还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致 1947 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苏联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②。

1949 年初,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苏联为保证其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建议新盟友中共迅速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斯大林在与新中国的对话中,依然保留了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1949 年末至 1950 年初中苏两国谈判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期间,苏联在最后阶段要求中国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其意图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国势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渗透,从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③

其次,苏联通过发展苏新贸易和苏侨企业,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

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与新疆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据苏联海关的统计数字,1934 年新疆对苏联出口货物为 594.5 万卢布,从苏联进口货物为 473.0 万卢布,到 1941 年分别增长到 4370.0 万卢布

---

①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37 页。

② 沈志华 1998 年 8 月 30 日采访原伊犁州统战部部长陈锡华记录。

③ 关于此期苏联对新疆政策变化最新研究,参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和 4709.7 万卢布，七年中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八倍。[①]尽管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和盛世才实行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曾一度跌落，但以后不久，随着三区革命爆发和苏联势力卷土重来，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再次加紧经济渗透。在鼓动并援助三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垄断市场，进而掌握了三区的经济命脉。以致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竟一再建议中国政府将新疆省会确定为伊宁。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而伊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②]。到 1949 年，苏新贸易总额仍保持在 7200 万卢布，"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50 年代中期。[③]

此外，伊犁苏侨企业的发展也加深了苏联对那里的经济影响。全国解放后，当地的苏侨协会不断开办工商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至 1958 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工商企业，资金即达 270 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相当庞大，在解放初期，仅伊犁的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占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业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④]显然，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必定会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影响。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以因政策改变而消除，那么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难以挥之即去的。苏联对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在伊犁地区，从三区革命时期起，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袭下来。1950 年 3 月，赛福鼎参加中苏条约谈

---

①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79 页。

②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 年 10 月 4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4，目录 3，卷号 63，页码 6～7；笔者 1998 年 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③ 同①，第 553 页；沈志华 1998 年 8 月 25 日采访伊犁自治州原机关党委书记李向庚记录。

④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州外事办史志办公室 1997 年编印。

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上学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 1958 年才全部得到更换。①

由于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纸杂志。塔城地区直至 1959 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 68 种。②此外,在 50 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③

如此十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 60 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有苏联、有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 25 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孜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④

说到伊塔事件的历史根源,还有必要说明一下伊犁地区中苏边

---

① 沈志华 1998 年 8 月 30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38 页。

②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38 页。

③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42～45 页;《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④ 沈志华 1998 年 8 月 27 日采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张克迅记录;《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38 页;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1963 年 3 月 28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20,页码 228、231;黄金明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 年 10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43。

境的历史状况。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在此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基本情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

所谓有边无界，即是说在很多边境地区分界线不清，双方的人员和牲畜根据多年放牧的习惯，经常来回流动，夏天到北边，冬天到南边，历来如此。[①]新疆和平解放后，由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友好的现状，伊犁方面对中苏之间是否应该保留边界线的认识，一直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中苏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友好的，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应该明确，中国不是对苏联，苏联也不是对中国，而是中苏两国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派遣特务和间谍的活动，双方密切配合，保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安全。[②]

所谓有边无防，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中国方面长期没有军队驻防。据邓力群回忆，他在1949年8月从莫斯科到伊犁时，只需苏联驻伊宁领事护送即可，因为在中苏边境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口岸只有苏方设立的边卡，而中方没有任何驻军和边境检查人员。[③]全国解放以后，在上述对中苏边界问题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实际仍旧一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直至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300余公里，而且只有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④]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对边境地区没有实施全面地、严密地控制，边界线上留下了许多无人管理的空隙，使边民能够经常地、

---

① 见沈志华1998年8月3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等人座谈记录。

② 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7年10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57，页码38～39。

③ 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④ 黄金明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4～155。

零星甚至小批地自由越过边界而不被发现。另外，就伊犁州的边境居民来说，伴随祖国观念的混乱，国界观念也极为淡薄。一些边民或者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联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干脆就到苏联境内去打猎、拾鹿角；少量人员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①

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新疆自治区方面发现，苏方自1960年6月以来积极加强边防工作，对边境全线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此时，虽然新疆各边界区县也已开始调查中苏边界情况，但面对苏方的新动向，自治区也只是要求加强边卡干部和巡逻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严守边界、不越不退的原则，慎重处理一切边界纠纷和越界事件。②

60年代初，由于双方都开始加强对边境地区边民越境问题的管理，除了在边界模糊地区的习惯性流动放牧外，此期真正非法越境的人只是极少数。据统计，新疆1961年全年越入苏境者共82人，苏方越入中国境内者2人，中苏双方为此会晤了154次。③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档案文献中，未见有关于1960年冬天至1961年4月大批民众从新疆西北部，也即伊犁地区非法越境去苏的记载。

通过追寻苏联与新疆关系的历史根源，可以看出：苏联不仅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通过这种影响，尤其是利用苏新在民族、部族上的历史渊源及密切联系，造成了当地居民对国家、祖国认识的模糊。这就是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在新疆伊犁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历史背景。而伊犁州中苏边境地区长期处于半开放状态，特别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当地中国政府和中国居民的边防概念模糊，边境管理不善，对边民流动现象习以为常。毫无疑问，伊犁边

---

① 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7年10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57，页码39。有关50年代新疆地区中国边民和牲畜的越境情况，在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档案馆所存各期"边防情况简报"中有详细报告，笔者虽阅览过，但未获准进行摘记。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60年10月12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208，页码51～52。

③ 伊犁州公安局：关于一年来边防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情况报告，1961年12月2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

境的历史状况以及当地居民的边界概念，是构成中国边民出走行为的一种心理因素。但是，促成伊塔事件发生的首先还不是非法越境问题，而是伴随苏联对新疆的历史影响而来，并且在新疆中苏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苏联侨民问题。

（二）苏侨问题：造成中苏边民流动的基本前提

苏联对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恢复二三十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苏联居民的国籍，同时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间大量发展苏联侨民。而历史上形成的伊犁境内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使得这一地区的苏联侨民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网，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构成了后来大量边民涌入苏联的基本背景。

关于新疆苏侨的来源和构成

最初来到新疆的苏联侨民，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逃亡的白俄败兵和难民；一是在苏联 30 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中国当地政府向这些苏侨发放了侨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为归化族。战后，苏联急需补充在战争中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1945 年 11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①] 1946 年 2 月 1 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此文稿张贴后，前往登记的人即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②]

①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9401，目录 2，案宗 105，第 50～58、238 页。

②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79～480 页。

此后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45 年 11 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 2.5 万人。[①]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 年发展苏侨 2000 人，1947 年即增加到 1.3 万人，1948 年至 1949 年更猛增为 4 万人。[②]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 6.5 万户，共 20 余万人。[③]

新疆解放后，苏联仍然继续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非法苏侨证件，鼓动他们加入苏籍，并移居苏联。例如，从 1958 年 2 月 8 日到 1959 年 3 月 6 日，苏联领事馆共发放 4575 本侨证，其中只有 15 户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的批准的。1959 年 7 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 80 多本非法苏侨证，一些人根本不是苏侨而是中国人，但也能得到苏侨证。[④]解放后苏侨人数的变化也能说明问题。1953 年，新疆外事机构对全疆苏侨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伊犁地区的调查结果为，伊、塔、阿三个专区共有苏侨 86757 人。[⑤] 1954 年迁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 1959 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苏 132873 人，其中苏侨 86890 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苏侨在此期间没有发展，应该已全部遣返完毕。但根据后来的统计，1960 年至 1963 年，全州仍有苏侨 11310 人。[⑥]

在发展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活动中，伊犁苏侨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在三区革命时期被苏联驻伊宁领事称为“国中之国”的社

---

①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9401，目录 2，案宗 105，第 240 页。

②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 年 10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39。

③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④ 伊犁州外事分处：苏联外交部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奥西波夫、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苏联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等同志与伊犁区党委张、赵书记等谈话记录，1959 年 7 月 6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第 86、82 页。

⑤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见新疆外事处：“新疆工作三年来的总结及今后意见”，1953 年 8 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页码 8～10。这里仅指苏侨本人，不包括其家属。此外，由于统计方法的问题，苏方的数字与中方有一些差别。

⑥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会团体，新疆解放后势力进一步膨胀，在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支持下，从事超出其自身职能范围的活动，尤其是代行领事业务，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和遣送苏侨等工作，利用此项工作之便，在中国公民中发放假侨民证，有的苏侨协会会长就专门做非法发放苏侨证的事情。霍城县苏侨协会还宣传说，一份护照可带 28 人出境。特别是有的苏侨协会还吸收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参加；有的苏协主席本人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在当地民族群众中搞小集团活动；有的在地方公安部门工作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拉拢人回苏，为那些借口将侨证上照片遗失的人乱开证明，以便于他们去领馆换取新的护照。[①]此外，由于 1959 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就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于是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便屡有发生。[②]这种情况实际又助长了苏协非法发展侨民的歪风。

中国政府对苏方的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当发现苏联在中国人中间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后，1955 年 7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曾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进行过协商，并达成协议：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1956 年 10 月，新疆外事处又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证明。[③]此后，新疆自治区于 12 月开展了对外侨的登记工作。伊犁州的登记事务开始于 1957 年初。针对苏方在新疆非法发展苏侨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联领馆进行交涉。1959 年初，赛福鼎即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达巴申商谈，并明确只有持苏联政府正式颁发的护照者才是苏侨。[④]是年 6 月至 7 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

①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 年 2 月 3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页码 5；伊犁州外事分处：3 月 5 日张书记同沙鲁诺夫领事谈话摘要，1959 年 3 月 8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页码 43～45。

② 伊犁州外事分处：3 月 5 日张书记同沙鲁诺夫谈话摘要，1959 年 3 月 8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页码 42。

③ 伊犁州外事分处："伊塔事件真相"，1962 年 12 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14。

④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 年 2 月 3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宗 80，页码 4～5、7～8。

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来新疆，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奥西波夫当时表示：伊犁领事馆委托苏侨协会办理护照是不对的。苏联外交部已在不久前指示说，办理护照的各种业务只能由领事馆本身去做，并应和地方政府取得密切联系，苏侨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遣侨工作是由国家进行的。伊犁领事馆把领馆的业务交给苏侨协会办理是工作中的一个错误。签证工作只能由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及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搞。达巴申总领事也申明：苏侨协会无权发出证件，苏侨协会干部只可做一些具体性技术工作。苏侨协会发出的不合规定的证件应该作废，持证人也不能前往苏联。①

但是，尽管苏方作出上述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也未严加限制。伊犁外事分处曾在1959年7月，1961年8月、11月先后三次将当地公安部门没收的非法护照187本退还苏驻伊宁领事馆，可截至1962年上半年，各地又发现了非法护照1470本。②

关于新疆苏侨的遣返问题

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出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出现了新疆苏侨回国之事。1954年4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6000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共同协助办理，各地方成立内部的“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外事处、公安局共同抓

---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委外办：自治区党委吕书记与苏联外交部领事局副局长康茹科夫、远东局奥西波夫和总领事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6月29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74，页码40～41、44；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奥西波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谈话记录，1959年7月6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87～88。

②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5。

并设立办公室。以后，自治州和各地区成立了“迁侨委员会”。[①]

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共新疆分局所谈：1954 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送 500 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送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发布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馆从中审查挑选 500 户遣返。计划在 6 月、7 月、8 月三个月办完此项工作，9 月 1 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关于“此事涉及中苏友好关系，必须主动积极协助，把协助遣返苏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地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②]这样，1954 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 500 户 2464 人。此后，大规模遣返苏侨逐年进行，从 1954 年至 1959 年 11 月 20 日止，伊犁州共遣返苏侨 86890 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 45983 人，合计达 13 万余人。[③]

伊犁地区的遣返苏侨工作从 1954 年开始后，即基本是在每年的春季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最初提出遣返苏侨的目的就在于增加劳动力，以完成苏方边境地区的春耕生产及其后的夏收任务和开垦荒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方强调冬季气候恶劣，不利于侨民的行动及苏方的安置工作。这样，每年的二三月，苏方都有数量大卡车开到伊宁，接苏侨、拉行李，浩浩荡荡。未走的人呼朋唤友前来领馆送行，致使当地生产搁置，人心浮动，给伊犁地区的春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④]尽管中方对于这种状况有意见，但在 50 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比较友好，伊犁党政领导机构还是一直积极配合苏方的遣返工作，认为应重视苏方意图，多听苏方意见，不宜过分强调照顾当地的

①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② 中共新疆分局："关于协助苏侨回国问题的紧急指示"，1954 年 5 月。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75，目录 6，卷号 54，页码 29。

③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④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人谈话记录，1959 年 7 月 6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页码 91～92。

生产问题。1959年,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伊犁方面曾几次向苏方建议将遣返时间改在每年的11月、12月份,或在春耕结束之后进行,尽量不要安排在4月至6月份。但苏方总以冬季天气寒冷,苏方提供的是敞篷车,对侨民有困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夏季需要劳动力为由加以回绝。中方提出汽车可以加篷,而且路途并不远,苏方仍然坚持在春夏季遣返。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2年。

关于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及伊犁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这是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了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另一方面1947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②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尽可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需要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当时,苏联方面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1950年初中苏条约谈判时,苏联外交部曾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他们说,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进

① 伊犁外事分处1957年工作报告,1958年1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59,页码135;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人谈话记录,1959年7月6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88~89;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自治区党委吕书记与康茹科夫、奥西波夫和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6月29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74,页码42;伊犁州外事分处:3月5日伊犁区党委张书记与沙鲁诺夫谈话摘要,1959年3月8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41。

② 详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曹达诺夫:《五军的革命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05页。

行了汇报，并表示自己愿意放弃苏联国籍。周恩来对此举表示欢迎。以后，中苏两国政府还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①。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疆自治区领导干部中的一些享有苏籍和持苏侨证的人退出了苏联国籍。但是，大部分苏籍干部还是不愿意放弃苏联国籍。特别是在伊犁地区，由于苏籍干部较多，如伊犁直属县的许多县长、科长、部长、公安局长都是苏侨，而且是苏侨协会委员，要动员他们全部退籍，涉及的面也太宽。于是，问题便拖延下来。②尽管在 50 年代以及 60 年代初，处理苏籍干部退籍的期限屡次延长，仍有大量苏侨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党政部门中任职。至 1960 年以前，伊犁地区绥定、霍城县的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有 60%以上是苏侨；伊犁州级军、政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是苏侨，甚至是苏侨协会委员；在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苏侨占 22%，另还有 25%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③ 1958 年，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辖区的苏籍负责干部已很少，只余几名，而伊犁州的苏籍负责干部却仍有 95 人之多。1960 年，新疆全疆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推动苏籍干部退籍的工作，但是该年的登记结果是，全自治区依然有苏籍干部 1047 人。由于伊犁州的苏侨登记工作未搞彻底，故此数字并不准确，苏籍干部的实际数量应该还要多些。至 1962 年，仅就伊犁州而言，即仍有苏籍干部 1001 人。④此外，还有许多干部隐瞒了他们的苏籍身份。⑤

---

①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 年 2 月 3 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页码 6；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1960 年的工作总结及 1961 年的工作安排意见，1961 年 3 月 10 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3，目录 43，卷号 8，页码 2；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②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 年 2 月 3 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页码 6；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37 页。

③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37 页。

④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 年 2 月 3 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页码 10；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1960 年的工作总结及 1961 年的工作安排意见，1961 年 3 月 10 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3，目录 43，卷号 8，页码 4；"伊犁区党委政法部 1962 年全州苏侨数字统计"。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9。

⑤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报告，1962 年 10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50、152。

应该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阶段，乃至末期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发展，两国关系出现倒退时，在新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一直基本上是持配合态度的。对于苏籍干部回苏的要求，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大体尊重中国方面的意见，如中方不同意他们回国，领馆即不予批准。对于苏籍干部多数愿意保留苏籍的状况，苏联方面也表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时候了。但是，由于极少数苏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苏联领事馆对这些人又基本持同情态度，因此，新疆苏籍干部问题的负面影响客观上严重存在着。[①]事实上，也正是这部分人日后成为苏联在新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

综上所述，新疆的苏侨及其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属，实际上为苏联在当地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由于历史的、民族血缘的纽带联系，使得新疆苏侨具有与东北、上海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为以后伊塔事件的发生确立了基本的前提。不过，从50年代的情况来看，新疆苏侨回国是自1954年以来由苏方提出经中苏双方政府认可的正常现象，尽管中方对苏联采取不正当手段发展侨民有不同意见，但在中苏友好的背景下，还是服从苏联的需要，协助新疆苏侨定期回国的。同时，对中方关于苏籍干部尽量留在中国的要求，苏联也是赞同的。这即是说，当时的苏侨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因素。此外，每年春季有一批伊犁苏侨举家迁往苏联也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是苏方坚持这样要求和安排的。

那么，为什么过去时有发生的平常现象到1962年初竟会酿成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呢？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就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问题在于，这两件事对以后的伊塔事件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呢？或者说，导致伊塔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

①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年2月3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80，页码10～12、7、14；外交部关于苏侨和苏籍干部处理问题的加急电，1961年3月25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4，卷号182，页码36。

（三）国内因素："大跃进"在新疆的经济后果及其影响

1958 年，中国大地急风暴雨般地兴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凭借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其结果导致全国性经济严重失调，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上 1960 年的自然灾害，引起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甚至在许多省份出现了饿死人和逃荒的现象。那么，这种状况是否就构成了 1962 年新疆边民外逃的主要原因呢？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特别是伊犁州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

新疆自治区于 1958 年 3 月开始部署和实施工业和农牧业生产的全面跃进计划，其显著特点与内地一样，也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并一再修改，层层加码。最后确定，1962 年与 1957 年相比，农牧业总产值要增长 6.2 倍，平均每年增长 48.5%；工业总产值要增长 16.6 倍，平均每年增长 77%。新疆还提出，一定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把自治区建设成为中国的钢铁、石油、有色及稀有金属、煤炭、粮食、畜牧业、棉花、制糖八大基地。1958 年 9 月新疆开始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紧急动员，同样是一哄而起，短短一个多月便在全自治区建成 562 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民 96 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 99.7%，其中自然也存在"一平二调"、刮"共产风"问题。①

然而，从有关统计数字和笔者在当地了解的情况看，50 年代末那场"天灾人祸"对新疆的影响要比全国其他地区小得多。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在农业方面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①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 年 2 月 3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80，页码 10～12、7、14；外交部关于苏侨和苏籍干部处理问题的加急电，1961 年 3 月 25 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3，目录 44，卷号 182，页码 36。以上所引数字见朱培民：《新疆大跃进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第 41～42 页。朱文引用了大量目前学术著作中少见的统计数字，但遗憾的是均未注明出处。因此，使用时只能作为参考。

但农业生产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1961年有农业劳力262万人，比1957年增长17%；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较快，1961年灌溉面积为4500万亩，比1952年增长1倍多；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扩大，1961年耕地面积5050万亩，播种面积4156万亩，均比1957年增长61%。在畜牧业方面，尽管由于实现公社化导致耕畜量大幅度降低（1961年为1957年的73%），但牲畜年末存栏总头数却逐年增加，由1957年的1709万头增加到1962年的2250万头。在农业收成方面，于棉花、油料出现较大减产的同时，粮食总产量则大幅度增长，1957年为29.1亿斤，1960年为39.5亿斤。此后有所下降，但1962年仍达到35亿斤。1957年至1960年，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从6亿元增长到7.9亿元，以后两年略有减少，但1962年依然保持在7.5亿元的水平。[①]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是否发生过饥荒，乃至部分边民需要出走苏联来解决吃饭问题呢？总括而言，从1959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起至1961年，新疆全区城乡人民生活虽然紧张一些（人均口粮标准由原来的400多斤减少到300斤左右），但是有饭吃，没有因缺粮而发生大的问题。新疆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突然大量增加而造成的。据统计，1960年1月至1961年3月，自流来疆人员达22万余人，仅1960年1月至10月就流入15.3万余人，其中多数为受灾地区群众。1959年至1961年11月，新疆地区收容、安置内地流入人员89万余人，接收、安置支边青年30万余人，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数，新疆人口由1957年的561万人增加到1961年的730余万人，三年增加人口170余万人，增长了33%。[②]这种自流人员不断涌入，导致人口猛增的状况，当然给新疆造成了很大压力。对此，一方面，中共中央根据新疆的要求，指示各有关省区确实安排好本地人民生活，控制人员外流；另一方面，自治区党委采取积极措施，妥善收容和安置

---

① 新疆自治区党史委、区党校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229～230、240页；朱培民前引文，第43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第209、218～219、226、229～230页；朱培民前引文，第44页；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页。

外来人员,[①]从而使新疆由于外来人口压力造成的困难得以缓解。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也正是由于新疆的人民生产生活状况较内地一些地区为好,才出现了严重缺粮省区大批自流人员涌入新疆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也在于这些年新疆的农业收成不是下降,而是有所提高。因此,尽管由于人口增加,此期新疆粮食库存量有所下降,但1961年6月全疆仍有库存粮2.9亿斤。不仅如此,新疆还帮助特别困难的省份解决严重缺粮的问题。如1960年底,自治区政府就专门成立了调粮委员会,组织向甘肃省调拨支援该省的粮食。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新疆非但未因困难而要求国家调入粮食,而且还调出粮食3万吨、肉8000吨支援国家。[②]

这一时期新疆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粮食危机,如1960年春季,南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发生了部分群众缺粮、饥饿、生病,乃至人员死亡的事件。但究其原因,却并非真正由于缺粮所致。到1960年3月,拜城县尚有库存粮1800余万斤,分配给该县的回销指标还有400余万斤。正如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4月召开的拜城县紧急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在有大量库存粮食的情况下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县委主要负责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民间的疾苦,既不听下级反映,也不向上级汇报,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为此,自治区党委在下发的做好全区粮食工作的决定中特别强调指出:新疆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缺粮问题,在条件比过去更好的情况下,更不能允许发生粮食问题,尤其不能允许再发生像拜城这样的粮食问题。[③]

当然,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造成的影响并不平衡。与南疆相比,北疆地区粮食不足的现象较严重一些。王恩茂在1962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承认,粮食问题主要发生在北疆,那里不少地区口粮和饲料的标准都有所下降,人民在穿的、用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④]

---

①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8、226、232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0、209页;朱培民前引文,第43页。

③ 朱培民前引文,第46页;《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

④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而伊塔事件恰恰发生在地处北疆的伊犁自治州，因此，就有必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专门的分析。显然，这对于探讨伊塔事件的起因，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1958 年伊犁州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由于在农业生产上计划定得过高，没有留有余地；对粮食估产偏高，直属县市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方面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浮夸虚报现象。1958 年秋收后，实际入库粮食比上报数相差 3300 多万斤，以致 1959 年 5 月清仓时发现，粮食库存比账面短少 1989 万斤。此外，在畜牧业生产上，因 1959 年冬季雪厚和 1960 年春季气候恶劣，全州牲畜死亡近百万头。进入 1960 年后，有的地方人民口粮安排不落实，发生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现象。但这种现象只是在个别收成较差的农场和支边人员组成的公社中出现过。同时，为了避免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伊犁区党委及时采取措施，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农村回销粮，在春播结束后将剩余种子清点转为口粮，并在城乡推广了一种做饭增量法，以解决群众吃饭问题。[①]

就全州 1960 年的总体情况而言，农业方面，粮食总产量达到 4.8 亿斤，比 1959 年还增产了 20%～30%，农村牧区每人平均 1200 斤。与内地许多地区灾情极为不同，伊犁州在是年 6 月虽然也有十余万亩地遭受冰雹灾害，以后又有十余万亩粮田发生黄锈病，但这种灾情在全州 600 余万亩播种面积中，所占比重较小，加之补救措施较及时，造成的损失不大。为使各县市解决好群众生活问题，伊犁区党委还于 12 月发出指示，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当时，全州人民公社共有 3405 个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 46.4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74.86%。同时，伊犁州还采取了压低城乡口粮供应标准，提倡推广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②]

到 1961 年，伊犁州的情况进一步好转。牲畜总头数增加到 700

①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 157、165 页；笔者 1998 年 10 月 25 日电话采访伊犁州党史委副主任刘丹记录。三年困难时期，刘丹就在伊犁地区，对民间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有所了解。

②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 169、139、168 页；伊犁州外事分处贾文郁同志与苏联领事沙鲁诺夫谈话纪要，1961 年 1 月 25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宗 97，页码 5、7～8。

多万头，全州粮食供应自足有余，并且外调支援乌鲁木齐市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当年伊犁州上调自治区的粮食达3000万斤。[①]虽然在春季，霍城、特克斯等县的支边人员中曾发生浮肿病现象，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安置工作不当。为此，伊犁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着重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织人员对支边青壮年的安置工作和生活情况做一次检查，发现浮肿病人除治疗外，要在生活上给予照顾。[②]总之，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在新疆北部地区并没有出现饥荒现象。据说，伊犁地区最差的时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只是所谓"三七开"，即吃30%的细粮，70%的杂粮，[③]根本就没有恶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困难阶段。

总之，正如上述资料所表明的，从整体上讲，在新疆，包括伊犁、塔城地区，尽管"天灾人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一些困难，但并不存在大批居民由于饥荒而外出谋生的动因。所以，伊犁边民大规模出走苏联应该还另有原因。

（四）苏联因素：中苏关系恶化及苏联在新疆的鼓动

1958年下半年以后，中苏双方经过在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炮击金门、马祖，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碰撞，中苏两党在50年代中期政治路线、外交方针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8月，苏联边防人员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中苏有争议地区驱赶中国边民，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两国的边境纠纷随之肇始。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又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而进一步恶化。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大背景下，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

---

①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175、100、179页；塔城地委关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裕民等县活动情况的简报，1961年6月22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宗97，页码78。

②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第170页。

③ 笔者1998年10月25日电话采访刘丹记录。

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转变为积极插手这项工作。从 60 年代初到伊塔事件发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开始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大量发展苏侨的步伐，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1960 年，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或直接给领馆职员布置任务，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如果有人没有证明其苏侨身份的文件，领馆就让他们给其在苏亲属写信要证件。一些人与苏联人毫无关系，也被拉来登记。苏联领事并指示说：这些人名单搞好后，与中国政府交涉成功，就可遣返回国。面对众多申请回苏的少数民族群众，苏联领事还采取了挑拨的态度，答复他们说："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我们就批准。"与此同时，伊犁苏侨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苏侨协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是年，伊犁地区查获 5 起非法登记苏侨案件，共查得照片 5269 张，非法登记的群众即有 13186 人。[①]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协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联。据 1960 年的典型调

---

①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60 年 10 月 12 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3，目录 43，卷号 208，页码 48～49；《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40～41 页。

查，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各县市居民总数的25%～40%；塔城专区在外侨普查登记时自愿交验的这类证件有6459件，为当地苏侨总数的8倍多。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持有此类证件的人，为数也不少。①

1961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②该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要"把这些护照发给那些想加入苏籍的中国公民"，"这儿粮食定量标准这么低，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到苏联去"，"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③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余；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只要是由苏联过来的人，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是苏联公民，过了边境就可以发给正式公民证，我代表苏侨政府批准你们走；并对个别要求退出苏籍的侨民进行威胁，指称：苏联政府1936年对外侨法令规定，不论何时苏侨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只有少数坏分子逃跑，不愿当苏联公民。④是年，仅伊宁市一个搞此项活动的8人集团，就在该市苏侨协会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秘密登记了6000多人，收取现金2000余元。⑤

50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并经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60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1961年9月3日"关于苏领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

---

①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5～116。

② 伊犁州外事分处关于非法领取苏侨证情况的报告，1962年（日期不详）。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27、24。

③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1页。

④ 中共塔城地委：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切莫合尼克在塔城、裕民、额敏、托里等县活动情况简报，1961年6月22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97，页码75～76、79。

⑤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2页。

时，对方却仍然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①]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观伊犁州的苏侨遣返情况：1954年至1959年6年遣返苏侨86890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45983人；而1960年至1962年3年中遣返苏侨8559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竟达20907人。[②]这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

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1960年8月，新疆自治区政府方面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即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却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退职，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③]

同期，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但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时却设法留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作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字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是否就遣返他们回苏？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60年5月到1961年3月向苏领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④]

---

① 伊犁州外事分处：11月14日伊犁外事分处办公室曹洪章同志与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谈话情况的报告，1961年11月16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97，页码191～192、195。

②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③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60年10月12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208，页码49～50。

④ 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1960年的工作总结及1961年的工作安排意见，1961年3月10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3，目录43，卷号8，页码5～6。

此期苏联政策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自己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还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①]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

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60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杂志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语广播1950年曾自动撤销，但到1961年上半年又得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很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②]

与此同时，已越境去苏的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③]

1961年至1962年，苏方发寄来的信件、邮包猛增。如塔城地区，1961年一季度苏方来信5038封，1962年第一季度增至6609封，增长31%；乌鲁木齐，1961年全年苏方来信40324封，平均每月3360封，1962年1月至5月增至51978封，平均每月10395封，平均每月增长209%。又如塔城地区1961年第一季度苏方寄来包裹340件，1962年第一季度增至632件，增长85.2%；乌鲁木齐1961年苏方寄

①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52。

② 《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46页；“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7。

③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6～117。

来包裹675件,平均每月139件,1962年1月至5月达851件,平均每月170件,平均每月增长22.3%。另如塔城地区1961年一季度收到苏联报刊杂志等印刷品462件,1962年一季度增至923件,增长99.8%;乌鲁木齐1961年一季度收到550件,1962年一季度增至704件,增长28%。①

第四,1962年4月至5月,苏联方面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1961年冬和1962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秘书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后6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4743人次。特别是1962年4月4日,季托夫抵达塔城,一反以往先到当地政府拜会的常规,径往苏侨协会接见居民,并鼓动说:哈族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季托夫在5天时间里接见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1573人次,并有意将7日约见的人推迟到8日下午接见,待人员集合至500余人时,即不经当地政府许可就擅自召开大会,煽动群众外逃苏联;又授意苏侨代表在他走后散布"你们跑我不干涉,你们自己负责"等语。此间,季托夫曾经巴克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季托夫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即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成批自称是苏侨的人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甚至扬言要大批逃跑。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气候,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4月中旬起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②

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群众。库则温边防站设有临时登记点,科克巴斯塔乌设有四顶帐篷、一间毡房的临时接待站,内装电话,外停数十辆大小汽车和摩托车;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中。当大批群众

①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6~117。

②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18、108、119、106;《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3~4、7页。

逃跑越境时，苏方在塔城、裕民和霍尔果斯、察布查尔中苏沿边境地区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并于夜晚打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用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苏边防军还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进行登记、发钱、发粮，并很快将他们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又在边界口子上散布“22 日关口子”、“25 日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据伊塔事件后逃苏被苏军捕获的人回来反映，苏方对他们说：“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过来不少人，原因是我们从多处开了边界口子。现在我们上级通知我们，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①

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积极劝阻，制止外逃。以后由于不少劝阻干部被打伤，各地在此项工作中均以民兵作后盾，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继续对外逃边民进行教育、劝阻。4 月 29 日自治区党委发出《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后，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不再外逃。与此同时，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举行武装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谣言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制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②

5 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5 月 14 日和 15 日，有 100 余人到伊宁苏联领馆说：中国政府允许我们走了。领馆人员则讲：“那你们找到中国政府要证明嘛！”5 月中下旬，每天不仅有许多人步行外逃，而且还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站班车取道霍城逃苏，伊宁发往霍城

①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19～120、107、113；《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46～47 页。

②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7～10 页。

的班车票仅 27、28 两日即售出 800 余张。5 月 29 日上午,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馆的汽车经过时,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人群示意,即有人高声呼喊"我们掌柜的来了"。下午,由于车辆不足,车站暂停售票。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一千余人,人声鼎沸,秩序混乱,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围逼前来处理问题的州长开证明去苏的情况。即之,聚集车站的群众分三路进发,前往州人委、区党委和苏联领事馆。面对要求去苏的中国边民,苏领事塔查尔金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管卖票,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我们只办理回苏的手续。"进一步激化矛盾,使这部分人全部转往州人委和区党委。是晚 6 时许,在一些坏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群众冲、砸了州人委和区党委。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 45 人。在 5・29 事件中,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苏方均把他们推倒中国政府方面,一再申说:如中国政府同意,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强迫地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带了一些邮袋回国。①

5 月 30 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② 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从 1962 年 4 月至 8 月,增设边防站 58 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6 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1963 年初,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1963 年秋至 1964 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

①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10～11、17 页;"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08～110、120。

②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页码 112。另据《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9 页记述:5 月 31 日,苏方出于政治的需要,封闭了边界。

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①] 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根据笔者发现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简单归纳如下：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的深厚影响，以及苏联侨民和苏侨协会的大量存在，构成了中国伊犁边民出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这种历史背景为1962年伊塔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1958年“大跃进”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现实，虽然构成了部分边民向往苏联的心理因素，但就其程度而言，并不能成为大规模迁徙苏联活动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实质还在于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改变了对新疆苏侨的遣返政策。尽管尚无证据说明苏联方面具体策划了这次大规模边民外逃的事件，但是苏联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并千方百计鼓动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的实际做法，无疑促使了历史上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性。这就是伊塔事件产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此为删节本

①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宗114，页码132；《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第243～244页；《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29～30页。

19.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

1965 年初至 1972 年末是美国派遣美军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南的入侵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继而又实行“战争越南化”方针；而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与美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较量的阶段。此期苏联调整其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不断加强援越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苏联在越南的地位随之大大提高，苏越关系趋向密切。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时却未能出现转机，苏联新领导集团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至 1969 年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进入 70 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由敌对走向对抗。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面对越苏将走到一起的前景，中国在大力援越的同时忧虑与戒心倍增，中越关系出现裂痕。

应该说，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

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①] 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②]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根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对这种矛盾冲突发生的背景，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做一个历史考察。[③]

（一）毛泽东关于外患与内忧的思路

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矛盾斗争的发展，是与毛泽东对外患与内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外患，即外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入侵中国的估计；二是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估计。关于内忧，则是从意识形态上的防修反修，发展至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纯洁与否、无产阶级专政稳固与否的关注。而毛泽东表述这种认识，以及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关键年份，是

① 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见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俄国和越南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见 Odd Arne Westad，Chen Jian，Stein Tønnesson，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Working Paper No. 22。以下不另注。

② 据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部长张如磉回忆："我知道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然而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因为仍然需要中国的援助。"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29页。

③ 整个援越抗美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越美和谈。在这一问题上，中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此，笔者将另文论析；本文着重论说的是对越物质援助中的中苏关系。

1964年;特别是1964年6月,是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对外患的认识

其一,关于美国侵略中国问题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却并不认为美国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1963年12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①] 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②] 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③] 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④]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认识与本文下面要谈到的,他对苏联威胁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设想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即一方面大张旗鼓地

---

①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

②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13、514页。

③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10月7日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④ 1964年10月6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73、674页。

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另一方面又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1965 年 2 月初美国对北越境内的若干兵营和军事通讯中心实施空袭后，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①] 而美国则于扩大越战，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同时，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说，美国绝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绝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②]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一面于是年 4 月 2 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③]。一面在 4 月 12 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④]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 5 月 19 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⑤]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 年 5 月 31 日，陈毅

---

①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Vietnamese 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9 June 1965, RSS No. 0008/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 (NSF-CO), box19, folder Vietnam Memos (D) Vol. XXXV 6/16～30/65,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LBJL), Austin, TX. 转引自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提交 2000 年 1 月香港"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Vietnam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 1965"。关于"第三者"，该文作者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 2 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

② 参见 1965 年 4 月 2 日周恩来与阿尤布・汗的谈话，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39 页。

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440～444 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723 页。

④ 1965 年 4 月 4 日人民日报在第 5 版的一则报道："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词；此后，4 月 6 日和 7 日又在第 4 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关于"援越抗美"的口号，则是在 5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中首次公开提出。见 1965 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

⑤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724、731 页。

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①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 月 2 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 月 4 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 月 7 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②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 6 月 8 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③ 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

---

① 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 年 6 月 2 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方转达的清楚和详细。参见 Peking (Mr. Hopson) to FO(英国外交部), No. 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 May 1965; Washington(Sir P. Dean) to FO, No. 1466, 4 June 1965; Peking(Mr. Hopson) to FO, No. 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英国伦敦档案局)。转引自前引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另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723 页。

②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 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 May 1965; FO to Washington, No. 4546, priority/confidential, 1 June 1965(d. 0240, 2 June 1965); Washington(Sir P. Dean) to FO, No. 1466, 4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 ACA-Lindsey Grant to FE-Mr. (William P.) Bundy, "subject: 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 31-INFORMATION MEMORANDUM", 3 June 1965, NSF-CO, Box238, LBJL.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 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 参见前引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

③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736 页。

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

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对南越进行地面战争，对北越实施空中袭击的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①] 1966 年 3 月 16 日，美方在华沙第 129 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②] 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威胁问题的判断；而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他开始不断地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其二，关于中国受到苏联威胁的忧虑。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 7300 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 1962 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 1963 年 7 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中苏之间，从 1960 年 8 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 1964 年 9 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 2792 起。[③]

---

① 参见前引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一文。

② 1966 年 4 月 6 日外交部抄发第 129 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12，卷号 1，第 129～132 页。

③ 1969 年 5 月 24 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 4189 起，比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见 1969 年 5 月 25 日《人民日报》。

其中 1963 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据苏方材料记载,计有 175 起。[①]是年 3 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9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11 月 21 日苏联外交部复照询问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 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②]。此后,1964 年 6 月 8 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教科书、学术书籍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不确切,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的版图里。为此,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③] 是年,苏联并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④]

毛泽东则于 1964 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 2 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⑤]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⑥]虽然毛的这一表示,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

---

① 1963 年 7 月 10 日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苏中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5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 年,第 3867～3909 页。

② 1963 年 3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苏]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 1977 年中文版,第 210、211 页。

③ 1964 年 6 月 8 日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教科书和学术书籍,以及绘制的地图中不正确阐述苏联与中国边界确定的历史决议》,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7 卷,第 4249 页。

④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第二辑,三联书店,1979 年,第 294 页。

⑤ 1964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

⑥ 1964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与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谈话。

动,“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1],但却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3]。

1966年1月,苏蒙又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4]。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5]。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6]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

---

①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9月10日与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②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

③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等问题,详见笔者《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两国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参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编写组编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0页。

⑤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的谈话。

⑥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的谈话。

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对内忧,即所谓亡党亡国问题的警惕

毛泽东在1964年1月就曾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①] 不过,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是在1964年的春节,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统战部。[②]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1962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③]并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

① 1964年1月17日总参情报部印发《阿破获一叛国案简况》说:据悉,该叛国集团的任务是为苏联提供情报,暗杀领袖。1月28日毛泽东在此件上做出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4～15页。

② 参见1999年11月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毛泽东发此议论所针对的问题是,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以及李维汉在提出统一战线有两个层次、两个同盟,即工人与农民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和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爱国者同盟时,没有讲明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既有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又有阶级斗争关系。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33页。

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1] 6 月 14 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2]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 12 月 15 日至 28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3]。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4]。此后不久，毛泽东在 1965 年 1 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5] 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 1 月 14 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 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的思考[7]

中国自 50 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方针，

---

① 《十年论战》，第 778、779 页。

② 参见总参《罗瑞卿传》编写组编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第 471～472 页；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第 248、250 页。

③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批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是两个"独立王国"。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 254 页。

④ 王力著：《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47 页。

⑤ 196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⑥ 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 255 页。

⑦ 1999 年 9～10 月，笔者曾与徐焰等军方学者探讨过毛泽东的军事防御战略设想，对此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受到很大启发。

其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62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友好,中苏同盟稳固,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在此指导思想下,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

但是到1964年中,毛泽东的对外战略防御设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林彪的战略防御方针提出了疑义。[①] 毛泽东此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②] 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③] 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④]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⑤]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

---

① 参见《罗瑞卿传》,第472页。

② 参见1998年6月军方学者的谈话记录。

③ 参见《罗瑞卿传》,第476～477页。

④ 《十年论战》,第778页。

⑤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68页。

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①

此外,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②

总之到1964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③ 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④

在上述诸项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与苏联重新团结起来,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协调行动。

中苏在对越援助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开始于1965年苏联大规模

---

① 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除上述引文外,其他的解释为,"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第1769页。

② 参见刘志男采访有关人士记录。转引自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42页。

③ 有学者根据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指出:毛泽东提出战备与三线建设的意见,同当时的越战战况之间无明显的因果关系。与其说从南方来的战争压力要大一些,不如说当时人们还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1964年提出战备问题,更改"三五计划"的指导原则,是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空前紧张的综合性产物。参见李向前提交2000年1月香港"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Vietnam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64:越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

④ 关于此问题,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援越之后。此时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已将两国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当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于 1965 年 4 月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把分歧撇在一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后,7 月,中国方面即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1]

1966 年 2 月末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2] 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绝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3]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即由此而生。特别是,由于越南在其抗美救国战争中力争得到中苏双方的最大援助,使得这种纠葛更加突出起来。

(二)1965 年至 1969 年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

1965 年至 1969 年是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的阶段。此期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至 1969 年 3 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 月苏联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 394～395 页。

② 1966 年 3 月 28 日、29 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的谈话。

③ 1966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嘛!

铁列克提地区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达至顶点，进入敌对状态。与此同时，随苏联对越军事、经济援助的不断加强，越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升温。

在这种背景下，此阶段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至 1969 年 9 月胡志明去世之前，中国的援越方针在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于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开始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他国的军事援助，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更适当地使用本国的人力资源；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经济建设战线拉的太长，希望其“立足于战争”，经济建设应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隐蔽的”为主，意即减轻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压力；1969 年半年内仅完成中越援助协议的 31.4%；直到 1970 年末外贸部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还拖欠有 1967 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尚未执行完毕等等。[①] 当然，导致此微妙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在于中国对越苏亲近的不满，其中有对越施加压力的成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越总方针的改变。

二是中苏两国围绕援越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斗争。

中苏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的纠纷

1965 年 2 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定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25 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 1. 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 4000 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 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 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 500 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 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

---

① 1969 年 4 月 12 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的谈话；1968 年 8 月 1 日李强与李班关于援越成套设备问题会谈纪要，8 月 14 日李强与李班关于成套设备问题会谈纪要，5 月 22 日李强、李班 4 月 23 日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 1968 年，卷号 379，第 31、29、15 页；1969 年 8 月 15 日苏军情报总局伊万舒金给鲁萨科夫的报告，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7 卷，第 4410 页；1970 年 11 月 14 日外贸部关于下达 1971 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清单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 1971 年，卷号 23，第 3 页。关于这个问题及此期中越关系的变化，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①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2月25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儿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例如,苏方要求紧急空运高射武器去越南,但是却直到3月8日才将这批飞机和高射武器交给中方,中方于当日两天内全部起运交付越南。为此,中国方面认为,如果苏联真的那么急于运,何以拖延8天才运来呢?② 苏联的行为令中国疑虑重重,感到在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下,苏联提出这些要求,实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作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

---

① 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65、267页。

②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65、267页。

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议上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重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 6.5 亿人口的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①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进行驳斥，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 18 门高射炮和 75 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预谋的反华行动。②

1967 年 5 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 和米格－21 型飞机各 12 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

① 1965 年 3 月 26 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7 卷，第 4300～4327 页。

② 1965 年 4 月 1 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11，卷号 7。

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1]

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纠葛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至越的一条重要通道。[2] 此期,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纠葛过程复杂,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

1965 年 2 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 2 月 11 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快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 3 月 30 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3] 4 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空导弹装备,包括 13 列火车、403 个车皮、282 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一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部署工作。4 月 14 日至 5 月 20 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6 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

---

① 1967 年 5 月 13 日乔冠华与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的谈话。

② 中国方面规定,这些国家经由中国运送的援越物资,均免收运杂费,对内由铁路向外交部结算。参见 1965 年 9 月 30 日铁道部关于"苏联、东欧和朝鲜各国经我国铁路运送援越物资的运送手续和计费结算办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 1965 年,卷号 665(无页码)。

③ 1965 年 4 月 1 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 77,目录 11,卷号 7,第 37～38 页;1965 年 10 月 21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见 1965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21,卷号 135,第 7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第 265、267 页。

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他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他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7月3日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并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①] 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26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1965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14.85万吨，其中军事物资5.5万吨，一般物资7.5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②] 根据中国的材料，1965年3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运送了150个车皮以上的物资去越南；4月至10月，苏方计划有40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5月26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从1965年至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③]

但是苏共中央于196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

---

① 据2000年1月笔者采访有关人士记录。

② 此批过境物资中另有越南的贸易进口物资1.85万吨。1965年7月26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2、7、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8页；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2页。

时转运苏给越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 7 月 14 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①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 这其中的是是非非能否说清呢?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1965 年 8 月 26 日,苏联方面向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 1965 年至 1967 年补充供应越南的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办理,通过中国驻越大使于 9 月 2 日通知越南外交部苏方申请之事,并在是月 17 日、27 日和 10 月 7 日连续催请越方答复。同时由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于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8 日接连 5 次向苏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和驻华武官说明情况,表示一俟得到越南的答复,即与苏方商谈签订协议之事。但直至 11 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 10 月 7 日苏对外经委代理代表请中国对外经委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以及为了接受这些技术装备在技术上有哪些可能性"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 10 辆军机修理车以及 40 门高射炮的转运。②

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 10 月 12 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

---

① 1965 年 7 月初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第 268 页;10 月 21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见 1965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21,卷号 135,第 2 页。

② 1965 年 10 月 21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11 月 5 日中共中央的复信,见 1965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21,卷号 135,第 6、3、2 页。

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在中方人员质问其用意何在时，苏武官和代理代表也表示不理解莫斯科的意图。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5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做反华文章。[①]

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作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9月2日，中国对外经委副主任李强约见苏对外经委代表，指出：苏联的做法就是要造成一种形势：如果我们接运你们违背协议运来的物资，你们就可以任意打乱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如果不接运，你们就造谣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李强表示坚决反对苏方的这种做法。苏代表则保证说，今后一定采取措施，按协议办事。只是此后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仅9月一个月内，苏联方面无计划和不按计划发车数即占总批数的72%。为此，中方从9月18日至10月23日，先后10次向苏方提出这一问题，声明此事如不加以解决，误了运输时间，一切责任完全由苏联方面承担。苏代表一面感谢中方“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的工作障碍所表现的巨大耐心”，表示要找出症结所在，消除己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一面恳请中方“不要把我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②]。

---

① 1965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11月5日中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3、6页。

② 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4页。

但遗憾的是,以后此类事情仍有发生。如是年 11 月 25 日,一批由中国代越储存的苏联、波兰炸药和爆破器材提前到货,给中国对外贸易总公司的工作带来困难。1966 年 4 月上旬,一批从波兰发往越南的炸药、雷管由苏联方面换票发运时在手续上造成了紊乱,运单与货物名实不符,如未发现即办理换装和发运,又会成为中苏之间的一场过节。①

1966 年 4 月末,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访问匈牙利期间谈到,由于苏联同越南没有共同边界,苏的援越物资非经过中国不可。如果中国不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这种援助会更加有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旋即于 5 月 4 日发表声明驳斥说:苏联交运的援越军事物资,中国方面均优先、迅速、免费转运给了越南。至 1965 年底,中国已转运苏联援越军用物资 4.3 万余吨。声明指出:苏联援越的军用物资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同它的国力很不相称的。所有武器都是过时的,有些还是破损的。数量也很少。1966 年第一季度,苏联要求中国准备 1730 个车皮的运输力量,中国方面予以同意,并备好了车辆。但苏联方面实际交运的物资只装了 556 个车皮。苏联与古巴没有共同边界,而且距离遥远,但却可以把火箭核武器运过去又运回来;为什么对离得并不那么远的越南,连常规武器都运不过去呢? 苏联同印度也没有共同边界,但苏联可以由海上把大量物资运去,帮助印度打中国,为什么苏联不能由海上把它的物资运到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国主义呢?②

7 月初,《人民日报》又特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揭露“苏修制造谣言”,宣称:“越南方面同意接受的军援物资,中国方面一律同意协助转运,从未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到达中国边境,中国铁路都立即以特快的军运办法予以转运,从未拖延,也根本没有发生过积压的现象;中国铁路对所有军援物资的转运都是免费的,我们从来没有向苏

---

① 1965 年 11 月 25 日外贸运输总公司关于代越储存炸药和爆破器材收货人到货站的通知,1966 年 5 月 3 日外贸运输总公司对越储运工作的情况反映,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 1965 年、1966 年,卷号 664,第 33 页;卷号 680(无页码)。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 卷,第 268、269 页;另参见 1965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21,卷号 135,第 2、4、5 页。

联政府收取过一个卢布、一块美元、半个格兰姆黄金，更不用说什么地对空导弹之类的实物了。”[①]

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 1966 年初正式通知中国：他们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②]另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 6 月 19 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并在 1967 年 2 月 28 日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③]

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 年 2 月 10 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 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 1 月到 3 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 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 月初，苏对外经委代表为通告据 1968 年 2 月苏中协议而发出的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对外经委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旋即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调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激情。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 1969 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

① 1966 年 7 月 7 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国是否向苏联索要过转运费及军火，及苏联是否散布过此类言论，笔者目前尚未见有中苏两方面的材料予以支持。

② 1966 年 3 月 24 日对外贸易部等四部“关于越南退回借用四处‘869’仓库和撤走派驻有关口岸和仓库的人员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 1966 年，卷号 680（无页码）。

③ 转引自郭明主编：《中越关系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76 页。

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他们给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①] 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有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东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去越的。

1965 年 7 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与有关用货部门协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②] 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你们援越的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 2 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惟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③]

现在看来,中国方面的指责有些牵强。因为军用物资通过铁路运输,确实比海运省时、安全,而且优先、迅速转运援越军事物资也是

---

① Christian F. Osterman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of 1969: New Evidence from the SED Archives, Appendix: Document No. 1,2.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② 1965 年 7 月 26 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 1965 年,卷号 409,第 3 页。

③ 1965 年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 1965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 1,目录 1～21,卷号 135,第 4、5 页。

越南方面的迫切愿望，所以，苏联才提出用中国铁路运送其军援物品。此外，苏联亦并非完全依赖中国的陆路和海运能力，除军用物资外，1965 年下半年苏联、东欧计划运往越南的一般物资总量为 52.29 万吨，其中未经中国港口直接海运越南量为 44.79 万吨，分别约是此期计划铁路过境中国的一般援助物资(7.5 万吨)及军事物资(5.5 万吨)的 6 倍和 8 倍，其比重不可谓不大。① 其实，如果中苏之间没有矛盾，无论铁路还是海路运送苏联的援越物资，本来都是不成问题的。

至 1966 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约 20 余艘船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截至是年 7 月 18 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 11 万余吨。只是苏方海运部报告说，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船只越多，该港口就越安全。而且越方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却有意识地让苏联的轮船通过危险水域，以检查是否有深水水雷。② 为此，苏联方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海运任务。1967 年 4 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1. 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 1 万吨增至 3 万吨；2. 中国开辟 2 个或 3 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③

(三)1970 年至 1972 年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

1970 年至 1972 年是中苏关系由敌对开始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对抗的阶段。此期中国着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即改变面对美苏

① 1965 年 7 月 26 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 1965 年，卷号 409，第 7 页。

② 1966 年 7 月 18 日苏联海运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 5，оп. 58，д. 262，л. 38～41。

③ 1967 年 4 月 7 日、10 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的和解,联合美国与中美的首要敌人苏联进行对抗。

在此背景下,这一阶段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显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与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第一,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越劳党的领导权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中越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①]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第三,中国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的战略进攻态势,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督促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同时劝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尽快结束战争,避免因越战的拖延不决而妨碍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②]

由此,早在1969年9月末以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即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这几个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迅速成立了援越领导小组,开始与越南的受援省谈判确定各种援助项目。[③] 进入70年代后,1970年9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11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

---

① 1972年10月16日李强在答复越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关于越方请中国发运军事物资的要求时提出:属于南方要的,尽快运去,不是南方要的,是否可以慢一步。11月13日李班向李强转达越副总理黎清毅的意见:希望中国发运重武器。因重武器的生产需要时间,故建议中方先从各单位借来交付越方,待供越重武器生产出来后再予归还。如不这样办,一旦停战,国际监督一实行,运送重武器到南方去就有困难。现在未实行国际监督,又是旱季,要抢运重武器到南方去。李强在指出越方有货接不过去,压车的军事物资很多等情之后表示:建议还是想法多运些军火,正如李班同志说的在实行国际监督之前,抢运军火到南方去。参见1972年10月16日、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44、147、149～150页。

② 参见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的谈话。

③ 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27～128页。

受灾省2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增至500万”。中国对外贸易部则发出通知,督促各进出口总公司,将所拖欠的尚未执行完毕的1967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抓紧清理一次,并采取措施设法完成。[①] 此后1971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②] 1971年至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③] 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只是,中国这时也更加积极地鼓励越南向苏联要东西。[④] 如叶剑英对李班等人说:“你们向他们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来,越多越好。如运不走,就存放在中国。”李强则询问越方:是否要求苏联多发运些军火?长征来华时,周恩来也嘱其多向苏联要汽车,等等。[⑤] 中国这么做固然有减轻己方负担的目的,但也含有借此制造越苏矛盾的意图,希冀越方在苏满足不了其要求时因不满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对苏联的离心力。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此期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

①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毛泽东对1970年11月外交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67~1971年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工作的批示,长春档案馆,全宗1,目录1~23,卷号21,第67页;1970年11月14日外贸部关于下达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清单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1971年,卷号23,第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41页。

③ 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62页;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20~0149。上述问题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另据苏联方面估计,1972年中国对越援助额约为50万美元。参见USSR Foreign Ministry Memorandum,“Vietnam—China Relations”,July 4,1973. SCCD,f. 5,op. 66,d. 71,p. 88. 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 231.

④ 1965年中共中央确定的援越方针、策略中即有“鼓励越方向苏欧要”一条。对外经委指示各有关部,要坚持此项策略,“以揭露苏修假支持,真出卖的面目”。参见1965年9月24日对外经委关于中越经济会谈初步总结和今后执行的部署函,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293,第51~53页。

⑤ 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谈话记录,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12月25日李强与吴船、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78、151、165页。

点便是,中国对苏联加强援越、特别是对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态度和方针也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1972 年 3 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攻势以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一,此阶段中国不仅同意苏联大批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而且还主动让越南催促苏方尽速发运货物过来。1972 年 1 月和 3 月至 4 月,中国分别与苏、德、保、罗等国签订了关于 1972 年转运特种物资的议定书。[①] 此后不久,周恩来在 5 月 20 日晚会见李班和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时即提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答应通过铁路提供的物资,凡得用的,越方应催他们快点运来。中国给予免费过境运输。"8 月下旬,中国方面又要越方催促苏联将原定在该月海运但仍未见到货的 5 万吨面粉,赶快通过铁路运来。[②] 另外,中国还为加速运送苏东援越物资事积极出谋划策,向越方建议增辟公路运输,开辟新的线路,中国援越导弹与过境军事物资分走不同的公路;一些物资也可通过铁路联运的办法运来等等。[③]

其二,中国方面同意苏方押运特种物资人员随车从中国过境,并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将允许的数额从不超过 46 名,增加到不超过 60 名,直至由周恩来批准苏联 400 名军事人员不带武器随物资过境。[④]

其三,1972 年 6 月 18 日周恩来向黎德寿表示同意苏联、古巴及东欧各国的过境物资船在中国港口卸货后,中国方面重新对苏联打

---

① 所谓"特种物资"即军需品。1972 年 6 月 6 日、5 月 27 日、6 月 2 日、6 月 10 日中方致该四国的议定书确认函,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 1972 年,卷号 85,第 38～39,34～37,40～41 页。

② 1972 年 5 月 22 日交通部《外交活动简报》特第 10 期;1972 年 8 月 22 日李强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8 月 26 日与吴船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 1972 年,卷号 52,第 53 页;卷号 53,第 126～127,131 页。

③ 1972 年 6 月 25 日、8 月 16 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1972 年 8 月 22 日李强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 1972 年,卷号 53,第 95～96,117,126 页。

④ 1972 年 6 月 6 日中国外经部致苏外经委关于确认中苏双方协议函,7 月 29 日李强致苏驻华临时代办萨福隆关于确认中苏双方协议函,11 月 28 日、29 日援越小组关于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 400 名人员过境运输问题的请示及周恩来批示,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 1972 年,卷号 85,第 38,42,1～2 页。

开了由海运转送援越物资之门。对此,越劳党中央政治局非常感谢,认为这是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极其巨大的援助。其后,中越双方于7月10日就此事达成协议,确定通过陆路或海路转运苏方海运至中国港口的粮、钢、油、糖及袋装化肥等几种物资。[①] 8月初,李强旋即又对越方表示,苏东物资除个别品种如黄铁矿、土豆种、鲜活商品外,中国方面同意都接卸,即便是孵小鸡的机器设备也不例外。[②] 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已不是战争所急需的了。此时,中国不只是准许苏联利用中国的港口卸货,甚至还同意苏供越的"米—6"直升飞机海运到湛江港后,在湛江机场安装并试飞。[③] 1965年时的"空中走廊"之虞,至此似已大大减弱。

其四,恢复代越储存苏联等国援越物资。[④] 1972年6月,黎清毅担心因美国4月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5月布雷封锁越港口,苏东各国有可能以1972年援越协议尚未执行为由而不同越方进行1973年援助的谈判,特指示李班与李强商量,并报李先念批准,请中国同意

① 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会见黎德寿谈话记录;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同李班等谈话记录,7月10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19、21～22页;卷号53,第78、99、98～99页。

② 中国此时做法改变的目的一是为了不至影响港口卸货;二则是由于可以自己使用这些物品。如李强对李班所说的:"你们运不回去我可先使用。我们希望越方能多运,快运回去,运不过去的,我们就使用掉,当然我使用的物资是以后能够归还的。"1972年8月2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15～116页。

③ 1972年10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45页。

④ 20世纪60年代越储存援助物资的情况为,1965年6月,李先念批准了越方关于由中方代为储存苏东各国援越物资的要求。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会谈,商定了关于在华设仓库四处、物资编号"869"、仓库代号"869－1"……运输、仓储手续及结算办法等具体事项。1966年3月,越方向中方正式提出,他们已同苏东国家达成协议,以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港口,加之越铁路改轨后接运能力增大,今后暂不再在中国储存"869物资"。此后至1967年,中国只代越寄存苏联的援越军用物资。参见1965年6月21日、22日外贸部关于越南要求我国代为储存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物资问题的请示及李先念批示;1965年7月26日中越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1966年3月24日外贸部等四部关于越南退回借用四处"869"仓库和撤走派驻有关口岸和仓库的人员的通知;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664,第41～42、45页;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4～5页;国际联络局1966年,卷号680(无页码);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69页。

将越南非常急需的苏东国家援助物资运来并寄存在中国。同时表示,这些物资(主要是粮、钢、油)可请中方先使用,到越南有能力接运时,用中国的物资运交越南。另外,越方还要求中国恢复1966年至1967年的做法,提供仓库寄存苏联运来的军用物资。对此,中国方面均予以同意,并向越方提交了储存物资换文的草案,获其首肯。①

关于越南让中国先使用海运至中储存的援越经济物资问题,主要出于对苏联方面能否及时供货一事的担忧,如越方希望苏提供的26万吨粮食在三个月(9月至11月)内全部运抵中国,但是倘若这些物资不能尽早运来,苏方便有可能因适逢粮食歉收而交不了货,故而请中国帮助将其无力接运的部分消费掉;认为1972年苏联援越物资共100多万吨,而半年过去了,仍有100万吨尚未交付。这些东西"放在他们那里,还是他们的,运来放在中国,才是越南的"。② 另也含有顾虑中国不愿储存苏联物资,由此为达目的而以优惠条件促中国接受的因素。这样,中国方面用掉了不少粮、油、化肥等苏供越物资,表示将来以相同的或他种物资归还。③ 不久,中国又决定将越方不急需而中国用得着、将来能归还的苏东各国援助物资,先用掉,中国不用或无法返还的存入在华中、东北的仓库,不再征求越方的意见。④

上述状况尽管表明此阶段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之事发展比较顺利,但是中苏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只是程度有所降低罢了。下面,略举数例:

1. 中国对苏联在援越问题上的一些宣传举措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向美国作姿态、向中国施压力,既而做出强烈的回应。例如,1972年5月上旬柯西金致函周恩来,要求在中国港口卸货,然后通过中国铁路运越;出席巴黎和谈的越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和河内也就此事

---

① 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谈话记录,8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63～64、69页;卷号52,第19、21、23页;卷号53,第117页。

② 1972年8月16日、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18、64页。

③ 1972年6月25日、7月1日、7月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91～92、82、86～87页。

④ 1972年7月24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07页。

向中国传话或作了通报，希望中苏之间能达成这个协议。此意向原本可以经过协商妥善解决，但是由于塔斯社报道了中国驻苏大使到机场送春水由莫斯科前往北京的消息，周恩来在5月14日会见春水时即尖锐地指出，苏联是想制造一种空气，使人觉得此协议可能已经达成，苏的援越物资可以避开美国的水雷进入越南了。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有这么回事，你不就是要美国人来轰炸铁路吗？如果是假的，你不就是要压中国同意吗？到底是要认真商量事情还是放空气呢？为此拒绝重新向苏联开放港口。5月20日周恩来又继续对李班强调说："苏联船我们仍不同意进来。"①只是在越方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才答应让苏船驶入自己的港湾。

此外，1972年6月苏联援越的导弹运至中国，由于盖的是油毛毡而未如以往那样用篷布遮蔽，到中国境内时都破了，苏方为此提出要中方以篷布加盖。中国方面认为，凭祥铁路越忙，苏联就越要增加过境运输，而且还放风说给越南新的军援，要运导弹过境；且不蒙结实的篷布，这不仅是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过境的是什么东西，更是"让美国人看的，美国的地球卫星可以看到"。从而质问苏方：为什么发运时不盖篷布?!②

2. 中国不愿意苏联介入接运援越物资的商谈和安排等项活动。当1972年7月27日苏联海运部副部长要求由河内乘机来京商谈有关问题时，李强断然表示："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只同越方谈。我们代替越方在港口收货。至于说货到中国境内如何运，他不能管。"并且告知李班："今后转运物资都在北京谈，我使馆不办理。"③以此将该项谈判权力牢牢控制在中国，避免苏越之间私下达成什么协议。

中国并提议与越南采取联运的办法处理苏东等有关国家经海运从中国过境的援越物资，即这些国家的船只到中国港口后就无须再

① 1972年5月14日周恩来会见春水谈话记录，1972年5月22日交通部《外交活动简报》特第10期，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4～6页；卷号52，第54页。

② 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68～69页。

③ 1972年7月27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11、110页。

管他们的货物,余事均由中越双方解决,运抵哪个港口由中方决定。越方表示明白并赞同说,船到港后"这些国家的事情就结束了,他们别再问货物到越南了没有,到了多少等等。他们的货物交到中国港口后所发生的费用、损耗、运输等问题,由越南方面负责"。"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双方知道,不对他们说"[①]。这样,中国通过此种防范措施严格地将苏联排斥在该项事务之外,有关转运的时间、地点等诸般细节苏方皆无权过问。

3. 苏联对中国也是小心提防。1972年8月越方通知中国:在中方同意接运的苏供越4条小船问题上,苏方不愿意按军事物资过境办理手续,建议越方派人到海参崴接货,然后由苏方负责与越方人员一起用三艘大船将小船运到中国南方港口,并在大船上安装完毕,请中方将之吊下水由越方接运,苏船随即办理离港手续,人员不上岸。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对此,中方答复说:"须研究一下。他那么怕中国人,连上岸都不上了,以后运导弹怎么办!?"[②]

4. 中国极力反对苏联政府官员插手援越物资过境问题。1972年11月中国批准转运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400名人员过境后,苏联提出拟准备6个专列运送,列车上武装警卫的吃、住全部由苏方负责,而且苏驻华使馆将派代表上车。为便于联系,也请越、中干部上车。对此,中国方面认为此项要求不合理。"苏联妄图整个武装专列不受监督、不受检查地通过我领土是不能允许的"。并且拒绝让苏驻华使馆派代表随行。对于苏驻华使馆派代表去湛江港参与接运苏供越导弹艇的要求,中国告诉越方准备在快艇被接走后再答复苏方:"不同意他们派人去。"[③]

5. 中国在重新启用海路转运援越物资之初,对海运物资的种类进行严格的限制,坚持规定只运送粮食、钢材、油料、糖四种。1972

① 1972年7月1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80～81页。

② 1972年8月20日晚李强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24页。

③ 1972年11月28日、29日援越小组关于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400名人员过境运输问题的请示及周恩来批示,11月30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85,第1～2页;卷号53,第153～154页。

年6月27日越方提出，除安排运来60万吨粮钢油糖之外，考虑再增加包括黄铁矿、石棉瓦等在内的30万吨物资；中方当即回绝说：周总理同黎德寿同志讲可以多运一些来，指的是越方急需的（四种）物资，其他的以后再具体谈。[①] 对于海运来的四种之外的货物品种，中国还坚持须经越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卸。这种做法耗时很长，致使波、捷、匈三国抵黄埔港的船只迟迟未能卸货，招致苏东方面的指责。对此，中国一方面指出这是造谣生事，另一方面只得打破四种物资的限制，决定不论苏东国家运来什么物资，越方急需与否，全都接下来。[②] 造成这种矛盾冲突的原因可能有几点，一是越方要货多多益善，故没有向苏东方面强调海运过境只限四种物资；二是中方不愿让非越方急需物品长期积压在中国，造成存储困难；三则为苏东国家有意不按中方的意思办。这里前两者的成分更多一些。

四、简要结语

在1965年至1972年末越战期间，中苏两国援越抗美的进程是在中苏分裂，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至走到敌对，进而转入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展开的，加之中越、苏越关系的发展变化交织其间，致使这一进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考察其中的是非恩怨，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其一，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是被动的配合，双方矛盾尖锐，纷争不断。中国强调援越物资运输的计划性，苏联则强调非常时期特殊情况应特殊处理，中苏之间无法良好地进行沟通。中方强烈的反苏情绪，苏方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不高和对中国的不满，以及苏联争取越南，而中国要防止越南向苏联倾斜等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导致双方各执己见，矛盾冲突由此而生。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中国的运输通盘规划确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在两

① 1972年7月6日、7月1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84～86，81页。

② 1972年7月24日下午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06～107页。

国关系友好时期是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的，只是在关系恶化后才构成了严重的事端。这其中，无论中苏双方是无意而为，还是有意为之，都有通过此事项做反苏或反华文章的成分在内。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却并未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两国援越抗美进程的发展。

其二，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针调整逐步完成；中国随越南战争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加强援越，帮助越南抢运物资到南方，促进战争及早结束，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顾及到苏越关系的发展将使自己在中苏越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的一角，故而注意避免引起越方的过度反感，以及中苏开始边界谈判，两国边境形势趋向平稳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与苏联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矛盾的尖锐程度较之 60 年代中后期有所降低，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此期尽管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问题上矛盾根深蒂固，冲突接连不断，但是两国的援助量都是相当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而且，无论中苏之间有什么矛盾，冲突到何种程度，最后的受益者却是越南。

其四，苏联加强援越后，越南得到了从赫鲁晓夫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对苏式先进武器的依赖，使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对中国来说，苏联这时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越苏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国戒心倍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如果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苏联对华实行全包围的企图。① 由此，中苏两国围绕援越抗美问题进行的激烈争执和斗争，即带有了与苏联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援越的主旨已不仅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中国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而当中国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自己重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战略构想时，在地缘政治影响，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的作用下，中越之间的矛盾也带有了更多的利害冲突的性质。

总之，在国际冷战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战争这个舞

---

① 参见 1968 年 4 月 29 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台上，中苏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束缚，又要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故此，中苏援越抗美的斗争才得以顺利发展。只是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及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强硬的反苏倾向和方针政策也从某种程度上使苏联感到了潜在的威胁，进而下定了介入越战的决心。从此，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苏联最终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随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地区霸权主义思想的日益膨胀，中国实际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4、5 期

20.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和苏联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两国边境地区的天空始终晴朗少云。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迹象,毛泽东愈益明确了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由此,他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和两个拳头出击的总体战略之后,又开始考虑继续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将中苏边界问题也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进而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掌握对苏外交的主动权。1969 年中国在中苏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结果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一)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苏边界的划分始于 17 世纪。沙皇俄国于 16 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 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 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 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 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 年)、中俄《伊犁条约》(1881 年)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将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在中俄中段边界，19 世纪末叶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1917 年以后，中国历届政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苏俄、苏联政府反复谈判、交涉，至 1946 年 1 月 5 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①]原中俄中段边界大部分成为蒙苏边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蚕食鲸吞之后，中俄之间 7300 余公里的边界基本确定下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 年 7 月 25 日列宁的苏俄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 19 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 年)、辛丑条约(1901 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②]并不包括 19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订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条约。1920 年 9 月 27 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③]。从字面上看，这一次清理中俄历史遗留问题的立场似乎较第一次宣言又前进了一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苏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左 64 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惟一的一次让步。[④]1923 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重

① 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730 页。

② 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以下简称《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8 页。

③ 《汇编》，第 87 页。

④ 《汇编》，第 241 页。

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旧俄政府提供的租界。[①] 面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②] 1924 年 2 月至 3 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不过是在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了"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③] 在 1924 年 3 月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时废弃旧约,而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提出:"数百年来中俄所订之条约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约未订以前,旧约中有违反 1919 年、1920 年两次宣言精神及有损中国主权的概不实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④]。这实际上即表明,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废除一切中俄旧约的声明并未超过第一次对华宣言所提出的条约范围,将中俄界约也纳入废止之列。1924 年 5 月 31 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此后至 1926 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平等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苏联政府却在 192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 700 多个中国岛屿划去 600 多个,面积达 1000 多平方公里;中苏两国还在 1929 年由于中东铁路利益冲突的加剧,爆发过一次中东路战争。是年 10 月苏军攻陷中国边陲重地同江,11 月又猛攻札兰诺尔和满洲里,中国

---

① 《汇编》,第 198 页。

② 《汇编》,第 206 页。

③ 《汇编》,第 212、215、218 页。

④ 《汇编》,第 242、244、247、248、249 页。

军队连连败北。12 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采纳了苏方的意见。其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苏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并撤军。中东路事件虽是此期中苏边境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但其缘起于中东铁路问题,还不是中苏双方由边界争端而导致的边界事件。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1932 年 12 月中苏恢复邦交。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中苏双方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在国民党败迹明朗化以后,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华关系的转轨。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虽然中苏边界呈现中俄界约线、两国地图线、实际控制线交错并存的复杂状态,但是,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二)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与边界冲突的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结成盟友,在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倚重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基础。特别是 1954 年至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纠正斯大林在苏联与新中国关系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基本解决了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使中国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中苏关系愈益密切,中苏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在 1950 年代始终处于平静状态,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毕竟还是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即在两国关系中伏下了边界冲突的隐患。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上与苏共产生分歧,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处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党"及大国主义作风表示不满。对于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趋向,毛泽东也逐渐由对苏共新领导批判斯大林的大党、大国主义及独断专行等作风的赞同,转变为对赫鲁晓夫集团完全否定并改

变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的忧虑,从而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开始改变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帮助的建设方针,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苏之间的不和谐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 1950 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的方针政策上发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先行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

1959 年 9 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进行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 30 页的绝密报告中谈道:"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①] 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应。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向恶化,齐米亚宁对中国重提旧案也是满腹疑团,但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9 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 月 2 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 7 小时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②] 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

① Mark Kramer, The USSR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 September 1959,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 178.

② 参见 1964 年 9 月 10 日毛泽东与法国技术展览会名誉主席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月至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责备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①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②

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章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统统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 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③。

这以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因此未获结果。在此期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认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新骗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还指责这份文件是修

---

① 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4页。

② 参见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与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③ [苏]A·普罗霍罗夫著、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等译：《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10、212页。

正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文件。[1]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2]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3] 这即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目的。两个月后，苏联对此做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的历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4]。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5]。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

---

①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

② ［苏］A·普罗霍罗夫著、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等译：《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11页。

③ 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与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④ 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1页。

⑤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的谈话，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9月10日毛泽东与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随着苏联对中国军事压力的逐渐加强，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3 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 4189 起，比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①] 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966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严重的边界纠纷，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 年至 1968 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8 年 1 月，苏军又进一步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 4 人，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到 1968 年末 1969 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 年 2 月 7 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②] 中苏边界事件不断扩大，终于在 1969 年 3 月爆发了珍宝岛地区的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国军队通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有力地抗击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权主义政策。

（三）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

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是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在边界问题上的必然反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 1960 年代中期起即开始考虑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放人其对外总体战略的思考当中，进而将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

① 1969 年 5 月 24 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见《人民日报》，1969 年 5 月 25 日。

② 参见徐焰：《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5 期，第 4～6 页。

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19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的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①。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即曾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②“东京湾事件”发生,美国对越武装干涉升级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对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攻打越南北方的问题时谈道: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并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③ 在对美国是否会打中国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的“在短期内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长远看中国是其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者,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国要打中国就得拉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④

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

①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13页。

②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与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毛泽东与武元甲的谈话。

③ 1964年10月5日毛泽东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等人的谈话。

④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的谈话,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①] 对此，虽然由于美方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是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和轰炸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地传达给了中国。[②]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也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勃列日涅夫政权趁美国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也开始考虑联华遏制苏联，从而对中国做出了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这些迹象都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自 196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进行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毛泽东在 1963 年和 1964 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他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而中国即使研制出原子弹，“同美苏比，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③]；一是不断提出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

① 《当代中国外交》编委会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60 页；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445 页。

②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第三卷（手稿），第 16 章第 490 页。麦克法夸尔教授这部新作的英文版最近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李向前同志处读到了这部书的手稿。

③ 1963 年 9 月 3 日毛泽东与印尼共总书记艾地的谈话，1964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3 年 5 月 22 日毛泽东与新（西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

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1]。中共中央在 1964 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做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 年 9 月 2 日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9 月 18 日至 10 月 12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2] 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只大纸老虎,吓唬不了人,中国"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3]。毛泽东要与苏联抗争到底。

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做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 3500 万人。[4] 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 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 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

---

① 1964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10 月 7 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的谈话,10 月 9 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

②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第 262 页。

③ 1964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9 月 10 日毛泽东与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④ 1964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的谈话,2 月 29 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9 月 4 日毛泽东与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宋西的谈话。

⑤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 250、255 页。

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实际上，1964 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而至 1960 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①]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 1969 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②] 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反击是必定的，问题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 年 1 月 24 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

---

① 1989 年 5 月 16 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92 页。

② 中共中央在 1967 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参见 1967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

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订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①]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安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②] 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③] 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

---

①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第318页。

②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第319、320页。

③ 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1号:1969年3月8日"苏联就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Document No. 1: Soviet Report to GDR Leadership on 2 March 1969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 189, 190.

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①] 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四)珍宝岛事件的后果

既然毛泽东已经把中苏的边境冲突纳入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整体思路和策略安排，那么珍宝岛事件的后果也就直接促成了 1970 年代初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

第一，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 3 月 4 日至 12 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 4 亿人次以上。[②]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① 在 3 月 15 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做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见叶利扎维金《柯西金与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一文“导言”作者乌索夫对苏方“达曼斯基岛事件”参加者的采访记录，*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5，с. 44，62。

② 见《人民日报》，1969 年 3 月 13 日。

我们是后发制人。还说，让敌人沾点儿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绝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这也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第三，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① 1969年2月毛泽东就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二十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看一棵珍宝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②

第四，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做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实上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

---

①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645页。

②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72、87页。

的重大决策。

对于任何外交事件、边界事件都可以淡化，也可以渲染。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做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打破国际上对中苏是否真正分裂、是否还会携手共同对敌的猜疑，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上只是一个形式，一种策略、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

苏联对于这次边界冲突，特别是中国在冲突后的举措也是颇值回味的。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随震惊而来的是满腹疑团，开始怀疑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指责中国试图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等国进行政治调情。[①] 可见，苏联对中美联手抗苏的趋向也是忧心忡忡的。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而苏联的核威慑虽然吓不倒中国，但既然中国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军事目的，珍宝岛事件的政治意义本就大于军事意义，那么，使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并摸清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意向也对中国更有利。于是，毛泽东批准了柯西金提出的来京会谈的要求。

1969 年 9 月 11 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②] 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1970～1975）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

① Document No. 1: Soviet Report to GDR Leadership on 2 March 1969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 189, 190.

②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26 页。

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①] 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9月 18 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26 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②] 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试图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局面。[③]

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1969 年 9 月 11日晚 7 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做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

---

①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3, №1, с. 117, 118；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 3 号："苏联关于 1969 年 9 月 11 日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报告"，Document No. 3: Soviet Report on 11 September 1969 Kosygin—Zhou Meeting,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 192。

②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5, с. 57.

③ 1969 年 9 月 22 日苏共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区、市委员会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与会者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关于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巩固并发展两国关系的方针。会上七名发言人的主调是，对苏共正在寻求巩固苏中关系途径的做法表示高兴和赞同。见 1969 年9 月 22 日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区、市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发言速记及哈巴罗夫斯克市委上报苏共中央组织部的会议纪要，Document No. 1: Stenographic Record of Meeting of Khabarovsk regional and city party officials, 22 September 1969; Document No. 2: Information Report Sent by Khabarovskiy Kray (Territory) Committee to CPSU CC, 22 September 196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 194～198。

能处理这样的问题。[①] 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 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10 月 20 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②]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 1978 年 6 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谋求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一再强调缓和苏中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对越南等国人民的支持。[③] 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1970 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 20 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 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 年 2 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 年 2 月和 1974 年 1 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④] 最后完

---

①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3, №1, с. 119.

② *Елизаветин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Н. 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3, №1, с. 113～115. 但中国有材料说，柯西金在会谈中同意了这个概念。见《当代中国外交》，第 242 页。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47 页。

③ Document No. 3: Soviet Report on 11 September 1969 Kosygin－Zhou Meeting,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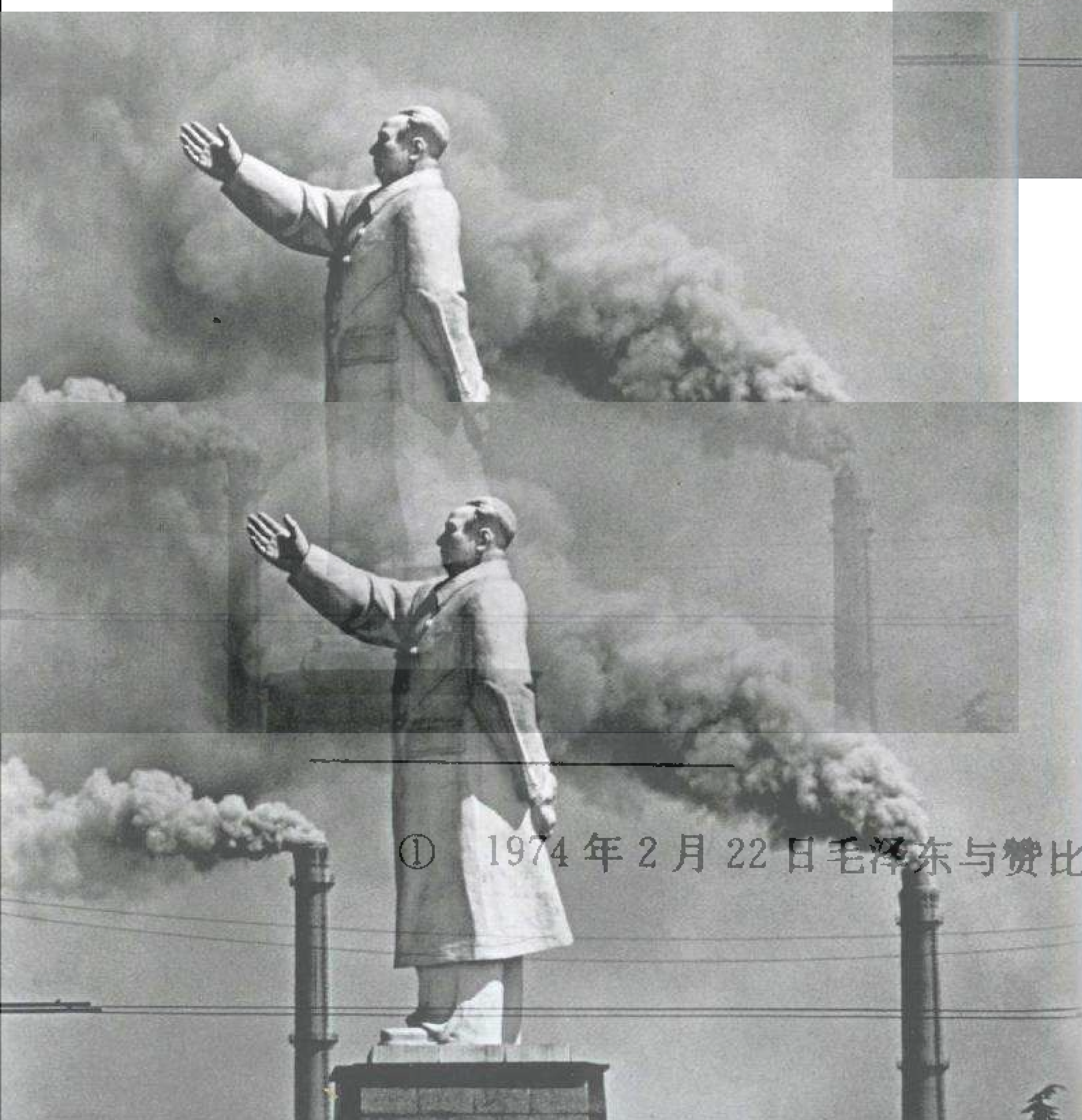
④ 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与基辛格、1974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与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的谈话。“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所有的国家。

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①]明确了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战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促动了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此处略有修订









①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


已批准

